巴西简明史

HISTÓRIA CONCISA DO **BRASIL**



〔巴西〕博勒斯·福斯托/著 （**Boris Fausto**）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巴西简明史**》囊括了自葡萄牙殖民起源到今天500多年的一段历史时期。该书的宗旨不但是要将巴西历史的最重要的史实，而且还要把历史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解释问题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本书的基本设想一方面是可以让广大公众了解以顺畅的语言不失真实地写成的历史，另一方面，则认定认识和诠释过去对于广大公民，特别是青年认识现在和评价未来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是完全必要的。博勒斯·福斯托站在对这500年发展史的诠释人的位置，他自然认为自己的诠释是最适宜的，但也不排斥其他的观点。正因为这样，在不同的时候——例如，在讨论殖民时期结束后，巴西能够保持领土完整的原因时——他努力集中叙述了对各种问题的不同回答。事实上，他就是想以此表明历史，或曰史书不能仅仅描绘过去固定的面貌，而应该是一种由不同作者的观点组成的阐释，当然，这些作者都认为自己的说法是建立在客观事实材料上面的对过去时代最佳的诠释。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肯定，每个历史学家的正确性都是相对的，可以被超越的，而永远不会是专断的。本书注意向读者阐明了所有重要的强硬路线和使人能够理解巴西历史组成意义的制度：殖民制度、奴隶制、自由主义以及20世纪的专制制度等等。同时，本书也收入了对于巴西历史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最新解释，比如，奴隶制在城市财富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就是个例子。此外，本书叙事更为简明，结论在当时又前进了许多，并且包括了史学界对近些年来及对未来前途的研究成果。





www.ssap.com.cn



ISBN 7-80230-144-0/K · 011 定价：35.00元

巴西简明史

HISTÓRIA CONCISA DO **BRASIL**

〔巴西〕博勒斯·福斯托/著
(Boris Fausto)
刘焕卿/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西简明史／〔巴西〕福斯托著；刘焕卿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ISBN 7-80230-144-0

Ⅰ. 巴… Ⅱ. ①福…②刘… Ⅲ. 巴西-历史 Ⅳ. K7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722 号

巴西简明史

著　　者／〔巴西〕博勒斯·福斯托
译　　者／刘焕卿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　　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编译中心(010)85117871
电子信箱／qiuyang@ssap.cn
项目经理／仇　扬
责任编辑／仇　扬
责任校对／麦　琪
责任印制／同　非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市场部(010)6528553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20
字　　数／255 千字
版　　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30-144-0/K·01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6-0825 号
定　　价／3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殖民地巴西（1500～1822）

一　海上扩张和葡萄牙人到达巴西

很久以来，我们在家庭或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都说，巴西是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在1500年4月发现的。这一事实是葡萄牙自15世纪初开始的海上扩张的插曲之一。

为什么一个像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在西班牙人派遣的哥伦布到达南美洲大地之前将近100年的15世纪初，会率先发起海上扩张呢？答案不是惟一的，这里有当时的一系列因素值得关注。首先，当时的葡萄牙在整个欧洲已经是一个具有向外发展倾向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葡萄牙人在13～14世纪的远程贸易中已经积累了经验，尽管还不能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相比，但是正下定决心超过他们。或许，在葡萄牙人把国际贸易控制在自己手里之前，热那亚人为把里斯本变成一个巨大的热那亚式的贸易中心，对他们的对外扩张已经进行了投资。

已有的贸易经验有利于葡萄牙在经济上进入地中海的穆斯林世界，在那里，发展交换是通过日益使用的货币作为付款手段来衡量的。毫无疑问，海洋对这个国家产生吸引力也受到它靠近大西洋一些岛屿和非洲海岸的地理位置的鼓励。在当时的技术条件

下，从葡萄牙港口或西班牙西南部的一些地方出发，能借助有利的海流航行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然而，也存在其他或许比上述因素更重要的葡萄牙政治历史因素。葡萄牙没有逃过西欧总危机，但是，它应对这场危机的政治条件要比其他王国好得多。在整个15世纪期间，葡萄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与卷入战争和朝代纷争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相比，它没有陷入那么剧烈的动荡和相互争夺。

葡萄牙王朝经过1383～1385年革命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阶段后得到了巩固。为了争夺葡萄牙王位的继承权，里斯本的商业资产阶级举行了暴动。接着，发生了人民大暴动，历史学家费尔南·洛佩斯称它是“小民造反”。这次革命和当时发生在西欧的其他事件相似，但是，其结果却同其他国家发生的被大庄园主镇压下去的农民起义不同。当由葡萄牙大贵族支持的卡斯特拉国王进入葡萄牙担任摄政王时，朝代更替问题和独立战争混合在一起。在对抗过程中，葡萄牙独立和革命的中心人物、佩德罗一世国王的私生子、阿尔维斯骑士团大统领——堂·若昂上台执政。

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383年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实际上，从阿尔维斯大统领实行的政策来看，这场革命造成了君主政权加强和中央集权的结果。在这位大统领的周围，对葡萄牙社会有影响的各种社会阶层——贵族、商人、新生资产阶级进行了重新组合。这是讨论葡萄牙海上扩张的原因的一个基本点，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旦取得了统治权和稳定的条件，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是国家，或更确切地讲，是王室。

最后，我们还应该记住，在15世纪初期，扩张是葡萄牙社会的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和组织的利益所在。对于商人，扩张代表着良好的贸易前景；对于国王，在一个王室收入急剧下降的时代，扩张不但是开辟新财源的好机会，也是给贵族找事干和提高他们的威望的好形式；对于贵族和教会成员，效忠于国王或服务于上

帝，使“野蛮人”基督化，能够获得奖赏和在首都狭窄的范围里难以企及的职位；对于人民，投身航海，首先意味着移民、进行取得过更好的生活的尝试以及逃脱暴戾的社会制度的压迫。惟一处于这一利益大聚汇之外的是农业企业家，对于他们来说，国内人手的外流造成了劳动力的匮乏。

因此，对外扩张成为一种使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受益和横贯几个世纪的民族宏图。

海上冒险不仅仅是由贸易的目的推动的。5个世纪以前，在地球上存在着一些人们还没有很好的认识，或完全不认识的陆地和还没有任何船只穿越过的海洋。这些被认为是未知的地域凝聚着欧洲人的想像，他们朦朦胧胧地看到那里存在着一个神奇的王国、有着怪异的人群、是陆地上的天堂所在地。

比如，当发现了美洲大陆时，哥伦布曾经想，在他发现的陆地深处，可能存在着一些人只有一只眼睛，另一些人长着狗一样的嘴。他看到3条美人鱼跳出海面，它们的脸使他深为失望：它们没有人们想像中那样美。在他的一封信中曾提到，在太阳降落的方向，有生来就带着尾巴的人。1487年，当身负发现通往印度群岛的陆路重任的阿奉索·德帕依瓦和佩罗·达科维良离开葡萄牙时，就是带了堂·若昂二世的寻找普莱斯特·若昂王国的指示走的。朝圣耶稣的东方博士的后裔、穆斯林的顽敌普莱斯特·若昂的传说，起码从12世纪中期以来就是欧洲人假想的一部分。这个传说的形成源自一个真实的材料：在非洲东方，有个埃塞俄比亚，那里生活着一个信奉某个基督教分支的黑人民族。

与海上冒险结合在一起的幻想，不应被看做无足轻重的虚构，因为它隐藏着物质利益。但是，毫无疑问，尤其当世界的边缘地区越来越被认识，实际的殖民问题被提上日程时，后者就将占主导地位了。

当全面分析葡萄牙海上扩张时，最后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一方面，它代表了航海技术的一项重要革新。当葡萄牙开始去往

几内亚的航程时，航海图上还没有标明纬度或经度，而只标明了方向和距离。指示盘、星盘等仪器的改善使人们通过星辰的位置，可以判定航船所在的位置，这代表了一项重要的革新。葡萄牙人还发展了一种更合适的航海建筑，建造了三桅帆船，自 1441 年开始应用。这是一种适应当时吃水浅、速度快等条件的轻型帆船，因此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靠近陆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搁浅的危险。三桅帆船被葡萄牙人珍若拱璧，在 16～17 世纪被充分利用在往返巴西的旅程上。

另一点是讲关于人们思维方式的逐渐变化，明显地表现在诸如杜阿尔特·帕舍科·佩雷拉、狄奥格·戈麦斯和堂·若昂·德卡斯特罗等葡萄牙人道主义者的身上。海上扩张越来越表明，在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些旧的思想观念——比如，在普托劳梅乌的《地理》中对世界的描绘——是何等地错误。这样，权威创立的标准开始被质疑。或者说，某个作者靠声望越来越不能保证他的理论的真实性了。

黄金和香料是葡萄牙对外扩张最渴望取得的财富。对黄金感兴趣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黄金作为可信赖货币被应用，同时，也被亚洲贵族用来装饰庙堂、宫殿和服饰。但是，为什么香料，或者说调味品也成为被追求的贵重物品呢？

调味品有如此高的价值可以从当时食品保存技术的局限性和饮食习惯中得到解释。中世纪的西欧是“一种食肉文明”。大量牲畜在夏初、牧草将要耗尽时被杀掉。用盐腌渍、用烟熏制、用太阳晒干的方法可以勉强储藏和保存。这些处理方法也同样被用于储藏鱼类，使食品不致腐坏，而辣椒可以用来掩盖肉的腐坏。调味品也代表着当时的一种饮食品味，就像后来在全世界大量消费的咖啡一样。黄金和香料就这样成为 15～16 世纪人皆追求的财富。但是，这其中还有另一些物品，诸如鱼、肉、木材、染料、药品等等，后来渐渐地增加了会说话的工具——非洲奴隶。

一般都认为，1415 年攻下非洲北部的休达是葡萄牙海外扩张

的起点。有计划的扩张沿非洲西海岸和大西洋的一些岛屿展开。对非洲西海岸的了解和掌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从吉尔·埃阿内斯越过博赫阿多尔角（1434）到巴托洛梅乌·迪亚斯偷偷绕过好望角（1487）用了53年的时间。自进入印度洋开始，为瓦斯科·达伽马到达梦想的令人着迷的香料产地印度提供了可能。后来，葡萄牙人又到达了中国和日本，在那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日本历史学家将1540～1630年期间称为"基督世纪"。

葡萄牙人没有深入非洲领土内部，而是沿海岸建立了一系列作为商业据点的商站。葡萄牙王室组织了非洲贸易，建立了王室对黄金贸易的真正垄断，强迫在一家造币厂制造货币，并在1481年左右建立了米纳造币厂，或称几内亚造币厂，作为对非洲贸易的特别海关。葡萄牙人从非洲西海岸带走了数量不多的黄金粉末，直到那时，其贸易还掌握在阿拉伯商人的手中，活动仅限于通过埃及进行的象牙与一种被称为马拉格塔的胡椒的买卖，还有从1441年开始的贩卖奴隶。最初，这些奴隶被运往葡萄牙，用于从事家务劳动和城市工作。

葡萄牙对大西洋上一些岛屿占领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在这段时期里，葡萄牙人借助奴隶的劳动，获得了在大范围里进行农业种植的十分有意义的经验。经过与西班牙人的斗争，失掉了对加那利群岛的占有后，他们获得了在其他岛屿——1420年左右在马德拉、1427年左右在亚速尔、1460年在佛得角和1471年在圣多美群岛——上耕种的成功。在马德拉岛上，有两个平行的农业系统，为夺取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比赛。对小麦的传统种植吸引了大量自己拥有耕地的葡萄牙小农。同时，在热那亚商人和商家代理人以及犹太人的鼓励下，出现了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甘蔗种植业。

糖业经济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衰落了下去，这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是由于巴西和圣多美糖业的竞争造成的。在这个位于几内亚湾的岛屿上，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与在巴

西创立的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大规模的甘蔗种植体系。这个岛靠近非洲海岸，尤其靠近圣若热德米纳和阿克西姆商站，具有丰富的奴隶补充来源。岛上有许多制糖厂，根据1554年的资料，那里有150～300名奴隶从事制糖的生产活动。圣多美一直是一个奴隶贸易中心，这里的奴隶来自非洲各地，并计划被运往美洲和欧洲。17世纪糖业经历了一个十分困难时期，当时这种贸易已经成为该岛的主要经济活动。

* * * * * *

1499年7月，瓦斯科·达伽马的回程船队的第一艘轮船抵达葡萄牙，掀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潮。几个月后，1500年3月9日，一艘由13艘轮船组成的船队，在一个30岁刚出头的贵族——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的率领下，以迄时王国最浩大的声势，从里斯本特茹河启程离开王国，表面上的目的地是印度群岛。船队在过了佛得角群岛之后，便离开非洲海岸，向西方开去，直到4月21日，远远望见那片后来被称为巴西的土地。这一天，在那里仅进行了一个短暂的登陆，第二天，船队才停泊在巴伊亚沿岸的安全港。

自19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说葡萄牙人到达巴西是海流给他们造成的偶然事件，或说在此之前，是不是他们早已经知道了这个新世界，并负有某种秘密使命，卡布拉尔才向西方航行。这样看，不能排除有欧洲，尤其是葡萄牙航海家在1500年之前曾经到达过巴西海岸的可能性。

二 印第安人

当欧洲人到达后来被称为巴西的这片土地时，遇到了文化、

语言十分类似，分布在沿海一带和巴拉那河—巴拉圭河流域的美洲居民。

在承认他们类似的同时，我们可以将这些人分成两个族群：图皮－瓜拉尼人和塔普亚人。图皮－瓜拉尼人分布在从塞阿拉直到南端的帕图斯湖一带的几乎整个巴西沿海地区。图皮人也被称为图皮南巴人，统治着北部沿海一带直到现在的圣保罗州南部的卡纳内阿；瓜拉尼人居住在巴拉那河－巴拉圭河流域和卡纳内阿与后来被称为巴西的南端之间的沿海地带。尽管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同，但是文化和语言相似，大致都讲图皮－瓜拉尼语。

在沿海地区的一些地方，图皮－瓜拉尼人的领土常常被另一些群体，比如居住在巴拉伊巴河口的格伊塔卡泽人、居住在巴伊亚南部和圣埃斯皮里图北部的埃莫莱人以及占据着从塞阿拉到马拉尼昂一带的特莱门柏人隔开。这些人群被通称为塔普亚人。这个词是图皮－瓜拉尼人对讲另一种语言的印第安人的称呼。

分析印第安人的社会及其习俗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是在面对一个与我们的文化完全不同的民族，而对这种文化，人们曾经并仍然存在着很深的偏见。这些在深浅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在历史学家、旅行家和神甫，尤其是耶稣会教徒撰写的报告中。

在这些报告中，根据对葡萄牙人抵抗程度的强弱不同，将他们分为品质好和品质坏的印第安人。比如，以军事效率高和造反性强而著称的埃莫莱人总被认为是很坏的人。根据上述人的描写，印第安人一般都像常人一样生活在家里，而埃莫莱人则像动物一样生活在森林里。图皮南巴人为了复仇吞噬敌人；埃莫莱人吞吃敌人则是因为他们欣赏人肉的味道。当葡萄牙王室颁布第一部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的法律（1570）时，只有埃莫莱人被特别排除在禁例之外。

还缺乏大量既不是由于不理解，也不是由于偏见，而确实是无法取得的材料。比如，至今不清楚当葡萄牙人到达新世界时，在今天的巴西和巴拉圭的领土上到底有多少印第安人。估计的数

字相差甚远，一说，在这片领土上，总共有200万人，另一种估算则是，仅巴西的亚马孙地区就有500万人。

图皮族人以狩猎、捕鱼、采集果实和农业为生。当耕种的土地变得贫瘠时，他们便临时地或永远地迁移到另一片土地上去生活。为了农业耕种，他们伐树、烧荒——这是殖民者教给他们的一种耕种技术。他们种植豆类、玉米、南瓜，尤其是木薯，面粉也成为整个殖民地的一种主要食品。当时的经济基本是生产生活必需品和仅供自己消费的物质。每个村庄都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仅有很少的食品是用来和其他村庄交换的。

但是，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交换妇女和奢侈品的关系，比如大嘴鸟羽毛和做唇饰用的宝石等。在一些村庄集团反对另一些村庄集团的斗争中结成的联盟就是由这样的关系形成的。战争和俘虏敌人——一些俘虏被杀了用来庆祝食人肉仪式——是图皮社会的组成因素。男子们通过这些活动来取得威信和更新女人。

葡萄牙人的到来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乘大船从远方来的葡萄牙人，特别是神甫——图皮人把他们和所想像的大萨满教徒联系在一起，他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遍地访游，为人治病、占卜，讲述着一个富庶的国度。同时，他们还把白人说成是一种具有特别能力、令人尊敬、令人害怕和令人仇恨的人。

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印第安民族，而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许多情况下是互相敌对的族群。因而，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在与抵抗他们的人的斗争中，很容易找到印第安盟友。在最初的年代里，由于没有圣保罗图皮人的帮助，圣保罗皮拉提宁噶镇险些被塔莫约人占领。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印第安人没有对殖民者——尤其在他们竭力把自己变成奴隶的时候——进行过强烈的抵抗。其中，一个特殊的抵抗形式是通过连续向越来越贫困地区迁徙对葡萄牙人进行孤立。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生物、社会和文化遗产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屈服和被迫屈服的印第安人遭到了文化暴力、瘟疫和死亡的摧残。在与欧洲人的接触中，产生了至今在巴西社会组成中仍悄然存在的印欧混血人种。

然而，从总的方面看，用灾难一词来形容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是最确切的。在那个征服时代，生活在巴西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有几百万，而今天，只剩下了30万～35万人。

三　殖民地化

发现巴西远没有引起像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那样的震动。巴西只作为一块是否可以开发，甚至地理轮廓都还不清楚的土地出现。在许多年代中，人们还认为那只是一个大的岛屿而已。当时，是异域风情的吸引力——印第安人、鹦鹉、金刚鹦鹉——占绝对优势，甚至一些报道者，特别是意大利人，还给它起了个“鹦鹉之乡”的名字。堂·马努埃尔国王更喜欢称它为维拉－克鲁斯，后来又称为圣克鲁斯。巴西这个名字，最初出现在1503年。这和这片土地在发现初期生产的主要财富——巴西木有关。这种树树干颜色甚红，被用做染料；其木质十分坚硬，被用来制作家具和建造轮船。说来令人好奇，回忆起在中世纪的欧洲，“巴西群岛”之类的地方被当做一种离奇之说。在1367年的地图上，有3个以此称为名字的岛屿，分别分布在亚速尔岛群之中、不列颠（法国）纬度上和爱尔兰海岸。

开发巴西海岸的最初尝试是被纳入到非洲海岸的商站系统之中的。巴西被新基督教徒费尔南·德洛罗尼亚，即诺罗尼亚领导的一个里斯本商人联合会租用了3年，这个联合会企图对巴西进行贸易垄断，作为交换条件，每年必须派出6艘轮船去开发300里格（近2000公里）长的巴西海岸线，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商站。该联合会只在表面上进行了几次开发，当1505年租期结束后，葡萄牙王

室就把对新领土的开发权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在1500～1535年之间的开始几年里，主要的经济活动是通过和印第安人交换的方式开采巴西木。这种树不是大面积地生长在一起的，而是零散地生长的。随着沿海地区的巴西木逐渐枯竭，欧洲人便通过印第安人取得这种木材，尤其伐树这种集体劳动是图皮南巴社会的一项共同活动。这样，砍伐巴西木活动可以比较容易地和印第安人生活传统习俗结合在一起。印第安人出售巴西木和少量的木薯粉，换回衣服、砍刀、折刀和小五金制品。

开始，无论是作为已经熟悉的航线上的休整站，还是作为主要是西班牙人开辟的新航线的可能通过的地方，巴西经常和印度联在一起。比如，在1492年，当哥伦布到达安的列斯群岛发现美洲大陆时，曾认为是到了中国海。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占有遭到了葡萄牙的反对，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谈判，最后签订了托德西里亚斯条约（1494）。世界被一条想像的从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处经过的线分为两半球。在这条线以西被发现的土地属于西班牙，位于这条线以东的属于葡萄牙。

这种分法留下了许多争议，因为永远不可能准确地确定托德西里亚斯线从何处经过。直到17世纪末，荷兰人才发展了一项准确测量经度的技术。比如，北部的亚马孙河口和南部的普拉塔河口都被看做从西路通往印度群岛的可能的航道，但它们是在葡萄牙的领土之内还是西班牙的领土之内？两国的多次考察都是沿巴西海岸向南进行的，直到有个效力于西班牙的葡萄牙人——费尔南·德马加良斯穿过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沿太平洋航行，到达了菲律宾（1521）。航海史上这一了不起的功绩，却使西班牙人大失所望。从西路到达印度群岛的航道被找到了，但是行程太长，没有经济利用价值。西班牙人的眼睛盯在了要在他们统治下的美洲大地上找到黄金和白银的财富上。

葡萄牙占领巴西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西班牙人，而是来自法国人。法国不承认瓜分世界的一切条约，而主张有效占领原则，

根据这个原则，谁有效占据一片土地，谁就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法国人参与了巴西木贸易，并沿着应由葡萄牙巡逻队卫戍的超长海岸线进行了海盗劫掠。后来，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在瓜纳巴拉（1555～1560）和马拉尼昂（1612～1615）定居下来。

政治上的考虑使葡萄牙王室下定决心，要对新的大地进行殖民开发活动。马丁·阿奉索·德索扎的远征（1530～1533）代表着新旧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期。为了有效占领的需要，它以进行海岸巡逻、通过向它带去的居民进行非遗产性土地转让建立殖民地（圣维森特，1532）和开垦土地为目的。

当堂·若昂三世决定建立世袭领地时，有迹象表明，马丁·阿奉索仍在巴西。通过一系列从海边向托德西里亚斯子午线划出的与赤道平行的线，把巴西分成15份，并将其交给各个受赐领主。这些领主是一个多样化的集团，有小贵族、官僚和大商人，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和王室有密切关系的人。

受赐的人中有航海家马丁·阿奉索；在东方发迹的杰出军人、虽没有巨大的财富，但在巴西的发展史是以在伯南布哥取得巨大成功而著称的杜阿尔特·科埃里奥；皇家财政法庭书记官、与佛罗伦萨商人和银行家门·德萨及热拉尔迪家族的鲁卡斯·热拉尔德斯关系密切的大商人若热·菲格雷多·克莱亚；在葡萄牙卖掉家产同600个垦民一起来巴西，但在同殖民者发生冲突后被告上宗教法庭，遂乘船回国的佩罗·杜坎波·托雷尼奥。1532年以前，费尔南·德诺罗尼亚从国王手里接受了第一块巴西领地——今天仍保持着原名的圣若昂岛。受赐名单中没有一个大贵族的代表，因为当时在印度、葡萄牙和大西洋岛屿上做生意都比这有更大的吸引力。

这些人接受了朝廷的赐予，从而变成土地的拥有者，但他们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不能出卖和分割这些领地，变更或撤销这些领地的权力在国王手里。这种拥有不但在经济、税收方面，而且在管理方面，都赋予了受赐首领广泛的权利。建立糖作坊和水磨房以及储盐仓库的使用取决于缴税的情况；应上缴王室的巴

西木、贵重有色金属、渔业产品的开发税的一部分也归领主。从管理观点看，他们拥有垄断司法、授权建立村寨和赠送划为小块的土地、征募垦民服兵役和组成在他们指挥下的民兵的权力。

小块土地的赠与使得产生了许多大庄园。把巴西划分为小块土地的概念在人们看来仍是大片未开垦的土地，连同其所有权一起赠给得到这些土地的人，他们有义务——但很少履行——在5年的限期内进行耕种，并将税收上缴王室。王室保留的权利包括垄断药品、香料买卖以及收取一部分税收。假如发生贵族被杀或被刺的情况，国王还掌握着执行司法的权利。此外，国王还可任命一系列官员来保证收取王室应得的税收。

当建立领地时，王室曾搬用了一些源自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成规。比如，赐予领主收取批准建立糖厂的酬谢金的权利就是这种情况，这种酬谢金类似从前农民向封建领主缴纳的“地租”。但是实质上，即使在原来的形式下，领地一直代表着一种过渡性的、探索推行殖民化的尝试，目的是使殖民地融入欧洲市场经济。

除圣维森特和伯南布哥领地外，其他领地由于缺乏资金、内部纷争、没有经验，再加印第安人的攻击，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失败了。因此，那些把制糖活动和对印第安人部落较少侵害的态度结合起来的领地都比较繁荣，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以后的年代里，通过赎买的方式，领地又陆续被王室收回。它们遂变为行政单位而存在，但是由于是属于国家，领地的性质变了。1752～1754年之间，波穆巴尔侯爵实际上完成了领地从私人统治到国家统治的转变过程。

* * * * * *

堂·若昂三世建立巴西总督府的决定是在国际范围里发生了一些和葡萄牙王国有关的重要事件的时候做出的。首先，在对印度的贸易方面出现了危险的苗头。尽管建立非洲帝国的梦想还没有

破灭，但是，葡萄牙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连遭失败。就在托麦·德索扎被派往巴西（1549）担任第一任总督的同年，由于亏损关闭了葡萄牙在佛兰德斯的商站。最后，和巴西大地相对存在的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开采贵重有色金属方面日益取得成功，并在1545年在波托西发现了大银矿。如果说所有这些因素可能对王室做出上述决定产生了压力，我们应该记得，就内部来说，领地制度的失败使对葡萄牙美洲管理不善的问题变得更加明朗。

总督府的建立代表殖民地在组织管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托麦·德索扎——一个在非洲和印度取得了经验的贵族——在包括400多名罪犯在内的1000多人的陪同下，带着很长的成文指示到达了巴伊亚。这些指示的宗旨是要保证对新世界的领土占领，并对其进行垦殖和组织为王国增收。为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设立了一些官职，其中最重要的职务有管理司法的特别法官、负责保卫海岸的军事长官和掌管并保证税收增长的物资供应长官。

然而在16世纪，巴西还不能向皇室国库提供大宗财富。根据历史学家维托雷亚诺·马加良斯·戈迪尼奥估算，在1558年，来自巴西的收入仅占皇室总收入的2.5%左右，与此同时，王国同印度的贸易却占26%。

第一批耶稣教徒——马努埃尔·德诺布雷加和他的5个同伴——怀着向印第安人传教和教育在殖民地声名狼藉的教士们遵守戒规的目的，同总督一起来到巴西。后来于1533年，创立了从属于里斯本大主教的圣萨尔瓦多主教管区，这样就向国家和教会紧密结合的组织机构迈出了步伐。总督府的开始施政也代表着行政管理中心在殖民地的确立。遵照接受的指示，托麦·德索扎对到1763年一直是巴西首都的圣萨尔瓦多做了大量的建设工作。

总督府的建立代表着一种行政集权的努力，但是总督却没有独揽所有的大权，即使在政府建立的初期，也没有开展过包揽各种权力的活动。领地之间的联系十分薄弱，限制了历届总督活动的范围。耶稣会教徒之间的通信清楚地反映了这种隔绝的状况。

1552年，弗朗西斯科·彼勒斯神甫在从巴伊亚写给他在科英布拉的兄弟们的信中，感叹只能讲些当地的事情，因为，“由于时间和很少有轮船从岸边经过的原因，有时整年整年地不通信息，彼此互不了解。有时，看到从葡萄牙来的船，比从其他领地来的轮船还频繁”。一年后，身处圣维森特内地的诺布雷加神甫实际上也讲了同样的情况：“从里斯本来这个领地的信比从巴伊亚来这个领地的信还容易”。

* * * * * *

在经过前30年以保证对新土地的占领为标志的努力之后，殖民活动开始形成。像发生在整个拉丁美洲的情况一样，巴西变成一个主要向欧洲贸易提供食品之类的物品和具有重要意义的矿砂的殖民地。宗主国葡萄牙的政策是鼓励具有巨大实力的贸易公司对少数可出口产品进行大规模出口。这一方针应该是为宗主国的大商人、王室及其宠信者们的财富积累服务的。由于葡萄牙没有控制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手中的欧洲贸易集团，上述方针最终也还是为欧洲经济的整体利益服务的。

选择大产业主是和适宜大规模生产的设想连在一起的。此外，自由小企业主们则是为生活而生产，在市场上出卖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剩余产品，这与成规模的商业行为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除了贸易公司和大产业制度之外，我们还要增谈第三个因素：强制劳动。也是在这方面，尽管其中有某些差异，这个规制对整个拉丁美洲是共同的。在西班牙美洲占统治地位的是各种形式的农奴劳动，而在巴西占统治地位的却是奴隶制。

为什么正好在被堂而皇之地称为现代黎明的时代，要乞灵于在我们看来是半死的、令人憎恶的劳动关系呢？一个综合性的回答是，只能说在那个时候，不但无法大量提供作为半独立者或雇佣工迁移来的劳动力，而且雇佣劳动也不适用于殖民活动的目的。

在土地占有的情况下，一件事是赏赐分成小片的土地，另一件事是对土地的有效占有，在大庄园里保持雇佣劳动者是不容易的。他们可能会设法过另一种形式的生活，从而，产生劳动力流入适合的贸易公司的问题。

但是，如果使用奴隶做劳力可以进行这样简单的解释，那为什么喜欢选择黑人，而不是印第安人呢？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样一种事实，从非洲海岸贩卖奴隶的这种国际贸易，就其本身而言，当时还是一种尝试性贸易，后来才变成殖民地的一桩大生意。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巴西人，在殖民地的最后阶段，都在争夺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权。因为奴隶贩运不仅仅是向大规模的出口产品种植提供劳动力，而且代表着一种财富积累的强大源泉。我们应该记得，在时间和空间上，曾经有一个从使用印第安人奴隶转而使用黑人奴隶的变化过程。这个转变在制糖经济的中心地区的时间不长，却给商业公司带来的巨大的利益，即在制糖经济中，黑人奴隶所产生的效益足以抵消购买他远高于购买印第安人价格的差价。而在边远地区，这一转变时间就比较长些，比如圣保罗就是一例，直到18世纪初发现金矿后，才转为使用大量的黑人奴隶。

除了黑人贸易产生的吸引力外，使印第安人奴隶化和以殖民化为目的的一系列不妥的做法产生了冲突。按照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无法接受制度化的紧张劳动，更不能接受欧洲人所企图的那种强制性劳动。并不是他们游手好闲或懒惰，他们的传统是只进行能够保证基本生活所需要的劳动，这在一个具有丰富鱼类、果实和兽类的时代，是不难做到的。他们更多的精力和想像力都用在了举行礼仪、庆祝活动和战争上面。持续劳动，或今天的人讲的生产力的概念，对于他们来说是莫名其妙的。

我们可以把葡萄牙人力图征服印第安人的两种基本尝试加以区别。其中一种是殖民者根据单纯的经济盘算，简单直接地将其变成奴隶；另一种是通过宗教团体，尤其是耶稣会教徒进行的，因为这一目的和他们的传教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尝试在于，

把印第安人集中在一些小村镇或村庄里，通过教化，努力把他们变成“好基督教徒”。成为“好基督教徒”也意味着要他们养成欧洲人的劳动习惯，用这种方式造就了一批顺从殖民地需要的印第安人农民。

以上两种政策不可等同视之。宗教团体有设法保护印第安人免受殖民者强行奴役的功绩，从而在殖民者和神甫中，产生了无数的悔罪者。但是，这些人不尊重印第安文化。相反，他们甚至怀疑印第安人是人。比如，马努埃尔·德诺布莱加神甫说，“印第安人在吃人和杀人方面，是狗；在弊习和待人方式上，是猪”。

印第安人通过战争、逃跑和拒绝强制性劳动，抵制葡萄牙人的各种奴役方式。相比而言，印第安人有比非洲奴隶更好的条件进行反对奴役的斗争。非洲奴隶是被强迫生活在一个陌生的领土上，而印第安人却是在自己的家乡。

另一个把对印第安人的奴役置于次要地位的重要因素是人口灾难。印第安人是麻疹、天花、流感的牺牲品，他们对这些病根本没有生理抵抗力。1562～1563 年，两次病毒性流行病比较突出，夺去了 6 万多印第安人的生命，这还没有把内地的受害者计算在内。印第安人中有一部分是从事食品植物种植的，他们的死亡在东北部引起了可怕的饥荒和劳力丧失。

因此，从 16 世纪 70 年代开始，王室通过一些法律来鼓励进口非洲人，并开始采取措施制止疯狂屠杀和奴役印第安人不是偶然的。这些法律包含了许多例外条款，很容易被歪曲愚弄。许多印第安人因在“正义战争”——即被认为是防御性战争中，或作为惩罚吃人的实践，或通过赎买等而沦为奴隶。赎买是购买那些要被送到食人肉仪式上杀了让人吃的一些部落的印第安俘虏。直到 1758 年，王室才决定彻底解放印第安人。然而实际上，由于上述的种种困难和通过变通的办法，奴化印第安人的实践早在那之前许多年就已经被放弃了。

当 15 世纪葡萄牙人跑遍非洲海岸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些了解

奴隶商业价值的商会的支持下开始了贩卖非洲人的活动。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里，黑人贸易由于它表现出的高额赢利性，很自然地被开展了起来。尤其通过他们在大西洋岛屿上被用于制糖活动而大为赢利的情况，殖民者了解黑人的智能。许多奴隶出身于铸造铁器和饲养牲畜是司空见惯的文明。他们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印第安人。据估计，17世纪上半叶，在制糖经济高潮年代里，购买一个黑人奴隶的钱要在13～16个月的工作期间分期偿付，即使在一次奴隶价格大涨之后的1700年之后，一个奴隶的卖价也要在30个月内偿清。

非洲人被从所谓“黑人大陆”带到巴西的节奏时紧时慢。对被贩卖的奴隶人数的估算有很大不同。据估计，在1550～1855年之间，从巴西港口进入巴西的奴隶达400多万，其中大部分是男性青年。

奴隶来源的地区是由贩卖组织、非洲当地的条件和（在很小的程度上）巴西主人的喜好决定的。在16世纪，几内亚（比绍和卡谢乌）和米纳海岸，即沿道美海岸的4个港口输出的奴隶数量最多。从17世纪以后，非洲海岸以南的地区——刚果和安哥拉——变成最重要的出口中心，出口港口有罗安达、本格拉和卡宾达。在18世纪，安哥拉人被贩运走的数量最大，相当于那个世纪贩运到巴西的奴隶的70%。

人们习惯把非洲人分为两个大的民族分支：主要生活在西非、埃及苏丹和几内亚湾北岸的“苏丹人”和在赤道及热带非洲、几内亚湾、刚果、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一部分的“班托人”。这个大概分法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在巴西沦为奴隶的黑人——比如，“苏丹人”中的约卢巴人、热热人、哈乌萨人和“班托人”中的安哥拉人、本格拉人、蒙若罗人，都是带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从非洲的许多部落或王国来的。

大的奴隶进口中心原来是萨尔瓦多，后来是里约热内卢，每个中心都有自己的组织和强有力的竞争者。巴伊亚的奴隶贩运商

利用勒孔卡沃——萨尔瓦多周围的地区——出产的一种烟叶作为在非洲海岸进行交换的有效货币。他们一直和米纳海岸、几内亚、贝宁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和后者的联系是在1770年中期后，当米纳海岸的奴隶贩运衰落的时候。由于金矿的发现、制糖经济的进步和自19世纪初以来城市市区扩大，里约热内卢接受的尤其来自安哥拉的奴隶，超过了巴伊亚。

如果认为在印第安人积极反抗奴役的同时，黑人被动地接受奴役，那是错误的。个人地或集体地逃跑，袭击庄园主，日常反抗，从一开始就是奴隶和奴隶主关系的组成部分。通过逃跑逃避奴役，并在巴西重组类似非洲社会组织形式的黑人建立的机构——“逃奴堡”，在殖民地巴西就有几百个。帕尔马雷斯——位于相当于今天的阿拉戈阿斯州一部分地区的一个居民点网——就是这种逃跑奴隶的避难地之一，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它形成于17世纪初，坚持抵抗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围剿近百年，终于于1695年被打败。

人们对帕尔马雷斯逃奴堡的了解很少，仅从葡萄牙一些方面发布的关于它的起义领袖祖穆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监禁和被绞死的消息中得知一些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祖穆比变成黑人奴隶反抗葡萄牙人的象征。今天，他的形象出现在一切黑人奋起的运动中。最近的考古研究暗示，在原先逃奴堡所在的地区，曾经存在一个多样化的公社社会，这个机构不但包括原黑人奴隶，也包括由于宗教原因或犯罪而被王国追捕的白人。

尽管采用了各种抵抗方式，起码直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非洲奴隶，或非洲—巴西人终究没能取得废除强制性劳动的条件。无论好坏，他们都必须适应这种劳动。从限制可能进行集体造反的诸多因素中，我们应该记得，和印第安人相反，黑人是被强行从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拉出来，并被粗暴地分开和成群地投放到异国的土地上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教会还是王室都没有反对过对黑人的奴役。

宗教团体，如圣本托教徒就是站在大奴隶主一边的，用各种论据来为奴役非洲人辩护。他们说这是在非洲早已存在的制度。只是这些奴隶现在被运到基督世界来，在这里，他们将在真正的宗教知识的教化下得到拯救。此外，黑人被认为是一种低下民族。在19世纪的过程中，“科学理论”使成见更强化了：黑人的脑颅和形状以及他们大脑的重量等都“证明”他们智力低下，并十分不稳定，从生理上是生就为人役使的人种。

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在立法上给予黑人的待遇。和印第安人对比，这方面是很明显的。印第安人有保护他们不被奴役的法律，尽管这很少被付诸实践和包含着许多例外。但是，沦为奴隶的黑人却没有任何权利，就是因为他们在法律上就被认为是一种物。

在人口方面，尽管经过澄清的数目各不相同，但是有资料记载，黑人奴隶，特别是儿童和刚到巴西不久的黑人奴隶的死亡率与美国的奴隶人口相比，是很高的。19世纪初的观察家估算，奴隶人口在以每年5%～8%的比率下降。最新的资料显示，在1872年，一个男性奴隶的预期寿命在20岁左右，同期全国人口预期寿命是27.4岁。然而，在1850年左右，一个美国男性奴隶的预期寿命大致是35.5岁。

尽管这些数字很惊人，但是，黑人奴隶没有遭到像我们所说的印第安人那样的人口大量死亡的灾难。好像来自刚果、安哥拉北部和道美——现在的贝宁——的黑人染上像天花那样的传染病的较少。无论如何，即使黑人早熟的健康身体被摧毁，奴隶主们总可以通过进口来对奴隶进行更新和补充。巴西的奴隶制完全依靠这种来源来维持。然而，从来没有进行过增加巴西定居的奴隶人口的努力，在这一点上很少例外。女性奴隶的生殖力很低。另外，考虑到由生活条件低下造成的高死亡率的现实，因此一个孩子养活到12岁或14岁被认为是风险投资。

* * * * *

几个世纪以来，葡萄牙王朝设法保证在殖民地活动中取得最大收益的方式和时行的商业主义经济政策思想有关。在这个政策范围里，各殖民地应该为宗主国的富足做出贡献，把自己变成每个殖民强国与其他列强进行国际竞争的后备区。为此，需要制订一系列把竞争者从相应的殖民地开发中排除出去的准则和规定，组成一个自己的殖民体系。基本轴心是宗主国的“专利权”，即有利于宗主国的殖民地对外贸易的专利权。

设法最大限度地阻止外国船只运送殖民地的商品，特别是直接销售到欧洲各国的商品，反之，也禁止这些国家的轮船运送那些尤其是宗主国不生产的商品进入殖民地。简言之，就是要设法把他们的产品在殖民地的销售价压低到在把它们销往宗主国时仍可取得较大利润的程度。并且，设法使进口的商品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在殖民地的销售也取得比较大的利润。殖民地的“专利权”有各种形式：收取租金、国家直接开发、创立有利于宗主国的一些贸易集团的特权贸易公司等。

在葡萄牙，商业主义法则没有持久地实行下去。令人好奇的是，最彻底贯彻商业主义政策是在波穆巴尔侯爵领导下的18世纪中期，当他的原则已经受到西欧其他国家的质疑的时候。葡萄牙王朝在这些原则上打开了一些缺口，主要是由于他们推行这些原则的能力受到限制。这不仅仅存在着走私，因为走私是对这一游戏规则纯粹而简单的破坏。更主要的还在于葡萄牙在整个欧洲国家中的地位。葡萄牙在海洋扩张方面处于先锋地位，但是却没有办法垄断它的殖民地贸易。早在16世纪，巨大的商业广场不是在葡萄牙，而是在荷兰。当时，荷兰人是葡萄牙的重要贸易伙伴，他们运走葡萄牙的盐、葡萄酒和巴西的糖，去换取工业产品、奶酪、铜和布匹。他们也加入了贩运奴隶的国际贸易。

后来，在17世纪，王室被迫和新兴的强国之一——英国，建立了不平等的关系。这些条件造成了葡萄牙殖民地的“专利权”根据时势而摇摆，位于相对自由、与特权相结合的、有领导的中央集权制之间。这种特权实质上代表着允许其他国家参与对葡萄牙殖民体系开发的收益权。

无需赘述所有进进退退的过程，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1530～1571年，曾有一个相对自由贸易阶段，在这期间，堂·塞巴斯丁国王颁布了葡萄牙轮船在殖民地贸易中的专利法令，这一措施的颁布和制糖经济大发展的初年在同一时期。当西班牙国王占据葡萄牙王位后形成了两个王朝合并时期（1580～1640），以日益限制其他国家参与葡萄牙殖民地的贸易为特征，特别是针对同西班牙开战的荷兰。此外还有资料说，1590年左右，巴西和德国的汉堡仍保持着直接和正常的贸易关系。

两个王朝合并的时期结束后，随着堂·若昂四世宣布自己为葡萄牙国王，由于缺乏规章制度和对殖民地进口市场的控制，曾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自由贸易”阶段。然而在1649年，开始实行一个通过舰队进行的新的有领导的中央集权的贸易制度，主要由新基督教徒出资成立巴西贸易总公司。该公司要保持一个由36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一年两次护送往返巴西的商船，作为交换，该公司享有从殖民地进口葡萄酒、面粉、橄榄油和鳕鱼的贸易垄断以及对这些产品定价的权利。自1694年开始，这个公司变成政府机构。

但是，创立该公司并没有阻止葡萄牙给予荷兰，特别是英国的特许权。简言之，就是葡萄牙王朝以贸易利益换取英国的政治保护。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654年克伦威尔二世强加的条约，保证了英国人同殖民地巴西就除贸易总公司垄断的产品之外的贸易进行谈判的权利。舰队制度直到1765年，当波穆巴尔侯爵决定鼓励发展贸易而限制英国人日益增长的影响时才被放弃。这些要通过在巴西创立代表商业主义政策最新表现的新公司（大巴拉-

马拉尼昂公司、伯南布哥暨巴拉伊巴公司）来实现。

* * * * * *

实际上使巴西实现殖民化的两个基础组织是国家和天主教会，它们彼此相关联，因为天主教被公认是国教。起初，两个基本组织之间有分工。保障葡萄牙对殖民地的主权，并对其进行管理、发展居住政策、解决诸如劳动力和确立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应存在关系等类型基本问题的重要职能属于国家。这些任务要求在巴西定居的殖民者要以承认国家权威为前提，无论是主动接受，还是通过武力，或二者并举来实现这个前提。

在这方面，教会的作用变得很突出。由于教会掌握着对人的教化，“控制灵魂”是驾驭服从，尤其是严格服从国家政权的总思想的最有效的工具。教会的作用还不限于此。它能预见人的生死及降生、结婚和死亡等各个决定性阶段。步入社会，置身于体面生活的各种过程和无罪脱离这个“泪水之谷”，都要依靠教会垄断的活动：洗礼、命名、宗教仪式结婚、忏悔和临终涂油礼、在以意味深长的“圣域”一词命名的墓地埋葬等。

众所周知，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上，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在各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的范围里，随着时代的演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以葡萄牙为例，曾有过一个通过皇家圣职授权使教会附属于国家的阶段。圣职授予权是罗马教廷通过向葡萄牙国家广泛授职，换取王国在它发现的所有殖民地促进和确保教会的权利和组织教会的权利。葡萄牙国王享有收取信徒应缴的“十一税”的权利，即相当于他们在一切活动中的总收入1/10的权利。创立大主教区和任命大主教也由王国负责。

王室授予职务起码从理论上造成了教会对国家更大的依附，像供养教士阶层、建造和守护宗教礼仪用建筑等的任命就是这种表现。为了监督这些任务的执行，葡萄牙政府设立了一个类似国

家宗教局的部门——良知暨教团领导委员会。

由于波穆巴尔侯爵时期（1750～1777）的耶稣会对宫廷都有强烈影响的事实，王室对教会的控制也部分地受到了限制。在殖民地，这种控制还受到了另外的限制。一方面，要把长久以来散布在整个领土上的教士阶层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宗教团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权。方济各会修士教团、施恩会修士教团、本笃会修士教团、圣衣会教团，特别是耶稣会教团的巨大自主权是由多种情况造成的。它们服从每个机构的教规，对于殖民化的许多根本性问题——比如印第安人问题——都有自己既定的政策。此外，随着自己变成大片土地和农业开发的主人，他们的生计问题不再依赖王室。

过着世俗生活的神甫们，一旦有机会，都会从内心里努力摆脱国家和教会强加给自己的重压。实际上，自 1789 年以来，在所有造反运动中都可以察觉到神甫们的存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巴西独立之后的 19 世纪中期。把这种明显却反常的造反特点说成是整个教士阶层共有的，是错误的。在日常活动中，教会默默地、有时也很张扬地、全力执行着自己的改造印第安人和黑人、把服从他们的理念以及服从国家的理念灌输给人民大众的使命。

* * * * * *

殖民时期的葡萄牙国家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理论上，所有权力——作为神授的权力——都集中在国王一人身上。王国——即领土、臣民和财富——也属于国王，都是他的世袭财产。因而，它被列为专制主义国家。这并不是说，国王可以不顾及社会各阶层——贵族、商人、教士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能说是他自己管理国家。不用“国王”，而更喜欢用“王室”一词来表达葡萄牙君主政权，就是表示肯定这后一种意思。如果这个决定性的词变为国王，那由他挑选形成政府的官僚集团，在做决定

时就会有很大的分量。公、私定义的不明确受一系列措施的限制，这些措施主要是为限制国王在财政范围里的行动而采取的。“公利”一词就是为限制国王强行借用或把私人财产据为已有的权力出现的。

建立殖民地政府分散和削弱了王室的权力。毫无疑问，中央决策还是要由宗主国做出。但是，巴西的官员有一个自己的职权范围，在新情况面前他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许多时候还要在垦民的眼前压力和来自遥远的里斯本的指示之间找到平衡。

四　殖民地社会

在殖民地的社会结构范围里，一种基本的排斥原则——至少直到1773年的宪章一法颁布前——还在对一定的范畴进行着区分。这就是纯血统原则。不纯人种是指新基督教徒、已经获得了自由的黑人、一定范围内的印第安人和几种混血人。由于这种种族原则决定了这些人不可能担任官职、接受贵族封号和参加有威望的教团等，1773年的宪章一法取消了新老基督教徒的区别，这并不是说从此以后这种偏见就一下消失了。

歧视的标准实际上仍在对人们进行着区分。比这更甚的是，存在着一种区分人和非人，即自由人和法律上被认为是物的奴隶的分别。自由人或奴隶的划分是与民族和肤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奴隶首先是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种。在整个混血人名称中，有许多特别名称，分为黑白混血人、白人和印第安人混血的印欧混血人和棕色土著人以及黑人与印第安人混血或黑白混血人与黑人生的卡弗佐混血人。

然而，还应该对印第安人奴隶制和黑人奴隶制做一区分。从殖民化开始直到印第安奴隶制正式废除，存在着俘虏印第安人和所谓解放的印第安人，或被管制的印第安人之分。后者是在被抓

获之后一直被置于殖民者的监管之下的印第安人。他们的情况和俘虏印第安人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总的来讲印第安人的情况是很艰难的，不同于黑人。在印第安村庄的宗教团对印第安人的保护仅限于纯粹和单一的剥削。王室则要设法建立一种歧视较少的政策。

比如，1755 年的许可证制度甚至鼓励印第安人和白人结婚而不受任何“名誉损伤”，并且对这种混血后裔在“工作和荣誉”方面给予优待，禁止把他们叫做“红皮土著人”，或类似被认为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在以后的年代里，巴西副国王将一位军事长官降为一个印第安人，就是因为“他表现了如此低下的情操，竟然和一个黑人女子结婚，这种结合玷污了他的血统，从而不配担任上述职务”。

非洲人和非洲—巴西人种在巴西社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从殖民末期的居民人口比例情况中得到证明。在 4 大地区——米纳斯吉拉斯、伯南布哥、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州，黑人和黑白混血人分别占人口总数的 75%、68%、79% 和 64%。只有圣保罗州白人占多数（56%）。这些奴隶工作在农村、作坊、矿区、在大宅院里当佣人。他们在城市里从事笨重而艰苦的工作，做货物和人员运输工，做气味难闻的大粪工，或在建筑工业领域工作。有的也做工匠、小商贩、路边叫卖者和传信人等。

奴隶制关系不能归结为不涉及其他人的直接主仆关系。当时，有给第三者服务的租赁奴隶，在城市中心有“赚钱奴隶”——这在 19 世纪前几十年的里约热内卢是很常见的。封建主允许奴隶们做“生意”、为他人服务、或推销商品，自己坐收每天或每周固定的回报金。赚钱奴隶被用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方面，数量从一个到 30 个，甚至 50 个。可以说他们大部分人活动在大街上，甚至是在主人的允许下沦为倡伎或乞丐，也有的在店里做理发师和工人。

即使在奴隶中间，也不是不存在分别的。一些表现在所做的工作上，因为有在大宅院里服务和在农田里干活、是大产业里的

奴隶，还是城市中的赚钱奴隶的区别。另一些区别是指奴隶的民族、在巴西生活的时间和他们的肤色。“傻蛋”是刚从非洲来的奴隶，还不懂得巴西的语言和习俗；“滑头”是已经比较“适应”环境的奴隶，懂得并会说葡萄牙语；土著人是在巴西出生的人。一种是肤色深黑的黑人，另一种是肤色较浅的黑白混血人。一般来说，黑白混血人和土著人比较适合做家务、手工艺和监视工作，而其他比较繁重的工作则落在了黑人，尤其非洲黑人的头上。

* * * * * *

除在类别上对广大奴隶进行区分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殖民地巴西有为数众多的自由非洲人或非洲—巴西人以及被解放的奴隶。有关那个时代末期的材料表明，这个阶层占了黑人或黑白混血人口的 42%。他们的身份往往是模糊不定的。一个本来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自由人，在实践中，尤其当其肤色和相貌长得像某种黑人时，往往再次被蛮横地打成奴隶。他们不能在市政厅或诸如圣弗朗西斯科附属教团等有声望的兄弟会工作。即使一个已经被解放的奴隶，如果被认为是对原主人表现不敬，原来的解放也可以被撤销。

奴隶制是一个国家制度，深入到整个社会集体之中，关系到其行为和思维方式。成为奴隶主的愿望和占有奴隶的努力，从统治阶级到城市小手工艺者人人皆有，概莫能外。作坊主和矿山主有几百个奴隶，小农有两三个，家庭里只有一个。对黑人的偏见一直延续到奴隶制消灭之后，甚至在改变着我们的时代。起码直到巴西中南部引进大批欧洲劳动者时，手工劳动在社会上还被鄙视为只是“黑人干的事”。

理论上，殖民地的自由人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次序。社会划分成的等级——贵族、教士、平民——是旧制度的特点。这种在

葡萄牙时行的模式移植到巴西的实效很小。贵族的封号为白人精英所贪求，但是，却没有一个是世袭的贵族。贵族很少，但企图成为贵族的普通人却占大多数。

这并不意味着殖民地社会仅仅由奴隶主和奴隶组成。种植庄园主、小农和劳动者居住在农村；只有在少数城市里集中了街头商贩、小商人，手工艺者。这种情况不是静止的。贩运奴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使之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以里约热内卢和萨尔瓦多贩运商为代表的精英阶层。自 18 世纪初以来，米纳斯吉拉斯、戈亚斯和马多格罗索州发现黄金和钻石与 19 世纪初王室到达里约热内卢，各以自己的方式，成为社会多样化和城乡关系改变的因素。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行政官僚、文人和从事所谓自由职业的人，尤其是律师，那是指在米纳斯地区和像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城市。

* * * * * *

不同的活动是有着不同的价值的。具有最大魅力的活动，尤其在初期，不是某个活动本身，而是“作坊主的形象”。安东尼尔神甫在 18 世纪初的作品《药材和矿藏创造的巴西文化和财富》中的那句名言是这样的：“作坊主是许多人都渴望得到的称号，因为，它可以带来许多人为之效劳和赢得尊敬。……作坊主在巴西受到的尊敬类似于有爵位的人在王国贵族之中的受尊敬的程度。”

从事商业被认为是一种不受尊重的职业，理论上，生意人是被排除在议会和荣誉之外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新基督教徒的事实增加了另一种受歧视的成分。工匠们也是被蔑视的，因为，手工劳动被认为是一种下贱的工作。在议会里，他们几乎从未有过代表，但有时他们也能让王室指定主持大城市市政厅的职业法官——“外来法官”，来听取他们的意见。

* * * * * *

在自由人的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在奴隶贩运商精英之侧，是农村大产业主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这是东北沿海地区和后来的里约热内卢的典型画面。在殖民地生活中起着战略作用的大商人，在理论上，他们的活动不受歧视。相反，17世纪中期以来，他们描绘了一条社会和政治地位上升的曲线。他们越来越参加到议会和声望巨大的兄弟会中去，并在民兵组织中担任了高级职务。

在高层的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一些既接近又对立的方面。一方面，在大量奴隶和下层社会的自由人面前，他们在总体上已经组成殖民地的社会统治力量。商人经济地位的上升有利于他们加入到殖民地的精英中去。通过婚姻和购买土地的手段，许多大商人也变成了东北部的作坊主，以至于已达到了有时可以打破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区别的程度。

另一方面，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强大理由。大商人，尤其在担任了王室组建的特权贸易公司的领导职位后，直接影响着进出口产品的价格。此外，他们向农村大庄园主预付资金，作为土地使用保证金来支持种植业和购买奴隶及设备。债务问题和关于展缓期要求问题的争论在东北部糖作坊领域里是常有的事。当双方的争夺伴着土著农村庄园主和葡萄牙商人的出身划分出现时，就变得更加激烈了。

争端严重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1710～1711年发生在伯南布哥的所谓小商贩之战。两个城市——奥林达和累西腓——之间的对立，表面上表现为作坊主的旧奥林达和“小商贩”的累西腓之间的积怨已久的复仇活动。实际上，累西腓只有很少的小商贩，是大商人——其中还有一些是在王室举行的拍卖会上——争夺到收税权而使自己的权力大为增强的人在作祟。

* * * * * *

一种同纯血统原则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划分表现在宗教方面。根据规定，居住在巴西的王国臣民都是天主教徒。但是，存在着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不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问题。少数天主教徒是根据葡萄牙君主制度的决定（1497），被迫转为天主教的新基督教徒——犹太人或他们的后裔。他们被怀疑秘密信奉犹太教。自殖民地初期以来，新基督教徒——作为商人、工匠或作坊主——起着突出的作用，也担任着许多世俗和教会的职务。尽管有这样突出的作用，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新基督教徒遭到歧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被监禁，甚至死在宗教法庭法官的手里。然而，相比而言，这种迫害没有达到在西班牙美洲开展的迫害的那种程度。在巴西没有常设宗教法庭。这个法庭恐怖的巡查，除了在1763～1769年“光顾”过大巴拉州外，只在葡萄牙王朝掌握在西班牙国王手中的时期进行过。宗教裁判所在1591～1595年之间曾分别设在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州，后于1618年又回到巴伊亚。

* * * * * *

最后，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家庭领域里男女之间的区别。传统上，尤其受吉尔贝托·弗雷伊雷的著作影响，殖民地的家庭观念是和家长制模式——一个由血缘亲属或姻亲、家丁和被收养者组成，在一个男性人物无可争议的领导下的大家庭——联在一起的。家长制家庭标志着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不带有统治阶级，更确切地讲，东北部统治阶级的特点。大家庭在下层社会的人中间从来没有存在过，当妇女没有丈夫和伴侣的时候，都希望有更大的独立性。比如，在欧罗普莱托城（1804）的203个被认为是家庭的单位中，只有93个是以男人为首的。

即使对于精英家庭，女人在家庭中甘受支配的情况也有例外。在某些情况下，她们在经济活动中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这种情况发生在圣保罗地区，在那里，妇女被一个1692年左右的领地统治者描写为“名人和强人”，当男人们多年来投身内地远征队的时候，她们担负起了管家和理财的重担。

殖民地时期的人绝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当时，城市发展很慢，一般都附属于农村。就连殖民地的首都也被16世纪的维森特·多萨尔瓦多骑士描写为“房子没人居住的古怪城市，因为，主人都在农村的庄园里度过更多的时间，只有在节日才回来。城市人口包括那些被迫居住在城里经商和司法、财政、战争部官员执行公务的机构”。一位耶稣会神甫认为17世纪的小圣保罗的贫困是“经常缺乏居民居住造成的结果，因为一年除了三四个主要节日之外，他们都住在庄园里，奔跑在森林里和原野上，寻捕印第安人，以此消磨他们的时光”。

这种景况由于包括奴隶贩运商精英在内的大商人的影响不断增长和改善城市质量的行政机构的陆续增加，才有了部分改变。荷兰人的入侵，尤其皇家到达里约热内卢也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 * *

在巴西历史上，对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根本相反的基本解释。其中之一，是确定统治中心在国家。作为遗产主义国家，统治的起源是自14世纪开始，以早熟的中央集权和一部大成法律的生效为特征的葡萄牙国家的形成。在殖民地，国家官僚加强了它的中央集权工程，重点是政权和镇压机制。它通过军阀和在必要情况下以国家的名义行事的远征队，把手伸到了遥远的内地。

更早的与此相反的指导思想认为，在松散无作为的国家面前，

社会的一个方面在殖民地占了支配地位。统治核心在大地主，是他们在执政、立法、掌握司法和对内地的部落作战，以保护居住在他们庄园附近的人民。庄园是他们的封建城堡，也是他们主持的宫廷。

因为两个主要理由，不能赞同一种或另一种解释的路线：第一，因为它们是强加于不同空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模式；第二，当把国家作为一方，把社会作为另一方彻底分开时，就等于排除了两个领域交叉的可能性。从更早的时候开始谈起，我们可以讲，不存在国家和它的功能被私人集团填充的情况确实发生在像从事牧业的东北部内地的一些地区。但是，这不能用来定义殖民地更一般的情况。

另一方面，葡萄牙国家和一个成功地移植到殖民地来的镇压性的官僚机器的思想不相符合。把葡萄牙的行政组织移植到巴西的努力碰到了由于殖民地辽阔、宗主国遥远和许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而产生的无数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更确切地说，是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国家在扩大着它的统治范围，其存在尤其表现在以出口经济为主要核心的地区。直到 17 世纪中期，权威行动也只有在总督府所在地及其周围的领地可以得到有效贯彻。在其他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宗教命令，特别是被认为是国中之国的耶稣会教徒的命令，或者是农村大庄园主和印第安人猎获者的命令。

18 世纪初，由于发现了金矿和钻石，国家加强了控制，目的是组织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和对新财富收取赋税的保障机制。然而，即使这样，也只有米纳斯吉拉斯州，大力铲除一切敢于抵制它统治的人的迪亚曼提诺县才与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形象相符合。

这不是说没有办法建立国家和殖民地巴西社会之间的尊重时间和空间差异的关系的总标准。首先，我们在谈及国家的高级活动时，几乎总是能够分清国家行为和社会的主要利益。王室和它任命的在巴西的官员起着不一定符合这些利益的殖民地生活总组

织者的作用。比如，限制奴役印第安人，或通过强制性种植的办法来保证庄园里的印第安人的食品供应等措施，受到了印第安人捕获者和农村庄园主包括发动暴动在内的强烈反对。

但是，国家和社会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天地。相反，存在着以公、私空间定义不明确为特点的国家领导社会和社会领导国家的双重运动。如果说一方面，国家浸透着私人的利益，那另一方面，国家的行为却没有对公民的个人保障权益建立的明确界限。归根结底，一切财产都属于国王的遗产主义的葡萄牙国家的特点和被认为是社会某个方面集体代表的阶级代表服从家庭团结的殖民地社会的特点是契合一致的。

家庭或统治阶级联盟中的家庭，作为不但由血统亲属，而且由教父、教子、被保护人和朋友组成的亲朋网出现。对于王室，国家是国王的世袭财产，执政者应该是在忠于国王的人们中挑选出来的人。而社会的统治阶层努力在国家机器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或接受执政者的造福于家族网的恩赐。

由此，通过各种渠道，形成一个不是根据客观和尊重法律标准，而是根据忠诚标准施政的政府。有一句著名的话说，“对于朋友，一切好说；对于敌人，法律解决”，总结了上述的观点和实践。

五 经济活动

地区性多种经营是殖民地经济生活的特点。

在沿海一带，东北部是新大陆殖民化和城市化的第一中心。当时，东北部的状况不是必然的结果，而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直到 18 世纪中期，东北部地区集中了殖民地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活动；在这个时期，南方是边缘地区，城市化程度很低，和出口经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萨尔瓦多，直到 1763 年，

是巴西的首都，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是它惟一重要的城市。尽管没有它直到18世纪中期的牢靠的人口材料，据估算，在1585年有居民14000人、1724年有25000人、1750年有将近4万人，其中一半是奴隶。这个数字看来很少，但和其他地区——比如圣保罗在1600年只有不足2000人的情况相比，还是不可轻视的。

制糖是东北部地区社会经济活动中心的中心。糖无论在用途上，还是在它的生产地域上，都可以说有一段漫长而不断变化的历史。在15世纪，糖还是一种香料，被用做药品或外国风味的调味品。在16世纪的一本烹饪配方书上说，它正在欧洲贵族消费中取得地位。后来，糖很快便从一种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

奠定糖在巴西生产的牢固基础是在1530～1540年的10年间。在1532年进行的远征中，马丁·阿丰索就带了一位制糖专家和一些在马德拉制糖活动中有经验的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佛兰德人，在从圣维森特到伯南布哥的所有领地都种植了甘蔗并建立了糖作坊。总督府的这一活动的中心目的是鼓励在荒废的巴伊亚领地进行糖的生产。托梅·德索扎带来的指示中包括一系列鼓励甘蔗种植和建立糖作坊的规定，并且，除了其他优惠外，在一定时间里给予免税待遇。此外，通过条例规定，总督还在萨尔瓦多附近的皮拉贾建立起了一个王室出资的糖作坊。

在圣维森特领地，马丁·阿丰索是股东，股东还有也许是殖民地南方最大的作坊——圣若热多斯埃拉斯莫斯制糖厂——的葡萄牙人和外国人。这个糖厂的名字来自从原股东的手里购得它的德国人埃拉斯莫·舍茨的名字。在里约热内卢州，特别是坎普斯地区的甘蔗生产，也占很大分量，但是直到18世纪，主要产品还是甘蔗酒，而不是糖，特别是这种酒还曾被用来作为与安哥拉进行奴隶交易的货币。

殖民地的大糖业中心是伯南布哥和巴伊亚。这些地方成为糖的产地，可从有利的气候、地理、政治和经济因素中得到解释。以上两个领地处在沿海地区，把优质土壤和适中的降雨量结合在

一起。这些地方位于距欧洲进口中心比较近的地方，随着萨尔瓦多和累西腓成为重要港口，这两个地区具有产品出口更方便的条件。

* * * * * *

建立一个作坊是个大举动。一般包括甘蔗种植，购置甘蔗加工设备，厂房建设，购买奴隶、牲畜、饲料、运输车辆和建设领主宅院等其他事项。甘蔗加工成糖的操作是复杂的。一开始，就要求较高的管理能力和多年过程中不断完善的技术。要经过榨取甘蔗汁、纯化、净化等几个阶段。磨甘蔗要通过一个由水力或兽力推动的鼓轮系统来完成。一些水动作坊由于其规模和生产力大而以皇家作坊著称。

在殖民地时期，无论在巴西还是在葡萄牙都未建立过制糖厂。巴西糖称为黏土糖，因为在制造过程中用了黏土。这并不意味巴西糖质量不好。黏土糖可制成在欧洲深受欢迎的白糖以及精制糖，这种糖呈灰色，当时被认为是劣质糖。这样，用黏土制成白糖的技术部分弥补了没有制糖厂的不足。

一个作坊的建立和运转是价值昂贵的活动，需要依靠贷款支持。在16世纪，这种贷款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佛兰德、意大利等外国或宗主国的投资者。后来，在17世纪，这种投资好像变得不重要了。起码在巴伊亚，两个主要贷款之源是占第一位的宗教慈善机构和商人。商人和作坊主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为建设糖厂提供资金和用预付款的形式来发展糖的生产，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有提供进口消费品的便利条件。双方在甘蔗收获后结账。许多时候，商人接受用糖来偿债，但价格要比市场上低。糖的贸易历史最终避开了地方，甚至葡萄牙插手。尽管葡萄牙在垄断其美洲殖民地的最营利的产品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大的进口中心仍然还是在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和热那亚，它们具有规定

价格的巨大权力。

从役使印第安人逐渐转为役使非洲人，这种情况明显地表现在糖的生产领域里。1550～1560年的10年间，在东北部地区的糖作坊里实际上没有非洲人。当时的劳动力是印第安人奴隶和少量来自耶稣会教徒村庄，接受很少工资的印第安人。我们举一个大作坊——其注册登记至今还存在的巴伊亚的塞尔希培多贡德作坊——为例，通过它可以对这个转变是怎样出现的有一个概念。在1574年，非洲人仅占这个作坊奴隶劳动力的7%；而1591年，是37%；在1638年左右，这个作坊的全部劳动力都是非洲人和非洲—巴西人了。

奴隶们包揽了大量工作，大部分是农村的繁重劳动。在磨坊、火炉和锅炉旁工作的条件更恶劣。在磨坊里工作的奴隶失去手和臂是司空见惯的事。大火炉和锅炉产生的热是难以忍受的，在那里工作的人还要冒着被烧伤的危险。许多奴隶从很小就接受这种被认为是对造反者进行惩罚的工作的锻炼。尽管如此，在特殊的情况下，也给奴隶提升职务级别，有的甚至被提为“老板”——制糖工长的一种助手，或工长。这是一种负责最后一些工序和对糖的生产质量负责的专业劳动者。

有些作坊主在殖民地生活中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成为一种财富和权力的贵族，但是，不是欧洲存在的那种世袭贵族。国王授予那些工作出色或用钱购买的人以贵族称号。但是，这些称号的级别不能超过那些世袭的贵族。我们不能夸大社会稳定和一些作坊主的财富，不能把一些家庭的特点的东西概括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总体情况。甘蔗生意带有许多风险，其成功要靠价格波动、良好的管理和手中掌握的大量奴隶。作坊的存在要比它的主人长久得多。同一个名称的作坊存在了几百年，但已经转了几次手。

在最初的年代里，谁是作坊主？一些原本是贵族出身或葡萄牙政府高级官员的家庭，一些是带着财产来的移民和同时从事生

产的商人。很少是贵族子弟，也不都是教龄很长的天主教徒。在巴伊亚的第一批作坊主中，新基督教徒很具有代表性。1587～1592年之间，在厂主的身份得到证实的41座作坊中，就有12座是属于新基督教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这些背景相同的家庭之间的联姻，作坊主变成一个性质相同的阶级。当时，他们的一些有威望的成员极力把自己描绘成出身于一个在葡萄牙就已经建立了贵族根基的门第。

在奴隶主和奴隶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诸如工匠（铁匠、木匠、制锁技师等）和制糖师傅等从事专业工作的解放奴隶和白人劳动者。其活动和作坊密切相连的最大的自由人群体是甘蔗种植者和没有钱建立作坊的独立生产者。他们依附糖坊主，但是，有时当糖坊甘蔗生产的活儿缺乏时，也有一定做生意的能力。黑白混血人或获得了解放的黑人奴隶很少做甘蔗种植人。认可这种种族排斥使甘蔗种植方面的经济能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从普通人——即拥有一两个奴隶的小片土地耕种者，到拥有20～30个奴隶的另一些人，都希望成为糖作坊主候选人。

抛开糖业生产的发展细节不谈，我们来区分一下以战争、外国人侵和竞争划分的殖民地时期的几个基本历史阶段。在1570～1620年之间，由于欧洲需求的增长和实际上没有竞争的情况，存在着一种扩张的形势。从那时开始，作为30年战争在欧洲大陆爆发（1618）的后果和后来荷兰人入侵东北部地区的原因，问题开始复杂起来。

尽管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区别，但总的来说，入侵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后果。侵占萨尔瓦多（1624～1625），对于巴伊亚湾的糖业经济是灾难性的，而对于伯南布哥却非如此。然而，伯南布哥遭受到由1630～1637年之间的荷兰再次入侵引起的斗争产生的后果，与此同时，巴伊亚却从国际市场的产品缺乏和价格提高中大受其益。

在17世纪30年代，出现了竞争。英、法、荷三国在小小的安

的列斯群岛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甘蔗种植，对东北部地区的糖业经济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价格形成更加脱离了葡萄牙商人和巴西殖民地生产者的控制。同样也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安的列斯群岛的生产引起了奴隶价格的提高，也刺激了英、法、荷在非洲海岸黑人贸易方面的竞争。巴西糖业经济再也回不到“大好的旧时代”了。然而，在殖民地时期，糖的出口收入一直占第一位。即使在黄金出口高潮中，糖起码在合法贸易中仍然是最重要的产品。这样在1760年，糖的出口相当于巴西出口总值的50%，而黄金则占46%。除此之外，在殖民地末期，糖的生产出现了新的势头，已不局限于东北部地区。波穆巴尔侯爵采取的措施和一系列的国际事件对扩张更加有利。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应该把1791年发生在法国殖民地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圣多明戈斯的奴隶大起义放在突出位置。在10年的战争中，糖和咖啡的大生产商圣多明戈斯退出了国际舞台。在19世纪初，巴伊亚、伯南布哥和里约热内卢州在重要的命令下，开始进行糖的生产。圣保罗开始显露头角，但仍是一个小出口者。

从社会和经济观点讲，殖民地的东北部地区不仅仅有糖的生产，甚至就是因为糖的生产引起了在一定范围内的多种经营活动。甘蔗种植的专业化倾向作为一种后果，带来了食品缺乏，从而刺激了食品——特别是木薯的生产。牲畜养殖也部分地和食糖经济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 * * * * *

烟草生产是第二大出口贸易活动，尽管和糖相比还相差很远。最大的产烟区在巴伊亚小海湾地区。那里生产各种烟草，从出口欧洲的最精纯细美的烟草，到因用做非洲海岸交换货币而倍显贵重的最粗厚的烟草。在小范围内生产烟草的现实使得由原来的木薯生产者或拥有少部分资金的葡萄牙人组成的一部分小业主的存

在成为可能。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这部分人中的混血人在不断增长。有材料显示，1684～1725年之间，巴伊亚有450名烟草生产者，其中只有3%是混血人，而在18世纪末进行的类似的研究表明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7%。

* * * * * *

牲畜养殖开始是在糖作坊附近的地域，但是，由于有占据用于种植甘蔗的肥沃土地的倾向，牲畜养殖者被推向内地。1701年，葡萄牙政府禁止在沿海80公里之内饲养牲畜。畜牧业担负着开发“大内地”的使命。牲畜饲养者深入到了皮奥伊、马拉尼昂、帕拉伊巴、北里约格朗德、塞阿拉和从圣弗朗西斯科河到托坎廷斯河以及阿拉瓜亚河的广大区域。这些地区比沿海有更广阔的大庄园的特点，在那里，牲畜可活动在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上。17世纪末，在巴伊亚内地有面积比葡萄牙还大的庄园产业，有的大庄园主甚至拥有100万公顷的土地。

六　伊比利亚联盟及其在巴西的反映

葡萄牙王朝发展方向的变化在殖民地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在葡萄牙王位空缺带来的危机的情况下，葡萄牙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要求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做葡萄牙的国王，结束了阿维斯王朝(1580)。西班牙的波旁占据葡萄牙的王位一直延续到1640年。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贵族之间密切的联系外，与殖民地世界相关的利益也沉重地压在了这个解决办法上。由于两个王朝的结合，葡萄牙的商业资产阶级希望更多地进入西班牙在美洲的市场，以奴隶和食品换取白银。

伊比利亚联盟实际上曾一度引起对托德西里亚斯条约的子午

分界线的否认，向葡萄牙垦荒者开放了进入位于亚马孙地区和今天是巴西中部地区的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州的领土。

从制度观点看，这个时期最重大的措施之一是颁布了菲利普王朝法典（1603），这部立法巩固和扩大了葡萄牙法律。这部法典在巴西实行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它的一些条款直到民法法典生效（1917）后才被废除。

两个王室联合带来的最大后果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葡萄牙与荷兰的接近消失了，作为荷兰和西班牙业已存在的冲突产生的后果，让位于一个公开对抗的时期。在美洲殖民地世界里，斗争围绕着控制糖的贸易和奴隶贩运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荷兰对巴西的入侵——殖民地时期最大的政治—军事冲突。荷兰人开始了对非洲海岸（1595）和萨尔瓦多城（1604）的掠夺性进攻。然而，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12年（1609～1621）停战协定曾使葡萄牙处于相对平静状态。停战结束和荷兰西印度群岛公司的建立标志着情况在发生变化。这个由国家和私人赞助者出资成立的公司，以占领葡萄牙美洲的糖产区和控制奴隶补充来源为主要目标。

入侵由1624年占领萨尔瓦多开始。荷兰人只用了24个小时的时间就控制了萨尔瓦多城，但是，实际上却没能走出它的城区。被称为好男儿的人们逃到了首都附近的一些庄园里，在那里组织了由自己选出的新总督马蒂亚斯·阿尔布盖尔盖和大主教堂·马科斯·戴舍拉领导下的抵抗运动。他们利用游击战术和依靠从欧洲赶来的援军，阻止了侵略军的进一步扩张。一支由52艘军舰和12000多人组成的舰队加入了战斗队伍。经过艰苦的战斗，荷兰人终于投降了（1625年5月），但他们仍在巴伊亚坚持了一年的时间。

对伯南布哥的进攻，以1630年攻占奥林达为开始。从这个插曲开始，战争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1630～1637年是抵抗战争时期，以荷兰政权在包括自塞阿拉到圣弗朗西斯科河之间的广大

地区站稳脚跟作为结束。在此期间，葡萄牙—巴西人眼中的反面人物，多民格斯·费尔南德斯·卡拉巴尔表现突出，此人出生于卡尔沃港（阿拉戈阿斯州），他熟悉战区一带的地形，从葡—巴军投降荷兰军，变成荷兰军队的得力合作者，直到被俘和处决。

第二个时期是从1637～1644年，以相对和平为特征。这与荷兰亲王毛雷西奥·德·纳绍为首的政府有关。纳绍这个名字和一系列的重要政治举动和行为联系在一起。为了结束经济瘫痪状态和建立与地方社会的联系，他命令以信贷形式出售逃亡到巴伊亚的产业主抛下的糖作坊。他关注解决供应危机问题，迫使农场主按所拥有的奴隶人数种植“国食”，即木薯。

这位亲王是个加尔文教派教徒，但能够容忍天主教徒和一切情况都表明对之表现不敬的犹太人。所谓隐蔽犹太人，就是暗中供奉自己原来宗教的新基督教徒，也被授权公开供奉自己的宗教。在1640年开始的10年间，累西腓有两个犹太教堂，许多犹太人从荷兰移民来到巴西。当荷兰人撤出巴西时，投降的条件之一是允许原来站在荷兰人一边的犹太人迁走。这些人随即去了苏里南、牙买加和新阿姆斯特丹（纽约），或回了荷兰。

纳绍还为一些艺术家、自然主义者和文人迁来伯南布哥提供方便。在这些艺术家中有写生和描写巴西生活景物的画家弗朗斯·波斯特。这位亲王的名字还同累西腓的地位改善连在一起，该城被荷兰人提升为领地首府，代替了奥林达。并在一种使之成为阿姆斯特丹缩影的企图下，在累西腓老城旁，修建了带有道路和河流设计的毛雷西奥城。由于同西印度公司发生冲突，纳绍于1644年回到了欧洲。

第三个时期是1645～1654年的战争时期，被称为光复时期。西班牙、葡萄牙两个王朝的合并没有带来和平。葡萄牙与荷兰的关系在西班牙统治葡萄牙之前发生了改变。两国在1580年之前的和平关系没有自动恢复。荷兰人仍然占据着巴西的部分领土，并且没有从这些地方撤走的意思。

反对荷兰人存在的主要造反中心在伯南布哥。在这些造反中，杰出的人物有安德烈·威达尔·德内格雷罗斯和若昂·费尔南德斯·维埃拉，后者是当地最富有的庄园主之一。和他们一起的还有黑人亨利格·迪亚斯和印第安人菲利普·卡马冷。葡萄牙—巴西人在经过开始的几次成功的战斗后，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并延续了数年。在造反者控制了内地之后，累西腓还在荷兰人的手里。在瓜拉拉佩斯的两次战斗中，由于起义者的胜利（1648～1649），相持局面被打破。此外，一系列的事件使入侵者的情况复杂起来。西印度公司发生了危机，已经没有人再愿意对它进行投资了。在荷兰，有一个主张对葡媾和的集团，其借口是在塞图巴尔的盐贸易是荷兰鱼加工工业的基础，比海外殖民地的令人质疑的利益具有更大的经济意义。最后，在 1652 年，荷兰和英国的战争开始，使它在巴西的军事行动的资源枯竭。第二年，一个葡萄牙舰队从海上包围了累西腓，终于迫使荷兰人于 1654 年投降。

荷兰占领的历史是一个反映殖民地生产和奴隶贩运之间关系的明显例证。荷兰人很快稳定了在东北部地区的制糖工业，并设法保障补充奴隶的来源，控制了在非洲的奴隶供应渠道。实际上，出现了荷兰在距离遥远但相互牵连的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情况。1637 年，米纳海岸数处被占领。葡萄牙恢复民族独立后不久，荷葡停战被纳绍占领安哥拉罗安达和本格拉（1641）的行动所破坏。在萨尔瓦多·科莱亚·德萨指挥下的葡萄牙—巴西军队于 1648 年重新占领安哥拉。像若昂·费尔南德斯·维埃拉和安德烈·威达尔·德内格雷罗这样的人领导着那个在非洲殖民地的葡萄牙政权不是偶然的。

东北部地区为战争动员的资金占抵抗阶段费用的 2/3 和收复失地斗争的几乎全部费用。同样，战争的第一阶段，是由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那波利雇佣军组成的军队占大多数，而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则是当地部队加伯南布哥人在数量上占优势，在军事指挥上也同样占优势。主要是这些人发明的以“巴西之战”对抗“欧

洲之战”的飞行战战术，并以此取得了对荷兰人决定性的胜利。

强调地方力量的作用，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一支“三个种族联盟”模式的民主军队。正是由于其重要性，卡拉巴尔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才作为“大叛徒”出了名。但他不是惟一的叛徒。实际上，荷兰人一直得到了当地许多作坊主和甘蔗种植者，还没真正融人或尚未融人葡萄牙殖民地秩序的群体，诸如新基督教徒、黑人奴隶、塔普亚印第安人、穷人和赤贫混血人的帮助。卡马冷的印第安人和亨利格·迪亚斯的黑人组成了葡萄牙—巴西联合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抵抗运动还是停留在低水平上的。比如，1648 年，亨利格·迪亚斯的队伍只有 300 人，相当于军队总数的 10%和当地奴隶人口的 0.75%。

当时出现的驱逐荷兰人的形式推动了伯南布哥本土主义的发展。在 200 多年的过程里，直到“海滩革命”（1648），伯南布哥一直是要求自治、独立和公开造反的活动中心。直到巴西独立，其主要打击对象还是宗主国葡萄牙；此后，占主要地位的是争取省自治，许多时候带有社会诉求的色彩。多年来，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况和参加斗争的社会团体，本土主义有着各不相同的内容。但是，它作为伯南布哥社会理想中的基本思想保持了下来。

七 周边地区的殖民地化

远离殖民地生活主要中心的巴西北部地区，过着与东北部截然不同的生活。那里的殖民地化进展缓慢，同欧洲市场的经济一体化直到 18 世纪末仍然十分薄弱，而印第安人的强制性劳动却仍占统治地位。为简便起见，我们把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介绍，但是，不能忘记马拉尼昂为一方，亚马孙地区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的深刻不同。

直到 1612 年，当法国人在马拉尼昂落下脚来，并建立了圣路

易斯时，葡萄牙人还没有表现出在这一地区定居的兴趣和可能性。失去领土的危险使葡萄牙人在1616年掀起了驱逐法国人和建立贝伦城的斗争。这是佩德罗·戴舍伊拉之旅（1637）沿亚马孙河逐步深入，直到秘鲁的基础。1690年，葡萄牙人在黑河口，在今天玛瑙斯所在的附近建立了一个很小的前哨站。葡萄牙王室在巴西的北部建立了一个政府，并建立了设有和巴西国家分立的州长和行政管理机构的马拉尼昂和大巴拉州。马拉尼昂州至少正式或断断续续地存在到1774年。

印第安人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文化方面在这一地区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在整个18世纪，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是"通用语"，即一种图皮语的变种。当时，人民中的混血是很普遍的现象，这是因为尽管努力从亚速尔群岛派遣了大量移民到路易斯来，当时白人妇女仍然很少。

如果说殖民地巴西所有的地区都存在货币缺乏的问题，在北方地区，这个问题表现得就更为严重。直到18世纪中期，产品直接交换，或用棉布和可可做货币是常见的事。建立以糖和棉花为基础的大量出口农业的企图到18世纪末失败了。在这个时期，马拉尼昂很快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棉花生产区，还将棉花种植扩展到北部地区。总的情况是，北部地区的生产是建立在被称为"内地药物"的森林产品的基础上的，如香子兰、菝葜以及印第安人和混血人沿河采集并带到贝伦去卖的本地可可。

印第安人的大量存在使北部地区变成以耶稣会教徒为首的宗教团体最重要的传教活动区域之一。据统计，在1770年左右，有近5万印第安人生活在耶稣会教徒和方济各会教徒的村庄里。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甫的行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位神甫1653年，作为耶稣会教徒团的修道院院长来到巴西。为了限制对印第安人的过度侵害，开展了大量的讲经布道活动。葡萄牙王室代表、殖民者和宗教人士在这一地区的冲突是经常的。耶稣会教徒遭到极大的仇视，因为他们有一个不同于殖民者的、企图通过文化渗

透来控制印第安人的计划。此外，他们拥有大片的养牛和种植棉花的庄园和糖作坊，并积极参与内地的药物贸易。他们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终于在1684年被驱逐出马拉尼昂。在王室的支持下，两年后他们又回到了巴西。但是，直到1759年，耶稣会教徒被彻底驱逐出巴西，传教士和殖民者之间的平衡状态一直是非常脆弱的。

维森特·多萨尔瓦多教士在1627年撰写巴西的第一部历史时，感叹殖民化的强盗性和葡萄牙人无力在新大陆内地进行殖民活动的事实，说他们只能"像螃蟹一样抓挠着海岸"。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国家的中南部，情况却开始变得大不相同了。

圣维森特领地的殖民化，开始于在沿海地区种植甘蔗、建造糖作坊。这些活动并不遥远。这里生产的糖很快便开始和东北部的糖竞争了，但是，由于土壤质量和距离欧洲港口较远而处于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大量印第安人的存在，为这一地区吸引来第一批耶稣会教徒。神甫和殖民者抱着不同的目的，投身到内地巨大的冒险之中：他们登上了马尔山，沿着印第安人小道开路，一直到达海拔800多公尺的皮拉提宁嘎高原。1554年，诺布莱加和安什埃塔神甫在这个高原上建立了圣保罗村，后于1561年变为镇。在那里，成立了耶稣会教徒学校。处身在这被天然屏障与海岸隔开的地区的第一批殖民者和教士越来越向内地深入，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通过由迪埃特、帕拉纳伊巴及其他河流组成的水路网走遍这一带大地。

在很久以前的圣保罗地区和北方的边缘地区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出口农业薄弱、印第安人众多、殖民者和教士为控制印第安人进行争夺、货币奇缺和经常以物易物。这里的印第安人影响尤其明显。由于白人妇女缺少，混血现象十分普遍，由此产生了白人和印第安人结合的混血儿，被称为印欧人种。直到18世纪，

图皮语是这里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圣保罗的葡萄牙人也采用了许多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他们使用弓箭和使用火枪一样熟练。

由于在征服印第安人的方法和目的上的不同，殖民者和传教士再次发生了冲突。比如，教皇和葡萄牙王室做出决定（1639～1640），重申限制对印第安人进行奴隶化活动，在里约热内卢、桑托斯和圣保罗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耶稣会教徒被从这些地区赶了出去，只有在1653年，他们才又回到了圣保罗。

尽管开始同北部地区相似，但是，圣保罗地区从16世纪末就有了自己十分独特的历史。那里的居民把种植葡萄、棉花、小麦同使他们在巴西这片不熟悉或开发很少的区域里实现深刻内地化的其他活动结合起来。圣保罗的养牛庄园主在东北部的分布，深入到了从圣弗朗西斯科河谷地到皮奥伊的广大地区。在南方，现在的巴拉那州——有人企图在那里开矿——也变成了圣保罗的广大地面。牛羊遍布在圣卡塔雷纳、南里约格朗德和东班达（乌拉圭）的广大地区。

个人活动和对保证地区占领及尽可能把疆界伸向西班牙美洲地区感兴趣的王室的行动结合在一起。从亚速尔群岛来的移民和圣保罗人在圣卡塔雷纳建立了拉古纳（1684）。在此之前的几年里（1680），葡萄牙人在面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普拉塔河畔，建立了萨格拉门托殖民区，企图以此干预秘鲁，尤其通过该河运输进行对外的白银贸易。

八　内地远征队和圣保罗社会

圣保罗人在17世纪的殖民地生活中留下的最大的标志是内地远征队。有时可以聚集起几千印第安人的远征队开往内地，在那里，往往一次要呆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寻找可变为奴隶的印第安人和贵重金属。被抓获的印第安人参加这些远征队是不难理解

的，因为，战争——与农业相反——是一种适合印第安社会的活动。印欧人和印第安人的人数经常超过白人。比如，1629 年进攻瓜伊拉地区的马努埃尔·普莱托和拉波佐·达瓦雷斯的远征大军就是由 69 个白人、900 个印欧人和 2000 多个印第安人组成的。

远征队被派向四面八方：米纳斯吉拉斯、戈亚斯、马多格罗索和那些西班牙耶稣会教徒组织的瓜拉尼印第安人村庄所在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中，突出的有位于巴拉那西部、巴拉那帕内玛河和伊瓜苏河之间的瓜伊拉，在那里，远征队发起了接连几次抢劫、摧毁和抓捕印第安人的战役。一些远征队进行了具有巨大冒险吸引力、与经济目的混在一起的广泛游历。久经锻炼的拉波佐·达瓦雷斯，在 1648～1652 年之间，行军 12000 多公里：他向巴拉圭方向进军，一直到达安第斯山支脉，接着继续向东北方向进发，穿过现在的朗多尼亚州，接着又下行到马莫雷河和马德拉河，从亚马孙最后到达贝伦。

王室的利益和远征队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些远征队受到葡萄牙政府的鼓励，另一些则没有。一般地讲，在一定时期里，寻找贵重金属、抓捕印第安人和领土扩张和宗主国的目的是一致的。远征队也为镇压北部和东北部的曾经降服了的人的宗旨服务，老多明戈斯·若热和其他圣保罗人，马吉亚斯·卡尔多佐·德阿尔梅达在北里约格朗德参加了镇压长期造反的印第安人的以“野蛮人之战”（1683～1713）著称的战斗。老多明戈斯·若热本人还领导了消灭阿拉戈阿斯的帕尔马雷斯共和国逃奴堡的最后战役（1690～1695）。

据耶稣会教徒观察家估计，仅在巴拉圭一些传教会俘虏的印第安人就达 30 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其他估算的数字也总是比较高的。怎样处理这些印第安人呢？最有力的迹象表明，他们的许多人被卖到圣维森特，特别是 17 世纪糖生产发达的里约热内卢做奴隶。据圣本笃会的资料，里约热内卢圣本笃会修士办的糖作坊的 1/4～1/3 的劳力是印第安人。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

荷兰人的干涉，在1625～1650年之间出现了缺乏非洲奴隶补充来源的形势。在那些年代里，鼓励开展远征队活动不是简单的巧合。

有材料表明，在后来的几年里，大量被抓捕来的印第安人被用在发展圣保罗经济，特别是在小麦种植方面。这些活动集中在17世纪，和荷兰人的入侵联在一起。由于葡萄牙船队被破坏，当时进口小麦很少。同时，大量外国军队驻在东北部地区，扩大了消费的可能性。在印第安人后备来源下降和进口产品竞争面前，随着战争的结束，小麦种植下降了，最后终于消失了。

* * * * * *

在他们对内地的普查中，圣保罗人终于实现了葡萄牙殖民者多年的梦想。1695年，在今天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萨巴拉和卡埃特附近的维利亚斯河一带实现了第一次重要的黄金发现。传统上，人们把以“祖母绿猎手”著称的费尔南·迪亚斯的女婿波尔巴·加托的名字和这一次重要发现联在一起。在此后的40年里，又在米纳斯吉拉斯、巴伊亚、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找到了黄金。和黄金一起的，还有1730年左右在米纳斯北部的弗里奥山发现了经济意义稍逊黄金的钻石。

贵重金属的开发在宗主国和殖民地都产生了重要的效应。竞相开采黄金在葡萄牙引起了第一个向巴西移民的洪流。在18世纪的前60年中，从葡萄牙和大西洋一些岛屿来巴西的移民达60万人，平均每年有8000～10000名各种阶层的人：有小业主、神甫、商人、妓女和各种探险者。

另一方面，贵重金属暂时缓解了葡萄牙的财政问题。自18世纪初以来，长期成为结构性问题的英、葡之间的贸易结算不平衡，在几年之内，就用来自巴西的黄金偿清了。贵重金属收入实行了三路分销：一部分留在巴西，使米纳斯地区相对富裕起来；一部分带回葡萄牙，支付了堂·若昂五世年间（1706～1750）的开销，

特别是王室的费用，诸如修建庞大的马弗拉修道院等工程的费用；最后一部分，以直接的形式——走私渠道，或间接的形式——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加速了英国的资本积累。

贵重金属的骤然兴起伤害了东北部地区的制糖经济。在黄金发现之前的20年里，制糖工业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还没有停产。然而，毋庸置疑，受到了人口转移的打击，尤其由于需求增加，也受到奴隶劳动力涨价的打击。在行政管理方面，殖民地生活的轴心转向了中南部地区，特别是输入奴隶、流出黄金的里约热内卢。1763年，副王朝首都从萨尔瓦多迁往里约热内卢。两个城市人口大致相当（近4万人），但是，一个成为首都，一个则仅仅是东北部的重要城市而已。

矿业经济使之产生了殖民地的远距离区域之间的某种联结。牲畜和食品从巴伊亚运往米纳斯，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南方不仅运来牛，而且运来驮运商品极为需要的骡马。圣保罗内地的索罗卡巴由于是个著名的集市，从而变为运销到米纳斯地区去的牲畜船队的必经之路。

* * * * * *

黄金和钻石的开采促使葡萄牙王室在巴西建立了更加广泛的制度干预。葡萄牙政府为税收管理做了巨大的努力。不论是为本区所用，还是为避免黄金竞争开采发生混乱，在矿区和殖民地的其他地方都采取了组织社会生活的许多措施。为了减少走私和增加收入，王室确立了在多年过程中几经变更的税收形式。

从总的方面讲，实现了两个基本制度：五一税和人头税。前者规定，生产的所有黄金的1/5属于国王。黄金的1/5是从铸金厂带走的金粉或金锭中扣除。王室为取得更大的收入而抛出的代替五一税的人头税，包括范围更广。对于采矿人，是对12岁以上的男女奴隶，不论其生产与否，按人头征收的一种税收。淘金者，

即没有奴隶的采矿人，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下，也要缴人头税。除此之外，对于诸如采矿场、商店、客店、屠宰场等机构也都要缴税。

王室的另一个关注是对进入矿区的人建立限制制度。在采矿活动开展的初期，圣保罗镇政厅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只有对发现金矿有贡献的圣保罗镇的居民才能获得开采权。事实证明，在由葡萄牙人和大量涌到矿区来的巴西人，尤其是巴伊亚人组成的浪潮面前，这种企图是行不通的。由此引发了以“恩博阿巴人之战”[①]（1708～1709）命名的，以圣保罗人为一方，以外国人和巴伊亚人为另一方的内战。圣保罗人的企图没有得逞，但是取得了与里约热内卢分立的圣保罗暨金矿领区的资格（1709），圣保罗镇同时被提升为市级单位（1711）。1720年，米纳斯吉拉斯也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区。

如果说圣保罗没有取得对矿区的垄断权，那葡萄牙王室却在努力避免使其成为自由领土，并企图通过制定移民准则来阻止撤销葡萄牙居民区。禁止修道士进入圣保罗是国王给领区长官的一道命令，并决定拘捕所有居住在圣保罗市的“无业或没有许可证”的宗教人士（1738）。从淘金活动一开始，那里的修道士就被怀疑进行走私活动。金银匠由于其职业性质也受到监视。他们在时时面临被驱逐出采矿区的威胁下，被迫离开了圣保罗。

王室进行的另一项努力是设法制止矿区和国家其他地区之间出现过大的不平衡。禁止运出从葡萄牙进口的商品，并采取了保证东北部地区奴隶补充的措施，规定了奴隶进入矿区的限额。

为了保证“法律和命令”的执行，王室设立了审判委员会，任命了特别法官。

这些法官，很多时候不但负责审理案件，而且负责监视五一

---

① 恩博阿巴（葡语 Emboaba）是巴西殖民时期，圣保罗远征队的后人给到内地寻找黄金和宝石的葡萄牙人和巴西外省人起的绰号。

黄金税的收取，这在原则上本来应是司法大总监的任务。为了控制奴隶、押运黄金和镇压暴乱，1719 年，特从葡萄牙向米纳斯吉拉斯派去两个连的职业武装力量——龙骑兵，还创立了不但由白人领导和白人，而且由自由黑人和混血人组成的为对付紧急事件的民兵。

葡萄牙政府没有能够完全达到他们在矿区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距离的遥远、地方当局的腐败、这些权威人士在王室和殖民地世界中间的地位、政府官员的职权冲突都是阻碍葡萄牙政府行为实现的因素。此外，来自里斯本的指示没有凝聚力。怀疑、迟误、指示方向的改变，都对上级意图和现实之间拉开距离起了作用。

* * * * * *

涌到米纳斯吉拉斯来的各种社会条件的人不仅仅来自葡萄牙。自从携带印第安人奴隶的圣保罗人到来后，这里有来自巴西各地的移民。这样，便产生了一个不但由采矿人，而且由商人、律师、神甫、庄园主、工匠、官僚、军人组成的成分繁杂的社会。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同殖民地密切连在一起的利害关系。因此，在米纳斯发生一系列的暴动和反对殖民地当局的密谋，不是偶然的。尽管人民中最富有的阶层多是大庄园主，尽管他们在遥远的地方投资开矿，但是，社会生活却集中在作为居住、交易和纪念活动中心的城市里。在这些城市中心，涌现出了许多艺术、文学和音乐方面的优秀文化活动。禁止宗教团体进入米纳斯鼓励了世俗宗教团体——兄弟会和附属教团的出现。他们主持了米纳斯巴罗格式教堂的修建。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人物有葡萄牙建筑工人和一个女奴的私生子——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里斯本，即阿雷若迪尼奥。

奴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最繁重的工作是淘金，当河床里的金沙被淘尽的时候，他们还必须到地下坑道里去寻找。因痢疾、

疟疾、肺炎等疾病和事故死亡，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有统计表明，淘金奴隶的有效生命不过7～12年。接踵进口的奴隶，补充着米纳斯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替换着失去劳动能力的奴隶。尽管制糖业面临危机，出口到巴西的奴隶人数在1720～1750年之间却增加了许多。1776年，米纳斯领区的人口资料表明，黑人和黑白混血人占绝大多数。在近32万居民中，黑人占52%左右，黑白混血人占26%，白人占22%。

多年来，种族混血日趋加强，妇女比例增加，1776年占总人口的近38%，并出现了对其解释颇有争论的现象：一说，奴隶解放的数目很大；一说，仅解放了一些奴隶。为了对规模有一个概念，在1735～1749年之间，解放奴隶占非洲人后裔人口的不足1.4%，而在1786年左右，他们的比例竟占到了这个人口总数的将近41%和全领区居民总数的34%。这个比例如此之大，已经超过了巴伊亚，对它的解释的一个最可能的假设是，在米纳斯地区，由于采矿业的逐渐衰落，对于许多业主来说，对奴隶的占有已经变成次要的、或经济上是行不通的了。

矿区社会通过黄金和财富思想联在一起。但是，这种财富是应该有许多限制的。我们应该马上可以分辨出黄金开采竞争的初期和后来的阶段之间的不同。开始时期，即17世纪最后10年和18世纪初期，没有其他活动支持的寻找黄金，导致了食品的缺乏和充斥着整个殖民地的通货膨胀。饥饿达到了极点，以致许多随从人员都被迫抛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和经济活动的多种经营改变了当时的贫困状况。米纳斯社会终于积累了财富。这种踪迹仍表现在今天的历史城市建设和艺术作品中。

但是，这些财富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一个不但从事不稳定的黄金开采，而且致力于围绕着金矿开采所形成的各种生意和商机，包括雇佣政府为其服务的集团。在这个集团之下的广大的自由人阶层是由穷人或小职员、经济财富有限的商人和为创业而奔波的人们组成。毫无疑问，矿业社会比糖业社会更开放、更复

杂。但事实并不因此从整体上看已不再是一个贫穷的社会。采金高潮时期是在1733～1748年之间，从那以后，黄金开采开始衰落。19世纪初，黄金生产在巴西经济总量中已经不再占大的比重了。矿区的倒退是显而易见的，这只要回忆一下生活紧张的城市变成带有停滞味道的历史城市就够了。比如，欧罗普莱托市在1740年有2万多居民，而到1804年，仅剩下7000人。

然而，倒退没有伤及整个米纳斯吉拉斯领区。因为在这个领区，并不都是采矿业。即使在采金鼎盛时期，米纳斯的农村庄园也都是把畜牧业、糖作坊和面粉生产与淘金结合在一起的。由于畜牧业、粮食生产和后来的制造业的支撑，米纳斯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倒退。相反，在19世纪的过程中，该地区扩大了这些活动，保持了奴隶进口的流量持续不变。米纳斯省代表着奴隶制和既非单纯农业种植，也不为外部市场所左右的经济的一种奇妙结合。

九 殖民地经济总结，国内市场

传统上，尤其自卡尧·普拉多·儒尼奥尔的著作之后，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宗主国葡萄牙把巴西变成一个开发的殖民地的目的赋予了殖民化最深刻的意义。这个目的是以大规模的出口性生产为宗主国取得大宗收入和资本积累的方式来组织殖民地经济的。

没有人怀疑这正是葡萄牙王室的意图，但是，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开始使人怀疑是否达到了这个意图。起码殖民地的一个生命攸关的方面：奴隶大贩运商阶层没有被纳入这种范畴。马努埃尔·弗洛伦蒂诺和若昂·路易斯·弗拉戈佐等人的研究显示，起码从18世纪末期开始，里约热内卢的奴隶贩运商组成了一个几乎全部由巴西人或在巴西扎根的葡萄牙贩运商参加的十分强大的集团。主要从不动产积累的利益出发，他们组成了一个包括奴隶供应和围

绕奴隶供应活动——比如在亚洲港口购买商品，到非洲海岸去换取奴隶——的庞大的贸易网。女历史学家卡蒂娅·马托佐的研究指出，在萨尔瓦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当证明了殖民地居民在所谓灵魂贸易中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同时，又重新走上了一条历史解释的道路，这一道路的最大代表是在过去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国内市场供应的经济活动上面的卡皮斯特拉诺·德阿布莱乌。若热·卡尔德拉的研究沿着这条道路把对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关系因而越滑越远的突出意义的论述又向前大大推进了。

作者回忆了南里约格朗德的生产（牛、干肉、小麦、运往圣保罗内地索罗卡巴集市的骡子）的重要性，上面已经讲过的在采矿衰落时期的米纳斯吉拉斯的情况和来自各个港口的奴隶对国内供应等情况，得出结论说，在比你想像的更早的时候，巴西已经在以自己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了。

更晚一些时候的研究立下了更大的功绩，它证明了殖民地巴西的经济不能被理解为一个相继发生的周期系列——制糖周期、黄金周期，等等，它有着更复杂的特点。这里，强调奴隶贸易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使之产生了一个甚至比农村大庄园主更杰出的社会阶层。

但是，应该注意不要走得太远。当回想到自 19 世纪中期到 1930 年左右的咖啡经济所起的中心作用时，就会发现在许多时候，推动了国内市场活动发展的出口经济既是殖民地的、又不仅仅是殖民地的一个重要轴心。

十　殖民地体系的危机

18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以西方世界不但在思想而且在行为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为特征。旧制度，即自 16 世纪以来一直统

治着欧洲的整个君主专制制度，连同与之相联系的一些思想和实践陷入了危机。从法国哲学家和英国经济学家开始，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树立，并得到了传播。

一些重要事件成为为西方世界变化设置的航标。1776 年，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宣布独立。自 1789 年开始，法国革命通过武装力量消灭了法国的旧制度，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时，在英国发生了没有准确时间，却是如此重要，而且比讲过的以往任何革命都重要的无声的革命——工业革命。新能源的应用、主要用于纺织工业的新机器的发明、农业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控制都是把英国变成那个时代最大的世界强国的因素。

为了追求市场扩大，英国人把自由贸易和抛弃商业主义原则强加给世界，同时，利用保护主义关税，设法保护本国和它的殖民地的市场。在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关系上，通过贸易协定、走私和与地方商人联盟的手段，在殖民地体系打开越来越大的缺口。殖民地世界也受到另一个因素：当时最大的强国——英国和法国所表现出的限制和消灭奴隶制的倾向的伤害。1794 年 2 月，法国颁布法令，废除其殖民地的奴隶制；英国在 1807 年做了相同的事情。然而，至于法国，我们要强调指出，后来拿破仑又撤销了 1802 年的法令。

* * * * * *

国际上的情况损害了葡萄牙王室和它最大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18 世纪中期，葡萄牙和欧洲强国相比，变成了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法国和西班牙面前，葡萄牙依赖英国，作为交换条件，接受它的保护。尽管如此，葡萄牙君主制度仍竭力保持其殖民地体系和限制英国在巴西日益增长的影响。

这段时期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堂·若泽一世在 1750 年登上王位。实际上，不是国王本人登位，而应该说是他的大臣——未来的波

穆巴尔侯爵，塞巴斯丁·若泽·德卡尔瓦略·梅洛。直到50岁被任命为首相之前，波穆巴尔还是个仕途比较黯淡的葡萄牙驻英国代表和驻奥地利王国的外交官。他多年来（1750～1777）的巨大努力使葡萄牙政府效力更高，使宗主国—殖民地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改革是一种具有葡萄牙特点的新老结合的制度。这种制度把开明的专制主义和彻底应用商业主义理论的尝试结合在一起。这种总的做法具体表现在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中。我们来重点讲一下那些和巴西更贴近的措施。

精通商业主义理论的波穆巴尔创立了两个特权贸易公司——大巴拉暨马拉尼昂贸易总公司（1755）和伯南布哥暨帕拉伊巴总公司（1759）。前者的目的是发展北部地区，对那些在巴西生产、在欧洲消费的商品，如可可、康乃馨、肉桂和后来的棉花、大米，均由该公司轮船专运，但要提供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价格。它也进口奴隶，但由于当地贫困，再将他们的大部分转卖到马多格罗索矿区。后一个公司也在同样的活动路线内，努力重新激活东北部地区。

波穆巴尔的政策损害了被特权公司排挤的巴西商界的利益，但是，他的目的却不是要迫害殖民地的精英。相反，他把这些精英的成员都放在了政府的行政和财政机关、法官或军事机构等的重要岗位上。

波穆巴尔的经济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因为在18世纪中期，殖民地进入了一个一直延续到该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萧条时期。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糖业危机和1760年开始的黄金生产下降。在宗主国收入下降的同时，用于重建受1755年大地震破坏的里斯本和支撑对西班牙战争费用等的巨大开支却在增加，这场战争是西班牙企图控制圣保罗以南到普拉塔河的广大地区引起的。

波穆巴尔企图禁止黄金和钻石走私与竭力改善税收。在米纳斯吉拉斯，人头税被原来的五一黄金税所取代，要求每年起码要收取100阿罗巴（古代重量单位，相当于15公斤）黄金。经过一

系列的失败之后，王室决定自己直接负责开采钻石（1771）。与此同时，努力减少葡萄牙对进口工业产品的依赖，鼓励在葡萄牙和巴西建立制造业。

波穆巴尔政府采取的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驱逐葡萄牙的耶稣会教徒，没收他们的领地和财产（1759）。这一驱逐令可以包括在为达到实现葡萄牙政府的中央集权和取消与王室意图不同的宗教团体自主活动区的目的的范围内。除耶稣会教徒之外，在 18 世纪 60 年代中期，施恩会——亚马孙地区第二个重要教团——教士也被赶出了这个地区，他们的产业均被没收。但其主要的打击目标还是被指控为企图建立“国中之国”的耶稣会。

在巴西，根据波穆巴尔的说法，要巩固葡萄牙在北部和南部边疆的统治必须要通过印第安人融入葡萄牙文明来实现。如果不能获得在巴西出生、但目的和葡萄牙一致的人民的支持，要保证控制半无人居住状态的广大地区将是不可能的。由此，采取了一系列对待印第安人的措施。1757 年，废除了印第安人的奴隶身份；亚马孙地区的许多村庄被变为行政管理下的村镇；立法鼓励白人和印第安人通婚。这种同化政策和耶稣会教徒的父系主义理论相冲突，成为他们之间斗争的中心点。

同时，西班牙耶稣会教徒被指控在乌拉圭传道会七镇地区发动印第安人反对把那片领土交给葡萄牙人的造反——这次造反从 1754 年延续到 1756 年，被称为瓜拉尼人之战。我们也不能忘记，耶稣会的广大产业早就成为殖民地精英和王室成员们觊觎的目标。

被没收的耶稣会教徒的城市和农村的大部分财产被大庄园主和大商人在拍卖中取得。他们的大教堂转到没有加入宗教团体的大主教手中。公司的许多学校变成省长们的宫闱或军队医院。在整体上，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特别是在文化方面，比如图书馆就被他们认为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而遭丢弃。

驱逐宗教团体使已经十分可怜的殖民地教育变成一片空白。葡萄牙王室和西班牙相反，害怕在殖民地培养一个有文化的精英

阶层。早在16世纪，西班牙就在美洲殖民地创立了几座大学：1538年，在利马创立了圣多明戈斯大学和圣马克大学；1551年，创立了墨西哥城大学。而在葡萄牙美洲，整个殖民地时期没有创立过一座大学。在新闻方面情况相同。在西班牙美洲的大城市，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新闻机构。与此同时，1747年经批准在里约热内卢创办了一家印刷厂，随后被一道王命封闭。巴西报业只有到19世纪随着堂·若昂六世的到来才诞生。

为了解决由于驱逐耶稣会教徒而在教育方面产生的问题，王室采取了一些措施。设立了一种特别的税收——文化公共设施特别税，以支持国家推行的教育。伯南布哥大主教创立了部分致力于教授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奥林达神学院。知识分子的小型俱乐部出现在里约热内卢和巴伊亚。

波穆巴尔反对宗教团体的措施是使教会从属于葡萄牙国家的政策的组成部分。但是，葡萄牙努力避免与教皇的直接冲突。教会接受了对耶稣会教徒的驱逐。比这更有甚者是在1773年，克莱门特六世教皇撤销了耶稣会，认为它带来的问题比好处多。耶稣会教团只有在1814年才重新恢复起来。

* * * * * *

赞成或反对波穆巴尔的葡萄牙历史学家之间的巨大争论导致产生了波穆巴尔时代和后继的堂娜·玛丽亚一世当政时期之间深刻的割裂之观。用“转折点”一词来定义1797年堂·若泽去世和波穆巴尔倒台后的时期就表明了这种观点。许多事情都变了：贸易公司被撤销，殖民地禁止保留工厂和除生产奴隶用的棉粗布以外的织造工业。这一事实和对米纳斯密谋成员的镇压在巴西历史上给后波穆巴尔时代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形象。

但是，在1777～1808年之间，王室继续尝试进行改革，以适应新时代和拯救商业殖民主义肯定是对的。堂娜·玛丽亚一世执政

和堂·若昂亲王摄政期间，与已往相反，从有利于重新激活农业活动的局势中获益匪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由于圣多明戈斯奴隶造反提供的有利条件，糖的生产扩大了，价格也提高了。此外，一种新的种植活跃起来：由波穆巴尔的贸易公司开发和受美国独立战争鼓舞发展起来的棉花生产，在一定时间里，把马拉尼昂变成葡萄牙美洲最繁荣的地区。

* * * * * *

十一　造反运动和民族觉悟

在葡萄牙王室推行专制主义改革政策的同时，在殖民地出现了各种反对葡萄牙的密谋和实现独立的尝试。这些一方面和发生在国际范围里的新思想和新行动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地的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些地区性的造反运动，而不是民族革命。这就是诸如米纳斯密谋（1789）、裁缝密谋（1798）、伯南布哥1817年革命等诸多历史插曲的一般概况。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生在殖民地的殖民社会成员和包括一些在这里定居的葡萄牙人开始把巴西想像成一个同葡萄牙不同的实体的？换句话说，是在什么时候出现了巴西人的意识的？

对于这种性质的问题，没有一个准确的回答。民族意识是随着殖民地的各个方面变得具有占宗主国的人不同的利益或在这种意识中找到了他们的问题的根源的情况下形成起来的。远不是组成一个性质相同的集团，而是包括以农村大庄园主为一方，经过大学生和文人，到工匠、收入微薄的士兵为另一方的许多社会方面。甚至也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思想。“法国思想”或美洲革命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启发他们的源泉。然而，统治阶层极力限制这种思想的传播，比如，对于伤害到他们利益的废除奴隶制，他们是

十分谨慎的。相反，对于被统治阶层，独立的思想总是伴随着社会改革追求平等的目的出现的。

伯南布哥的小商贩之战（1710），自1720年菲利普·多斯·桑托斯造反以来，发生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许多造反活动，尤其是发生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和19世纪前20年的密谋和革命经常被认为是肯定民族意识的例子。如果可以说以上这些指出了这样的方向，我们应该来回忆一下，直到独立，甚至独立之后，民族意识只被认为是地区性的。那个时期的造反者都被认为是米纳斯人、巴伊亚人、伯南布哥人和一些穷苦人，这些都被认为比巴西人更普遍。

自18世纪末以来，在巴西发生的最重要的造反运动的表现是所谓米纳斯密谋（米纳斯吉拉斯，1789）。它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实际事件本身，而在于它的象征意义。这一运动与那个时期当地社会问题的恶化有直接关系。同时，它的成员受到了欧洲和北美洲出现的新思想的影响。米纳斯精英的许多成员走遍世界，并都曾在欧洲读过书。比如，原科英布拉大学学生——若泽·若阿肯·达马雅，1786年曾进入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学习。在那一年和此后第二年，还曾与当时的美国驻法国大使托马斯·杰斐逊有联系，并请求过他的支持，根据他的说法，正在巴西策划一场革命。密谋参加者之一，若泽·阿尔瓦雷斯·马歇尔从科英布拉大学毕业后，曾在英国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他学习了制造技术，并就支持巴西独立运动的可能性，同一些商人进行过讨论。

大部分密谋者组成了一个由矿业主、庄园主、卷入事件的神甫、职员、有声望的律师和高级军官参加的殖民地精英集团。他们所有的人都与领地的殖民当局有密切联系，有的还担任过法官职务。

只有若泽·若阿肯·达席尔瓦·沙维埃尔是个例外。他父母早亡，丢下了7个儿女。他因繁重的债务而失去了家产，也曾经尝试做生意，但没有成功。1775年，他从戎做少尉，相当于最低一级

的军官。业余时间做牙科大夫，由此获得了带有贬义的绰号——拔牙者。

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米纳斯社会进入了一个以黄金生产持续下降和葡萄牙王室为保证收取五一黄金税而采取措施为标志的衰落时期。同时，当地精英和领地政府的结合，由于1782年路易斯·达库尼亚·梅内泽斯州长到达米纳斯而受到巨大的震撼。库尼亚·梅内泽斯排挤了精英中许多最重要的成员，而和他的一伙朋友站在一起。拔牙者尽管不属于精英，但也受到了伤害，他失去了巡逻进入米纳斯的战略门户——曼提丐拉山山口的军事小分队指挥的职务。

形势随着任命巴尔巴塞纳子爵取代库尼亚·梅内泽斯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巴尔巴塞纳从葡萄牙大臣梅洛·卡斯特罗那里接受了保证收取每年100阿罗巴黄金税的指示。为了完成这个定额，州长将领地已有的全部黄金没收，这还不够，又发布政令收取分摊税，一种领地每个居民都必须交纳的税收。他还接受了调查王室债务人以及政府和私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指示。这些指示使威胁的乌云笼罩了整个领地，更直接地笼罩在包括王室的一些最大的债务人精英集团的头上。

在发布分摊税指示的刺激下，密谋者们开始准备原定于1788年最末几个月发动的造反运动。但是，他们没能实现已定的计划。1789年3月，巴尔巴塞纳发布政令，中止收取分摊税，与此同时，谋反者被人告密。接着，便在米纳斯进行大肆追捕和监禁，拔牙者在里约热内卢被投入监牢。在殖民地首都进行的漫长的审讯直到1792年4月18日才告结束。拔牙者和其他一些被告被叛处绞刑。几个小时后，堂娜·玛丽亚王后下达宽恕令，除拔牙者一案外，其他所有判处均变为流放巴西境外。1792年4月21日早晨，拔牙者作为旧制度处决舞台的典型主角，被执行绞刑。烘托这一舞台的，包括出动军队、发表演说和对王后的感恩欢呼。接着，是将死者分尸和割头，并将之挂在欧罗普莱托城的主要广场上

示众。

密谋者们想干什么？回答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其大部分根据都是来自被告和见证人在王室举行的决定其死活的公开审讯过程中的供词。表面上，大部分人的企图是以美国宪法为模式，宣布成立共和国。把迪亚曼蒂努县从它遭受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宽恕王室债务人，鼓励建立制造业。取消常备军，取而代之的是全体公民在必要时都要拿起武器，到国家民兵中去服务。在建议采取的许多措施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奴隶制问题。思想一致而利益不同的密谋者们，在主张解放出生在巴西的奴隶问题上选择了中间路线。

米纳斯密谋是一个表面范围有限的历史事件如何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产生了冲击力的范例。作为实际事件，造反运动并没能实现，它在当时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在这方面，应该说，从伯南布哥，扩大到东北部广大地区的1817年革命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但是密谋运动的突出意义在于它的象征力量：拔牙者变为民族英雄，他死的场面，躯体被分尸，悬头示众，唤起学校孩子们的恐怖和激动。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通过一个具有自己独特历史的神话形成的长期过程。在初期，巴西还没有独立的时候，殖民者的说法占统治地位。当时所用的“米纳斯密谋”一词，被传统令人好奇地保持到今天的事实，就是它的表现。“密谋”是个贬义词，表示的是一种对君主或国家不忠、不履行职责的意思。在帝国时期，这种行为使人不安，因此谋反的人很少得到王国政府的同情。此外，负责判处这些革命者的两个巴西皇帝都是堂娜·玛丽亚皇后的直系后裔。

共和国成立对扩大运动的影响和拔牙者变为共和国烈士的形象有利。当时，存在着这种变化的现实基础。有迹象表明，葡萄牙王室导演的这场恫吓殖民地人民的大表演引起了相反的效果，使人们活生生地保持了对这一事件的记忆和对谋反者的同情。自审讯的一段时间以来，拔牙者承担了谋反的全部责任的态度和他

最后牺牲在共和国刚刚成立后的时间里有利于使他的形象被神话化。4月21日变成公休日，拔牙者的画像越来越被描绘成类似于常见的耶稣的形象。这样，他逐渐变成少有的民族英雄之一，不但被右派、左派，而且被大街上的广大人民尊为烈士。

* * * * * *

巴西独立的实现，不是通过与宗主国进行革命的一刀两断，而是一个造成许多变革和与殖民地时期相关联的连续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经过了葡萄牙皇室迁来巴西和巴西港口对外来贸易开放，从而结束了巴西的殖民地制度。

19世纪初，拿破仑在欧洲发动的反对英国的战争，以给葡萄牙王室造成严重后果而告终。拿破仑在控制了几乎整个西欧之后，对英国与大陆的贸易进行了封锁。葡萄牙代表了在行将合围的封锁中的一个缺口。1807年11月，法国军队穿过与西班牙接壤的葡萄牙边界直向里斯本进军。

自1792年，宣布其母亲患疯病后，一直摄政王国的堂·若昂亲王决定在很少的几天内，将王室迁往巴西。1807年11月25～27日，有10000～15000人登上葡萄牙轮船，在英国军舰护卫下，前往巴西。整个官僚机构：王国大臣、御前顾问、最高法院法官、国库官员、陆军和海军将领与高等神职人员一起前往殖民地。还有皇家国库、政府档案、一台印刷机和后来成为里约热内卢国家图书馆基础的几个图书馆也统统迁往殖民地。

刚刚到达巴西后，在巴伊亚短暂的停留期间，堂·若昂便发布政令，向“友好国家”开放巴西港口（1808年1月28日）。尽管人们都知道当时的“友好国家”一词等于英国，但是这个行动一下结束了持续300多年的殖民地制度。1808年4月，已经在里约热内卢的摄政亲王废除了禁止在殖民地建立制造业的法令，宣布对工业原料进口免税，对毛纺工业、丝织工业和钢铁工业进行补

贴，鼓励发明创造和引进新机械。

港口开放是一个历史可预见到的、但同时也是当时时势推动下的行动。葡萄牙被法军占领，贸易不能再通过它进行。对于葡萄牙王室来说，宁愿使业已存在的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大量走私合法化来收取应得的税收。

英国是这一措施主要的受益者。里约热内卢不但变成英国工业产品进入巴西，而且出口到普拉塔河和太平洋海岸的港口。1808年8月，在该市就已经有了一个150～200名英国商人和贸易代理人的重要中心。港口开放也有利于生产出口货物（糖、主要是棉花）的农村大产业主，他们因此而摆脱了宗主国的贸易垄断。此后，他们可以将产品卖给任何人，都不再受殖民地制度强加的限制了。

相反，这一措施在里约热内卢和里斯本的大商人中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以致连堂·若昂也不得不对他们做出一些让步。通过1808年6月的法令，自由贸易限定在贝伦、圣路易斯、累西腓、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进行；所谓沿海航行贸易——在殖民地的各个港口之间的贸易——是留给葡萄牙商船的；原定为24%的进口产品税，对葡萄牙船只运输的商品减低为16%。只有这最后一个决定具有真正的意义，但是很快就被超越了。

英国对巴西殖民地市场的控制升级，经过长期谈判，终于以1810年2月签订的航海贸易条约达到了顶峰。葡萄牙王室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它依赖反拿破仑战争胜利的结果收复了宗主国的领土，其殖民地也是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之下。1810年条约把出口到巴西的英国商品应付的关税规定为15%。这样，英国的商品便处于甚至比葡萄牙自己的商品还要优越的地位。后来，即使两国商品关税拉平之后，英国享受的优惠仍广泛存在。一个落后的国家的商品，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条件下，就像葡萄牙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范围里的那样，在价格和品种方面是没有条件同英国商品进行竞争的。堂·若昂前期措施所要达到的工业化意图几乎变为一纸

空文。

英国政策有一点是值得殖民地社会统治阶层的各个方面关注的。在成为奴隶贸易最大的受益者之后，自18世纪末期开始，英国开始反对奴隶制度。通过同1810年航海贸易条约一起签订的联盟友好条约，葡萄牙王室被迫对自己统治下的领土限制进行奴隶贩运，空泛地答应将采取缩小这种贸易的措施。几年后，当反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在维也纳召开代表大会时（1815），葡萄牙政府又签订了新的条约，同意停止赤道以北地区的奴隶贩运。这样，便原则上结束了从米纳海岸到巴西的奴隶贩运。这个条约的一项附加条款规定，把在公海上对贩运奴隶的可疑船只进行的“检查权”及将其没收的权力交给了英国。这些措施中没有一项能够阻止奴隶贩运。相反，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的奴隶贩运比此前更猖獗了。从而出现了以英国政府为一方，以巴西政府当局和社会统治阶层为另一方互相争夺的景况，这种争夺在独立后的巴西变得更尖锐了。

葡萄牙王朝总部迁往巴西改变了南美洲地区国际关系的状况。葡萄牙的对外政策变为在殖民地采取决策，于是，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战争和外交部，除了在英国政府鼓励下进行的对法属圭亚那的征伐外，葡王室将其活动集中在普拉塔河地区，尤其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自17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一直冲突不止的东班达——现在的乌拉圭——地区。

堂·若昂六世怀着兼并东班达的目的，在1811年和自1816年以来，在这个地区进行了两次军事干预行动。阿尔逖加斯——乌拉圭独立斗争的主要人物——的失败，保证了葡萄牙人对这一地区的占有，1821年东班达地区作为西斯普拉提纳省被并入巴西。然而，在普拉塔地区的冲突却远没有结束。

王室的到来使殖民地政治生活的轴心彻底转向里约热内卢，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该市呈现出一派伴有图书阅读和思想比较活跃的文化生活景象。1808年9月，殖民地的第一家报

纸问世，相继开设了一些剧院、图书馆、文学—科学院，以满足宫廷和迅速发展的城市人民的需要。这里只要讲一下堂·若昂六世在巴西期间首都居民人数增加了一倍，从近5万人上升到10万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新居民中的许多人都是移民，不但有葡萄牙人，而且有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由专业人员和高水平的工匠组成的中产阶级。

除这些人之外，来巴西的还有外国科学工作者和旅游者，诸如英国自然科学家和矿物学家约翰·马维、巴伐利亚动物学家司皮克斯和植物学家马蒂乌斯、法国自然科学家圣－伊莱尔，他们都是拥有大量作品的著作家，这些作品是当时不可缺少的知识的源泉。1816年3月，包括建筑设计师格朗让·德蒙蒂尼、画家陶奈和德布雷在内的法国艺术使团到达里约热内卢。这些艺术家留下了描写19世纪前几十年的里约热内卢的景物和习俗的油画和水粉画。

迁来巴西后，王室还仍是葡萄牙的王室，不能不在巴西做有利于葡萄牙利益的事情。当时令人不满的主要焦点之一在军事力量。堂·若昂号召葡萄牙军队去守卫主要城市，并组织了陆军，把最好的职位留给葡萄牙贵族。税收的负担增加了，因为殖民地必须自己负担起朝廷的开支和国王在普拉塔地区发动的军事战役的经费。

与此同时，还存在地区不平衡问题。对东北部地区的主要感觉是，随着王室来巴西，殖民地的政治统治中心从一个外国的城市转移到一个殖民地的城市，即从里斯本转到里约热内卢。1817年3月，在伯南布哥爆发的革命正是融合了这种由经济条件和王室赐予葡萄牙人的特权造成的各种不满的情感。这次革命包括了人民中的广泛阶层：军人、农村庄园主、法官、工匠、商人和为数众多的神甫，以致这个运动以“神甫革命”而著称。其中，大量和外贸相联系的巴西商人的加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已经开始同那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控制着那个领域的葡萄牙人进行竞争。

1817年革命的另一个重要情况可以在它从累西腓，经过阿拉

戈阿斯、帕拉伊巴和北里约格朗德发展到内地的事实中看到。伴随着强烈的反葡主义情绪，地区性不利形势是发生在整个东北部地区的大造反的公分母。然而，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相同的目的。对城市贫民阶层来说，独立是和平等的思想联在一起的。农村大庄园主的目的是结束王室强加的中央集权；如果不能把殖民地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起码也要把东北部地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革命者攻克累西腓后，成立了建立在共和国颁布的“组织法”基础上的临时政府，确立了权利平等、宗教宽容，但是没有触及到奴隶制问题。他们派出密使到各个领地寻求支持，也派出使者到美国、英国、阿根廷，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承认。起义者向内地进军，但是，紧接着就遭到王室军队的攻击，他们封锁了累西腓，并在阿拉戈阿斯登陆。斗争在内地展开，革命军表现出准备不足及其内部步调不一致的缺陷。1817 年 5 月，葡萄牙军队终于占领了累西腓，继而对起义领袖进行了监禁和处决。运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在东北部地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 * * * * *

1817 年左右，就有人说巴西将在 5 年内独立，那只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预见。和东北部毗邻的伯南布哥革命失败了。考虑到 1814 年欧洲战争以拿破仑失败而宣告结束，王室长期留在巴西的理由表面上已经不存在。于是，王室采取了将葡萄牙和巴西作为一个王国的两部分合并在一起的措施。但是，堂·若昂却决定继续留在美洲殖民地，并于 1815 年 12 月，将巴西提高到葡萄牙和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地位。几个月后，在王后去世之后，堂·若昂以堂·若昂六世的名号，成为葡萄牙——也是巴西和阿尔加维的神圣君王。

巴西独立，既从国内也从国外的总体因素中得到解释。然而，

是外来的风把这些事件引上了一个大多数当事人没有预料到的方向，这个方向来了一个由主张巴西自治一下变为巴西独立的大升级。

1820 年 8 月，葡萄牙在启蒙思想启示下，爆发了自由派革命。革命者力图为葡萄牙生活中的深刻危机找到一条出路。国王不在和没有政府机关而造成的政治危机；部分由巴西从中受益的自由贸易引起的经济危机；部队的高级职位被英国军官把持和忽略晋升葡萄牙军官而导致的军事危机。所有这些只要回忆一下在堂·若昂不在的期间，葡萄牙是由一个在英国元帅贝雷斯福德主持下的摄政委员会执政就够了。战后，贝雷斯福德成为葡萄牙陆军总司令。

1820 年的葡萄牙革命具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方面。由于它认为葡萄牙专制王朝是一个专横跋扈和动辄镇压的政权，同时又设法赋予像议会这样的社会代表机关以活力，这个革命可被定义为自由主义革命。他们又主张促进葡萄牙资产阶级利益，努力限制英国影响，企图使巴西重新回到完全置于葡萄牙统治之下的状态。

1820 年末，革命者在葡萄牙成立了一个三人临时委员会，以国王的名义管理国家，并要求国王回到宗主国。革命者决定召开由整个葡萄牙世界选举产生的议会大会，起草和通过一部宪法。在巴西，预定在行将改称省的各个领地成立忠于革命的政府委员会。

在葡萄牙，深怀不满的军人也开展了 1820 年运动。这一运动在巴西——包括葡萄牙人在内的军人中，第一次产生反响。军队在贝伦和萨尔瓦多举行暴动，并成立了政府委员会。在里约热内卢，人民群众和葡萄牙军队上街游行，迫使国王改组内阁，在没有政府委员会的地方成立政府委员会，并准备议会的间接选举。

在这种情况下，在堂·若昂六世是否回葡萄牙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线。在里约热内卢，由希望按殖民地体系的路线，把巴西置于宗主国统治之下的高级军官、官僚和大商人组成的

“葡萄牙派”主张国王回国；而由首都附近领地的农村大庄园主、在巴西出生的官僚和法官组成的“巴西党”，以与上述人主张相反的理由，反对国王回国。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利益已经和殖民地联在一起的葡萄牙人、业已适应了自由贸易新秩序的商人、许多是通过婚姻纽带和殖民地人联在一起的城市土地和产业的投资者。我们在这里用带引号的“巴西党”，是想用这种形式表明它本身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意见派别。在那个时代，政治联合都是通过共济会进行的，其杰出的成员都是捍卫独立的。

堂·若昂六世的去留问题很快便烟消云散了。担心不回葡萄牙会失去王位的国王最后决定回国，并于1821年4月在4000多名葡萄牙人的陪同下，登船启程。作为摄政王留下来代替他的是他的儿子佩德罗，即后来的佩德罗一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巴西进行了参加议会大会的巴西代表的选举。几乎所有当选者都是在巴西出生的人。在他们之中，有一些是独立的坚决维护者和原来的独立激进派，比如曾参加过1817年革命的席普里亚锘·巴拉塔（巴伊亚）、穆尼兹·塔瓦雷斯（伯南布哥）和安东尼奥·卡洛斯·雷贝罗·德安德拉达（圣保罗）。

议会早在1821年1月，在当选的巴西代表到达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开会了，采取了一系列使整个殖民地深为不满的措施。各个省政府都不再听命于里约热内卢，而直属于里斯本。他们曾企图废除同英国签订的不但符合英国人利益，而且符合巴西农村大产业主和城市消费者的利益的贸易协定。在这些情况之外，再加上自由主义革命的领袖们以蔑视殖民地的言论火上浇油的事实。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巴西是一片需要用狗群来维持秩序的“猴子、香蕉和从非洲海岸抓来的黑人集聚的土地”。

在1821年9月底到10月之间，议会采取的新措施使巴西加强了对直到那时还是轮廓模糊的独立的选择。议会决定把堂·若昂六世在巴西建立的主要政府部门转到里斯本，更突出的是要派新的军队到里约热内卢和伯南布哥去，还有决定性的一点就是决定让

摄政王回葡萄牙。

“巴西党”把一切努力集中在使堂·佩德罗留在巴西的目标上。亲王留在国内的决定在“吾留日”（1822年1月9日）庄严宣布，这就代表他选择了不归路。摄政王在“吾留日”之后的行动是决裂的行动。拒绝效忠堂·佩德罗的葡萄牙军队被迫撤出里约热内卢。从那时开始便策划建立一支巴西军队。堂·佩德罗组成了一个新内阁，这个内阁由葡萄牙人组成，但魁首却落到一个巴西人——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席尔瓦的头上。

安德拉达兄弟——安东尼奥·卡洛斯、马丁·弗朗西斯科和若泽·博尼法西奥，尤其后者，都是那个年代巴西决策的中心人物。若泽·博尼法西奥出身于桑托斯一个最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从事糖业出口。他本人曾就读于科英布拉大学，1783～1819年居住在欧洲。曾在葡萄牙担任过重要的政府职务，也是科英布拉大学教授。回国后，他应召自1821年3月主持圣保罗临时政府委员会。给若泽·博尼法西奥思想贴一个标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社会领域，他主张进步思想，如逐步废除奴隶贩运和奴隶制度、土地改革和移民自由进入巴西等。政治上，正如他在某种场合所讲的，他是“打着肮脏混乱的民主招牌的衣衫褴褛的远征队”的敌人、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限于有知识的统治阶层的公民代表所主张的政府的君主制是适合巴西的。

在导致独立的各种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比较明显地形成了“巴西党”的保守派和激进派。在独立之前的几年里，保守派主张巴西对葡萄牙要有最大的自治，只有到第二阶段才有了争取独立的思想。保守派所希望的政府形式是有限代表性的君主立宪制，认为这是社会秩序和稳定的保证。给激进派下个定义比较难，因为在这个派别里，包括了从关注保障人民具有最大代表性和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的君主主义分子，到一些所谓“极端分子”，对于这些人来说，独立总是和成立共和国、人民意愿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改革的思想联在一起的。

在做出召开一次议会大会的决定之后，尽管当时仍有求助"与葡萄牙联盟"的意图存在，但还是加速做出了与之决裂的决定。当时，要求把赞同巴西独立和团结事业作为政府人员录用的先决条件；建议各省政府不要任用来自葡萄牙的人。1822年8月，摄政王发布政令强调，来自宗主国的军队被视为敌军；贡萨尔维斯·赖多，继而，若泽·博尼法西奥向各友好国家发表了宣言。

来自里斯本的公文到达了里约热内卢，公文否决了摄政王的政令，并再次决定速回里斯本，同时指责叛臣煽动决裂的思想。堂·赖奥帕蒂娜公主和博尼法西奥急忙把消息传达给正在去圣保罗路上的堂·佩德罗亲王。1822年9月7日，到达了伊比兰卡河畔的堂·佩德罗，发出了所谓伊比兰卡呼声，正式宣布了巴西独立。12月1日，当时只有24岁的摄政王，被加冕为皇帝，接受了堂·佩德罗一世的帝号。从此，巴西变为一个保持着政府君主专制形式的独立国家。比这更有甚的是，新国家的王位上坐着的是一个葡萄牙国王。

十二　殖民地末期的巴西

从领土和人口的观点看，什么是独立了的巴西呢？

从18世纪初开始，殖民地的辽阔地域与模糊不定的托德西里亚斯线已经毫无关系。圣保罗远征队的向西扩张和养牛庄园主及军队的向西南扩张，实际上扩大了国家的疆界。18世纪以来的采矿人的大进军又给予了一个巨大的推进，从而使巴西的领土面貌已经十分接近现在的样子了。

剩下的是要使人们在权利上承认这个新的边界。这是个需要和西班牙确定的问题。它通过葡萄牙王朝和西班牙王朝签订的马德里条约得到了解决。这个条约承认了对葡萄牙有利的有效占领原则。但是，关于南部疆界却不在此列。葡萄牙放弃了在接近蒙

得维的亚的普拉塔河地区建立的萨格拉门托殖民地。作为交换，接受了乌拉圭河左岸的地区——被印第安人和耶稣会教徒占领的七道团领地。

尽管签订了协议，但是，关于南部边界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1761年条约废除了马德里条约。结果，圣伊尔德奉索条约（1777）又将七道团领地还给西班牙。葡萄牙人企图收回萨格拉门托殖民地——这一通过巴拉那河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走私白银的基地。

虽然边界已经确定，但是，国家的广大地区实际上都未开发，或者被与殖民者没有接触的印第安人占据着。直到殖民地末期，关于巴西人口没有一个可信的数字。在王室要求下进行的统计，经常把7岁以下的儿童、印第安人、有时甚至连奴隶都排除在外。据估计，1819年巴西有将近360万居民，根据命令集中居住在米纳斯吉拉斯、里约热内卢、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等省。国家南部地区当时还是边缘地区。

从种族观点看，业已存在的主要省份的资料表明，白人仅占总人口的不足30%。

大致地讲，这就是殖民地末期巴西在领土和人口方面的面貌。它的居民已经不再像螃蟹一样吃力地爬行在沿海地区。但是，他们近74%的人口还是集中在主要出口港口周围和里约热内卢、巴伊亚、伯南布哥和帕拉伊巴等沿海领地的内陆地区。

第二章
君主制的巴西（1822～1889）

一 巩固独立和国家建设

巩固独立的斗争进行了没几年。葡萄牙军队在西斯普拉提纳省进行了抵抗，终于在1623年11月撤出了这个省。在那里开始了长期的乌拉圭独立的战争，但这时反对的是巴西人，而不是葡萄牙人。另一个对抗中心是在巴伊亚，在那里巴西人终于打败了葡萄牙人。

在国际领域里，美国在1824年5月承认了巴西独立。这一独立也得到了对保障原葡萄牙殖民地的秩序感兴趣的英国的非正式承认。这样，就保住了它在一个当时已成为它的第三大国外市场的国家的商业利益。它对巴西独立的正式承认还是被推迟了，因为英国人企图迫使巴西马上取消奴隶贩运。然而，英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巴西巩固独立的斗争，并充当了使葡萄牙承认这个新民族的中间人的角色。

这一承认终于在1825年8月，通过一个巴西同意赔偿宗主国200万英镑以补偿它失去原殖民地的损失，同时不允许巴西与其他殖民地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盟的条约得到了实现。由于对葡萄牙王国赔偿的需要，巴西在伦敦向英国进行了第一笔国外贷款。前面

提到的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关的第二条，可以从和奴隶贸易联在一起的巴西利益已经深植于非洲海岸的一些地区的事实中得到解释。当独立的消息传到安哥拉时，出现了在巴西印刷的小册子，邀请本盖拉也加入到“巴西事业”中去。因此，葡萄牙的预防不是没有道理的。

* * * * * *

在巴西历史上，习惯把巴西相对容易的巩固独立和西班牙美洲解放的复杂过程相对照。还应该强调，在巴西保持统一的同时，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却分裂成了几个民族。这两种视角存在着内在联系。但是，这要分开来讲，因为保持领土统一的形式，通过对1822～184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后，就会变得更清楚。

人们要问，是不是一开始就已经支持这种传统了呢？事实上，对这种传统不乏异议。批评家们强调，团结在里约热内卢周围的独立是通过斗争取得的，而不是由一致的赞同形成的。在这种斗争中，各省的自治主义运动和那些主张与葡萄牙联盟的人，像在巴拉地区发生的那样，都失败了。

这些异议的功劳在于它们唤起了人们对巴西独立并非和平过渡的事实的注意。但它无损于这样一个实证：由于使用武力以及由此造成的死亡，使独立在不多的几年里，没有造成大的损耗即得到了巩固。比这更重要的是，巴西的解放没有对当时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及政府形式造成大的改变。在拉丁美洲历史上，君主专制的巴西是在各个共和国之间留存下来的惟一例子。

这种在两个时代之间的相对连续性得以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在于王室来巴西和独立过程出现的形式。港口开放在葡萄牙王室和殖民地占重要地位的阶层之间，特别是集中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的人们架起了一座桥梁。由于国王在巴西的存在而带给里约热内卢地区的好处，刺激了那个与制糖、咖啡及

奴隶贸易联在一起的地区的经济扩张。

对宫廷的许多不满肯定仍然存在，但是，还不像已经出现了共和思想的东北部地区的那种不满。倡导独立的政治精英们对促进可能把原殖民地在现存模式内的稳定生活置于危险境地的决裂已经不感兴趣。这里，回忆一下旨在独立的自治斗争努力却集中在了国王和后来的摄政王的形象上的事实是很有意义的。尽管人们对皇帝这个人物有争议，但在独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君主专制制度仍成为权威的象征。

独立在短时间里实现，而且没有引起大的震动的事实不能使我们得出以下两个错误的结论。一是说，什么都没有变，因为巴西只是从经过葡萄牙依附英国变为直接依附英国而已；另一种则设想存在一个性质相同的政治精英，他们拥有结构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指导新民族发展的明确计划。

说第一种结论是错误的有几种理由。自 1808 年港口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的依附关系代表了比一个简单的名词更换更多的内容，它造成原殖民地的形式变化，并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此外，独立要求必须完成组建国家、保证统一、建设一个民族政权的任务。

第二个结论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即使在以若泽·博尼法西奥为首的倡导独立的核心内部，也没有就组织国家政权的基本路线取得一致的意见。相反，1822～1840 年之间的岁月是以巨大的政治动荡、一系列的起义和组建政权的各种截然不同的尝试为标志的。

* * * * * *

国家独立后的前两年里，政治辩论的中心集中在通过一部什么样的宪法上面。对制宪代表大会的选举早在独立前几个月就已经确定了。1822 年 9 月 7 日进行了这一选举，1823 年 5 月，制宪代表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接着，很快便在代表大会和起初受

到大臣若泽·博尼法西奥支持的堂·佩德罗之间，围绕政权（这里指皇帝）和立法的职权范围问题产生了分歧。

立宪成员们希望皇帝无权解散将来的众议院，迫使他同意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进行新的选举。也希望他不具有绝对否决权，即对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均可否认其有效的权力。对于堂·佩德罗一世和支持他的政治集团来说，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对抗有“民主和分裂”倾向的政权，从而，主张把最大的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这是个政治上变幻不定的时期。独立后不到一年，1823 年 7 月，若泽·博尼法西奥被迫离开了内阁。他当时被夹在自由派的批评和保守派的不满之间。保守主义者恶意地看待这位关闭了他们直接进见皇帝之路的大臣对政府的个人领导。

权力之争终于导致了堂·佩德罗在军队的支持下解散了制宪代表大会。包括安德拉达三兄弟在内的一些议员被逮捕。接下来的是集中力量制订一部宪法草案，后成为 1824 年 3 月 25 日颁布的宪法条文。这部宪法和议会被解散前的宪法草案没有大的不同，但是，有一个值得强调的区别。第一部巴西宪法是自上而下产生的，是国王强加给“人民”的，虽然我们也应该把少数白人和有选举权的和在一定程度上有参加政治生活权利的混血人理解为“人民”。

人民中值得重视的一个群体——奴隶——被排斥在宪法条款之外。即使是被解放的奴隶，也从来没有想过不被歧视。需要看到的另一点是关于原则和实践之间的距离。这部宪法在组织政权、确定职权和保障个人的权利方面代表着一大进步。问题是，尤其在权利方面，这部宪法的落实有着很大的相对性。在这些权利之上，凌驾着这样一个国家的现实：在那里，尽管广大人民群众是自由的，但仍然依附于农村大庄园主；在那里，只有一小部分人受过教育；在那里，存在着一种专制的传统。

1824 年宪法，后经某些修订，一直实行到帝国时期结束。它确立了世袭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帝国存在贵族，而不是贵族阶

级，即存在由皇帝封号的贵族，但封号不是世袭的，这就使之产生了一个“血统贵族”。罗马天主教继续是官方宗教，其他宗教只允许私下信仰。

立法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规定两院必须进行差额选举。众议院的选举是临时的，而参议院的选举则是终身的。除此而外，参议院的选举过程是在各省选出一个相当于既定议员人数三倍的议员，再由皇帝从三个当选的人中选其一。实际上，这种限制使参议院成为一个其成员是由皇帝任命为终身议员的机关。

投票是间接的和纳税人的投票。称为间接投票，是因为在被称为初级选举的过程中，相当于今天的广大选民的投票人，在一个选举团里进行投票选举，然后再由选举出的选举团去投票选举众议员。根据纳税人的投票原则，在初级选举中，那些由于不动产、工业、商业或职业所得，年收入在10万莱依以上的巴西公民进行投票选举。他们被称为投票人。这些投票人选举选举团，即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举出那些除上述条件外，年收入必须在20万莱依以上，而且不是被解放奴隶的候选人。为当选众议员，除保持上述各条件外，纳税必须在40万莱依以上和信仰天主教。对于妇女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按照社会常规，他们是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的。令人好奇的是，直到1882年，为使宪法在这方面保持沉默，惯例允许大量文盲有投票权。

国家分为许多省，省长由皇帝任命。确保个人权利，其中包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附有上述限制的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表达意愿自由等。

政治机构的一个重要机关——国务委员会，是由皇帝从年龄在40岁以上（当时这个年龄的人被认为是上年纪的人）、收入不低于80万莱依、被认为是“有智慧、有才干、有道德的人”的巴西公民中挑选任命的委员组成。在诸如宣战、调整国家开支、皇帝建议实行元首特有的节制权等政府重大事务和重大措施时，需要听取国务委员会的意见。

建立最高节制权的思想来自法国作家本加明·康斯坦特，堂·佩德罗和当时的许多政治家都读过他的书。本加明·康斯坦特主张将属于国王的阁僚们的政权和被称为中立权或节制权的皇帝特有的权力分开。国王不干预政治和日常行政管理事务，但有代表“民族利益和民族愿望”节制全面性的严重纷争的权力。

在巴西，最高权力没有如此明确地和政权分开。由此造成了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根据元首最高权力的宪法原则，皇帝本人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受任何责任的约束。在其诸项职权中，任命参议员、解散众议院、召集选举新的议会来代替原来的议会、通过或否决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任何决议的权力都属于皇帝。

* * * * * *

堂·佩德罗一世解散制宪大会和颁布宪法的行动表明皇帝与组成“亲密者之圈”的官僚和大商人占绝对统治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葡萄牙人。在伯南布哥，以上行动无异于自1871年，甚至更早的时间以来，一直在燃烧的火堆上加油。

共和思想、反葡萄牙人和联邦思想的传播在这个本来就不安宁的省里，取得了猛烈的发展。若阿肯·多阿莫尔·狄维诺教士，即陶罐教士，作为对帝国发起批评的中心人物表现突出。他的绰号说明他少年时在累西腓的路边卖过陶罐的低微身世。他在自由思想的传播中心——奥林达修道院受过教育，后来成为一位博学的知识分子和实干家。由于任命的省长不受欢迎而在全省引起的强烈对抗为后来的起义开辟了道路。这次起义的显赫一时的领袖马努埃尔·德·卡尔瓦略，在1824年7月2日宣布成立赤道邦联。卡尔瓦略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与一位美国女子结婚，是个美国崇拜者。他在起义之前，1824年宪法颁布的当天，致函美国国务卿，要求派一个小舰队到累西腓港，以平衡由于英、法战舰的

存在对自由造成的威胁。他在信中引用了门罗总统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的最新理论。

赤道邦联要在联邦和共和国的形式下，把除了伯南布哥以外的帕拉伊巴、北里约格朗德、塞阿拉和可能的皮奥伊和巴拉各省都联合起来。这次起义与由农村大庄园主和大商人领导的、具有1817年革命特点的广泛的地区统一战线不同，其重点内容围绕着城市和人民问题。当时在累西腓的英国旅行家玛丽娅·格雷厄姆试图使各部分达成一致，她把起义者占领政府大楼的气氛，描写得和法国革命中国家会议大楼的气氛一样。她看到被那些瞪着眼、侧着耳、防备随时可能发生的叛变和阴谋的起义分子——真正的无裤党人——占领的政府大楼附属楼。

赤道邦联在当地根本没有基础，也不具备在军事上抵抗政府军的条件，以致在东北部各省相继被打败，到1824年11月，战争完全结束。对革命者的惩治出乎人们的想像。一个受皇帝操纵的法庭将陶罐教士及其他革命者判处死刑。陶罐教士被带上绞刑场时，刽子手拒绝执行绞刑，最后，这位教士被枪毙。

1824年革命的标志不是那么容易被抹掉的。事实上，这次革命可以被看做1817～1848年之间发生在伯南布哥的一系列起义和造反行动的组成部分，这个省变成了一个东北地区人民不满的辐射中心。

新生的巴西帝国继承了由于占领东班达地区所产生的一切问题。1825年，这个地区的一场起义宣布与巴西分立和后来的乌拉圭加入了普拉塔河合众省。这一行动加速了自1825年12月开始的巴西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战争的爆发。

这场巴西人败于伊图扎印戈的战争（1827）对巴西是一场军事灾难，对于参战双方都是一场财政灾难。对恢复被战争破坏的正常贸易感兴趣的英国出面调停，和平才得以实现。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保障乌拉圭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和在普拉塔河及其支流的自由航行的权利。后一点对于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有利，

也对巴西有利。对巴西来说，政治地理性原因和经济性原因混合在一起，因为这些河流是进入马托格罗索地区的主要河运航行渠道。

在国内，由于战争和通过纯强制性手段在人民中进行令人畏惧的征兵引起人民的不满。皇帝决定从国外雇佣军队来充实本国军队的兵源。这些从欧洲招募来的雇佣军绝大部分是由抱着到巴西来发财当小业主的愿望的穷人应征组成，没有任何军事业务知识。正如预想的那样，对于使战争向有利于帝国的方向发展没有任何帮助。此外，几百个德国和爱尔兰雇佣兵在发现自己被蒙骗后，于 1828 年 7 月在里约热内卢发起了暴动，形势变得十分严重，政府不得不卑躬屈膝地乞求英、法舰队的保护。

军队开支增加加剧了业已存在的财政—经济问题。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 10 年里，出口产品——比如咖啡等的实际产量大为增加。但是，棉花、皮革、可可、烟草和包括咖啡产品本身的价格却都在降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税收的中央政府的收入不足。英国于 1827 年 8 月强加于巴西的贸易条约把它的产品进口关税保持在 15%。这一措施后来又延伸到其他国家。

1808 年由堂·若昂六世创立的巴西银行，自 1821 年在国王启程赴葡之前取走存在该行的黄金之后，便开始处于困难境地，终于在 1829 年倒闭。堂·佩德罗利用大量发行铜币，导致了货币造假和生活费用——特别是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当时，还没有用“通货膨胀”这个词，但当暗示流通手段“膨胀”时，也讲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尽管巴西银行和国库发行了纸币，但是，里约热内卢之外的地区很少接受。1829 年，纸币在圣保罗的流通值只相当其正常值的 57%。另一方面，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 10 年过程中，巴西货币对英镑的比率一再下跌。这有利于出口，但是，同时也抬高了精英阶层和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所热切需要的进口消费品的价格。

不满情绪加深了巴西人和葡萄牙人之间的摩擦。控制着大部

分零售贸易的葡萄牙人是当地人攻击的首要目标。政治斗争同族群的分裂有关系，但是，不能仅仅归结在这上面。在堂·佩德罗时期，政治精英们分为自由派和专制派。专制派是希望由一个强有力和被尊重的皇帝来保障社会秩序和维护财产制度。他们害怕“过分的自由”会使他们的特权处于危险状态，并以秩序的名义接受皇帝违反法制的行为。像专制主义者一样，自由主义者也站在维护秩序和财产一边。但是，他们维护宪法自由，是以此作为保障秩序和财产的形式。他们是“新事物”的维护者，特别是政府和君主反对的大的新事物的维护者。

由于不信任自由派，或因在政府中担任了职务及接受了皇帝慷慨赐予的荣誉封号，巴西精英的许多成员都站在堂·佩德罗一边。但是，在许多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巴西人越来越加强了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却紧抱着皇帝的形象不放。在城市人民和军队里，反对葡萄牙人的情绪具有强大的动员力。空气中充溢着一种堂·佩德罗要回到联合王国时代的嫌疑，特别是由于堂·若昂六世在1826年去世后，更产生了他作为长子企图回葡萄牙接受王位的可能性。

军队渐渐离开了皇帝。当时，军队的大部分成员是从最贫困的城市贫民中招募来的，受尽生活条件低劣、军饷推迟发放和严守纪律之苦的混血人。与此同时，军队高层对连续的军事行动失利和葡萄牙军官占据着军队领导职位深为不满。

自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形势的变化加速了。法国卡洛斯十世倒台和作为自由派的七月王朝开始在巴西引起了反响，甚至国务委员会都成了讨论的对象。1831年3月，在里约热内卢，政治温度上升。皇帝在访问米纳斯吉拉斯之后回到里约热内卢，在那里受到了最冷淡的接待。葡萄牙人决定举行秘密会社“王位栋梁”策动的庆祝活动以表示对他的支持。巴西人做出了反应，由此发生了持续5天的第一次骚乱。接着，出现了组成新一届内阁的尝试和抗议游行示威活动。许多具有崇高威望的巴西军事指挥官，

诸如利马和席尔瓦兄弟其中之一——未来的卡希亚斯公爵的父亲也参加了造反。最后，堂·佩德罗被迫于1831年4月7日，让位给他的儿子堂·佩德罗二世。

这时，巴西终于取得了拥立一位在本国出生的国王的前途，但是，在这些发生之前，将近10年过去了。当他的父亲退位启程去英国，梦想夺回被其弟堂·米格尔占据的另一个王位——葡萄牙王位时，小佩德罗才仅仅5岁。

* * * * * *

堂·佩德罗一世退位后的时期被称为摄政时期，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国家是由一些政治人物以皇帝的名义执政的，直到他提前成为成人之前的1840年。原则上，摄政者为三人，而从1834年开始，变为只有一人。

摄政时期是巴西政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那些年代里，国家领土完整的问题、中央集权、权利分散、省自治程度、组织武装力量等是政治辩论的中心内容。摄政者进行的改良也是试图摆脱专制主义危害的自由主义实践遇到困难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巴西当时的条件下，许多旨在使政治制度具有某些灵活性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措施终于酿成了精英之间的暴力冲突和地方集团在其主要利益领域里的暴力冲突。不是一切决定都是在摄政时期做出的，因为直到1850年左右，当各省的最后起义停止下来时，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才得以巩固。

为了理解这个时期的困难，需要强调的重要的一点是，精英们没有就最适宜的制度安排取得一致的意见。对作为统治阶级总体利益的组织者，为了总体利益在一定情况下必须牺牲一定社会阶层的利益这一点国家作用也没有明确。

1831年4月7日之后，获胜的政治倾向是根据共济会的传统聚集在保卫自由和民族独立会社里的温和自由派的倾向。在这些

人中，大部分是米纳斯吉拉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政治家。这其中神甫和一些科英布拉大学的毕业生也占有很大的分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土地产业主和奴隶主。他们都是科英布拉大学毕业的米纳斯大法官贝纳尔多·佩雷拉·德瓦斯贡塞罗斯派的显赫人物；有在圣保罗出生，后来做了摄政者的狄约格·费若神甫；还有当时里约热内卢最大的报纸《里约热内卢黎明报》的出版负责人埃瓦雷斯托·达威加。

在反对派中，一方是“狂热派”，另一方是“专制派”。“狂热派”主张成立联邦政府、实现个人自由，在一些情况下，还主张成立共和国。被称为“欧洲人”的“专制派”，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政府、军队及大贸易公司身居要位的葡萄牙人，他们为堂·佩德罗一世复辟而斗争。然而，这些人的复辟梦没有多久就破灭了，因为堂·佩德罗一世于1834年在葡萄牙去世了。

* * * * * *

摄政时期的改良废除和减小了君主国家机关的职权，建立了新的军事组织形式，减小了陆军的作用。

1832年，刑事诉讼法典颁布，制订了1830年刑事法典施行规定。刑事诉讼法典赋予早在堂·佩德罗一世执政时期地方上选举的和平法官以更大的权力，比如，规定可以逮捕和审判被控有小的违法过失的人。同时，追随美、英模式创立了法官组织来审判绝大多数罪犯，并赋予被非法逮捕或其自由受到威胁的人以人身保护权。

因为是对1824年宪法做了补充和修订而被称为补充法的1834年8月的法律决定了国家元首最高权力在摄政期间不能颁用。同时，也撤消了国务委员会。各省省长继续由中央政府任命，但是，设立了拥有较大权力的省议会来取代原来的总委会。

此外，对中央政府、省和市的收入划分进行了立法。赋予各

省议会以规定省、市开支和征收支付这些开支的税收的职权，但这些税收不能损伤中央政府的税收。这种划分税收的空泛含糊的形式使各省有可能以削弱中央政府的代价来取得自己的财源。赋予各省议会的一个更重要的职权是任免公务员的权力。这样一来，就把换取实惠的选票与迫害敌手的重要武器交到地方政治家手里。

在摄政时期之初，军队被心怀疑虑的中央政府视为组织不善的机构。即使在堂·佩德罗退位以后，葡萄牙人军官的数量仍然很大。然而，最大的担心却来自由收入微薄、不满情绪严重和在城市暴动中倾向与人民联手的人组成的军队基层。

1831 年 8 月颁布的一部法律，宣布成立国民卫队来取代原来的民兵。这条法律是法国同年颁布的法律的翻版。其思想是组织一支可信赖的公民武装团体，一方面可以减少中央集权政府的过度行为，另一方面又可以对付来自“危险阶级”的威胁。实际上，这个新的组织是受权维持其所在市的秩序的。在特殊情况下可被召来对抗市外发生的造反，并在军队指挥下保卫国家边疆。

作为一般规定，凡年龄在 21～60 岁之间，在初级选举中有选举权的所有男性公民，都有义务参加国民卫队服务。然而，必须到国民卫队服兵役，侵占了军队的地盘。因为凡是在国民卫队服兵役的人，即被免除到军队去服兵役。到 1850 年，国民卫队的下级军官都是在和平法官领导下的选举中，由卫队的全体成员选举出来的。国家的现实和建立等级制度的需要高于选举原则。选举落空了，甚至在该法律被变更之前就自行消失了。

＊ ＊ ＊ ＊ ＊ ＊

摄政时期的造反没有被限制在单一的模式之内，它们与日常生活的困难和政治组织的变幻不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每一次造反都是由省或地方的具体现实引起的。尤其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许多起义都发生在最重要的都市，并且以军队和人民为主

角。在里约热内卢，1831～1832年之间就有5次起义发生。1832年，形势变得更为严峻，以致国务委员会被召来进行咨询，一旦无政府状态在该市发生，一旦北方各省与南方分立，应该采取些什么样的措施来拯救小皇帝。

与这些造反活动相对应，1832～1835年之间，在伯南布哥爆发了“卡巴诺人之战”。这实质上是一次农民运动，内容和以往的伯南布哥起义不同。这些乡下贫民联合了许多小业主、农村劳动者、印第安人、奴隶，起初还有一些作坊主。在许多方面都像是一个提前了的共和国初期发生在内地的逃奴堡人起义。他们为宗教和为反对“雅各宾派烧炭党人”的皇帝复辟而斗争，这是对19世纪的法国革命党人和欧洲自由派秘密会社的一种批评性表达。

这样，农村人民中的贫苦阶层表达了他们对自己不理解的、但发生在距离他们的世界很远的地方的变革的不满。由于起义申明的所要达到的目的，卡巴诺人得到了累西腓的葡萄牙商人和帝国首都的复辟主义政治家的异乎寻常的支持。

经过一番游击战，起义者最后被马努埃尔·德卡尔瓦略·帕伊斯·德安德拉德打败，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就是这个人——当时的省长，在1824年宣布成立了赤道邦联。

补充法颁布后，陆续发生了巴拉省“卡巴纳仁”起义(1835～1840）——这里，请不要和伯南布哥的“卡巴诺人之战”相混淆、巴伊亚的萨比纳达起义（1837～1838)、马拉尼昂的草篮党人起义（1838～1840）和南里约格朗德的“褴衫人之战”(1836～1845)。

当了解了各省对君主制的中央集权有那么多积怨时，这段时期发生如此多的人民起义可能就不足奇怪了。最后，摄政集团只好给各省议会某些自治权，并在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进行收入分配。但是，摄政者们在这方面的做法刺激地方精英之间为控制重要性不断增长的省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此外，早在皇帝在位期间，政府就已经失去了好歹还属合法的拥戴。而对省长的错误任命使得王朝剩下的一点威信都丧失殆尽了。

“卡巴纳仁”起义终于在与里约热内卢联系松弛的地区——巴拉省爆发了。在那里，社会结构没有其他省稳定，也没有势力稳固的农村大庄园主阶级。那里是印第安人、混血人、奴隶劳动者或依附劳动者和由葡萄牙商人及英国人、法国人组成的少数白人的世界。这些白人集中在贝伦这个只有12000名居民的小城里。那里输出为数不多的烟草、可可、橡胶和稻米等产品。

地方精英集团之间对省长任命的争夺为人民起义开辟了道路，宣布了巴拉独立。一个基层由黑人、混血人和印第安人组成的军队向贝伦发起进攻，经过几天艰苦的战斗，终于攻下了这个城市。起义从那里扩展到这个省的内地。在斗争中，杰出的起义领袖有埃杜阿多·安若林，他是个只有21岁的塞阿拉人。1827年，塞阿拉发生大旱灾，他迁居到巴拉。安若林试图组织一个政府，他在少数会写字的人中邀请了一位神甫做秘书。

卡巴纳仁起义者们没能给巴拉提供一个取代的组织，他们集中力量打击外国人和共济会会员，保卫天主教、保卫巴西人、保卫堂·佩德罗二世、保卫巴拉和自由。尽管卡巴纳仁起义军中有许多奴隶，但却没有废除他们的奴隶身份。有一起奴隶造反甚至被安若林镇压了下去。

通过封锁亚马孙河口和一系列漫长而残酷的对抗，起义军最后被正规军打败。贝伦实际上已经被摧毁，经济也已经荡然无存。据估计，起义者和官兵有3万人死亡，占当时全省统计人口的近20%。

萨比纳达一词来自这一运动的主要领袖——巴伊亚记者和医学院教师萨比诺·巴罗佐。自独立以来，巴伊亚是许多起城市暴动的舞台，在这些运动中，有奴隶造反或奴隶参加的造反运动。萨比纳达起义围绕着联邦和共和思想，团结形成了一个拥有包括萨尔瓦多中产阶级和商人在内的广泛的支持基础。

这个运动对奴隶们做出承诺，把他们分为民族分子和外国人。凡是为革命拿起武器的土著奴隶都将一律被解放；而其余的人仍

处在被奴役的地位。“萨比诺分子”没有能深入到支持政府的糖作坊主盘踞的勒贡卡沃地区。政府军从陆地和海上包围了萨尔瓦多，经过一场造成1800多人死亡的肉搏战后，夺回了这座城市。

马拉尼昂草篮党人起义自地方精英集团之间进行的一系列的争夺发生后就开始了。敌对活动的发展终于引发了一次人民起义。这次起义集中在马拉尼昂南部和皮奥伊交界处的棉花生产小业主和养牛庄园主拥有的一片不大的土地上。领导这场运动的有参与了地方政治的拉伊蒙多·戈麦斯和弗朗西斯科·安若斯·费雷拉，由于他的职业——编卖草篮而使起义获得草篮起义的名称。费雷拉参加起义是为被一个警察头子强暴了的女儿讨回名誉。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姓克斯麦——起码历史记载上没有的姓氏——的、率领着3000多名逃亡奴隶的黑人领袖。

“草篮党人”占领了这个省的第二大城市——卡希亚斯。在他的极少的成文公告中，宣称颂扬天主教、拥护宪法、拥护堂·佩德罗二世、拥护“神圣的自由事业”。这里没有提到社会或经济性内容。但是，很难想像克斯麦及其同伴们竟然不为他们的人身自由事业而斗争，不论这个事业神圣与否。

“草篮党人”中存在的各种不同倾向造成了队伍的不和，而中央政府军的行动迅速而奏效。起义者在1840年中期被打败。继而颁布了大赦，但起义黑人重新沦为奴隶。1842年，克斯麦被执行绞刑。指挥皇家军队的是一位在当时的政治派别斗争和第二王朝时期的战役中经常出现的军官：在当时接受了卡希亚斯子爵封号的路易斯·阿尔维斯·德利马·席尔瓦。

1835年，在距北部和东北部几千公里的南里约格朗德爆发了“褴衫人之战”。“衣衫褴褛”和“破衣褴衫”是同义词，都是身穿破烂衣服的意思。南里约格朗德的“褴衫人”从他的敌人那里接受了这个充满蔑视的绰号。但是事实上，如果说他的军队的战士们穿得破衣褴衫，那领导人可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代表着这个省养牛庄园主的精英。

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南里约格朗德在巴西各地区中就是一个特例。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组成和社会关系，南里约格朗德人同普拉塔世界，尤其乌拉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是养牛庄园主的边疆军事化集团的首领（军阀）与那个国家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在那里，他们有土地，通过婚姻也和许多精英家庭联在一起。

另一方面，从产品去向看，南里约格朗德作为经济传统地区和国内市场联在一起。这里是骡马饲养中心，建成铁路前，在巴西中南部地区骡马在运输商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的农业复兴时期，来自亚速尔的殖民者都从事种植，尤其在巴西有大量销路的小麦种植。而当国家独立之后，在虫害和美国竞争的打击下，这个小麦扩张时期已经接近尾声了。

养牛业像牛肉制成的腊肉（干肉）一样普及了起来。腊肉是南部和中南部地区的穷人和奴隶消费的主要产品。养牛庄园主和腊肉生产商形成了两个独立的集团。牧主们居住在与乌拉圭交界的坎帕尼亚地区，而腊肉制造商的工业都建立在沿海、沿湖地区，那里集中了一些像里约格朗德和佩洛塔斯这样的城市。养牛庄园主和腊肉生产商都利用奴隶或依附他们的劳动者作为劳动力。

南里约格朗德对中央政府的不满由来已久。南里约格朗德人认为，尽管这个省对巴西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仍然受到沉重的税收制度的剥削。自治，甚至分离出去的要求从很早之前就有了，许多时候，有这种要求的不但包括保守派，也包括自由派。

摄政者和补充法没能缓和这种不满。负担不起自己全部经费开支的一些省份接受的中央政府的拨款，部分资金来自其他省。这些早在补充法实施之前就已经是事实了，在补充法实施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南里约格朗德继续给圣卡塔雷纳和其他一些地区的拨款来补充它们的经费开支。

然而，上述起义没有能团结起南里约格朗德的所有阶层。这

个原来由边界地区的养牛庄园主和城市中的一些中产阶级的知名人士发动的起义主要取得的也只是他们这些阶层的支持。依赖里约热内卢——巴西最大的腊肉和皮革消费中心——的腊肉生产商却站到了中央政府一边。

除上述的一般不满之外，牧场主有着特殊的不满理由。他们意图取消，或大大减少同乌拉圭接壤地区的牲畜税和建立两国牲畜群的自由流通制度。此外，鉴于已经组织了建立在一个无可争议的指挥官基础之上的小型私人军队，因而，他们认为再创立通过选举产生军官的国民卫队是一种危险的新事物。

褴衫党人不久前刚刚到达南里约格朗德的一些军队军官举行了比赛。在参赛者的行列中，最少有 20 多名逃来巴西的意大利革命者表现突出，他们中间最杰出的是若乌泽贝·加雷巴尔迪。这个起义最重要的人物是牧主巨富的儿子，在地区战争中颇有军事经验的本托·贡萨尔维斯。他组织了边界共济会，利用共济会邮差作为他们的秘密通讯的传递手段。

斗争是长期的、建立在骑兵行动基础上的。加雷巴尔迪和大卫·卡纳巴罗把战争扩大到了这个省的北部，有一段时期曾经控制了圣卡塔雷纳。1838 年，在起义者控制的南里约格朗德地区的皮拉提尼市，宣布成立皮拉提尼共和国，总统就是本托·贡萨尔维斯。

中央政府的立场介于战斗和对革命者让步之间。褴衫党人的领导机构由精英组成。战斗进行的地区对帝国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比如，在 1840 年初，政府曾对褴衫党人的主要经济要求之一做了让步，宣布同国内竞争的普拉塔地区生产的咸肉进入市场率为 25%。

为结束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实现于 1842 年，当卡希亚斯被任命为省长兼武装部队司令时。卡希亚斯巧妙地把军事打击政策和绥靖措施结合起来。最后，于 1845 年，在和几个造反首领分别达成协议后，卡希亚斯和卡纳巴罗签订了和平协议。这不是一

个无条件的投降，对造反者要实行一次大赦。“褴衫人”军官根据其职衔加入巴西军队服务，帝国政府负责偿还皮拉提尼共和国的债务。

不能肯定地讲，褴衫人就是希望从巴西分离出去，成立一个像乌拉圭那样的新国家和普拉塔合众省。但无论怎么说，造反者共同的一点是起码要使南里约格朗德成为一个摆脱里约热内卢强加的中央集权制控制而拥有自己收入的自治省。

“褴衫人”革命迫使巴西在普拉塔河地区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对外政策。多年里，巴西只得在普拉塔地区实行一种不带侵略性、并设法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制止在它们的边界地区发生革命采取协商一致的政策。“褴衫人之战”结束再次使巴西对乌拉圭保持有力影响的企图死灰复燃，也对同一个政权控制普拉塔河两岸再生畏惧。这种畏惧随着统治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阿根廷省份的胡安·马努艾尔·德·罗萨斯推行巩固政权的政策的加强而与日俱增。

一个反罗萨斯联盟在巴西、巴西在乌拉圭的传统盟友“红党”和阿根廷反罗萨斯的科连特斯和恩特雷里奥斯等省之间形成。1851 年，堂·佩德罗二世登上王位，在这一年开始的反罗萨斯战争中，巴西参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近 24000 多名主要从南里约格朗德招募来的巴西士兵参加了战斗。“红党”控制乌拉圭得到了保证，罗萨斯的军队在阿根廷土地上被打败（蒙特卡塞罗斯，1852 年 2 月）。

* * * * * *

在纷起的造反运动搅得巴西不得安宁的同时，一些新的政治倾向在领导核心中逐渐形成，萌生出了两个大的皇家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保守派团结了法官、官僚、一部分农村庄园主，尤其是里约热内卢、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的大庄园主和其中许多是

葡萄牙人的大商人。自由派则联合了城市小中产阶级、神甫和非传统区域的农村庄园主，尤其是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的庄园主。

然而，政治系统还不够稳定。在1835年4月举行的惟一摄政者的选举中，费若神甫打败了其主要竞争对手，伯南布哥大产业主奥兰达·卡瓦尔甘逖而当选。两年后的1837年9月，费若宣布辞职。因为他受到了来自国会的压力，同时，他被控镇压“褴衫人”起义不力，而且起义首领中还有他的一个堂兄弟。

在继而进行的选举中，原众议院院长和伯南布哥糖坊主，后来的奥林达侯爵佩德罗·德阿拉乌若·利马获得了胜利。阿拉乌若·利马的胜利象征着“回归”的开始。这个词表示保守派希望“回归”到政治集权和加强权威的行动中。在这方面第一批通过的法律之一就是一部从各省收回职权，特别是关于任命公务员的职权的补充法“诠释”(1840年5月)。

二 第二王朝时期

一个有悖于普通政治的反常行为是，加速让堂·佩德罗登上王位的不是保守派，而是自由派。根据补充法解释，赞同“回归派”倡议的人在国会发起动议，要求通过补充法再做一个解释，实施将国王执政的法定年龄提前的法律程序。这样，在1840年7月，还是少年的堂·佩德罗二世在14岁时便登上了巴西的王位。

“回归派”的措施延续到了1840年之后。1841年，重新恢复了国务委员会，并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典。整个行政和司法机构，除和平法官外，又都回到了中央政府的手中。然而，这些和平法官却失去了行使警察职责的重要意义。

在每个省会都设有一个由司法部长任命的警长。在每个教区和每个市都设立了警官和副警官。他们担当起了从前赋予和平法

官的、包括审理小的刑事案件在内的许多职责。因此，在一些情况下，警察变得不但有调查权，而且有审讯和用刑的权力。

中央集权政治和加强皇帝的形象——“回归”的主要目的——的过程，以改革国民卫队而告完成。实际上根本没起作用的选举原则完全消失了。军官变为由中央政府或省长任命，增加了职务薪水要求。建立了军衔等级制度，并规定在有限的范围里招收军官。从此，在国民卫队和军队之间不再发生竞争，而只存在职责分工。保持社会秩序、保障地方统治集团的安全由国民卫队负责，而裁决纷争、保卫边疆和保持国家总体稳定则是军队的责任。

* * * * * *

尽管自由派在其执政期间，深受中央集权措施之益，但一切并不都是平静的。在19世纪40年代的最初几年里，王国政府还是缺乏牢固的社会支持基础的。1842年的5月和6月，在两个很少发生起义的省份——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爆发了自由派的起义，并扩展到了里约热内卢省的帕拉伊巴河谷地区。农村大庄园主在斗争中分为两个阵营。在里约热内卢，起义的领袖是咖啡庄园主和这个省最大的富翁——若阿肯·德索扎·布莱维斯。布莱维斯反对政府堵塞偷漏咖啡税收和反奴隶贩运的措施。

几年后的1848年，在伯南布哥爆发了海滩居民革命。这个名字来自当时的一家自由派报纸——新日报，其地址在累西腓的海滩路。1848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一系列的民主革命席卷了欧洲。在奥林达和累西腓散发着一位匿名作者，也是革命的敌人在很多年前称之为“伯南布哥邪恶之雾”的东西。这个时候的雾气已是由一种社会批评和社会主义思想组成的了。一个社会批评的强有力的例子是安东尼奥·佩德罗·菲格雷多。他在1846～1848年出版的《进步》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土地集中在

少数大庄园主手里的土地结构和外国贸易垄断是这个省的两大弊端。社会主义思想被省长雇佣来美化累西腓的法国建筑师路易·沃捷和此后几年里的一本以《社会主义》为题目的小书的作者阿布莱乌·利马将军在内的各种不同阶层的人到处传播。这不是当时在欧洲还很不著名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是蒲鲁东、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

然而，海滩居民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它之前，累西腓的一次反葡萄牙人的大游行已经造成几个人的死亡。这次运动在农村以同自由党有联系的糖坊主为基础。他们不满的理由是他们对这个省的控制输给了保守派。在海滩党人的城市核心中，表现杰出的人物有原共和派分子博若斯·奉塞卡，他主张制订一个赞同联邦主义的纲领，废除元首最高节制权，驱逐葡萄牙人和将被他们控制的零售商业国有化。有一个新的思想是主张普选，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要有最低年龄的限制，但对最低收入没有要求。近2500人对累西腓发起攻击，但被击败。斗争在游击战的形式下，一直继续到1850年，然而，对王国政府没有造成很大的威胁。

* * * * * *

海滩居民革命是这个省的最后一次造反，同时标志着自这个省和国王命令相结合共同发起的反对荷兰人的战争开始的伯南布哥革命周期的结束。

在爆发海滩居民革命以前，皇家精英们就一直在设法使政治游戏规则正规化。最后达成的一致协议是以恢复国家元首节制权和国务委员会加强皇帝形象以及所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为基本点。后者构成了泛称为“制度精神”的东西。一个类似议会制，但不同于本来意义上的议会制的政府体制开始运行。首先，1824年宪法没有任何议会制内容。根据它的条款，政权是由皇帝和经他自由任命的国务大臣们执行。在第一王朝和摄政时期，没有议

会制的实践。尽管如此，这个实践自 1847 年开始，还是以独特的和很有限的形式逐渐形成。就在那一年，一项政令创造了一个由皇帝指定的部长会议主席的人物。

这个政治人物负责组织其整体构成对政权负责的部长会议，即内阁的各个部。这个体制的运转预示着，为了保住在政府中的地位，内阁不但要取得议会的信任，而且要取得皇帝的信任。曾经发生过议会迫使改变部长会议组成的情况。但是，即使是在 1850～1889 年期间，皇帝掌握着大量最高权力，以此区分皇家政治制度和议会制度的不同。当议会不支持皇帝喜欢的内阁时，皇帝便动用最高节制权这一特权。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可以在最高权力的基础上，在听取过国务委员会的意见后，解散议会，召集新的选举。由于政府在这种选举中所起的作用很大，皇帝能够使之选出一个与他喜欢的内阁和谐一致的议会。

通过这种机制，在 50 年的时间里更换了 36 届内阁，平均每届任期只有 1 年零 3 个月。表面上看很不稳定，实际上，尽管有危机，但政治制度仍允许政府中的两大政党进行轮换。对于反对派来说，随时都有希望应召执政，因而借助武装力量则变得不必要了。

* * * * * *

皇家的两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期就这样形成了。它们在思想和社会方面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在背景上几乎相同的两大政党，只不过是由于个人对立而分立吧？许多当代的人都这样讲。但是，送给伯南布哥政治家奥兰达·卡瓦尔甘巡的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了名言：没有比掌权的“鲁西亚”更像“萨瓜莱马”的了。“萨瓜莱马”是在第二王国初期人们给保守派起的绰号。这个称号来自里约热内卢的萨瓜莱马市，在那里有保守党主要领袖之一——伊塔波拉依子爵的一座庄园。“鲁西亚”是自由派的绰号，这个称号暗指米纳斯吉拉斯的圣鲁西亚镇，在

那里爆发了1842年革命。两党没有差别的思想似乎也被经常发生的政治家从一个阵营转到另一个阵营的事实所证明。

当审视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没有为这个时期和此后一段时期制订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达到一个远大的思想目标的政策。当时，上台执政意味着为自己和自己的一伙人取得荣誉和利益。在选举中，不要期望候选人会履行竞选纲领，但是，候选人一定要履行对追随者所做的承诺。保守派和自由派利用同一个资源来争取选举的胜利，给朋友以好处，却用严厉的手段对待不坚定分子和对立者。分裂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两派，在为谋取自身利益和残余权力的对方选民中，进行激烈的争夺。

同时，政治也不能缩小到只为个人利益，帝国的精英们应该在一个更广大的层面上，为治理国家、公众自由、代表制、奴隶制等大课题而斗争。对这些问题的分歧会导致党派的分裂，如果这些发生的话，那这种分裂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把奴隶制问题放到后面去讲，这个问题值得单独讲，这里我们着重谈一些其他的问题。

中央集权或权力分散问题使之分成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在19世纪30年代的10年间，当两种倾向还没有形成政党的时候，这种分裂就已经很突出了。“回归派”的措施和自由派策动的确立堂·佩德罗成年活动显示了中央集权模式的胜利。从此以后，两党都拥护这种模式，尽管自由派还在口头上竭力主张实行权力分散。

捍卫自由和公民更广泛的政治代表性是自由党树起的一面旗帜。在这种面目下，该党的立场有了发展。但是，只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项内容才和重提权力分散的建议一起活跃了起来。1870年组成的所谓新自由党，由于有了像纳布戈·阿拉乌若和扎卡雷亚斯·德戈伊斯这样的原保守派分子参加，在它的纲领中才有了主张在大城市进行直接选举，设立临时参议院，缩小国务委员会职权，保障信仰、教育、贸易和工业自由与逐步废除奴隶制的内容。

如果说两个政党之间有一定的思想差异，这就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历史学家若泽·穆雷洛·德卡尔瓦略在分析皇家历届内阁组成时，得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在他看来，尤其在1840～1850的10年间，保守党代表了农村大庄园主和政府官僚之间的联盟，此外，担心城市动荡的一部分大商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自由党则主要团结了农村产业主和广大自由职业者。

两党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地区基础。在保守派从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省抽调出它的大部分力量的同时，自由派却在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成为最强大的党派。法官占显著地位的官僚和里约热内卢农村大庄园主的联盟代表着保守派主张的中央集权政治的核心。

由政府官员提出的一个统一和稳定的帝国思想是通过由地理和贸易关系与宫廷紧密联在一起的里约热内卢大地主体现的。属于保守党的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的部分农村产业主，曾经并仍在经历着争取具有人民内容的地区自治斗争。这可能就是他们支持中央政府具有巨大权威的思想的基本原因。

就其本身而言，在第一阶段，自由派的权力下放的建议是从像圣保罗和南里约格朗德这样一些地方统治阶级素有自治传统的地区开始提出的。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不但来自农村产业主，而且来自由采矿形成的老城市的市民。

另一方面，引进更广泛的代表性内容和强调公众舆论的作用是因为自由党内有城市自由职业者存在造成的。这一存在，直到19世纪60年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量增多才变得重要起来。

最后，我们还应该想到，在1870年左右，主要是在圣保罗，社会经济变化使之产生了一个建立在咖啡生产基础上的阶级，这个阶级不惜承担一切后果来取得权力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保卫省自治。同时，在社会基础不同的集团，如咖啡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爆出了一种新的确信，坚持不相信权力下放和扩大政治代

表性的改革会在君主国家内实现。由此确信，诞生了共和运动。

* * * * * *

为什么巴西自殖民地时期以来，一直保持了领土完整而没有分裂？一些省的造反和关于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的变幻都表明，如果宣布独立，国家的完整是毫无保障的。它是通过武力和才智解决冲突，以及历届政府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做的努力的共同结果。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各省独立的设想从来就没有超过保持领土完整的可能性。

在巴西历史上，这个主题是颇具争议的。存在着强调从社会文化因素到精英的性质相互冲突的解释。但是，将这些解释综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从结构观点看，主要说明因素是奴隶制度。保持奴隶制的企图使各个重要的省份抛弃了使帝国分裂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这种解决办法在以英国为首的反对奴隶制的国际压力面前被大大削弱了。同时，英国也鼓励这个已经成为它在拉丁美洲最大的市场和在几个动荡不安的共和国包围下显得相对稳定的君主专制国家保持完整统一。

再则，一个在科英布拉大学法学院和后来的奥林达－累西腓法学院，以及圣保罗法学院受过教育，具有性质一致的等级观念和保守观念的精英的形成对于建立一种目标是建设中央集权的帝国的政治有利。这些在各省担任行政要职的精英在全国流动把自己和中央政权紧密联结在一起，减少了他们与不同地区利益的联系。

三　社会经济结构和奴隶制

19 世纪前几十年的巴西经济的一大新闻是出现了出口咖啡生产。咖啡种植的引进应该归功于 1727 年把第一批咖啡种子带到巴

拉的弗朗西斯科·德梅洛·帕列塔。用于国内消费的咖啡在1760年左右传到里约热内卢，在殖民地首都郊区的果园和菜园里进行小规模的混合种植。

然而，集中了各种条件、第一次在贸易水平上发展大规模的咖啡种植是在穿越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部分地区的广阔的帕拉伊巴河河谷地区进行的。这是个自采矿高潮时期以来，就被大大小小通向米纳斯吉拉斯的纵横交错的道路穿行的著名的地区；那里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和良好的气候条件。此外，尽管这个地区交通条件还很薄弱，但是，靠近里约热内卢港还是有利于产品流通取得贷款及商品购买等方面的联系。

按照大产业的传统方式，建立起了利用奴隶劳动力的大庄园。正像哥伦比亚的实践所证明了的那样，在小型生产单位生产出口咖啡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巴西，在土地、劳动力组织和补充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非大产业方式莫属。

土地占有的历史仍然按照过去遗留下来的，并在巴西历史进程中一直沿用的方式继续着。当时，对土地产业界限和许多未开垦的土地没有明确的划定。对于土地产业的文契，即使已有的也可以有争议，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地契与另一些地契相重合。在这种情况下，弱肉强食的规律起作用。强者是那些以强力强占土地的人，他们赶走被撤销土地所有权的合伙人，雇佣最好的律师，买通法官，使土地占有合法化。

为建立一个咖啡庄园，庄园主需要进行包括伐除森林、平整土地、种植咖啡树苗、建造设施和购买奴隶等大量的投资。除此之外，如果种植永久性咖啡树——即不需要短期进行更新的树种——需要到4年后才能进行第一次收获。起初，在堂·若昂六世刚到巴西的时期里，建立一个咖啡园的资金主要来自大力发展贸易取得的资金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咖啡种植的利润和自1850年后由于废除奴隶贩运而释放出的资本成为投资的源泉。

在几乎整个君主制时期，咖啡种植采用十分简单的技术。这

种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造成破坏的技术，直到今天还存在。当时的生产是粗放的，就是说，对土地的肥沃力不重视，不关心。当由于缺乏施肥或管理不善而使一些土地的肥沃力丧失时，他们便转到另一片土地上去种植，将原来的土地废弃或用做食品生产的农场。

大片咖啡种植使用的基本劳动工具是锄头和镰刀。奴隶们也适应了使用这种巴西土地上的劳动者所用的传统工具，而且，帕拉伊巴河谷地区的地形条件也适于使用这种工具。只有到1870年左右在圣保罗新区咖啡庄园里才开始普遍使用犁。

不讲特殊的情况，咖啡的种植工程是这样进行的：首先，伐除树木，只利用其部分木材，其余的都放火烧掉。然后，是种植咖啡树苗，开始庄园主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进行分行种植，而是按照安的列斯的常规，在咖啡树苗的空挡间种植黑豆、玉米和木薯等食品植物。这样有一个好处，即可为咖啡新苗提供成活必要的荫庇，也可为庄园主、依附人等及奴隶提供必需的食品。

咖啡树苗的管理主要是在秧苗周围松土和除掉有害的杂草。当咖啡树开始结果时，奴隶们以手工进行当年的收获。据估计，在里约热内卢庄园里，平均一个奴隶要管理4000～7000株咖啡树苗，这表明管理工作量很少。咖啡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只是工业加工前的准备性加工。装袋后的咖啡向出口地运输是个薄弱环节。在铁路建成之前，咖啡都是由一个人带领奴隶赶着的毛驴队运送到港口的。毛驴队在由谷地通向里约热内卢的道路上每年要往返好几次。去时，运走庄园的产品；回时，带来鳕鱼、干肉、肥猪肉和五金等消费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运庄园主购置的家具和诸如水晶、瓷器等的奢侈品。

在咖啡贸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代理商。这些起初驻在里约热内卢，后来也驻在桑托斯港口的代理商是生产者和出口商之间的中间人。他们接受这些从庄园运来的商品，并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卖出去。代理商通过交付给他和将交付给他的商品账，给

庄园主买回消费品和定购的工具，从买卖中收取佣金。这样，庄园主和代理商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代理商在银行开一个活期账户，为庄园主发行贷款和借贷。一些时候，这种关系甚至还发展到一些代理商带领他的客户访问首都，或照顾在那里学习的庄园主的儿女。生产者和代理商一般都是巴西人。然而，从一开始咖啡出口贸易就掌握在英、美大公司的手里。

尽管喝咖啡的习惯在巴西已经普及，但是，国内市场不足以吸收大规模生产的咖啡。咖啡生意一直依赖国外市场。咖啡生产的发展是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及欧洲国家中产阶级喝咖啡的习惯的扩展并肩前进的。美国成为消费巴西咖啡的主要国家，同时，巴西的咖啡也出口到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喝茶的习惯根深蒂固的英国从来不是一个咖啡消费大国。它的加勒比、中美洲和南亚殖民地消费也很少。从以上这些地区来的咖啡，通过减少交纳关税的方式进入英国市场，更加使得巴西咖啡进入英国无门了。这是19～20世纪的部分时期里，巴西国际关系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国家一直主要依靠从英国取得信贷和借款，尤其，其外债都是从英国银行家那里借取的。然而，巴西同英国贸易中获得的收入远不足以偿付进口英国商品的金额和应偿还的债务。

咖啡生产的发展及其对巴西外贸的重要性可从一个简单的材料进行估量。在1821～1830年的10年中，咖啡相当于巴西出口总值的18%；在1881～1890年的10年间，则相当于61%。

从社会经济观点看，咖啡综合体囊括了一系列活动，使得国家的活跃中心彻底转移到中南部地区。由于咖啡的作用，对港口进行了建设和装备，开设了新的信贷和就业机制，运输也进行了革新。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东北部的衰落和中南部的兴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在1870年左右就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

帕拉伊巴河谷地的大庄园主们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了巨大的

利益，他们的虚荣心也由于赐封贵族封号而得到了抚慰。里约热内卢大庄园主若阿肯·德索扎·布莱维斯在1842年曾领导自由主义者造反的冒险已经成为过去。19世纪中期，帝国在大商人和农村产业主中取得了支持的基础，其中，突出的包括里约热内卢省咖啡男爵们的支持。这种情况的确立，不应该理解为上述社会阶层已经可以左右国家了。在国家和社会上的统治集团之间是存在区别的。按照规定，省长要在省精英圈子之外挑选的事实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说明。这种做法避免了被任命的人同地区利益的完全一致的情况。这样，中央政府对每个省在贯彻其政策方面保持较大独立性。

皇帝及皇家官员在促进全面秩序改善和逐步解决奴隶制等问题时，要注意满足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根本利益。但是，即使这样做，有时会与他的基本支持力量的观点相抵触。皇帝不顾几乎所有大庄园主的普遍反对提出的《新生儿自由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巴西政治家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国务委员会的终身委员上面。按照若泽·穆雷洛·德卡尔瓦略刻画的形象，对于帝国国务委员来说，巴西就像一个被国家这个太阳控制的日心系统，围绕这个系统旋转的是被称为保守阶级的大星球和很远处的千百万人民大众这些星星。

巴西就是咖啡，咖啡就是黑人。这句19世纪前半期在统治阶级圈子里共同的话，只有一部分是事实。实际上，巴西不仅仅是咖啡，正像以往不仅仅是糖一样。除此之外，咖啡生产在将来没有集中的奴隶劳动者时，仍会继续下去。但是，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贩运奴隶的扩张大部分是为满足咖啡种植的需要。

独立之后，巴西政府面临着复杂的情况。除了一些孤立的声音之外，不但大庄园主和奴隶贩运商，而且所有的自由人也都相信，奴隶贩运在短期内被废止将会造成社会的瘫垮。但是，国家的靠山——英国，却站在相反的方面，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巴西和英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一致和一致都表明，尽管巴西

独立了，不是一切根据英国的目的都可以在朝夕之间就能得到解决的。

在独立后的10年里，奴隶贩运比独立前的时期增加了。根据官方统计，在1811～1820年之间，巴西平均每年进口的奴隶为32700人；在1821～1830年之间，则为43100人。奴隶进入巴西，集中在巴伊亚以南的港口，最突出的是里约热内卢，进口的人数有了很大的增加。在1811～1820年之间，这些港口接受的奴隶占进口奴隶总数的53%；而1821～1830年之间，却占了进口奴隶总数的69%。这些奴隶的大部分被送到帕拉伊巴河谷地的咖啡种植园，或留在了里约热内卢。在这个咖啡经济的阶段里，补充奴隶的主要来源应该是进口，而不是像几年前人们所想像的那样，米纳斯吉拉斯的奴隶向外地转移。

1826年，英国迫使巴西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在条约被批准3年后，将宣布无论从何处向巴西贩运奴隶都是非法的。英国还保留了在公海上检查非法贸易的可疑船只的权力。条约在1827年3月被批准，因而上述条款应在1830年3月后生效。1831年11月7日通过的一条法律设法使上述条约付诸实施，规定将对奴隶贩运者严刑判处，并宣布在这个日期之后，所有进入巴西的奴隶都是自由人。这一法律在奴隶贩运低潮的时期通过。然而，不久后奴隶贩运潮重起，该法律的条款实际上没有执行。

奴隶贩运商在统治阶层的眼里没有受到冷遇，他们却在摄政期间实行的权力下放改革中大受其益。受大产业主控制的法官对被审理的少数被告宣布无罪释放。1831年颁布的法律被认为是“做给英国人看的”。此后，这句今天已非时髦的话，被普遍用来形容某种只具其表而不备实施的态度。

统治集团卷入奴隶工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们要强调的事实是，在大庄园里还没有一个对奴隶劳动者来说是行得通的变革办法，奴隶造反也不普遍。就后者的情况来说，一个局部的例外是莱贡卡沃和萨尔瓦多市。自19世纪初，奴隶暴动就在这个

地区经常发生，这已成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但是，在巴西出生的黑人一般不参加这些运动，表现了这些暴动的局限性。最大的起义发生在1835年，那是由几百个非洲黑人、奴隶和解放奴隶以及穆斯林教徒在萨尔瓦多举行的起义。穆斯林黑人以祸害著称，从而，这个词也成为这次起义的名称。祸害起义受到了残酷的镇压，造成70多个参加者死亡，500多名非洲人受到残暴的对待，少数人被判处死刑，大量参加者被监禁、拷打和流放。

巴伊亚的情况特殊，在1835年以后，那里没有发生过新的大暴动。在奴隶占全市人口40%的里约热内卢，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镇压、获得自由的渴望、划分表现好的和表现不好的奴隶、区分解放奴隶和奴隶、土著人和非洲人等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几种因素。

英国在巴西政府的无所作为面前是不能袖手旁观的。许多贩运奴隶的船只被抓获。1846年是赋予英国海上检查权的协议应该结束的一年。巴西不准备延长这一权力的年限。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在巴西以"庇尔·阿贝丁"命名的决议案。庇尔·阿贝丁是当时英国政府外交大臣阿贝丁勋爵的名字。这个决议案授权英国海军将贩运黑奴的商船作为海盗船对待，有权没收其船只和将涉案人员交付英国法庭审讯。在巴西，"庇尔·阿贝丁"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内涵的攻击目标。即使在英国国内，也出现了许多反对国家赋予自己充当"世界卫道士"角色的呼声。

1848年9月，在巴西一个保守派内阁上台执政，这个内阁自1849年10月由波尔托·阿里格雷侯爵主持。这个内阁代表着官僚、法官、大庄园主——尤其是里约热内卢省咖啡庄园主的联盟的利益。欧泽比约·德盖伊罗斯被任命为司法大臣。欧泽比约·德盖伊罗斯是个葡萄牙—安哥拉法官的儿子，他出生在安哥拉，和一位与里约热内卢城市贸易有联系的家庭出身的姑娘结婚。司法部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案，要求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反对奴隶贩运，从而加强了1831年法。巴西承认贩运奴隶是海盗行为，特别法庭将

对触犯律条者进行审判。法案于1850年9月成为法律。这一次，该法真的“起作用”了。奴隶进口从1849年的54000人下降到1850年的不足23000人和1851年的3300人左右。从那时以后，奴隶贩运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1831～1850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第二部法律能够“起作用”，而第一部法就没有呢？答案是和19世纪40年代末的形势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的压力增加起了突出的作用。根据“庇尔·阿贝丁决议案”，英国的海军不限于在公海上缉拿走私奴隶的可疑船只，英国军舰还可以深入到巴西领海捉拿，从而造成了封锁主要港口的威胁。英国的检查升级导致在沿海发生了一些事件。最严重的是英国缉私巡逻舰和巴拉那的巴拉那瓜炮台交火事件。在这种强大的压力面前，皇家政府抵抗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了。在巴西南方面临着阿根廷入侵的威胁和需要英国保护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由国外到国内的运动是废除奴隶贩运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在多年的加紧进行奴隶进口之后，在19世纪40年代末，巴西市场已经处于供应过剩状态。里约热内卢的庄园主们为了取得购买奴隶的资金，把自己的产业也被迫抵押给了奴隶贩运商。这时，奴隶贩运商已被众目怒视，国内的反英阵线已经破裂。

此外，采取了保守派措施的中央政府所做的努力有利于镇压行动。比如，1853～1857年期间任司法大臣的纳布戈·德阿拉乌若，在一些人企图让最后一批奴隶在那个省登岸时，甚至让一个表现更坚定的人强行替换了伯南布哥省省长。

当采取了反奴隶贩运的有效的措施后，奴隶制注定是要被废除的了。巴西奴隶主，背靠不断进口的奴隶流，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们的再生产。由于进口的停滞，从事各种服务的奴隶供应数量逐渐变得不足起来。此外，从政治和思想观点看，奴隶贩运的结束是一个分水岭。如果巴西把进口奴隶变为非法，那在国内保持奴隶制度就失去了合法性。然而，由此产生了各种问题。在什么

期限内，以什么方式废除巴西的奴隶制？又由什么人来取代奴隶劳动力呢？

开始的答案在1850年取消奴隶贩运后的两个星期内通过的土地法中可以找到。这个法律试图整顿在农村土地产业方面早已存在的混乱，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国家的土地可进行买卖，而不是像从前搞的那样，将土地划成块进行赐予，规定了使土地所有合法化的标准和强行进行土地财产登记。这一立法被认为是一种避免土地产业被未来的移民占有的一种形式。国家土地要以一种相当高的价格出售，以推开合股人和贫穷的移民。受资助来巴西的外国人，禁止在抵巴3年内购置土地。总之，是大庄园主企图吸收移民来代替奴隶劳动力，并设法避免他们很快成为庄园主。然而，大量移民的到来还距之尚远。中南部地区的庄园主们都广泛选择在国内市场上从衰落地区购买来的奴隶。

四 现代化和咖啡扩张

1850年对于巴西而言，不仅仅指前半世纪的结束，也是废除奴隶贩运、颁布土地法、国民卫队集权和第一部贸易法典通过的一年。贸易法典带来了许多革新，同时也把殖民地时期以来零散的法规汇集在一起，规定了可以在全国组建公司的类型，并规范了它们的活动。正像对土地法那样，法典把废除奴隶贩运作为一个中心点来谈。

由于结束奴隶进口而释放出来的资本使得贸易活动和投机生意在当时的条件下加紧开展起来。出现了银行、工厂、汽轮航运公司等。由于前10年中期（1844年）颁布的进口产品关税增加，政府的收入增加了。1852～1953年的政府收入比1842～1843年的收入增加了一倍。

在政治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暂时达成了全国性的一致协议，

这表现在成立了由巴拉那侯爵主持的和解部（1853～1856）上。在一定形式上面，这一协议贯穿了直到1861年的几届内阁。

这样，在国家的活跃地区，初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某些变革，即创立劳动、土地和现有资源市场的前期尝试。

现代化应该是从改善薄弱的运输系统开始的。在19世纪中期，汽轮航运，尤其是铁路是现代运输的同义词。尽管如此，由马雷亚诺·普罗考比约倡议的19世纪最重要的公路——联邦暨工业公路的修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这条公路连接里约热内卢省的彼得罗波利斯和米纳斯吉拉斯省的茹伊斯迪福拉，全长144公里，1856年动工，直到1861年才到达茹伊斯迪福拉。这是一条用粉碎石铺设的公路，当时称为碎石路，它是英国工程师麦克·亚当发明的建造体系。这条路令人感动的还在于它的金属桥和从桥上通过的一条工整而正规的马车道上的马站。联邦暨工业公路是一条造价很高，而又很难维护的公路。因此，很快就被铁路竞争战胜了。

建设铁路的伟大创举出自改善主要出口商品运到国家的一些最重要港口的运输条件的需要。这就需要克服道路难走和运费昂贵而且很难使产品及时流通的驴背运输所造成的不便。

在东北部，以制糖工业产品的输出为基本功能的重大举动都集中在伯南布哥。在那里，出现了一些英国资本公司：1855年建立的累西腓－圣弗朗西斯科创业公司和后来——已经是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的大西方公司。在中南部地区，修建铁路最大的目的是运输咖啡，这个问题随着咖啡种植脱离宫廷，发展到米纳斯吉拉斯的马塔地区，以后又扩展到西圣保罗地区，变得越来越紧迫。

铁路建设和汽轮航运革新了1840～1880年之间的英国经济，拉动了钢铁、煤炭等重工业生产增加。资本积累使发放贷款和外来投资成为可能，对铁路投资成为一个优先考虑的方面。许多铁路是用英国人的资金、材料、设备和通过同英国人签订的合同修建的。

1850年左右，帕拉伊巴河谷地的咖啡经济发展达到了高潮。

运输问题大部分是通过建设堂·佩德罗二世铁路，后称为巴西中央铁路解决的。铁路自 1855 年开始建设，以后几年里，各段陆续通车，但直到 1875 年才到达圣保罗境内的卡舒埃拉。后来，一家在圣保罗成立的公司把卡舒埃拉和省首府连接起来，这样把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连接起来的工程才最后完成。

* * * * * *

与此同时，咖啡种植开始在圣保罗内地一个叫做西圣保罗的新的地区发展了起来。咖啡树引进该地区，部分是为替换原来甘蔗园的甘蔗生产。圣保罗在巴西经济的总体中曾一直是糖生产的边缘地区。与咖啡相比，糖价跌落的趋势推动了从种植甘蔗向种植咖啡的转变。西圣保罗地区咖啡经济的成功主要依靠交通和一个输出方便的港口，因为距离里约热内卢港遥远。最大的困难是要穿过陡峭的马尔山山脉，才能到达海边。然而，这一困难被一家英国特权公司——圣保罗铁路有限公司（SPR）修建的，于 1868 年开始通车的从桑托斯至容迪亚伊的铁路克服了。当时，桑托斯港仅出口少量自 18 世纪末以来圣保罗沿海地区种植的咖啡。这条铁路的建成使该市一跃而成为出口中心。

圣保罗铁路有限公司曾同意将容迪亚伊一线延长至里奥克拉鲁。但是，后来该公司借口伦敦资本市场困难，对这段铁路的修建没有兴趣。这可能是战略考虑占了上风，因为这家公司实际上已经垄断了从内地到桑托斯港的通道。这时，和咖啡贸易有关系的一家由巴西资本组成的公司——圣保罗铁路公司，按照 1868 年制定的初步措施卓然出现。追随这家公司出现的还有莫贾纳、伊图阿纳和索罗卡巴公司。后者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和咖啡没关系，而与 19 世纪 60 年代在索拉卡巴地区发展起来的棉花生产有关系。

帕拉伊巴河谷地区的咖啡经济和西圣保罗的咖啡经济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历程。从帝国的最后 20 年开始，可以证明在前者衰落

的同时，后者进行了自由扩张的事实。在帕拉伊巴谷地和西圣保罗地区都可以进行粗放农业耕作，但是，在西圣保罗有大片的土地，可以对新的土地进行陆续开发；帕拉伊巴谷地有明显的地理限制，没有大的发展余地。由于长期种植的结果，也由于水土流失造成的土地贫瘠使收益下降，从而利用价值下降。在奴隶制废除前夕，这个地区庄园主的巨大投资是由奴隶组成的，这个事实本身表明了废除奴隶制所造成的冲击的程度。

除了拥有大量的土地外，其他的因素也都解释了西圣保罗上升的历程，这里讲的是当地的自然条件、技术和历史时期等。在圣保罗内地广袤的高原上集中了咖啡种植最有利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那里，有生产力很高的红土壤，那里的咖啡树可收获 30 年，而在其他地区很少有超过 25 年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被意大利移民称为“玫瑰”土的红土壤。尽管我们不应该夸大技术的进步，但是，在西圣保罗引进了犁和咖啡脱粒机。这意味着咖啡豆脱壳技术上的一次真正的革命。

最后，让我们来讲一下历史时期。在新区，资本的积累是在寻找取代奴隶劳动力的办法变得十分明显的国家生活阶段出现的。在以奴隶制为依托的帕拉伊巴谷地咖啡区出现得比较早。只有在它达到高潮的时候，奴隶贩运才被废除。随着生产力的下降，解决劳动力成为一大难题，但是没能解决。

这样，便形成了命运不同的两个地区性阶级。谷地咖啡庄园主支持君主制度，但在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措施被通过后渐渐地离开了它。这个离开的过程随着 1888 年奴隶制被废除而告结束，但是，帕拉伊巴河谷地的男爵们在那里的社会和政治方面已经没有大的分量了。

* * * * * *

西圣保罗的经济使之产生了一个被习惯地称为咖啡资产阶级

的新阶级。自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圣保罗地区进入了一个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过程。这不是朝夕间可完成的事。在某些方面，引进资本主义只是在近些年里完成的。在几十年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资本积累，经济多样化，形成土地、生产和消费市场的过程。

资本积累在初期是通过咖啡生产出现的，并逐渐和对铁路、银行和商业的投资结合在一起。咖啡生产的扩张使之产生了一个小生产和消费中心的城市核心网，并开始使经济经营多种化。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量移民涌入，促使形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和劳动力市场。

认为帕拉伊巴谷地和西圣保罗地区的各社会集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代表“旧的”、没落的贵族，一个代表“新的”、实干的资产阶级，那是个错觉。两个集团出自一个共同的设想，他们不同是由于物质和社会因素不同的现实原因所致。两个地区都发展了粗犷农业经营，并广泛地使用了奴隶劳动力。西圣保罗的庄园主们不是因为相信道德或自由劳动的收益高，而是由于奴隶劳力消失，需要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回答才转向移民的。1887年，在废除奴隶制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圣保罗已拥有奴隶人口10.7万人，在各省中占第三位，米纳斯吉拉斯占第一位（19.2万人），里约热内卢占第二位（16.2万人）。

1850年之后的奴隶补充是通过省际奴隶贩运实现的。因此，在巴西，在强迫奴隶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的痛苦形式下开始了国内人口的迁移。出现了新的奴隶贩运商和新的奴隶贩运职业：跑遍各省的奴隶购买商到处去说服比较穷的庄园主和城市居民把奴隶卖给他们。不仅仅通过海路把奴隶运往咖啡生产区，也可能为了达到逃缴港口税的目的迫使奴隶走陆路，从巴伊亚、米纳斯吉拉斯内地一直到咖啡生产区。没有可靠的省际奴隶贩运数量的记载，据总的估计，1850～1888年之间，有10万～20万奴隶被从东北部的原食糖生产区转移到中南部地区。1864～1874年之

间，东北部地区的奴隶人数从77.4万人（相当于当时巴西奴隶总人口的45%），减少到43.5万人（相当于这个总人口的28%）。同期，咖啡生产地区的奴隶人数从64.5万人（相当于奴隶总人口的43%），增加到80.9万人（相当于奴隶总人口的56%），仅圣保罗省奴隶人数就增加了一倍多，从8万人增加到17.4万人。

由于奴隶贩运被废除而造成的奴隶价格昂贵，即使像巴伊亚、伯南布哥这样一些老的生产地区也输出了大量的奴隶。自1874年开始，全国各个地区的奴隶人口都有下降，自从1885年开始，这种趋向就一直在加剧。东北部地区的奴隶下降情况比中南部地区更加明显。1874～1884年之间，奴隶人口下降的总平均数为19%，在中南部相当于9%，而东北部则相当于31%。南方也呈现出急剧的下降的情况，南里约格朗德居首位，在那里奴隶人口在此期间下降了几乎39%。

五 移民潮的开始

各地区对奴隶劳动力或大或小的依赖，在废除奴隶制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反应。但是，取得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和能力——圣保罗是个典型的例子——同时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解决办法是吸引欧洲劳动力到咖啡庄园来工作。但为什么不设法将奴隶变成自由劳动者，或进一步讲，为什么不设法鼓励东北部贫困地区的人口到咖啡种植园来呢？

对前一问的回答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庄园主的成见使他们很难，或根本就是阻止了他们对奴隶劳动制度进行变革的设想；另一方面，在多年实行奴隶制后，奴隶们能否还会安于在没有很大变化的条件下生活令人怀疑。在这方面，我们来想一下这样的事实，即在还存在奴隶制度的情况下，移民被迫对庄园主施加压力以达到比奴隶要好一些的生活条件。

对后一问的回答同前一问有一个接触点。帝国领导集团的思维所得到的种族主义论据是根据像巴克尔和戈比诺这样的一些作者的思想，不仅仅认为奴隶和解放奴隶价值低下，在葡萄牙殖民时期出生的混血人也被认为是低能儿，惟一能够救巴西的是尽快地使巴西欧洲化。和这个文化因素一起的其他因素也应该重视。东北部地区的作坊主和棉花种植者在不久前刚刚减少了奴隶劳动力，并且以非善意的目光看待他们控制下的劳动力向中南部转移。

东北部的一些州经常发生定期性旱灾，从而造成大批逃荒者。许多人无家可归，一些人被招募到北部地区去采橡胶，或到巴伊亚的可可园里去种植可可。发财或起码改善生活的梦想，在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不是在遥远的中南部地区，而是就在亚马孙和东北部的一些地区。

大批涌入圣保罗咖啡生产地区的移民史没有被包括在政治历史的周期化之中。它开始于第二王国时期，但在独立后的年代里取得了迅猛的发展。鼓励移民到咖啡地区来经历了一些试验和错误。1847 年，原帝国时期的摄政官和大部分财富来自进口奴隶的大庄园主——尼古拉·德坎波斯·维盖伊罗曾有过初期试验的经历。他利用王国政府的资金，招来一批德国和瑞士的移民，通过合伙经营制度，让他们到他的庄园和西圣保罗的庄园里去工作。

这种做法引起了许多摩擦。尽管来自受饥荒打击的欧洲地区，这些合伙人还是不甘心接受巴西所提供的生活条件。他们在庄园里，被置于包括信件检查和活动被封锁等严格的纪律管制之下。终于在 1856 年，在维盖伊罗的伊比卡巴庄园发生了暴动。从此以后，合伙经营制的尝试被停止。

重新招募移民的努力自 1871 年开始，正好和通过“新生儿自由法”在同一年。这次举动是由省政府和农村庄园主发起的。1871 年 3 月颁布的一条法律授权圣保罗政府，用公共资金贷款给庄园主，以便为各庄园引进一些农业劳动者。由于目的是吸引移民来巴西，政府决定发放一种旅途补助。这样，便开始了受补助

的移民活动，即享受该州提供的补助到圣保罗来的移民活动。几年中，补助方式经常变化不定，包括在省首府时住在政府建造的楼房里的8天住宿费和到各庄园去的交通费。

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作为移民进入圣保罗的人数仍很少。1875～1879年，登记进入圣保罗的仅有10455人，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咖啡生产的需要。从1874年开始，陆续到达巴西的意大利人，不满意巴西提供的生活条件，许多人又回国了。1885年意大利政府发布了一个通告，把圣保罗描写成一个不卫生和不是人呆的地方，劝阻人们不要移民巴西。

在奴隶制崩溃已经十分明显的敏感时刻，圣保罗精英的最显赫的人物在上述状况面前，做出了反应。1886年，在马尔逖尼奥·布拉多·儒尼奥尔和安东尼奥·达席尔瓦·布拉多兄弟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移民促进学会，并采取了一系列吸引移民到咖啡庄园工作的措施。

这个学会出版了许多葡萄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小册子，大力宣扬移民圣保罗的好处。并就移民许多有利的方面，与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美国和阿根廷等其他接受移民的国家做了对比。在不好的方面，没有提及还存在着奴隶制。马尔逖尼奥·布拉多·儒尼奥尔访问了意大利北部，研究了关于吸引移民的方式等问题，并在热那亚开设了移民促进学会办事处。

大洋此岸与彼岸的许多因素有利于大量移民的流入。由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变革造成的更强烈地打击穷人的意大利危机，是一个主要因素。同时，提供交通费用和住房的可能性，好歹也是一种刺激。

直到20世纪初，抵达圣保罗的大部分移民是由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尤其是伦巴第地区——的靠耕种自己的土地已经无法生活的农村劳动者或小业主组成的。

在帝国末年，从各地到达圣保罗的移民从1885年的6500人猛增到1888年的92000人。在这最后的一年中，意大利人几乎占了

当年移民总数的90%。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情况是，在废除奴隶制的第二年，即1888年的5月，在进行咖啡收获时，已经不存在缺乏劳动力的问题了。

六 巴拉圭战争

在咖啡生产在西圣保罗地区顺利发展和逐步废除奴隶制的建议有了初步进展的同时，一桩国际事件给第二帝国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就是巴拉圭战争。这场战争自1864年11月11日第一次敌对行动开始，到1870年3月1日结束，进行了5年之久。

为了准确地把握这次战争，我们先讲一下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的一般情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拉普拉塔河副王朝在西班牙殖民主义末期和19世纪前几十年，从未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过。经过长期的混战，在那片领土上诞生了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经过许多反复以及统一派与联邦派互相争夺的战争，诞生了阿根廷共和国。

统一派主要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人的利益，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在原副王朝首都统帅下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模式。商人阶层可以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牢靠地控制阿根廷的对外贸易，占有来自进口关税的收入。

联邦派则联合了地方精英、大庄园主和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工业家和商人。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权力分散的国家，以保证他们的收入不被置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业资产阶级规定的税收的枷锁之下。

阿根廷人、巴西人和独立党人之间经过3年的斗争，终于在1828年建立了乌拉圭。英国从赞许的态度对待这个国家的诞生，认为这可以有利于稳定拉普拉塔河河口湾地区，在那里，英国有财政和贸易利益。但是，乌拉圭在19世纪的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

和平。“白党”和“红党”两个党派之间展开了铁与火的政权争夺之战。“红党”联合了同情自由派思想的商人和欧洲一些强国；主要由农村庄园主组成的“白党”则继承了西班牙的老牌专制传统，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欧洲一些新的强国在阿根廷的发展。

原巴拉圭省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印第安瓜拉尼人后裔，他们不接受布宜诺斯艾利斯资产阶级的奴役，自19世纪的前10年开始，就以自治的方式行动着。自治没有取得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承认，实际上，在1813年，他们就阻挠巴拉圭开展对外贸易，封锁了巴拉圭人通过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到达拉普拉塔河河口湾进入海洋的自然通道。这一封锁迫使巴拉圭领袖若塞·加斯帕尔·弗朗西亚将国家与外界隔绝起来，也使其变成一个终身的独裁者。国家征用了原属于教会和主张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解的部分精英的土地，成为生产和贸易的主要代理人。

人们说巴拉圭是一个左派历史上常见的有远见卓识的政府领导下的小庄园主的国家，主要是指弗朗西亚时期。他在南美洲的总体环境中确实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但是，把这些措施编入进步措施类，简化了它的内容。在没收的土地上，政府组织了由政府或小承租人负责开发的祖国牧场。在政府的牧场里，利用奴隶或俘虏做劳力。经济不再是货币经济：无论是地租，还是税收都以产品而不用货币偿付。

弗朗西亚死后，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被指定为总统，他在1842年正式宣布巴拉圭独立。洛佩斯设法打破国家的孤立状态，修建铁路，鼓励对外贸易。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被派往英国，他在那里购买战争物资，招收欧洲技术人员来帮助国家实现现代化。巴拉圭逐步通过和国外市场的联系谋求自身发展。他对控制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航运以及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自由通行的兴趣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索拉诺·洛佩斯于1862年，在他的父亲去世后，上台执政。

19世纪前半期，巴西对邻国的态度可以这样概括：王国政府

最大的担心集中在阿根廷。害怕这个国家统一后可能变成一个能够削弱巴西霸权和吸引不安分的南里约格朗德省的强国。

对于乌拉圭，一直实行将其置于巴西影响之下的政策。南里约格朗德人作为养牛庄园主，在乌拉圭有经济利益，他们以敌对的目光看待对边界上的走私进行的镇压措施。巴西站在其政治路线接近自己利益的“红党”一边。王国政府甚至同罗萨斯的敌人——“红党”达成一项秘密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巴西答应向他们按月提供现金捐助。

19 世纪前半期，巴西与巴拉圭的关系取决于巴西和阿根廷关系的状况。当两国对立加剧时，王国政府倾向接近巴拉圭。当两国关系缓和时，巴西和巴拉圭的争执便又浮上水面。它们的分歧表现为边界问题和巴西坚持保证对进入马托格罗索的主要通道——巴拉圭河的自由航运。

表面上，存在着形成一个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反巴拉圭联盟的可能性，进而发动一场披着这种外衣的战争似乎还为时尚早。但是，这些发生了。未来联盟者的相互接近开始于 1862 年，当巴托洛梅·米特雷打败了联邦派，在阿根廷上台执政的时候。这个国家在阿根廷共和国的名义下被统一，米特勒当选为总统。他开始实行一种被在同一年接管政府的巴西自由派看好的政策。他和乌拉圭的“红党”接近，成为河流自由航行的捍卫者。

这些一致给巴西和巴拉圭之间的对立提供了空间。尽管两国在巴拉圭茶市场问题上存在着竞争，从巴西政府的角度看，这种争夺具有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地理（边界、河流自由航行等）内容。为了一下子打破巴拉圭的孤立和实现在地区的存在，索拉诺·洛佩斯决定同“白党”和米特勒的敌手——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和科连特斯省的领袖们联合起来。

远不像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作为英国利益的工具而行动的那样，王国政府这时已卷入了以“克里斯蒂问题”著称的一些和英国有关的事件，这里的“克里斯蒂”是英国驻巴西大使的名字。

巴西商船在被停泊在里约热内卢的英国海军俘获后，巴西于1863年初和英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国内，掀起了一种爱国热的气候，这种气候也被巴西公民在“白党”执政的乌拉圭遭受暴力的报道鼓动起来。帝国政府在1864年9月派兵攻入了乌拉圭，目的是帮助“红党”上台执政。

这时，洛佩斯决定采取主动。1864年11月11日，巴拉圭炮艇在巴拉圭河上俘获了巴西轮船“奥林达侯爵号”。接着，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实际上，战争行动开始于1864年12月23日，洛佩斯向马托格罗索地区发起进攻。不久，他便要求阿根廷授权让巴拉圭军队穿越科连特斯省，以进攻在南里约格朗德和在乌拉圭的巴西军队。这一要求遭到拒绝。

驱使索拉诺·洛佩斯冒着激起两个老对手——巴西和阿根廷联合起来反对巴拉圭的危险挑起战端的原因具有很大的投机性。表面上，他希望能削弱来自两个强大邻国的威胁和使巴拉圭变成本大陆政治游戏中的一支力量。为此，预计在缺乏防备的马多格罗索可取得胜利，从而可迫使巴西议和，还预计会得到乌拉圭的“白党”和阿根廷反对米特勒各省的支持。

希望实现的这些前景没有能够实现。企图获得阿根廷各省的支持落空了；在乌拉圭，巴西王国政府强行扶植“红党”维南西奥·弗洛雷斯上台执政。1865年3月，巴拉圭向阿根廷宣战；同年5月1日，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政府签订了三国联盟条约，阿根廷总统米特勒担任了联盟军总司令。

三国联盟的经济和人口力量远大于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相信——像许多冲突一开始常有的情况那样——这次战争将是一场轻松的散步。然而，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和他的敌军相反，洛佩斯军事上做了充分的准备。看来，当时的军队人数统计不准确，战争开始时，巴西军队是18000人，阿根廷8000人，乌拉圭1000人。与此同时，巴拉圭军队人数达64000人，另有估计为数28000人的老兵后备军。但是，巴西有在河上战斗的巨大水军优势。

在几年的过程中，三国联盟军的力量增长了，巴西人占绝对多数，起码占了联军总数的 2/3 以上。1865 年，在巴西全国 490 万男性公民中，动员参战的总人数估计在 13.5 万～20 万人之间。正规军、国民卫队营和按殖民地时期沿袭下来的强行征兵方式征募来的人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不仅如此，还有许多人加入了祖国志愿军。

奴隶主也献出了许多奴隶去当兵作战。1866 年法规定，凡是入伍的“祖国奴隶”，都赐以自由。该法讲的奴隶是指奴隶贩运废除后非法进入巴西，被抓获后置于王国政府的管制之下的非洲人。

巴西军队在战争的过程中，逐渐得到了巩固。那时帝国只有很少的职业军官，在扩大兵源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没有义务兵役制，而时行一种颇受限制的抽签兵役制。大部分是白种人的国民卫队成员免服抽签兵役。直到巴拉圭战争，一直在独自承担巴西在普拉塔地区战斗任务的南里约格朗德民兵，却表现得无力对抗像巴拉圭这样的现代化军队。

在战争史上，双方战功是和军队在战斗中损折的人数和因病——尤其是霍乱造成的死亡人数连在一起的。在战争开始时(1865 年 6 月)，巴西的海军在雷亚舒埃洛战役中，摧毁了阿根廷领土上的巴拉圭海军。此举使联盟军封锁了巴拉圭，切断了它通过巴拉圭河通往国外的惟一通道。但是，这种有利条件没有被充分利用。由于害怕敌人沿巴拉圭河——尤其在乌迈塔周围——构筑的防御工事，联军被巴拉圭陆上防御系统牵制在那里几年没动。

也是在 1865 年 6 月，已经驻扎在阿根廷科连特斯的巴拉圭军队侵入了南里约格朗德，不久被打败。自这一年的 11 月开始，除了变成第二战场的马托格罗索外，战争发展到在巴拉圭境内进行。在图尤提（1866 年 5 月）展开了这场战争最大的阵地战。尽管巴拉圭战败，联军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形势，因而，接着在库卢

徘提遭到严重的挫折。这些战斗的目的都是要攻下乌迈塔堡垒。

在战争方向上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 1866 年 10 月，任命卡希亚斯为巴西武装部队司令。这一任命是当时在野的保守党要求自由党对飘忽不定的战局负责的压力下宣布的。1868 年初，卡希亚斯还担任了联军总司令。米特勒被迫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处理国内政治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各省反对向巴拉圭派兵。从此以后，实际上是巴西独自继续了这场战争。

攻打乌迈塔之前，卡希亚斯集中力量完成军队必要的基本建设的任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进攻。乌迈塔于 1868 年 8 月投降。在 1869 年 1 月，巴西军队进入了阿松森。身患疾病、希望和平、认为战争再继续进行下去只是摧毁政策作祟的卡希亚斯辞掉了司令职务。代替他的是王位继承人伊莎贝尔公主的丈夫，德乌伯爵。

经过几次战役，打败了巴拉圭最后的一支由老人、孩子和病人组成的很小的军队。最后，索拉诺·洛佩斯被包围在营地里，于 1870 年 3 月 1 日被巴西军队的士兵打死。

巴拉圭深受战争的伤害，向巴西和阿根廷割让了领土，也失去了自己的未来。现代化的过程已经成为过去，巴拉圭变成一个出口毫无重要意义的产品的国家。可靠的计算表明，巴拉圭死去了一半的人口，从 1864 年的总数为 40.6 万人左右，下降到 1872 年的 23.1 万人。幸存者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巴西赢得了战争，但欠下了英国大量的债务，在这次战争一开始，两国就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是，战争最大的后果是肯定了军队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面貌和目的的机构的存在。在另一些方面，对帝国政府由来已久的不满取得了另一种表现形式。归根结底，军队用它自己的对错，支撑了战场上的斗争。与此同时，文人精英们——人们鄙视地称他们为“贪婪的人”——则处境安全，有些还因做为军队提供给养的生意而发了大财。

七 第二王朝的危机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第二王朝危机的迹象，诸如开始出现了共和运动，王国政府同军队及教会的摩擦。此外，奴隶制问题的进展在国家和支持它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上产生了磨损。这些因素对君主制度的垮台都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也可从导致产生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接受改革思想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总体理由中得到解释。

分阶段进行的废除奴隶制最后直到 1888 年才算结束。对于有关该法律措施的最大争论不是发生在 1888 年，而是在王国政府提出所谓《新生儿自由法》法案的 1871 年。该法案宣布，在此法颁布后出生的女奴的儿女一律为自由人，他们直到 8 岁之前属于母亲的主人所有。从这个年龄开始，奴隶主可以选择接受国家给予的补偿或留用孩子服务，直到其年满 21 岁。

法案出自里约布兰戈子爵主持的保守派内阁，以此从自由派的手中夺过废除奴隶制的旗帜。是什么驱使政府提出一条尽管没有什么革命意义，却在它同它的社会支持基础之间制造了问题的法律呢？

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将这种举动归结于皇帝及其国务委员们的选择。尽管还没有发生过奴隶造反，但是，在巴拉圭战争刚过不久，统治圈子里认为，巴西国内战线的基础十分脆弱，因为它没有取得大部分人的忠心。奴隶制问题的发展趋向，尽管伤害了重要的经济利益，但在这个问题和奴隶造反的潜在危险面前，被视为一种较小的祸患。

相反，社会统治阶级认为这个法案是颠覆秩序的严重威胁。通过奴隶主的慷慨行为来解放奴隶，可以取得受益者的尊敬和服从。通过法律的力量为自由开路，可以在奴隶中间产生一种权利

思想，会把国家带向种族之间的战争。

议员们对于通过最后法案的态度是很说明问题的。在东北部地区的议员多数赞同法案（39 票赞成，6 票反对）的同时，中南部地区的议员却与此倾向背道而驰（30 票反对，12 票赞成）。这就部分地反映了省际奴隶贩运已经逐渐减小了东北部地区对奴隶劳动力依赖的事实。

还有另一个与职业有关的重要事实。大部分的议员是由国家官员，尤其是法官组成的。这部分人大多数来自东北部和北部地区，服从政府的领导，大部分投票赞同政府。从党派观点看，自由派和保守派投票没有明显的区别。两党的代表根据自己的情况，对法案投了赞成和反对票。实际上，1871 年法产生的效果不大。只有少数的孩子交给了国家，大部分奴隶主继续利用他们做劳力。

自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由于协会、报纸的出现和宣传的大力开展，废除奴隶制运动取得了更大的活力。社会地位和观点不同的人参加了废奴运动。在不同的精英人物中，突出的有出身伯南布哥政治家和农村大庄园主家庭的重要议员和作家若阿肯·纳布戈。出身贫贱的黑人和混血人的，如若泽·多帕特罗西尼奥、安德烈·雷布萨斯和路易斯·伽马也是废奴运动的中心人物。

帕特罗西尼奥是神甫兼庄园主和奴隶主与一位黑人水果小商贩的儿子。他曾是里约热内卢废奴运动报纸——《晚报》的东家，以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而闻名。

雷布萨斯工程师代表反对派，他是王国综合理工学院的植物学、数学、几何学教授，平时少言寡语，是个与众不同的内向人物。他把废除奴隶制和建立“农村民主”结合在一起，主张把土地分给解放的奴隶和设立迫使把庄园分成小块出卖的土地税。

路易斯·伽马有一部自传体小说。他的父亲出身于巴伊亚的一个葡萄牙富人家庭，以儿子为骄傲的母亲鲁伊莎·马依姆“是一个一直拒绝天主教学说和洗礼的自由非洲黑人”。伽马被贫困潦倒的父亲当做奴隶非法卖给他人，先是被送到里约，后来到桑托斯，

和其他100多个赤脚和饥饿的奴隶一起上了马尔山。他从主人的家里逃出来，当了兵，后来成了圣保罗的一位诗人、律师和记者。

在废奴运动不断发展的同时，北方各省对保持奴隶制度已经不感兴趣，以致在1884年，塞阿拉宣布自行废除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1885年通过了《六十岁人法》，也称为萨拉伊瓦—科特若佩法。这个由萨拉伊瓦国务委员主持的自由派内阁提出的法案，当科特若佩男爵领导的保守派再次上台执政时，在参议院通过。大致的内容是，这个法案宣布给予60岁以上的奴隶以自由，并确定了通过补偿，逐步解放所有奴隶的标准。这部法律被认为是阻止彻底废除奴隶制的形式，没有达到既定的目的。

在1885～1888年之间，经过一段短暂的停滞，废奴运动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这时最重要的情况是在圣保罗庄园里，由于大批奴隶逃亡而造成工作的混乱。圣保罗富家子弟安东尼奥·本托领导的废奴运动的积极分子深入到内地的庄园和城市开展造反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桑托斯变成一个庇护逃亡奴隶的中心。在此期间，发现奴隶制很快就要解体的圣保罗的咖啡精英们，急忙启动了移民计划。

1888年，抓住奴隶制不放的只有帕拉伊巴河谷地咖啡生产老区的议员们，这些地区下降的财富都集中在奴隶身上。和西圣保罗地区联在一起的圣保罗保守派参议员——安东尼奥·普拉多准备的一份法案仍企图维持原制度不变。这一方案规定，为保证面临的咖啡收获，凡通过补偿和提供3个月劳动的奴隶立即实行解放。在自由派的反对面前，国务委员会主席、保守派分子若昂·阿尔弗莱多决定提出无条件废除奴隶制的建议。决议在议会以多数票通过，遂于1888年5月13日，由当时摄政王位的伊莎贝尔公主批准了这项协议。9位投票反对法案的议员中有8位是里约热内卢省的议员。在参议院，科特若佩男爵领导了脆弱的抵制，发出威胁说："不久，将提出分土地的请求，国家可以发布无偿征用土地的法令"。

被解放奴隶的命运根据全国各地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在东北部地区，他们一般都变成了大庄园主的附属劳动者。马拉尼昂是一个例外，因为那里的解放奴隶离开了庄园，作为合股人在未开垦的荒地上定居下来。

在帕拉伊巴河谷地，原来的奴隶变成了衰落咖啡庄园的合伙人，后来成为小业主或牧民。在西圣保罗，大批奴隶逃亡是废除奴隶制前几年的特点。但是，黑人向圣保罗市和其他地区的流动持续了起码 10 年之久。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市中心区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圣保罗，固定的工作都被移民占去了，解放的奴隶被迫去做报酬少、不稳定的工作；与此同时，在里约热内卢情况略有不同。由于那里的手工艺作坊和工厂里都有雇佣黑人奴隶和解放奴隶的传统，而且那里的移民比重很小，因而黑人劳动者找到工作的机会相对比较多些。比如，1891 年在里约热内卢制造业里工作的近 30％的劳动者是黑人，与此同时，1893 年仅在圣保罗工厂中工作的移民就占了 84％。

在南里约格朗德，像在圣保罗一样，在取得正规工作的机会上，有一个奴隶或解放奴隶被移民取代的过程。

尽管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同，但是，废除奴隶制没有消除黑人问题。移民选择在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工作，而在其他地区向解放奴隶提供的工作机会又很少，便造成了对黑人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作为偏见的部分后果，这种不平等终将更为加深排斥黑人的偏见。尤其在移民多的地区，黑人如果生性顺服，被认为是可用的低下人种；但如果生性喜欢冒险，则被认为是游手好闲和犯罪嫌疑分子。

* * * * * *

在巴西的历史题材中，很少进行过像对奴隶制问题这样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对于穿越大西洋的奴隶的死亡率、对于奴隶建立家庭的可能性、对于奴隶解放或 1888 年之前的奴隶解放的意义、

对于所谓农民豁口、对于奴隶在各种劳动条件下的状况等等，都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这种争论能够最大限度地证明，奴隶制度仅仅依靠公开的暴力是无法支撑下去的，尽管这种暴力支撑起了主要的作用。这种制度的长期存在，也由于它的包容性，在奴隶之间进行不同的划分，对奴隶提供取得自由的现实的或想像的前景等原因。关于这些，有两个内容突出：所谓农民豁口和奴隶解放问题。

存在“农民豁口”说是以席罗·卡尔多佐为首的作者们的主张，他们强调在殖民地时期和19世纪的巴西经济中致力于国内市场供应方面的重要性。这一论点出自对这样一种事实的证明，即在当时的甘蔗园，尤其咖啡庄园里，允许奴隶在他们的茅屋周围或自己的份地上进行生产劳动，生产出满足自己生活消费和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食品。这种情况大量普及，以致变成了风俗。这样，他们便得出结论说，当自发地为市场供应而生产时，奴隶即变成了农民，从而在奴隶制度中打开了一个豁口。这一证明还指出这样的事实：尽管奴隶在法律上是一种物，但在社会关系的实践中，终于有了由风俗习惯派生出来的一些权利。

奴隶解放问题，同英、法属地相比，是由于在西班牙殖民地和巴西都存在大量奴隶和解放奴隶引起的。在讲殖民地巴西、尤其讲关于米纳斯情况时，我们已经提到这些事情。事实上，尽管数量有限，我们已经看到，在殖民时期末，解放奴隶或自由奴隶占来自非洲的人口（黑人和混血人）的42%和巴西总人口的28%，与此同时，奴隶占巴西全国总人口的38%。根据1872年的人口普查材料，解放或自由奴隶占来自非洲人口的73%、巴西总人口的43%，奴隶仅占巴西总人口的15%。

奴隶解放是在奴隶或第三者赎买他们的自由身份的时候，或当奴隶主决定解放他们的时候发生的。通过赎买取得奴隶解放大多数都是在城市实现的事实说明，在这些城市存在着靠奴隶挣钱的极大可能性。

对于奴隶主主动解放奴隶的行为的最容易的解释是出于经济原因，仅仅解放那些老的和身患疾病的奴隶。但是，一些研究对这种假设深为怀疑。比如，一项对1684～1785年之间萨尔瓦多的7000多名解放奴隶所做的调查显示这些受益者的平均年龄仅为15岁。

这并不是说应该在大量奴隶被解放的原因中排除经济的考量。曾经进行过的一些研究显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衰落的地区之间的对比中，经济衰落地区的奴隶解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但是，感情的原因可能强烈地影响了奴隶解放行动，因为，从性别来分可以看到，妇女占绝大多数。这样，在里约热内卢市，在1807～1831年之间，女子占解放奴隶总数的64%。如果我们注意到男人在奴隶人口中的比例远超过妇女的比例的话，那上述比例是非常高的。

最后，我们应该记得，解放奴隶不具有和自由人一样的地位。直到1865年，通过赎买或无偿解放的奴隶的自由资格可以简单地借口忘恩负义而被原主人撤销。此外，奴隶的解放在理论和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都附有一系列限制，特别是必须给主人服务的限制条件。1870年之后的立法在确定儿童和老人的自由时，应该是已经加进了这种常规的限制的。

尽管我们发现在黑人造反行动中有一些解放奴隶，但是，这些奴隶的态度一般都介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事实上，更接近于贫穷的白人。奴隶的解放缓和了直接的种族冲突。除此之外，在黑人人口大量存在的条件下，解放奴隶具有种族社团保护地的重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是巴伊亚，在那里19世纪的解放奴隶保证了一个把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种族社会的存在。

八　共　和　制

与革命思想和某种社会改革思想联在一起的共和主义思想在18世纪末期以来的两个要求独立的运动中取得了发展。1870年在

里约热内卢爆发的共和运动的一些领导人继承了这种思想。像1870年共和宣言的签署人洛佩斯·特罗翁和席尔瓦·贾尔丁——此人出现已经到了帝国的最后几年——等人就主张人民革命是通向共和国的道路。但是，大多数人赞同根逖诺·博卡尤瓦的意见，他主张从一个制度到另一个制度的和平过渡，如果这可能的话，还可以等到堂·佩德罗二世死后。

城市共和运动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自由职业者和新闻工作者组成的，这个集团的出现是由城市发展和教育传播、加军人扩张造成的。里约热内卢的共和派把共和国和公民的最大政治代表性、个人权利和个人保障、联邦制以及废除奴隶制联在一起。

19世纪70年代的新鲜事是在各省出现了一个保守主义的共和运动，以1873年成立的圣保罗共和党（PRP）为最大的表现。圣保罗共和党的骨干分子大多数来自咖啡资产阶级。这个党的纲领的主要点是主张建立联邦制和保障各省最大的自治权。尽管联邦主义最大的倡导者之一——达瓦雷斯·巴斯托斯——坚持联邦君主制思想，但是圣保罗的共和派还是相信，帝国同联邦制是不相容的。联邦意味着由各省控制银行政策和移民政策以及收入下放。

圣保罗的共和运动由于大力强调联邦思想和对保护公民及政治自由以及对奴隶制问题的斗争形式不感兴趣而与里约热内卢的共和运动不相同。由于其社会组成的原因，圣保罗共和党避开对奴隶制采取明确表态，以致直到奴隶制废除前夕才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圣保罗共和派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主要是圣保罗在议会和政府机关的次要地位。同时要求分享政府收入，他们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圣保罗对帝国收入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尽管做了非常积极的宣传，并出版了许多报纸，但是，里约热内卢的共和运动却没有能够组成政党。有巨大影响的党，直到帝国灭亡，还是圣保罗共和党和米纳斯吉拉斯的共和党，特别是

前者。1884 年，圣保罗共和党联合反对党的保守派，把普鲁丹特·德莫拉埃斯和坎波斯·萨勒斯选人众议院，这两个人后来成为共和国初期的两位平民出身的总统。据 1889 年统计，圣保罗选民的1/4（3600 人）是共和党人，但却位居自由党（6600 人）和保守党的选民（3900 人）之后。

＊＊＊＊＊＊

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 10 年里，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824 年宪法中规定的“王位与圣坛”联合的本身就代表着冲突的“潜在之源”。如果说天主教是官教，只要它不反对宪法，宪法本身即给国家保留了赐予或否定教会意旨合法性的权力。

这一冲突是庇约九世教皇在位期间，由 1848 年以来发布的梵蒂冈的新谕旨引起的。教皇谴责“现代自由”，并极力确立教会在全世界的精神主导地位。1870 年，当梵蒂冈教士会议宣布它的从无过失的教义后，教皇权力得到了加强。教会的这种做法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反响。比如在美国，这正好和大量爱尔兰移民涌人是在同一个时期。在新教领导圈子里，害怕美国会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在巴西，梵蒂冈的政策鼓励了神甫们在宗教纪律方面的强硬态度和面对国家确立自治的势头。

当奥林达大主教堂·维塔尔遵照教皇的决定，禁止共济会成员进入宗教兄弟会时，发生了冲突。尽管人数不多，但共济会在当时的领导圈子里颇有影响。当时主持内阁会议的里约·布朗戈子爵就是一名共济会会员。自争执一开始，就被当做“造反官员”对待的堂·维塔尔大主教被逮捕并判刑，接着，又有另一位主教被逮捕和判刑。这场风波由于采取了撤换里约·布朗戈内阁(1874～1875)、赦放诸位被捕的大主教和教皇中止实行对共济会会员的禁令的处理办法才平息下来。

* * * * * *

陆军军官参加政府，到堂·佩德罗一世让位，是有重要意义的。此后，军人参政的数量有了越来越大的缩减。军队参与独立后的人民骚动，使得它受到不信任目光的看待。费若领导的摄政时期的自由党人缩减了军队编制，创立了国民卫队。其根据是，一个巨大的常设军队会像阿根廷和墨西哥那样导致小波拿巴派的出现。

相反，海军深受重视，被看做一支贵族军队，因为在独立初期甚至有英国军官参加了这支队伍。

尽管存在着不平等的对待，直到 1850 年，陆军军官仍具有精英的特点。这个机构的社会组成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有了很大的变化。报酬低、生活条件差和晋升缓慢都使当时大家庭的子弟对致力于军事生涯失去了热情，但军人或官僚家庭的子弟希望成为军官的数量却增加了。

从地区角度看，大部分新军官来自东北部和南里约格朗德的内地城市。一般地讲，来自东北部地区的军官都是出身于供不起孩子上学的衰落了的传统家庭。在边界地区的南里约格朗德有大批驻军，军队在那里有较高的威信。1853 年，政府在那个省设立了培养步兵和骑兵军官的军事学院的事实就是这种情况产生的一个注释。

军队的社会组成的变化，为推开帝国政治精英军官，尤其是法学院毕业的学士军官做出了贡献。那些军人眼里的所谓“法学家”是无用的文化和选举腐败的大杂烩，并用他们的法律法规网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 10 年里，政府在一个繁荣的时期，采取了一些改革军队的措施。1850 年 9 月颁布的一条法律，改变了军官团的结构，赋予那些持有军事学院文凭的人一种没有这种文凭

的人所没有的特权，特别是军队的各个技术军种。在1810年以来王国开设的军事学院的学科中，包括了和严格的军事教学的另一种学历相结合的土木工程学历。1858年，战争大臣把工程班和军事班分开，迁到红海滩，在那里一直呆到1904年。

在巴拉圭战争前，在军官中已经出现了对帝国政府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但涉及诸如晋升标准、无须经过战争大臣允准而可结婚的权利等军队的特别问题，而且涉及其他更大的、关乎国家生存的问题。青年军人特别主张加强教育、发展工业、建设铁路和废除奴隶制。

通过重新组织军事学院，战后军队作为国家机关而得到加强。当涉及政治方面时，许多军官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标志着两代军人不同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卡希亚斯和弗洛雷亚诺。毫无疑问，卡希亚斯在军队中是一位具有崇高威望的人物，但是也是保守党的领袖之一，甚至在巴拉圭战争之前，他就几乎成为主持内阁会议的人物。弗洛雷亚诺尽管也和自由党最高层有联系，这些人也曾帮助他在军人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他一直以军人的身份、公民的身份讲话。他主要是为军队效忠。

人们本来以为进行军事教育的红海滩军事学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数学、哲学和文学的研究中心。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对政府的攻击变成以君主专制制度为目标，共和思想取得了进展。对此，实证主义的影响十分重要，在1872年，当本加明·孔斯坦特担任该校的教授之后，这种理论日益为人们所接受。

实证主义理论在拉丁美洲，诸如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它好像对自由主义寡头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僵局给出了一个在秩序之内的科学回答。当人们重视技术革新和工业的价值时，尤其是对批评那些仅具有表面知识的法学学士的新兴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巴西，实证主义包含着一种集中在国家行动和传统政治家中立之上的保守主义的现代化方式，这种理论在军人中间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在这中间，其影响很少通过对学说原则的正统认同而出现。一般来说，军队的军官由于他们的洞察力，吸收了这种理论观点最精华的方面。共和制专政表现为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干预主义的、能够使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政权，或干脆实行军事独裁的政权的形式。

* * * * * *

除废除奴隶制之外，19 世纪 80 年代的帝国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 1881 年 1 月通过的以"萨拉伊瓦法"命名的一项选举改革法。选举改革确立了立法选举的直接投票，从而结束了投票人和选民之间的限制性区分。保持了最低收入标准的要求——经济登记——并从 1882 年开始，设立了文学登记，即限制文盲投票。选举权扩大到非天主教徒、加入巴西国籍的人和解放奴隶。

作为维护选举和扩大公民权的道德化工具，萨拉伊瓦法开始成功地用于 1881 年的选举。一致性似乎已经结束了，因为，尽管保守党处于少数，但选出了拥有 47 名议员的大党团。然而，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们在选举中又表现出了旧的恶习，舞弊和向选民施加压力等。城市选民和帝国文人希望实现"真正的选举"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同时应该注意到，在一个文盲国度里，当禁止文盲投票选举时，萨拉伊瓦法使得选举人群急剧地缩小了。比如，在 1872 年的选举中，投票人占全国人口的 10.8%。但在 1886 年的选举中，这个比例下降到 0.8%。

* * * * * *

自 1883 年以来，在政府、议员和军队军官中出现了多次争执。最大的一次摩擦发生在 1884 年，是当皇帝的朋友、威望很高的军官塞纳·马杜雷拉少校邀请了一位曾经在塞阿拉参加过解放奴隶斗

争的木筏主参观由他任指挥官的里约热内卢射击学校时发生的。后来被调到南里约格朗德的塞纳·马杜雷拉在共和派报纸《联邦》上发表文章讲述他的塞阿拉插曲。

与塞纳·马杜雷拉事件平行的还有另一些事件，引起了在报纸上的争论。于是，战争大臣签署了一项命令，禁止军人在报纸上讨论政治问题或军队问题。

在南里约格朗德驻军的军官们在阿雷格里港举行了一次大会，抗议战争大臣的这一禁令。南里约格朗德省省长德奥多罗·达奉塞卡因拒绝惩罚提出抗议的军官而被召到里约热内卢。最后，出现了有利于军人的和解形式。禁令被撤销，内阁受到议会的批评。

这时候（1887 年 6 月），军官组织了军人俱乐部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常设协会，德奥多罗被选为该俱乐部主席。在俱乐部成立的当月，德奥多罗向战争大臣提出请求，不再承担追捕逃亡奴隶的职责。请求虽然被战争大臣拒绝，但在实际上却是实行了。

当 1889 年 6 月，皇帝邀请自由派人士——欧罗·普莱托子爵出来组织新内阁时，军方的不满和共和派的宣传增加了。欧罗·普莱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然而，在任命德奥多罗的一个私人敌对者做南里约格朗德省省长时，却起到了使这种情绪升温的作用。

圣保罗和南里约格朗德共和派领袖们和军人之间就推翻君主专制的接触从 1887 年开始，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1889 年 11 月 11 日，军方和非军方人物，诸如路易·巴尔博扎、本加明·孔斯坦特、阿雷斯逖德斯·洛伯和根逖诺·博卡尤瓦同德奥多罗元帅一起开会，竭力劝说他领导一次推翻现政权的运动。青年军人散布了一系列的谣言，说德奥多罗被监禁、缩减陆军编制、甚至取消陆军，使德奥多罗下定起码推翻欧罗·普莱托的决心。

1889 年 11 月 15 日清晨，德奥多罗指挥军队，开往战争部，当时，君主专制领袖们都在那里聚会。接着，是一段混乱的插曲，对这段插曲有着不同的说法，却无人准确地知道，德奥多罗是否在那天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还是仅仅是他认为的推翻了内阁。无

论事实如何，在第二天，君主制度倒台已经是既成事实。几天后，皇室出走避难。

九 君主制的倒台

君主制度的结束是由一系列分量不同的因素造成的。首先，应该突出讲一下特点不同的两种力量：军队和圣保罗共和党里的最富政治表现力的圣保罗咖啡资产阶级。11月15日的插曲几乎是由军队的独家行动产生的，它对于加速君主制度倒台给予了一个小小的、但却是决定性的推动。另一方面，巴西咖啡资产阶级同意共和国具有一个无论是军队，还是里约热内卢市民都无法单独提供的稳定的社会基础。

还有值得关注的人的因素。皇帝生的痢疾病从争夺的中心撤走了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由于他的个人威望和来自王位的影响，堂·佩德罗二世应该是军方不满的平息者。他的缺席把军队的军官放在与受到多方限制的皇家精英们直接对抗的位置。精英们紧抱着他们的文职权威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不放，这在诸多例子中突出地表现在任命一个文职人员为战争大臣，在那时，经过慎重的考虑绝不会采取这种做法。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建立第三王国缺乏一种令人鼓舞的前景。由于堂·佩德罗去世，伊莎贝尔公主上台执政，其丈夫德乌伯爵是个法国人，也是一个起码是很有争议的人物。

在君主制度倒台问题上，从前一般归结为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教会和政府之间的争夺与废除奴隶制。这中间的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制度的磨损是起了作用，但是其分量不应该夸大。君主制度的倒台局限于意见分歧的精英之间的争夺，教会无论在君主派中间，还是在共和派中间都没有很大的影响。相反，实证主义者——无论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都与它保持着

一定的距离。

至于废除奴隶制，皇帝在逐步废除奴隶制方面的举动在农村庄园主——不仅仅在农村庄园主中间，引起了强烈的愤怒。帕拉伊巴谷地的咖啡庄园主对帝国的幻想破灭，他们原希望帝国会采取保护他们利益的立场。这样，君主制度失去了它赖以支撑的主要社会基础。但是，废除奴隶制的本身对君主制度灭亡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废奴措施的惟一正面敌手——里约热内卢的男爵们，作为社会力量，在1888年已变得微不足道。

十　经济和人口统计

在我们关注的这段时期，分别于1872年和1890年，进行了最初的两次人口普查。尽管存在着许多缺点，但这两次普查还是提供了比以往所有已存的估算都更可信的数字。从1819年估算的包括80万印第安人在内的近460万人，上升到1872年的990万人和1890年的1430万人。根据1872年的资料，米纳斯吉拉斯仍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拥有210万居民；接下来是巴伊亚，拥有138万人；伯南布哥和圣保罗两地的人口很接近，都在84万人左右。变化突出的是圣保罗的上升和里约热内卢省的下降，这个省从第二位下降到了第五位。

从种族的角度看，混血人占了人口总数的42%，白人占38%，黑人占20%。这样，白人比1819年估算的不足30%增加了许多。这和移民的进入有关。在1846～1875年之间，有30多万人进入了巴西，平均每年1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葡萄牙人。

前几次的普查资料表明，教育方面的情况十分落后。1872年，在奴隶中文盲的比例为99.9%，在自由人中为近80%，妇女文盲占86%。即使对没有除去幼儿的总人口的比例打一个折扣，全国文盲的比例也是很高的。这里还要澄清，在6～15岁人口中，只有

17%的人上学。当时，在中学里注册的人数只有12000人。然而，据估计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有8000人。

一道深渊把文人精英同广大的文盲和受过初级教育的人分隔开来。随着堂·若昂六世来到巴西，一些外科和其他医科学校出现在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这些学校以及工程学校从根源上讲和军事教育有关。从培养精英角度讲，最重要的步骤是创立圣保罗法学院（1827）和奥林达/累西腓法学院（1828）。从这些学校走出来的毕业生，成为法官、律师，组成了帝国政治骨干的核心。

鉴于直到1872年，80%的人口从事农业活动，13%的人口从事服务业，从事工业的人只占7%，巴西实质上仍是一个农业国。我们看到，在服务业范围里，一半以上的人是家庭佣人。可以看到，工业尽管包括开矿业，但是仍然处在开始的阶段。

1890年，拥有522000名居民的里约热内卢是惟一的大城市。这个帝国的首都集中了政治生活、娱乐业和对交通、照明和城市美化等大量的投资。接下来的是萨尔瓦多、累西腓、贝伦和当时只有65000名居民的圣保罗。但是，这个变成咖啡贸易中心，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移民的城市开始了一个大范围的飞跃，以一种几何级的年增长率增长，从1872～1866年之间的3%，上升到1866～1890年之间的8%。

1870年左右，中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东北部地区的经济衰落的倾向已经巩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外对农业生产的各种激励造成的。在许多咖啡消费国，居民的人数及其收入都大大增加了。美国——最大的咖啡消费国——的人口，在1850～1900年之间几乎增加了3倍，喝咖啡的习惯范围也扩大了。这一事实和其他情况一起，为生产商取消咖啡价格的浮动提供了条件，或者说，由于需求的增加，咖啡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跌落的时期，还能够顶得住可能的损失。

东北部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尽管仍然在全国占突出的地位，却没有拥有和咖啡一样的命运。糖在巴西对外出口清单中被咖啡

超过后，除 1861～1870 年的 10 年间曾被棉花超过外，仍占第二位。

但是，糖在世界市场上的情况已经是步履艰难了。这种产品在世界上有两个很强的竞争对手：19 世纪中期德国大规模生产的甜萝卜糖和以古巴为杰出代表的加勒比地区生产的糖。和巴西相反，这个岛国面临着劳动力的困难。然而，土地的肥沃和所占有的资本——西班牙和后来的美国资本——使古巴无论在生产和制糖工业的现代化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应该记取的另一个因素是它非常靠近消费中心区。1860 年左右，古巴使用蒸汽机的糖作坊已经达到 70%，而相比之下，伯南布哥使用蒸汽机的糖作坊却只有 2%。

在巴西的东北部地区，由政府扶助进行的现代化的努力是缓慢的，效果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1875 年左右巴西在世界食糖市场上的供给量从传统的 10%下降到 5%，这是不足为奇的。

从殖民地时期以来，棉花的种植就在北部和东北部各省广泛发展，主要集中在伯南布哥、马拉尼昂、阿拉戈阿斯和帕拉伊巴地区。但这些都是些中、小庄园主结合他们自己生活需要的食品植物种植和在当地市场上出售而生产的产品。

自 19 世纪初期以来，美国的棉花在竞争中开始在英国纺织工业这个主要进口市场上排斥巴西的棉花生产。1861～1865 年之间的美国内战给了巴西棉花出口一个突然的激励，以至于使巴西的棉花在 1861～1870 年的 10 年间的出口名单中占第二位。然而，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很快便衰落了。棉花生产后来的推动力和纺织工业因国内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国内市场有关。

在亚马孙地区开采橡胶开始受到重视，并吸引了当地的流散人口和北部地区的劳动者。世界对这种产品的大量需求出现在 1839 年，当查尔斯·古德伊尔改进了橡胶硫化程序之后。由于他的革新，使橡胶变得既耐热又耐冷，开始被用在诸如皮带、水龙带、胶鞋、雨衣等许多产品上。

直到1850年，巴西橡胶的出口还是微不足道的。在以后的年代里逐渐增长，到19世纪80年代，其出口值达到了8%，比例已经很接近糖的出口值（10%），居第三位。橡胶业的巨大发展——橡胶骤然繁荣——就是在这段时期开始的。不仅出口增加了，而且形成了地区经济的一极。直到那时，生意都集中在一个小小的葡萄牙经纪人集团和一些外国出口公司的手里。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银行网，中间人和消费商品进口公司的数目增加了，由此，推动了贝伦和玛瑙斯的发展。只有劳动者和卑微的橡胶工人的命运没有改变。

尽管美国是巴西咖啡的主要进口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10年里，英国在巴西商品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中，仍占第一位。在1870～1873年之间，巴西向英国的出口占总出口值的将近40%，其次，才是占29%的美国。以这些年的情况作为参考，我们会发现，巴西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从英国进口（占总值的53%）的，将占第二位的法国（占总值的12%）抛在一个相当大的距离之外。

正像在殖民地时期经常发生的那样，不是国家所有的产品都用于出口。一些领域从事牛和其他牲畜饲养及食品生产，这既是为了自身生活需要，也是为了在国内市场上出售。在这方面，有两个地区表现突出：米纳斯吉拉斯和国家的南方——尤其是南里约格朗德。

米纳斯吉拉斯的领土分为许多各不相同的区域，由一些条件很差的通道勉强地将它们连接起来。马塔地区生产咖啡，与里约热内卢相连。圣弗朗西斯科河谷地是一个养牛地区，这个地区与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的联系比与本省其他地区的联系更密切。该省的南部和圣保罗及帝国的首都相连。

尽管通过里约热内卢出口的咖啡生产在增长，但米纳斯吉拉斯和国外市场的联系却没有占主导地位。它的经济基础还是牲畜饲养和粮食种植。似乎大部分植物食品，像玉米、黑豆和木薯等都在本省销售，与此同时，牛、猪及其副产品是向其他地区出售

的重要项目。

直到奴隶制废除，米纳斯吉拉斯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奴隶数量最大的省份，尽管在奴隶数量的比例上，里约热内卢省已经超过了它。咖啡生产的扩张吸收了大量的奴隶，但是，奴隶还是大量集中在米纳斯的非咖啡生产区。这样，就保持了一个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特点，即奴隶制关系同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经济相结合的特点。

在国家的南部，国内市场的生产和养牛庄园主的传统及移民的迁入联在一起。那里对移民的吸收比圣保罗早，并有与之迥然不同的特点。在圣保罗，移民以向大庄园提供劳动力为目的，而在南方，却是和建立在小庄园基础上的殖民计划联系在一起。

在独立前不久，若泽·博尼法西奥和堂·佩德罗，出于社会经济和军事的原因，做了旨在吸引德国殖民者到南方，特别是到圣卡塔雷纳和南里约格朗德去垦殖的第一次努力。若泽·博尼法西奥希望促使在巴西形成一个农村中产阶级。

在阿雷格里港附近，出现了一个最成功的殖民区——圣莱奥波尔多德国殖民区（1824）。德国人的殖民活动在圣卡塔雷纳的东北部展开，在那里出现了布卢梅瑙殖民区（1850）、布鲁斯垓殖民区和多纳弗朗西斯卡殖民区，即现在的若因维利。

殖民区的移民养猪、养鸡、养奶牛、种植土豆和蔬菜及直到那时在巴西还没有的水果，如苹果等。他们还在建立工场和工业机构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样，便开始出现了初期简陋的脂肪、酸奶、肉类罐头、啤酒及其他的饮料工业。

由于移民流向南方，德国人在1846～1875年之间迁入巴西的外国移民中占第二位。但是，自1860年开始，移民流开始减少。这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给予殖民者——特别是受雇佣做圣保罗参议员维尔格伊罗合伙人的瑞士人和德国人的生活条件恶劣。1871年，统一了的德意志帝国终止了对巴西移民的赞助。有关南里约格朗德的资料显示了两个时期的不同：1824～

1870 年之间，南里约格朗德接受的移民中，德国人占 93% 左右，而 1889～1914 年之间，却仅占迁人移民的 15%。

1870 年以后，帝国政府鼓励意大利人到南里约格朗德开发。大部分来自蒂罗尔、威尼托和伦巴第的小农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殖民区，其中，卡希亚斯殖民区是最重要的。意大利人的经济活动，除了一些和德国人相似的道路外，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是他们的特殊之处。1882～1889 年之间，在进入南里约格朗德的总计 41000 名移民中，34000 名是意大利人。

移民经济和牧主经济惟一的相同之处是二者的生产都是为了供应国内市场。其余——从占地时期到产业结构——一切都是不同的。牧场主比较集中，至今仍然集中在南里约格朗德的坎帕尼亚一带和乌拉圭境内，他们是大片土地的主人。牛和牛皮可以用来制革，特别是牛肉可用于当地消费，或在沿海地区建立的腊肉加工厂里制成腊肉。腊肉是中南部地区穷人和奴隶的食品。南里约格朗德的养牛牧主和腊肉加工主就这样进行大量生产和加工，产品主要用以供应国内市场。该省一个经常令人头疼的问题是条件优越的普拉塔河地区的肉类在巴西市场上与之进行激烈的竞争。

尽管交通有了相对的进步，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家领土和经济的结合薄弱问题在独立后的巴西继续存在下来。正像在殖民地时期曾发生过的那样，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非常关注与王国首都接壤的地区和一些省首府的存在，而边远地区的存在却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即使在每个省的范围里，也都存在一些不同的和分散的地区。共和国在它的政治组织方面表现了在联邦制基础之上的这一地区特征。

第三章 第一共和国时期（1889～1930）

一　巩固共和的年代

作为插曲，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过渡几乎宛如一场散步。作为补偿，1889 年 11 月 15 日以后的年代则具有很大的变化不定的特点。争夺政权的各个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并在如何组织共和国的思想上有很大分歧。一些主要省份——圣保罗、米纳斯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们都主张联邦共和国的思想，这样可保障各地区有较大程度的自治。

但是，他们对组织政权的其他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圣保罗共和党和米纳斯的政治家们主张自由模式。南里约格朗德共和派是实证主义者。在儒里奥·卡斯逖里奥斯领导下的南里约格朗德变为受实证主义影响最主要的地区的理由不明朗。可能是那个地区的军事传统和处于少数的共和派为寻求能够给他们带来强大凝聚力的理论的事实促成了这些。他们必须使自己能被在帝国时期以自由党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流派所接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军人。在共和国初年，军人是很有影响的。德奥多罗·达奉塞卡元帅曾是临时政府首脑，几十位军官被选进制宪代表大会，但是没能组成一个性质一致的集团。因为，

在陆军和海军之间存在着对立：在陆军是新制度的缔造者的同时，海军却被视为与君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也存在着将德奥多罗派和弗洛雷亚诺·贝绍托派分开的个人风格和思想观点的差异。在老元帅的周围团结起了参加过巴拉圭战争的资深老战士。这些军官中的许多人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与实证主义思想也有一定距离。他们帮助推翻了君主制度，是“为了拯救军队的荣誉”，而没有一种成熟的共和国眼光，他们只认为军队应该比在帝国时期起更大的作用。

尽管弗洛雷亚诺不是实证主义者，也没有参加过巴拉圭战争，团结在他周围的军官们有着另一种特点。他们都是曾经上过军事学校、并接受过实证主义影响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作为公民—士兵参与社会的，负有为国家取得一个有意义的发展方向的职责。共和国应该有秩序，也要有进步。进步意味着通过增加科技知识、实业主义和发展交通来实现社会现代化。

尽管在军队内部的各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但是，他们在一个基本点上是接近的。他们不代表社会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比如，他们都是自由共和国的保卫者的例子就是这样。首先，他们都是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军队的代言人。无论从它的功能的性质，还是从军队内部发展着的文化类型，军队军官不管是否是实证主义者，都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对于他们来说，共和国应该具有一个强大的政权，甚至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专政。省的自治不但有为农村大产业主利益服务的嫌疑，而且涉及分裂国家危险的嫌疑。

自由共和国的支持者们害怕在德奥多罗个人指挥下的半专制制度延续下去，急忙出来策划召开制宪代表大会。新制度在欧洲受到怀疑，为保证共和国得到承认和取得国外信贷，需要赋予国家一种符合宪法的形式。

1891 年 2 月颁布的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受美国模式的影响，采用了自由联邦共和国的称号。各州——从那以后，对原来各省的

称谓——没有被明确授权履行诸如对外贷款和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州公安部队等的职权。这些职权是各大州，尤其是圣保罗州深感兴趣的。可否在国外贷款，对于圣保罗政府实施其咖啡增值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从事出口的各州——尤其圣保罗——的一项显然十分重要的职权是颁布商品出口税收法令的职权。这样，就保证了可以贯彻自治的重要收入的来源。各州也取得了建立自己司法的职能。

联邦政府（联邦）并没有丧失政权。南里约格朗德实证主义派所主张的超联邦主义思想不但受到军方的反对，而且受到圣保罗方面的反对。损害中央政权是一种上述各方出于各种原因都不愿进行的冒险。联邦取得了收取进口税收、开设货币发行银行和组织全国武装力量等的权利。联邦还具有参与各州建立秩序和保持联邦共和形式的职能。

宪法开启了政府总统制制度。从前属于皇帝的政权由 4 年一届选出的共和国总统执行。像在帝国时期一样，立法机关仍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但是，参议员不再是终身的。众议员在各州按各州居民人数的比例选出，每 3 年一次。参议员的选举，按照固定的人数，每 9 年选举一次：每个州要有 3 个参议员代表本州，3 个代表联邦区，即共和国首都。

确定了直接投票的普选制度，废除经济登记制度。除诸如文盲、乞丐、士兵等一些范畴外，凡年满 21 岁的所有巴西公民都被认为是选民。宪法没有提及妇女，但是，她们被含蓄地认为没有选举权。作为特殊情况，第一届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是由后来变为普通代表大会的制宪代表大会间接投票选出的。

宪法条文赋予巴西人和旅居巴西的外国人以自由、个人安全和财产权。废除在帝国时期也很少施用的死刑。国家和教会成为分立机构。这样，在巴西就不再存在官教了。直到那时由天主教会把持的一些重要职能赋予了国家。共和国只承认世俗结婚，墓地改由市政府管理。在墓地，人们有信奉各种宗教的自由。1893

年颁布的一条法律，建立了人的出生和死亡户籍登记制度，从而完善了这些宪法规定。这些措施反映了共和国领导人的世俗信念、消除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冲突的需要和使大部分是路德教徒的德国移民融入社会的目的。另一个旨在使移民融入社会的措施是所谓巴西国籍大加入。通过这一措施，所有1889年11月15日在巴西，并且在宪法生效后6个月内没有声明保留原国籍的外国人都自动变为巴西公民。

* * * * * *

共和国的成立，在英国取得有限制的赞同，但在阿根廷却受到热烈欢迎，也使得巴西更接近美国。巴西制度变革正值由美国倡议的第一届美洲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与会巴西代表遂由许多观点都与美国一致的共和派历史学家萨尔瓦多·门东萨代替。

随着里约·布朗戈男爵进入外交部，巴西外交的轴心明显地从伦敦转向华盛顿，他自1902～1912年，主持该部多年，经历了几届总统更迭。里约·布朗戈的政策不代表与美国自动站到一条线上，却是与之有力的接近，其目的是要为巴西取得南美洲第一强国的地位。

巴西——阿根廷关系惬意的时代过去了，两国在军事领域进入了公开对抗。巴西竭力取得像乌拉圭、巴拉圭这样一些小国的同情，并努力接近智利，以限制阿根廷的影响。尽管如此，尤其在他主持外交部的最后几年，里约·布朗戈竭力推动签订一个以ABC著称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国之间的稳定协定，但是没能够取得成功。

在里约·布朗戈时期，巴西同几个南美洲国家，其中有乌拉圭、秘鲁和哥伦比亚确定了边界线问题。巴西和玻利维亚为争夺因橡胶开发而骤然升值的亚马孙地区的阿克里爆发了武装冲突。这个被认为是玻利维亚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却在巴西移民的占领之

下。经过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导致两国签订了彼得罗波利斯条约（1903），根据这一条约，玻利维亚承认巴西对阿克里地区的主权，作为交换条件，接受巴西给予的250万英镑的补偿。

* * * * * *

作为大量发行货币和取得信贷容易的后果，共和国的第一年以生意热和金融投机热为显著特点。实际上，由于雇佣劳动和移民大量涌入的新现实，流通手段是今非昔比的。建立起了许多企业，一些是真的，另一些则是假的。交易所的投机活动大增，物价飞涨。1891年初，发生了经济危机，股票暴跌，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币值按英镑比价规定的巴西货币开始暴跌。也可能是在阿根廷严重金融危机（1890）之后，在拉丁美洲出现的利用英国资本落潮酿成这种局面。

在这一危机正严重的时候，议会选举德奥多罗·达奉塞卡为共和国总统，弗洛雷亚诺·贝绍托为副总统。当德奥多罗试图以已被废除的最高权力为模式加强政权时，同国会发生了争执。他关闭了议会，许诺进行新的选举和修改宪法，以加强政权和缩小各州的自治权。德奥多罗计划要取得成功，需要依赖武装力量的团结，这些没能实现。在弗洛雷亚诺派的非军界反对派和海军方面尚未做出反应之前，德奥多罗终于宣布辞职（1891年11月23日）。副总统弗洛雷亚诺·贝绍托上台执政。

弗洛雷亚诺元帅体现了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不相同的共和国观点。他试图建设一个主要以军队、军事和民间学校青年为基础的、稳定的、中央集权的、泛民族主义的政府。这种观点和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加强军队和里约热内卢市民示威游行的自由的和权力分散的所谓“庄园主共和国”的观点相矛盾。

但是，和人们预料的相反，在弗洛雷亚诺的总统府里，总统和圣保罗共和党达成了一种默契。这样做的基本理由是对付对共

和制度所产生的现实的、有时是想像的危险。圣保罗的政治精英们从弗洛雷亚诺身上看到他可能是保障共和国存在的最可靠的人选。而后者则觉察到，没有圣保罗共和党，就没有他执政的政治基础。

* * * * * *

在共和国初年，全国政治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是南里约格朗德。在共和国宣布成立到 1893 年 11 月，儒里奥·德卡斯蒂里奥斯当选为州长之间，换了 17 届州政府领导。以里约格朗德共和党（PRR）内的信奉实证主义的历史共和派为一方，自由派为另一方，双方相互对抗。1892 年 3 月，后者成立了联邦制度党，推选在帝国时期自由党中有崇高威望的人物席尔维拉·马丁斯为他们的领袖。

联邦制度党人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在该州的南部和乌拉圭交界的坎帕尼亚地区的养牛庄园主中间。他们组成了在帝国时期已有根基的传统政治精英。共和派则以沿海地区和集中了许多移民的塞拉地区的人民为基础。他们形成了一个新兴精英集团，并打破了企图垄断政权的政治。

以联邦主义革命著称的两个集团之间的内战开始于 1893 年 2 月，直到两年半之后，已经是普卢登特·德莫拉埃斯总统当政时才告结束。斗争是无情的，造成了几千人死亡。许多人不是在战争中死去的，而是做了俘虏后被砍头的。

从战争一开始，弗洛雷亚诺就得到了圣保罗及其组织严密的州民兵的财政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军人在政府中的影响在减小。出身于帕拉伊巴谷地的圣保罗家庭、转而支持共和国的原帝国国务委员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担任财政部长。众议院和参议院主席也都落在圣保罗共和党的手里。

弗洛雷亚诺和圣保罗政治精英之间的默契，在选择他的继承

人时结束了。弗洛雷亚诺的支持基础很薄弱，其中包括长于喧嚷，但效率很低的激进派，他没有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条件。圣保罗人普卢登特·德莫拉埃斯，于 1894 年 3 月 1 日以多数票当选。这位元帅以不参加总统就职仪式来表达他的不快。据报道，他宁愿呆在自己的寒舍里照顾他花园里的玫瑰。

这届总统的继任标志着军队人物入主共和国总统府的结束，当选为 1910～1914 年总统的埃尔梅斯·达奉塞卡元帅例外。除此以外，军人的政治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衰落了。协调这些活动的军人俱乐部也在 1896～1901 年之间被关闭了。

在普卢登特·德莫拉埃斯政府里，弗洛雷亚诺时期业已存在的各个大州的政治精英和集中在里约热内卢的激进共和派之间的对抗更加尖锐了。激进派是由中产阶级下层成员、工人和忍受着昂贵的生活费用打击和低劣的生活条件的军人组成的一支队伍。他们的动机不限于物质方面。他们希望有一个能够战胜对他们来说无处不在的君主主义威胁的强有力的共和国。自由共和国的敌对者也有爱国和反对葡萄牙人的老传统。掌握着里约热内卢大部分生意的“加利西亚人”是猛烈打击的目标。激进派支持弗洛雷亚诺，并把在 1895 年 6 月去世的他树为一面旗帜。

* * * * * *

一桩发生在距里约热内卢遥远，但在共和国政治上留下后果的事件给普卢登特·莫拉埃斯政府的年代打下了烙印。那是在 1893 年，在巴伊亚北部内地的一个废弃的庄园里，形成了一个以卡奴多营地闻名的村子。他们的领袖是安东尼奥·维森特·门德斯·马歇尔，更以安东尼奥·孔塞列罗著称。孔塞列罗生于塞阿拉，是个希望他成为一名神甫的商人的儿子。在背上了经济问题和经过家庭纠纷之后，他从事过几种职业，当过教师、流动商贩，甚至成为受过礼仪的虔诚义士——一种集教士和镖头于一身的人物。

他在广大内地过着流浪的游民生活，联合人们修建和重建教堂，筑建墓地围墙，过着一种充满辛酸的生活。后来，他在卡奴多定居下来，吸引了二三十万内地居民。

孔塞列罗的布道与教会进行着竞争；一桩围绕着砍伐树木的无足轻重的事件，使巴伊亚州州长下决心给“狂热信徒”们一个教训。令人惊讶的是，巴伊亚军队竟被打败。于是，州长又求救于联邦军队。由大炮、机枪武装的两次征讨均遭失败，并且在其中一次征讨中，他们的指挥官也被打死，这在里约热内卢激起了抗议和暴力活动的浪潮。

激进派在一个与内地生活条件及内地人精神世界相联系的插曲中，察觉到了君主主义政治家的黑手。这个幽灵由孔塞列罗宣扬君主制度将要复辟的事实发展起来。共和国——根据他的说法——只能是无神论者和共济会成员的事，正如采用世俗结婚制度和无故禁止耶稣会活动所证明了的那样。

由 8000 多人组成、并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征伐军，在阿图尔·奥斯卡将军指挥下，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终于在 1897 年 8 月荡平了卡奴多这个小村庄。它的保卫者大部分在战斗中阵亡，凡是被俘的均被砍头。对于实证主义军官和共和派政治家来说，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斗争。实际上，双方都很“野蛮”，更野蛮的是那些不能，起码不想理解内地人的受过教育的人。

* * * * * *

寡头一自由共和国的巩固是由另一位圣保罗人，坎波斯·萨勒斯（1898～1902）继承普卢登特·德莫拉埃斯总统完成的。激进派运动由于它的一些成员卷入了企图暗杀普卢登特·德莫拉埃斯的活动而受到破坏。军人大部分回到了军营。

以圣保罗为首的各个大州的政治精英们胜利了。但是，没有创造出能使寡头共和国建立在稳定的政治制度之上的手段。赋予

各州的巨大职能在一些州引起了敌对集团之间的斗争。联邦政府运用它在宪法中规定的有争议的权力对之加以干预。这使得一些州对权力的控制变得扑朔迷离，减小了联邦和各州之间能够长期协调一致的可能性。尽管宪法上讲“各权力之间是和谐的和彼此独立的”，但政权在企图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立法方面碰到的困难增加了。

鉴于这些问题，坎波斯·萨勒斯想出了一个以州长政治闻名的解决办法。通过对众议院内部制度巧妙变通的办法，保证每个州的议会代表性与占统治地位的地区集团相符合。同时，保证众议院对政权的最大服从。只部分达到目的的州长政治的宗旨在于消除各州内的派别争夺，并同时加强了政权，这就是坎波斯·萨勒斯认为的那个所谓“杰出政权”。

在财政方面，自君主制时期遗留下来的严重局面急剧恶化。共和国政府从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外债每年消耗掉贸易结算盈余的大部分。这种情况在19世纪90年代的10年过程中，由于公共赤字增加而有恶化的趋势。许多费用与那个不稳定时期的军事行动开支有关。当时，由于经常借助于国外贷款，1890～1897年之间的外债增加了近30%，随之产生了许多新的债务偿还协议。

另一方面，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咖啡种植的扩张带来1896～1897年的大丰收。咖啡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供应扩大，造成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和外汇收入减少。在这一届政府的末期，当外债偿还明显继续不下去的时候，普卢登特·德莫拉埃斯便开始和国际债主进行谈判，以期达成某种协议。在里约热内卢，同伦敦暨普拉塔河银行达成了谅解，与此同时，已经当选但尚未就职的总统——坎波斯·萨勒斯去伦敦，以期与罗思柴尔德银行达成了谅解。自巴西独立以来，这家银行一直担任巴西在欧洲的财政代理人的角色。

最后，在1898年6月，已经是坎波斯·萨勒斯政府时期，达成了一项艰难的基金贷款协议，作为取得喘息时间和通过一种新的贷款办法，来保证偿付利息和以往贷款的计划。作为担保，巴西

把里约热内卢的海关收入交给了债主，并被禁止在1901年6月之前进行新的贷款。还答应焚毁部分流通中的纸币，履行艰难的通货紧缩计划。这样，国家勉强逃过了已无偿付能力的局面。然而，在以后的几年里，将为这些和随后在坎波斯·萨勒斯政府时期采取的另一些措施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而导致了经济活动萎缩，银行倒闭和企业破产。

二　寡头统治和上校们

共和国实现了州自治，充分体现了每个地区的利益。这些反映在政治计划和仅限于每个州的共和党的组成上。组织全国政党的企图成为瞬间即逝的烟云，即失败了。由少数精英控制的各共和党决定着全国政治的命运，并就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的指定达成了协议。

各个州的寡头政治代表着什么？以站在一个最重要的楷模地位上的圣保罗、南里约格朗德或米纳斯吉拉斯的名义讲话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这些寡头在垄断政治权力的形式上有某些相同之处，那么他们在与社会的关系上也有一些区别。在圣保罗，寡头政治精英与咖啡经济有关的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为与工业有关利益关系密切。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各个集团的代理人。为了统治阶级最一般的利益，圣保罗的政治寡头们善于有效地把圣保罗州组织起来。

分别控制着里约格朗德共和党和米纳斯共和党的南里约格朗德和米纳斯吉拉斯的政治寡头，在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各方面都具有充分的自治权。在实证主义权威理论指导下的里约格朗德共和党以强有力的政治机器自居，决定着养牛庄园主和上升中的移民的利益。米纳斯吉拉斯的政治寡头们也不是咖啡庄园主或养牛庄园主的“指挥棒”。为了关注这些社会方面，他们组成了一个职业

政治家机器，这个机器在很大程度上由其自身产生出一个权力之源，任命官员、使土地占有合法化、决定在教育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投资等。

初看上去，政治寡头的统治似乎是可以被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选举的手段打破的。然而，选举不是义务的，一般人民把政治看做大人物之间的一种游戏，或利益交换。当在总统选举中，各州的政党相互协调，抛出惟一的候选人时，或当在野党的候选人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时，人民对选举的冷淡增加。投票人的比例晃动在最低时的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4%（在1906年阿奉索·佩纳的选举中）到最高时的5.7%（在1930年儒里奥·普莱斯特斯的选举中）之间。

应该强调的另一个侧面是，选举结果不反映现实情况。选举不是秘密投票，大多数选民被置于政治长官的压力之下，而这些人也在讨取上述长官的欢心。通过假造选举过程记录、死人票、外国人票等的选举舞弊是常见的事实。这样一些扭曲或许已经不是新闻，而是代表着自君主制度以来的情况的延续。

尽管如此，比较起来，参加投票的人还是比帝国时期增加了。把帝国最后一届皇家议会的立法选举（1886）同各州选民都参加了投票的第一届共和国总统选举（1889）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参加选举的人增加了400%。此外，不是所有的共和国总统选举都是对一个名字的简单认可。1910年、1922年和1930年，在分别选出埃尔梅斯·达奉塞卡、阿图尔·贝纳尔德斯和儒里奥·普莱斯特斯的选举中争夺还是很激烈的。

* * * * * *

人们通常把第一共和国称为“上校共和国”，这里的上校是指原国民卫队的上校，他们大多数都是作为政权的地方基础的农村产业主。上校主义代表了当时不但在农村，而且在城市都存在的

一种最普遍的社会政治关系——顾主主义[1] ——的变种。这种关系是由社会不平等、公民无法享有他们的权利、国家的社会救助服务薄弱或根本不存在以及不存在职业公务员造成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但是，共和国为地方政治领袖集中更多的权力创造了条件。这主要是由赋予各市扩大部分税收和扩大市长选举等权利造成的。

从选举角度讲，“上校们”控制着其势力范围内的投票人。利用各种各样的利益，诸如一双鞋、一个医院的空缺或一份教师工作作为诱饵来为他指定的候选人换取选票。但是，“上校们”没有能够垄断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代表各种市民利益的其他集团，在驾驭政治上起着很大的作用。此外，尽管“上校们”作为支撑寡头政治制度的基础是重要的，但是仍然依赖一些管辖权来维持他们的权力。在这些管辖权范围里，在一些大州，并不是“上校”集团的州政府最突出。“上校们”向各自州的政治领袖们提供选票，但是，要依靠他们给选民所期待的利益，尤其是兑现集体性利益。

根据全国各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现实，上校主义有着不同的标志。“上校”政权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东北部内地，在圣弗朗西斯科河附近出现了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真正的“上校族群”。与此相对照的是，在一些重要的州里，“上校们”则依靠更广泛的机构，即政府机器和共和党。

三　联邦和各州之间的关系

在一般常识中，第一共和国以“咖啡加牛奶”而著称。这句

---

[1] 顾主主义一词用的面很广，一般是指政治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包括以提供工作，保证财政利益，免除某些负担、债务等让与公共利益的形式来换取政治上，尤其投票方面的支持，即接受顾主的利益，也受顾主控制，按顾主意志办事。

话表达了圣保罗（咖啡）和米纳斯吉拉斯（牛奶）之间的联盟统帅着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治的思想。但现实却是更多样化的。为了了解这些，我们来近看一下联邦和起码三个彼此十分不同的州——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之间的关系。

不想伤害联邦政府的圣保罗竭力要保住它由正在发展中的经济提供的收入和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保障的自治。但是，圣保罗人不能把所有风光好事独揽。为了保持在最显要的地位上，制订货币和汇兑政策的主要职能还是由联邦政府负责，这个政策除了决定国家的财政方向，也反映在咖啡生意的命运上。

在联邦范围里，圣保罗政治家们把力量集中在这样一些事情和为取得政府支持咖啡升值计划的倡议上。这样，尽管圣保罗经济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实现了多样化，但是它的政治精英们却主要在为咖啡资产阶级的利益活动，应该说从这个阶级中产生了他们这些精英中的许多成员。

咖啡升值政策是圣保罗在联邦的作用和各州之间关系的最明显的例证之一。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圣保罗的咖啡生产大量增加，产生了一些关于咖啡种植收入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两个基本源头：咖啡的大量供应导致了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下滑；自坎波斯·萨勒斯政府开始的巴西货币升值阻碍了本国货币对咖啡国际价格下降的补偿。

为了保证咖啡种植的收益，20世纪初在圣保罗出台了许多政府干预咖啡市场的计划。最后，在1906年2月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因为这项协议是在圣保罗市签订的，因而被称为陶巴特协议。签署协议的有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州。

协议的两个基本点是：通过以适当的价格向咖啡种植主购买咖啡的方式，谈判借取1500万英镑的贷款，用以支付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创立一种旨在稳定汇率的机制，以抑制巴西货币升值。政府应该用国外资金购买丰收年的咖啡，进行商品储备，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在国际市场上抛售。这一计划是建立在丰收和歉收经

常交替变化的正确思想和政府收购减少咖啡供应以使咖啡价格上升的前景之上的。

联邦政府对这一计划的抵制和协议成员州的沉默迫使圣保罗州与赫尔曼·西尔肯领导的一个美国进口商集团合作，独自出资执行这项计划。这个集团的出资和银行贷款使咖啡有了退出市场的可能。但是，如果不能获得长期的巨额资助，这种情况是很难维持长久的。

1908 年下半年，阿奉索·佩纳总统从议会获得授权，让联邦政府为圣保罗取得 1500 万英镑贷款做担保。从此开始，只要圣保罗州把这一活动的控制权交给国际银行家掌握，便可继续推行其咖啡升值的活动。这一计划在 1909 年产生了初步效果。咖啡的国际价格开始上升，由于库存引起的供应量缩减，也由于收获量减少，直到 1912 年，咖啡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价位上。1913 年 6 月，贷款偿清。

一直到 1924 年，当阿图尔·贝纳尔德斯担心联邦预算，放弃了对咖啡的保护而由圣保罗州直接担负起对咖啡的长期保护的职责时，还有其他两次在联邦负责下的咖啡增值活动。

这个简短的陈述说明了圣保罗和联邦之间存在的关系类型。圣保罗人有办法保证自己的自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也能推行自己的经济计划。但是，当采取汇兑升值措施时，联邦的汇兑政策在圣保罗咖啡种植界引起不利的反响。此外，联邦政府的担保应该是必要的，起码可为获得国外贷款提供方便。

* * * * * *

米纳斯政治家的态度却另有不同。他们代表的州，经济上比较分散，有咖啡、养牛和一定程度上的工业，没有起主导作用的一极。此外，米纳斯州没有圣保罗那样的实力，要依靠联邦给予

的好处。这种情况使得米纳斯的政治精英们与“咖啡”和“牛奶”的特殊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积累着自己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力量。米纳斯人在众议院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众议院有一个 37 个席位的党团，而圣保罗仅有 22 个席位。这个比例是根据 1890 年的人口普查确定的。1920 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了圣保罗人口比例大幅度的增加，圣保罗人曾企图纠正这个比例，但没能成功。

米纳斯的政治家们控制了取得许多联邦政治职位的通道，并在他们的优先目标之一——在米纳斯境内修建全州都受益的铁路问题上取得成功。在 20 世纪 20 年代，联邦修建的铁路的 40% 集中在该州。同时努力保护在国内市场上的米纳斯产品，并根据情况支持咖啡升值。

* * * * * *

南里约格朗德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存在具有和军人存在密切相关的特点。这种接近不意味着军人和里约格朗德共和党的完全一致。在 1894～1910 年之间，南里约格朗德人——像军队高层一样——在联邦政府中几乎无一席之地。当埃尔梅斯·达奉塞卡当选时，他们又重新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出现。

造成上述的亲合倾向有各种原因。从帝国时期起，南里约格朗德就集中了最多的军队，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军队人数晃动于全国兵员总数的 1/4～1/3 之间。1919 年成立的第三军区是一座通向政府高层的桥梁，因为曾有几位军区司令做了战争部部长。军队的重要性鼓励了南里约格朗德一定社会阶层的人走上从军的道路，为第一共和国贡献了多名战争部长和军事俱乐部主席。

另一方面，这一地区打打停停的战争有利于军官和政党之间的接触。比如，由于联邦主义革命，产生了一些军官同里约格朗德共和党的联系。

某些思想和政治特点也都很接近，在军队内部兴盛一时，但

其重要性还不很清楚的实证主义是这种思想的主要方面。此外，南里约格朗德共和党人所主张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和军人集团的观点也很一致。里约格朗德共和党主张一种物价稳定和联邦政府开支的保守政策。通货膨胀会给干肉市场带来问题。由于这种产品主要是东北部和联邦区人民阶层的消费品，这些阶层购买力的任何下降都会造成需求的萎缩。尽管动机不同，这种景况却建立了一座与以赞许的态度看待采取保守主义财政政策的军人沟通的桥梁。

有一个东北部的政治寡头集团可能对国家政治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个地区的州际联合因现存的利益冲突而增加了困难。比如，由于这个地区每个州收取的出口税的资金都很少，各州都争先恐后地争取联邦政府给予更多的好处；各个州也都卷入了围绕着对一个州流通到另一个州的商品收取州际税的权利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

圣保罗和米纳斯政治寡头的联盟是第一共和国政治历史的基本要素。这个联盟是由两股力量中的一股或另一股为主导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争议，终于导致了巨大的混乱。

尽管有军界的影响，但是圣保罗在共和国初期还是处于领导地位。在米纳斯人的支持下，圣保罗人在议会里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为文人总统上台铺平了道路。1894～1902年之间，接连选出的三届总统——普卢登特·德莫拉埃斯，坎波斯·萨勒斯和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他们都是圣保罗人，这种情况后来再没有过。圣保罗在这些年代里的政治主导地位不但从其经济重要性，而且也可从其精英们的党派团结得到解释。圣保罗精英的绝大部分能够很快放弃他们之间原来的分歧，在圣保罗共和党的周围组成一支整齐的队伍。

在米纳斯却是另一种景况，那里各集团之间的分歧只有在1897年，米纳斯共和党的所谓第二次成立后才平息下来。从那以后，米纳斯在国家政治中的存在才日趋增长。

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之间的协议自坎波斯·萨勒斯开始一直延续到1909年。就在那一年，两个州的分歧开始明朗化了，这对军人临时和南里约格朗德长期回到国家政治舞台起了帮助的作用。1909～1910年的共和国总统选举运动是共和国生活中第一次真正的选举争夺。德奥多罗的侄子，埃尔梅斯·达奉塞卡元帅在里约格朗德和米纳斯共和党及军人的支持下，成为总统候选人。圣保罗作为反对方，与巴伊亚结成联盟，抛出了路易·巴尔博扎作为候选人。

路易竭力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的选票，主张民主原则和秘密投票，给选举运动定下一个反对军人参与政治的基调，把攻击军事首脑和策动州公安部队与军队对抗作为一种行动的模式。尽管路易·巴尔博扎最重要的政治基础是在当时的圣保罗政治寡头之中，他的竞选运动显示出一种知识分子为公众自由、文化、自由传统和反对不文明、寡头统治和专制的巴西而奋斗的姿态。埃尔梅斯的胜利使当时狭小的知识分子界产生了莫大的失望。

1906年，在就推出米纳斯人阿奉索·佩纳作为总统候选人达成谅解的时候，南里约格朗德之星开始放出生命的光辉。自埃尔梅斯政府开始，这位候选人就一直作为第三大明星在“咖啡加牛奶”的星空中闪耀。这个事实使圣保罗和米纳斯避免了新的分歧。一条不成文的公约，1913年在米纳斯城市欧罗费诺形成，根据这个公约，圣保罗人和米纳斯人设法轮流入主共和国总统府。然而，南里约格朗德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存在并没有消失。尽管还没能主导共和国总统接替的问题，但是，南里约格朗德的政治寡头在1910年之后不断上升，他们占据了许多部长职位，与此同时，圣保罗的政治寡头们则只好盘踞在他们自己的州里。

最后，华盛顿·路易斯总统不按游戏规则办事，悍然指定圣保罗人儒里奥·多普莱斯特斯做他的接班人（1929），成为1930年政治决裂的核心因素。

* * * * * *

对各政治寡头之间协同一致的分析指出，联邦政府不是一个简单的咖啡庄园主俱乐部。中央政权被确立为国家整体的协调者，尽管它很脆弱，但并不因此而不存在。它必须保证国家一定的稳定，调和各种利益，吸引外国投资，关心外债问题。

然而，咖啡生意是那个时期经济的轴心。在第一共和国期间，咖啡平均占出口总值的60%左右，在巴西对外出口的产品名单中保持着遥遥领先的榜首地位。在那个时期末，甚至占了平均出口总值的72.5%。这个全国最发达地区的发展和就业都靠它。它也提供了进口和履行对外信约，尤其是偿还外债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外汇。

不管共和国总统来自哪个地区，联邦政府在制订政策时，都不能忽视咖啡方面的重量。但是，最重要的方面还在于所谓和咖啡利益连在一起的执政者不是任何时候都充当他们的保护者的事实。令人好奇的是，三位来自圣保罗的总统——坎波斯·萨勒斯、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和华盛顿·路易斯都曾引起咖啡界的不满，或者说都同他们发生过冲突。这种貌似奇怪的举动主要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和国总统必须关心他认为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东西。这些利益被认为是财政稳定，同外债债主，特别是巴西在国外的主要金融代理人——罗思柴尔德银行集团达成的协议。

四　社会经济变革

移民的大量涌入是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巴西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巴西是来美洲寻找工作和社会地位提高机会的几百万欧洲和亚洲人的接收国家之一。与之为伍的

还有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等国。

在 1887～1930 年之间，380 万外国人迁入巴西。1887～1914 年之间的移民数量最多，接近 270 万，占移民总人数的近 72%。移民如此集中，主要是那些年咖啡庄园对劳动力大量需求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减少了这个移民流。一战结束后，我们又看到一个一直延续到 1930 年的新的移民洪流。

1929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发生在巴西和欧洲的政治变革，使得 1930 年以来作为劳动力进入巴西的移民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然而，日本人是个惟一的例外，在 1931～1940 年 10 年的时间里，进入巴西的日本人数量巨大。

中南部、南部和东部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1920 年，93.4%的外国移民居住在这些地区。圣保罗州在总体上表现最为突出，独自集中了全国所有移居巴西的外国人的大多数(52.4%)。这种偏重状况的出现只能用这个州为移民提供了更多的方便（旅费、住宿费）以及正在发展中的经济所提供的工作机会来解释。

在审视 1887～1930 年的一段时间时就会发现，意大利人形成的团体最多，占总数的 35.5%，其次，是葡萄牙人（29%）和西班牙人（14.6%）。总的来讲，在数量上比较少的还是质量比较高的群体。

最明显的例子是那些到圣保罗州来的日本人。1920 年，87.3%的日本移民居住在这个州。目的地是咖啡庄园的第一次移民潮在 1908 年到达桑托斯。尽管在庄园里安置日本人有许多困难，但是，直到 1925 年，圣保罗政府多年来一直给予日本移民一定的补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移民流中断，在巴西曾产生过“种植业缺乏劳动力”的恐慌。从 1925 年开始，日本政府转而赞助移民旅费。在这段时期，日本人已经不再去咖啡庄园。他们在农村定居的时间比任何其他民族移民的时间都要长，但是，作为小业主，在农业多种经营方面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群体是叙利亚—黎巴嫩人和犹太人，他们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和日本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相反，这两部分人从到达的一天起，主要都是集中在城市里。他们也都是不享受补助的自发移民，因为政府的补助只给那些到庄园去的人。

意大利人主要是到圣保罗和南里约格朗德去的。1920年，在巴西的71.4%的意大利人生活在圣保罗州，占其人口总数的9%。在多年的过程里，意大利移民的来源地区有了许多改变。直到世纪交替时，仍是来自北部的意大利人占优势。从20世纪初，来自南部——尤其是卡拉布里亚和那波利——的意大利人开始占了多数。

意大利是向咖啡种植园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民族。1887～1900年之间，进入圣保罗州的73%的移民是意大利人，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从事农业。这些人的贫困，从圣保罗州政府提供的补助竟然对他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事实表现出来。这个计划中的问题对移民流的规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对新来移民的接待条件低下使意大利政府采取了反对招募移民的措施。这种情况一度发生在1889年3月至1891年7月之间。1902年3月，一项以意大利政府当局的决议，即以当时外交部长的名字命名的"普勒内逖政令"，禁止向去巴西的移民提供补助。从此以后，希望移民巴西的人可以继续自由进行，但得不到政府提供的路费补贴和其他小的方便。这一措施是根据旅居巴西的意大利人向领事馆人员进行的怨声载道的告状而采取的，这种抱怨是由咖啡危机而加剧了的生活条件低劣造成的。但也可能是因为意大利社会经济状况改善，对这些不满起了促发的作用。

意大利的移民流没有中断。但是，"普勒内逖法令"、咖啡危机和来源国国内的情况都对移民潮减小起了作用。在审视桑托斯港不分民族的移民进出情况时我们发现，在这些年里通过该港出境的人数大于进境的人数。比如，在咖啡危机正盛的1900年，进

境的移民为21000人，而出境的移民则为22000人。在“普勒内逖法令”颁布后不久的1903年，进境的移民为16500人，而出境的移民则为36400人。翌年，移民流动同样是逆差的情况。

1901～1930年期间，到圣保罗去的移民的民族来源已变得相当均衡。意大利人的比例下降到26%，其次是葡萄牙人（23%）和西班牙人（22%）。葡萄牙移民集中在联邦区和圣保罗。即使和各州对比，共和国首都拥有的葡萄牙人数也最多。葡萄牙移民的一个特点是都集中在城市。1920年，在圣保罗市有65000名葡萄牙人，占全市人口的11%；在里约热内卢，葡萄牙人数上升到了17.2万人，相当于全市人口的15%。这些资料并不意味着葡萄牙人没有到咖啡庄园和农业种植园去的。然而，他们更以在大、小商业以及工业，尤其是在里约热内卢的工业中所起的作用著称。

西班牙最大的移民潮集中在1889～1914年之间。但是，他们与其他移民不同。1887～1903年，意大利移民人数远远超过西班牙人；而在1906～1920年之间，西班牙人却超过了意大利人。在日本人之后，超比例地集中在圣保罗州的是西班牙移民。这样，在1920年，有78%的西班牙移民定居在圣保罗州。在某些方面，西班牙移民有许多与日本人相似的特点。像日本人那样，他们到巴西来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只身闯荡的单身汉。在长期坚持从事农业活动和喜欢生活在内地小城市而不是首府圣保罗方面，西班牙人也很接近日本人。

日趋增长的城市中的移民的社会能动性是毫无疑问的，正如他们在圣保罗、南里约格朗德、巴拉那、圣卡塔雷纳等州的工业和商业活动中取得的成功证明的那样。农村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来举圣保罗为例子。在大量移民涌人的最初年代里，移民们被迫过着几乎和奴隶一样的十分艰苦的生活，这是全国劳动者的一般生活条件也同样低下造成的。大量移民回国、领馆人员告状和意大利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都证明了这种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移民在社会上的地位升级了。少部分

人变成了大庄园主，大部分成为小业主和中等业主，为他们的后代成为圣保罗农工业生产的中心人物开辟了道路。1934 年进行的圣保罗农业普查显示，30.2% 的土地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其中意大利人占 12.2%、西班牙人占 5.2%、日本人占 5.1%、葡萄牙人占 4.3%、其余是其他民族。这些数字仅说明了移民地位上升的部分情况，因为，土地主人是外国人后裔的逻辑上都被认为是巴西人。

* * * * * *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到 1930 年的过程中，巴西继续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1920 年的普查表明，在 910 万经济活动人口中，有 630 万人（占 69.7%）从事农业活动，120 万人（13.8%）从事工业，150 万人（16.5%）从事服务业。

“服务业”是一项包括低生产力的——比如有偿家庭服务一类的城市劳作活动。更明确的资料是在工业领域从事活动的人数在增长，根据 1872 年的普查，当时这一类人不超过经济人口的 7%。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说明，当时的许多“工业”不过是些小作坊。

第一共和国期间，农业出口活动的主导地位不是绝对的。不但面向国内市场的农业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工业以日趋增长的力量建立了起来。圣保罗州在以农业多种经营、城市化和工业飞跃为特点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咖啡继续是经济的轴心，成为这个资本主义化过程初期的基础。保障咖啡生产的重要的一点在于找到解决劳动力队伍和稳定劳动关系的形式。第一个方面已通过移民解决；第二个方面要通过雇农来解决。

雇农替换了垦殖合伙制失败的经验。雇农，即移民劳动者的家庭负责管理咖啡树和收获，收取两种基本酬金：一是管理几千株咖啡树的年金；一是收获时的酬金。后一种酬金根据完成工作

任务的结果，或收获的质量而有所不同。庄园主为雇农提供住房和供他们生产生活食品的小片土地。雇农雇佣和合伙制不同，因为雇农没有对咖啡出售后收入的分红。另一方面，不构成纯粹雇佣劳动的形式，而是涉及另一种类型的回报。

咖啡新树苗种植是所谓培育合同的目标，这种培植的情况是，雇农种植和管理咖啡树苗，需要 4～6 年的时间，因为一般在第 4 年时，咖啡才开始结果。实际上，这期间咖啡培育者并没有得到工资，但是，他们可以在咖啡树苗之间进行食品植物种植。从这种劳动关系受到雇农的欢迎可以推断出，他们生产的各种食品不仅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本身的消费，而且还可以拿到当地市场去出售。

雇农制度稳定了劳动关系，但是没有消除雇农和庄园主之间的矛盾问题，经常发生个人摩擦甚至罢工。除此之外，雇农不是奴隶，允许他们自由流动，经常从一个庄园跳到另一个庄园，或到城市去谋求更好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方面提供了移民劳动力；另一方面，雇农开辟的一些挣钱机会保证了咖啡生产和咖啡种植园中劳动关系的相对稳定。

在咖啡生产日趋发展的同时，在圣保罗出现了与移民上升相联系的农业多种经营。在日益增长的城市需求的刺激下，大米、豆类和玉米生产增加。20 世纪初，圣保罗从其他州进口这些产品，其中以南里约格朗德的大米最为突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圣保罗州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到了自给自足，并开始销往州外。将 1901～1906 年的平均产量和 1925～1930 年期间的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稻米生产几乎增加了 7 倍，豆类生产增加了 3 倍，玉米生产增加了 2 倍。

棉花种植也开始了。1919 年左右，圣保罗变成全国最大的产棉州，产量接近全国总产量的 1/3。这样就保证了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此外，以咖啡为主的咖啡和棉花套种，对于庄园主来说是天赐良方。当 1918 年咖啡种植受到寒霜害打击时，是棉花生产把

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废墟中拯救了出来。

* * * * * *

全国所有的城市都发展了，而最惊人的跃进却发生在圣保罗州首府。这一跃进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发的移民族群和那些设法从农业活动中走出来的人们。城市向手工艺、路边买卖、后院小工厂、自命为“意大利师傅”的建筑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用武之地。最差的选择或许就是到新建的工厂去当工人或做家庭服务工作了。圣保罗首府也是一个进口产品的分配中心，是咖啡生产和桑托斯港口之间的纽带和政府所在地。在那里，有许多大银行的总部和许多重要官职。

自1886年起，圣保罗开始加快发展的节奏。迅猛的飞跃发生在1890～1900年之间，这个时期圣保罗居民从6.4万人上升到23.9万人，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10年中增长了268%。

1890年圣保罗已经是巴西第五大城市，仅次于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累西腓和贝伦。在20世纪初，尽管距离共和国首都68.8万名居民的数字还很远，但是，它已经上升到了全国第二位。和里约热内卢相比，圣保罗仍然是一个大省的首府。

* * * * * *

工业增长可以放在一个包括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几个区在内的更广泛的地理环境中看。

19世纪中期巴西出现的很少几个工厂主要用来生产供贫民和奴隶消费的低质量的棉布。巴伊亚是第一个这种工业的中心，它集中了1866年全国存在的9家工厂中的5家。1885年前后，工业生产转移到中南部地区。至于制造业单位的数量，米纳斯吉拉斯州占第一位，但是联邦区集中了最重要的工厂。除去制糖的农工

业外，1889年这个地区占了巴西工业资本的57%。在共和国首都建工厂有各种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有集中的资本、中等规模的消费市场和取代了原来以水力为动力的小工厂的蒸汽能源。

圣保罗工业增长是在废除奴隶制以后的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了一个雏形。它发迹于起码有着内在关联的两个源泉：咖啡业和移民。后一个来源不但和圣保罗有关，而且与另一些移民地区，如南里约格朗德有关。

咖啡贸易为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第一次工业大飞跃打下了基础：首先，当鼓励货币现金交易和增加利润时，创造了工业产品的市场；其次，当促进投资修建铁路时，扩大了这一市场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第三，当发展进出口贸易时，为创建工业产品的分配体系做出了贡献；第四，当促进移民活动时，保证了劳动力的供应；最后，通过出口咖啡为工业机械进口提供了资金。

移民作为企业主和工人出现在工业的两端。此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变成了专业技术人员。外国劳动者的历史是那些来“开发美洲”，却看到他们的梦想在新大陆破灭的移民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圣保罗首府的制造工业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在那里，1893年的市民的70%是外国人。这个数目同里约热内卢相比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它相当于1890年巴西总人口的39%。

移民步入工业领域的道路变了。一些人简直是从零做起，他们从在圣保罗和南里约格朗德形成中的资本主义创造的机会中大大受益。另一些人因为原来是进口商，他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发展工业的机会。他们的这种地位有利于他们进行进口机械方面的联系，同时也是一个了解在全国什么地方投资可能赢利最高的源泉。圣保罗的两个最大的意大利工业家开始做起了进口生意。

至于工业生产值，1907年联邦区位居各州之首，占生产总值的33%，接下来是圣保罗占17%和南里约格朗德占15%。1920年，圣保罗州一下便跃居第一位，占生产总值的32%；联邦区则

下降到21%，接下来居第三位的是南里约格朗德，占11%。我们是在将各州和一个市做对比，各个市的材料也不准确。不论怎么说，肯定的一点是，在1920～1938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圣保罗超过了里约热内卢。

当时的主要工业首先是纺织工业，其次是包括饮料在内的食品工业和服装工业。纺织工业——尤其是棉布生产，无论是从投资数额还是从工人数量衡量，都称得起是真正的制造业。有几个工厂的工人人数高达1000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全国消费的80%的布匹是国产的，并且质量有了很大改善。尽管工业生产有较大的进步，但是基础工业（水泥、钢铁、机械设备）还是很薄弱。这样，工业大发展大部分仍需要依赖进口。

一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刺激工业发展的时期，因为当时的进口产品竞争已经中断。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10年意义重大，简直可以与欧洲战争相提并论，因为在这段时期，开始出现超越工业发展极限的尝试。在政府的鼓励下，巴西出现了两个重要企业：1924年在米纳斯吉拉斯投产的比利时－米纳斯钢铁公司和1926年在圣保罗开始投产的圣保罗波特兰水泥公司。同时，一些小的修配厂利用大战期间积累的经验和利润，相继变成了机械设备厂。

这个州对工业的发展曾经有过什么促进或设置过什么障碍吗？事实上，该州主要关心的不是工业发展，而是农业出口的利益。然而，不能说政府采取了反对工业发展的态度。巴西财政长期以来在汇率下降方面的倾向，对于工业发展有负面影响。货币的贬值抬高了进口消费品的价格，这样就限制了竞争。同时，使工业赖以支持的进口机械的价格也变得更加昂贵。在一定时期，政府采取通过降低关税来保护机械进口。在一些情况下，国家要对建立基础工业给予贷款和免税待遇。总之，如果说国家没有和工业作对，但也远没有采取促进工业大发展的决策。

* * * * * *

在第一共和国期间，南里约格朗德注重发展旨在满足本州和国内市场需要的多种经营的经济活动。多种经营的主角是定居在山区的移民小业主，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向外地扩张。在农业方面，最为突出的首先是大米生产和玉米、豆类及烟草生产。

在资本投资方面，和全国其他地区发生的情况一样，纺织工业在工业领域起着领导作用，其次是饮料工业。后者以殖民地时期开始的葡萄酒生产最为突出，由于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到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冷藏库的建立代表着发生在肉类冷藏过程的薄弱环节的一大变革，使大量存储成为可能。1917 年，在这个州成立了阿穆尔和威尔逊两家美国公司。南里约格朗德养牛庄园主保持一座冷藏库的努力，由于缺乏资金而告失败。这家企业于 1921 年卖给了安格洛冷藏库。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畜牧业、腊肉生产，尤其是皮革制造业相对衰落的情况下进行的。1890 年，腊肉和制革一起曾占外销总值的 55%，而 1927 年才不过占 24%，皮革也从外销总值的 37%下降到仅有 7%左右。这一年的外销值就单项而言，脂肪占第一位（20%），其次是腊肉（18%）和大米（13%）。

尽管在圣保罗和南里约格朗德都有多种经济活动，但圣保罗以农业出口为其经济活动的中心；而南里约格朗德的生产发展则几乎完全是面向国内市场的。

* * * * * *

由于橡胶生产，亚马孙地区在做着短暂的财富黄金梦。在前几十年中已经开始的橡胶生产的发展，从 1880 年开始取得了巨大

的推动。19 世纪 90 年代真正的自行车狂热和自世纪交替以来汽车的逐渐普及进一步刺激了橡胶生产的发展。

在它的高潮时期，橡胶在巴西出口产品中轻松地占了第二位，在 1898～1910 年之间达到了最高点。在此期间，橡胶出口相当于出口总值的将近 26%，仅次于咖啡（53%），远远走在紧跟其后的产品——皮革（4%）——的前面。

橡胶的骤然繁荣招徕大量移民涌向亚马孙地区。据估计，1890～1900 年之间，流入这一地区的移民达 11 万人。他们主要来自受周期性旱灾打击的塞阿拉。

作为后果，橡胶经济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起码在贝伦和玛瑙斯的部分城市人口生活条件的改善。1890 年～1900 年之间，贝伦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从 5 万人增加到 9.6 万人。亚马孙地区的两个大城市有了电车、电话、自来水、路灯，当这一切在上述两个城市出现时，在其他许多城市这些还是奢侈品。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在内地采橡胶的橡胶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创造出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

自 1910 年开始，以橡胶价格急剧下降为征兆的危机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扑来，其主要原因是国际竞争激烈。巴西的天然橡胶出口一直经受着中美洲和质量低劣的非洲橡胶竞争的挤压。主要是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其亚洲殖民地进行的橡胶种植改变了这种竞争的局面。他们的这种橡胶质量好，成本低，并可以进行大面积的种植。与此同时，巴西在遥远的亚马孙地区采天然橡胶的费用变得越来越昂贵。

1910 年，亚洲橡胶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的 13%稍多；1912 年，上升到 28%；1915 年竟达到 68%。在亚马孙地区扩大种植的努力没有进展，并且经常受到虫害的袭击。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福特公司遭遇巨大失败的经验。

* * * * * *

在第一共和国期间，巴西在财政—经济领域的国际关系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巴西大部分的国外贷款和投资仍然来自英国；美国也保持着它作为巴西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咖啡的主要市场的地位。但是，在多年的过程中，一种更偏重同美国发展关系的倾向在20世纪20年代变得十分明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来自这个国家的产品进口值已经超过了来自大不列颠的进口值。

1928年，巴西是拉丁美洲外债最多的国家，占这个地区外债总额的44%，其次是阿根廷的27%和智利的12%。据估计，1923年外债偿还耗去巴西出口收入的22%。借外债是出于维护国家、为港口和铁路的基本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咖啡升值或干脆就是偿还已借的外债的需要。

在帝国最后的几十年里，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建设上。在共和国时期，这种投资趋向降为次要地位，居保险公司、航运公司、银行以及电力生产和输送企业的起始资本之后。

大城市的基础服务业都在外国公司手里。最明显的例子是1899年在多伦多创建的加拿大企业——光 & 能公司。这个公司起初在圣保罗，自1905年开始，转到共和国首都开展业务。光 & 能公司在圣保罗取代了一家当地有轨电车运输公司，并控制着这家公司的电力供应和输送。该市工业化的飞跃发展同这家公司对基本建设的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出口经济方面，发展生产上的外国投资很少。但是，它们以各种形式出现：为商品化提供资金，控制着部分铁路运输，实际上控制了全部的出口、海运和商品保险业。

还没有关于外国公司在巴西所获利润的可靠资料。好像最大的利润是通过银行实现的，这些银行利用巴西货币不稳定或经济

萧条进行投机，从中谋利。在1898年贷款基金会成立后，许多国内银行倒闭，而外国银行的地位却更加稳固有力。最大的英国银行——伦敦暨巴西人银行——有比巴西银行更多的资金。1929年的资料显示，外国银行包揽了全国交易的一半。

外国投资者都设法控制他们投资的各个活动领域，挤掉巴西的民族资本。他们获取了大量投资带来的利益，有强大的律师队伍，以蔑视的眼光看待这个落后的国家。但是，他们的方法同当地精英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怎么说，外国资本在建立服务和交通运输基础机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五 社会运动

在第一共和国期间，劳动者开展的社会运动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取得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可分为三大群体：第一，是一些把宗教内容和社会贫困相结合的人；第二，是把宗教内容和社会诉求相结合的人；第三，是表达没有宗教内容的社会诉求的人。

前面已做了简单叙述的卡奴多斯起义是反映第一部分人情况的一个例子，孔特斯塔多运动是反映第二部分人的例子。孔特斯塔多是巴拉那和圣卡塔雷纳之间的交界地区，其归属两个州一直在争执不休。但是，1911年在那里爆发的运动不是以争夺这一地区为目的，而是由于一位“上校”的追随者集会而发生的，这位“上校”被认为是穷人和出身不同，并深受这一带地区所发生的变化之害的人们的朋友的。在他们中间，有因为修铁路和建立木材公司而被从自己土地上赶走的农村劳动者，也有被招来修建铁路，而在合同结束后失业的人们。

造反者团结在一位在同州民兵初期的冲突中死亡，后来被神

化了的人物——若泽·玛丽娅的周围。他们在平等和友谊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建立了许多营地。在期待若泽·玛丽娅苏醒的同时，提出了土地要求。造反者在州属部队和军队的打击下，于 1915 年被消灭。

第三部分人开展的农村社会运动以圣保罗咖啡庄园里发生的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举行的许多罢工为最明显的例子。业已查明曾发生过几百次罢工，但留下来的记载很少。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 1913 年，在咖啡收获之际，聚集了雷贝冷普莱托地区的几千名雇农。这些雇农要求修订他们的劳动合同，罢工使所有的大庄园瘫痪。警察和竭力做他们谈判中间人的意大利领事对此进行了干预。最后，雇农们的目标还是没有达到。

城市的发展及其多样经营活动是劳动阶级运动形成的最起码的前提。城市集中了各种工厂和服务行业，每个单位都聚集了在同样条件下工作的几百名劳动者。后者的情况，和咖啡大庄园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尽管受教育水平差别很大，并缺乏广泛的传播工具，在城市里，人员自由流动也还是很大的，正像思想在广泛传播一样。

尽管如此，在第一共和国期间，城市劳动阶级的运动是有限的，只有个别的取得了成功。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层面下的工业和社会政治层面下的工人阶级的意义都是相对的。只有大罢工，或者触及到农业出口系统的关键部分——如铁路和港口时的罢工，才能产生强烈的反响。而寡头们的政治游戏可以不必通过取悦新兴的工人大众来进行。工人被族群的对立所分裂，他们很少倾向于组织起来，因为简单的工会化已经把他们放在了厂家的“黑名单”中。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尚未放弃“开发美洲”和回欧洲去的希望的移民。

在共和国首都，当 19 世纪末出现第一批工人阶级政党时，是一种空泛的社会主义和一种倾向于追求满足诸如增加工资、限制劳动时间、改善卫生条件，或在中期范围内的，要求雇主和国家

承认工会等眼前利益的实用工会主义占了主导地位。

和这种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在圣保罗，无政府主义，或更确切地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翻版：无政府—工会主义，占了主导地位。鉴于他们的纲领和巴西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掌握了革命思想，但他们还是被迫把努力集中在实现他们的对手所主张的要求上去。这没能阻止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从而削弱着已经很脆弱的工人运动。

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工人运动之间的思想和行动方式的不同应归结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这些因素与两个城市的特点和劳动阶级的组成有关。

19 世纪末期，共和国首都的社会结构比圣保罗的情况要复杂得多。那里集中了较少依赖农业阶级的社会方面，包括专业中产阶级、官僚阶层、职业军人、军校学生和各高等学校的学生。青年军人的存在、中产阶级对农村各阶级的较少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一种阶级合作政策。里约热内卢直到 1917 年的许多抗议运动有着比圣保罗的工人运动更普及的内容。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除了激进主义便是 1904 年发生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政府里的反对引进抗黄热病疫苗的“疫苗起义”。

从劳动阶级组成的角度，我们应该想到，它主要集中在政府重视的事业的一些重要方面（铁路、海运和港口装卸），在老板与政府的关系方面，里约热内卢还有一支一直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庞大的民族劳动者大军。

圣保罗尽管在发展，但其社会结构仍然是不够多样化的。中产阶级围着咖啡资产阶级转，没有准备组成与“下层人”联合的不安生的军事集团。在新的土地上尚未扎根的外国劳动者的大量存在有利于无政府主义传播：企业主和政府——尤其是政府——是“另类”，是敌人。

从第一共和国开始，即出现了劳动者的组织和运动：一些或许根本就很少有工人参加的、很快便消失了的工人政党、工会、

罢工等。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企图在1906年利用建立工人联合会，在全国范围里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然而，运动散乱无序，很少唤起精英们的注意和担心。他们取得了没有法律保障的向企业主施压的权利，但施压运动一过，权利也随之消失。

在1917～1920年之间，当一个大规模的罢工周期出现在全国主要城市——尤其是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时，这种状况被打破了。究其这一周期的根源有两个因素：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食品投机生意引发的混乱造成物价上涨的加剧；第二，存在一个由沙皇俄国的二月革命和相继爆发的1917年十月革命掀起的欧洲革命浪潮。工人运动变成人们关注的目标，取得了报纸头版的位置。

劳动者不希望进行社会革命，而期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取得最起码的权利。这并不是说，许多人没有被一个平等社会的梦想摇撼过。在这个时期的三次大罢工中，圣保罗1917年6～7月的大罢工给人留下了最强烈的历史记忆，这些罢工甚至达到了注意力只集中在罢工上面，而忘记了进行更广泛的群众发动工作的地步。

或许是意识到难于达到成功的目的，或许是受到镇压的原因，从1920年开始，罢工热潮冷却了下来。镇压主要落在起了重要组织作用的外国工人领袖的头上。后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驱逐出巴西。

说1917～1920年的罢工浪潮之前，国家对规范劳动关系或工人工会化漠不关心，那是夸张。然而，的确是在罢工浪潮发展的过程中，才深切地想到需要制订一部相应的法律。一些主要的提案送到了国会，汇集在一个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限制役使妇女和童工以及孕妇休假的劳动法法案中。法案受到了工业家和大部分议员的抨击。最后，只剩下了1919年通过的规定对受工伤的人进行补偿的法律。

在20世纪20年代的10年间，在工人运动冷下来的同时，出现了国家通过劳动者最低权利的特许立法来干预劳动关系的明显

迹象。在这方面有两条法律规定很重要：给予工商业劳动者 15 天假期的内容（1925）和限制利用童工的内容。然而，假期法要依靠制订执行条例来实施，因迫于工业家的压力，直到 1930 年，这项法律在工业领域里还没执行。

* * * * * *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无政府主义内部出现了危机。尽管罢工势头迅猛，但是收效很小的现实为对这个流派思想的怀疑开辟了道路。同时，在国际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和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决裂的消息传到了巴西。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好像预告了“新时代的黎明”，处处受限制的左派群体，表面上似在“逆历史前进步伐而行”。这样，在 1922 年 3 月，诞生了巴西共产党，它的缔造者大部分来自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由来是拉丁美洲的一个特例，在那里，实际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巴西共产党在其整个历史上几乎都处于非法地位。直到 1930 年，它一直是一个工人干部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其党员从来没有超过 1000 人。它服从总部设在莫斯科，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初级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三国际战略。

六　20 世纪 20 年代的政治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城市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存在变得更加明显。从总的方面讲，这个社会阶层倾向于支持那些树起真正的自由主义大旗、能够把宪法的标准和国家的法律付诸实践、把寡头共和国变成自由共和国的人物和运动。抛开其他不讲，这意味着纯洁的选举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人们都在谈论社会改革

的手段问题，但是最大的希望却寄托在人民教育、不记名投票和创立选举法庭上面。

城市人民参与政治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1919年的总统大选。在1910～1914年选举中失败的总统候选人路易·巴尔博扎，针对埃皮塔西奥·佩索阿自行参选，以示抗议。尽管没有任何选举机器的支持，还是取得了近三分之一的选票，在联邦区胜出。

政治寡头之间在总统更替问题上的一致和不一致呈现了新的面目。为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总统的继任者的宝座进行的争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保罗—米纳斯轴心在1921年的前几个月推出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阿尔图尔·贝纳尔德斯作为候选人。博尔若斯·德迈德罗斯领导下的南里约格朗德反对这一候选人，揭露这一政治安排是在国家需要财政平衡的情况下，为咖啡升值计划保证资金来源的一种手段。南里约格朗德人也害怕进行限制自治的宪法修改——贝纳尔德斯真的在1926年实现了这种宪法修改。其他州也和南里约格朗德州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和派抗衡”，推出尼洛·佩萨尼亚作为反对派的候选人。尼洛是平民出身的里约热内卢政治家，弗洛雷亚诺主义的捍卫者。

在选举的过程中，军方的不满浮出水面。军队的普遍印象是，候选人贝纳尔德斯是反军派，然而，这一印象由于1921年10月在里约热内卢《晨邮报》上刊登的两封信而变得具有戏剧性。表面上，这是贝纳尔德斯致米纳斯吉拉斯一位政治领袖的信（信有两封），信中包含了对军人的严重的侮辱。这些伪造的信无异于火上加油。这两封信的作者的目的是使候选人贝纳尔德斯进一步失去反对他的军队的支持，当1922年3月1日大选前不久，两封信的伪造者承担了假造“文件”的责任时，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

1922年6月，贝纳尔德斯已经胜出，但还没有就任总统，就任要等到11月15日，这段时期的情况仍然是很复杂的。军事俱乐部发出了抗议，反对政府利用军队干涉伯南布哥地方政治。作为回答，政府决定以反对与社会有害协作法为依据关闭了军事俱

乐部。

这些事实加速了“尉官运动”的爆发，以此命名是因为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都是军队的中级军官——首先是中尉和上尉。

第一个行动是 1922 年 7 月 5 日发生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堡垒起义。对军队真假交错的攻击造成的气氛和对军事俱乐部的镇压导致青年尉官们发动了起义，这是旨在“拯救军队荣誉”而发起的一种抗议。起义没有扩及到其他单位。在第一次交火之后，起义者受到了炮击和包围。第二天，他们当中的几百人响应政府的号召投降了，但是有一个小队企图继续顽抗。堡垒再次受到来自海上的炮击和空中的轰炸。17 名军人和一名届时加入起义队伍的平民决定从科帕卡巴纳海滩撤出，而与政府军相遭遇。在对战中，16 人被打死，席盖拉·坎波斯和埃杜阿尔多·戈麦斯两位中尉受了伤。“堡垒十八壮士”创造了“尉官运动”的传说。

两年后，在圣保罗爆发了第二个“7 月 5 日事件”。选择这个时间是为了纪念第一次运动；选定这个地点是因为它对圣保罗州十分重要。1924 年革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以推翻阿尔图尔·贝纳尔德斯政府为明确目标。在 20 世纪 20 年代，贝纳尔德斯成为尉官们仇恨的统治阶级政治寡头的化身。这一运动的正式领导者是一名在弗洛雷亚诺时代站在联邦主义者一边的南里约格朗德军官——退役将军伊泽多罗·狄亚斯·洛佩斯。在行动积极的军官中，有塔沃拉（儒阿雷兹和若阿肯）兄弟、埃杜阿多·戈麦斯、埃斯逖拉克·赖阿尔、若昂·卡巴纳斯、米戈尔·考斯塔。米戈尔·考斯塔——圣保罗公安部队的一名颇有威望的军官——的存在给起义者带来了一部分州民兵的支持。

这个运动一开始便占领了一些军营，接着展开了夺取圣保罗的战役，革命者取得了对城市的控制权。尉官们占据圣保罗首府一直到 7 月 27 日。这一天，他们放弃了首府，向圣保罗西部的内地转移。他们组成了所谓“圣保罗纵队”，驻扎在巴拉那西部一个靠近伊瓜苏河口的地方。在那里，这支来自圣保罗的部队抵抗着

政府军的进攻，并等待与来自南里约格朗德的另一支纵队汇合。

在南里约格朗德州，1924年10月也爆发了一次尉官起义，在起义中，中尉若昂·阿尔贝托和上尉路易斯·卡洛斯·普莱斯特斯表现最为突出。这次起义得到了反对里约格朗德共和党的南里约格朗德反对派的支持，这样，就把尉官运动同这个州的政治分歧混合在一起。经过几次战斗后，南里约格朗德人向巴拉那方向转移，去同圣保罗队伍汇合。1925年4月两支队伍会师，决定走遍巴西，宣传革命思想，发动人民起来反对政治寡头。同时希望吸引政府的注意力，以利于在各城市出现新的起义。

这样，诞生了最后以普莱斯特斯命名的纵队——米盖尔·考斯塔－路易斯·卡洛斯·普莱斯特斯纵队。这支纵队在巴西内地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长征，走过了近24000公里的路程，直到1927年的2～3月，其残余部队散伙的时候，他们已经深入到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境内。这支队伍一路上有临时成员随时加入或退出，变动很大，但其成员从未超过1500人。纵队通过从一地向另一地迅速转移，避开同重头部队正面作战。农村人民的支持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纵队军事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等于零。但是，它在对领导精英不满的城市人民中间有一种象征性作用。无论怎么说，在他们看来，正如那些为拯救民族而历经千难万险的英雄所表现的那样，改变共和国的命运是有希望的。

尉官运动首先是一个军队的运动。在海军里，中层干部卷人的惟一一次运动是1924年11月由埃尔克里诺·卡斯卡尔多中尉领导的圣保罗号护卫舰起义。在与瓜纳巴拉湾堡垒交火之后，圣保罗号便向公海驶去，直到蒙得维的亚，在那里起义者成了流亡者。

第一共和国期间在海军中发生的最大的起义的主要角色几乎都是从最贫穷阶层招募来的黑人和混血水兵。这次起义在1910年11月22日爆发，被称为鞭笞起义。起义参加者并不想推翻政府，而是要结束他们所受的虐待和暴力体罚。

由于几个军官的突然死亡，运动几乎同时在停泊在瓜纳巴拉

湾的几艘战舰上爆发。他们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水兵若昂·坎迪多。在起义队伍的威胁下，国会颁布一项赦免令，如果起义者服从当局，当局将答应废除海军纪律制度中的鞭笞体罚。

起义者接受了国会的条件，运动宣告结束。接着又发生了海军陆战队起义和随之而来的严厉的镇压，若昂·坎迪多和鞭笞起义的其他领袖们也没有逃脱，尽管他们根本没有卷入海军陆战队的起义。一艘“死亡之舰”——卫星号——载着起义水兵、盗贼、强奸犯和娼妓，从里约热内卢出发驶向亚马孙。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途死去或被枪毙。11 月起义成员以参与海军陆战队起义的罪名被判刑。最后，他们终于被宣告无罪释放，然而他们已在监狱中度过了 18 个月，身体受着暴力的摧残，且无法同外界联系。

尉官运动代表着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回忆一下当时在军队内和社会上发生了什么。

自共和国初期以来，军官培养发生了许多变化。在 1904 年，当最后一次起义发生后，红海滩军事学校最终被关闭。直到 1911 年，政府只保留了阿雷格里港战争学校。这一年，在里约热内卢成立了雷阿伦格军事学校。这座军事学校的教学与以往相比有了许多不同。课程集中在教授军事知识方面，没有受实证主义影响的老学校的多样化教学。学校的办学宗旨不是培养一只脚在军队，另一只脚踏在社会和政治之上的公民——士兵，而是要设法培养职业士兵。

对军官的训练改进了，在 1906～1910 年期间，军官分三批去德国接受训练。埃尔梅斯·达奉塞卡是德国军事组织的狂热崇拜者，在 1910 年，他曾在德国参加过大型的军事演习。以后的年代里，在 1920 年，军队改革由于法国军事使团的到来而扩大了。因为当时德国已经战败，理所当然要寻找另一种军事模式了。

尽管军队的专业化程度很高，但军队军官对社会和现存的政权制度不能不有着自己的思想。在埃尔梅斯元帅任总统期间，一个由文武官员组成的集团围绕在总统周围，形成一种压力。因为

他们的宗旨是拯救共和制度，因此被称为“拯救主义者”。“拯救”什么？努力在那些执行起来比较容易和社会不平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地区缩小政治寡头的权力。在军队内外问题恶化的环境中，尉官们可以被看做“拯救主义者”的继承者。此外，当尉官运动出现的时候，军人总统已经不存在，而对文人总统，人们却又都持有极其保留的看法。

至于说到军队，中层干部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职业制度僵硬，为取得空缺的更高职位困难。也有许多对被控与腐败政府相勾结的军队高级干部行为的批评。这样，尉官们希望不但要纯洁社会，而且要纯洁他们所在的军队。

在20世纪20年代，起义的军人没有对政治改革的明确建议。他们希望国家采取中央集权制度，以达到人民都受教育、奉行泛民族主义政策的目的。为了建设民族，要努力重建国家。他们认为寡头统治的巨大灾祸之一是分裂巴西，把它变成是由政治统治选定领主的“20个封建领地”。

尽管在这个时期没有能提出反自由主义的纲领，但尉官们不相信“真正的自由主义”是复兴国家的道路。要限制直接选举和全民投票，暗示相信专制道路能够改革国家和社会。

尉官运动真像通常所讲的那样，是一个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运动吗？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它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同情，但是，把它说成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那未免太简单化了。从社会出身观点讲，尉官们绝大部分出身于东北部地区的军人家庭或没落的精英家庭，很少是从里约热内卢或圣保罗城市人中招募来的。首先，我们应该想到，尉官总归是尉官，是军队的成员。他们对世界的看法首先是通过武装部队内的社会化形成的。这种观点是他们特有的，正像他们对他们自身也是组成部分的军队的不满是特有的一样。

除了某些有限的支持外，实际上，最终是尉官们自己在与政府对抗。他们没能把军队拉来做自己的后盾。直到1930年，没有

一个文人精英集团曾准备进行孤注一掷。这种激进主义不是出自尉官运动行动的内容，而是表现在它的方式——武装对抗上。

* * * * * *

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阿尔图尔·贝纳尔德斯总统（1922～1926）执政期间形势十分困难，曾一再动用戒严令来维持秩序。在各个城市——特别是在里约热内卢极不得人心的他，对时代的标志[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人民不满的根源是复杂的财政景况。埃皮塔西奥·佩索阿在1921～1923年，为第三次咖啡升值而大量发行纸币，造成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在贝纳尔德斯政府时期，在咖啡政治方面发生了一桩重要的事件。总统关注的中心问题主要是外债偿还问题，自1927年，由于重新开始不但要付息而且要还本的债务偿还，这种偿还额便大大增加了。一个由蒙塔古勋爵率领的英国财政代表团，在1924年底到达巴西，对巴西的国家情况进行了考查。在他提交给总统的报告中，指出了增值活动和滥发纸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很明显，国际债主担心巴西不能履行信约。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表示不准备再为保护咖啡承担责任。与此同时，咖啡界对“抛弃形势”的批评大增。出路是把保护咖啡的责任从联邦转到圣保罗州，于是，该州承担起了长期保护咖啡的责任。对咖啡的长期保护改变了咖啡政策的方向。从此以后，政府对咖啡界不准备再举起只在危急时刻才举起的保护伞。保护伞应该经常打开着。圣保罗政府掌握了规范咖啡进入桑托斯港和在认为必要时购进这种商品的职权。表面上，这个州的行动永远结束或起码缓和了咖啡危机。

贝纳尔德斯的继任总统选举进行得很平静。圣保罗和米纳斯

---

① 这里指尉官运动。——编者注

之间的轮流执政因华盛顿·路易斯的当选而终结，尽管华盛顿被讥称为“马卡埃圣保罗人”，因为他出生的城市马卡埃是在里约热内卢州。新总统的最大梦想是稳定货币，以所有流通中的纸币都能兑换为最终目标。

20世纪20年代的10年间，南里约格朗德和圣保罗的政治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南里约格朗德，经过一场大的武装对抗之后，精英们倾向相互接近；与此同时，在圣保罗，由圣保罗共和党把持的一党垄断出现了破裂。在南里约格朗德内战之后，华盛顿·路易斯的原财政部长热图里奥·瓦加斯，于1927年当选为南里约格朗德州州长。热图里奥鼓励里约格朗德共和党和对南里约格朗德在联邦的存在产生了反响的反对党之间进行彻底的和解。正像在1929～1930年之间的诸多事件表现出的那样，这种存在大大增强了。

在圣保罗，社会的分化使得在圣保罗共和党内无法包容所有的利益——许多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各种政治观点。党内的分歧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其猛烈势头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所减弱。1926年出现了拥有一个自由主义纲领的民主党（PD）。它的基本目的是通过不记名和义务投票进行政治改革、代表弱势群体、实行三权独立和选举检查权归司法权。

起码到1930年，民主党的领导干部都是由有威望的自由职业者和青年——主要是咖啡庄园主子弟组成。选举圣保罗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圣保罗共和党思想体系”的老对手、原国务委员安东尼奥·普拉多来领导这个党。民主党吸引了一些移民，但是它的报纸——《民族日报》——的办报路线表明它的基础是传统的中产阶级。移民，特别是“工业财阀”是被激烈批评的对象。

民主党因执政党很厌恶的自由主义与其成员的相对年轻化而与圣保罗共和党不同。它唤起了没有沾染圣保罗共和党思想的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的热情，并渴望在社会和政府中加强他们发展的机会。民主党不能被说成是一个控制着各大城市的现代化政

党，同时也不能说圣保罗共和党是个统治着农村的过时的政党。民主党人在农村也有秘密活动据点，在那里，他们利用与敌手上校主义者相同的方式进行活动。

在国家政治方面，与南里约格朗德的发展相反，在圣保罗，共和党的分裂使圣保罗在国家政治中的存在成了问题。

七　1930年革命

在华盛顿·路易斯相对平静的总统任期后，1929年伊始，各大州精英之间出现了终于把第一共和国带到了尽头的分裂。

华盛顿·路易斯令人吃惊地坚持他的继任者一定要是一个圣保罗人，这一举动引发了争执。围绕着圣保罗人总统儒里奥·普莱斯特斯的争论还没有充分展开，便被画上了句号。华盛顿·路易斯的态度把米纳斯人和南里约格朗德人推到了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对1909～1910年竞选运动力量进行整合。

在1929年中期，经过几次会谈之后，反对党推出了热图里奥·瓦加斯作为总统候选人、若昂·佩索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若昂·佩索阿是埃皮塔西奥·佩索阿的侄子，帕拉伊巴州州长。他组成了自由联盟，并以此名义参加竞选运动。热图里奥得到了圣保罗民主党人的支持，与此同时，在米纳斯，分裂了的米纳斯共和党支持儒里奥·普莱斯特斯。

自由联盟的竞选纲领反映了没有同咖啡核心结盟地区的统治阶级的愿望，并以动员中产阶级为目标。这个纲领主张需要鼓励全面发展全国生产，而不仅仅是发展咖啡；反对以财政正统观念的名义进行产品增值计划，正因如此，在这一点上没有同华盛顿·路易斯的政策相矛盾；并提出了一些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建议。坚持的重点集中在保卫个人自由、实行大赦（以此向尉官们招手）和保障实现真实选举的政治改革。

尽管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设法和总统取得一致意见的热图里奥保持缄默，但竞选运动却取得了迅猛的发展。由许多年轻成员组成的自由者旅行团，跑遍了东北部的主要城市。结果，他们的候选人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举行的集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929 年 10 月，当竞选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咖啡种植被抛到一个困难的境地。长期的咖啡保护政策产生了由国家保证一定利润的前景。结果，咖啡种植在整个圣保罗州发展。许多人为种咖啡去借高利贷。经济危机引起了国际咖啡价格的急剧下降。由于消费下降，无法以扩大销售量来补偿价格下降。用未来的利润作抵押借债的庄园主已经没有出路。

咖啡界和联邦政府发生了争执。咖啡庄园主要求华盛顿·路易斯通过提供新的资助和实施他们债务的展缓期来对付危机。总统担心保持汇兑稳定计划将会造成顺流而下的不治局面，最后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在圣保罗掀起了一个不满的浪潮。但是，咖啡界和联邦政府之间还没有达到决裂的地步。从危机中选举得到的好处很少。尽管民主党参加了自由联盟，但是还没有理由相信反对党的胜利会对咖啡利益给予更大的关注。

儒里奥·普莱斯特斯赢得了 1930 年 3 月 1 日的选举。被自由联盟口头谴责的居支配地位的政治资源也被它利用。"选举机器"制造了各个州的选票，包括南里约格朗德州，在那里，热图里奥以 298627 对 982 票胜出。

选举结果在反对党的青年干部中没有得到承认。他们决定要走实际上尉官们独自走过的道路。尉官运动虽然已经失败，但由于他们的军事经验和在军队中的威望，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力量。青年政治家和造反军人之间的接近这时已经具备了实现的条件，尽管各自都受到了限制，事实上还是实现了。

惟一一个重要的例外是路易斯·卡洛斯·普莱斯特斯。1930 年 5 月，这位在尉官们中具有巨大威信的人发表宣言，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者，并谴责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寡头。他的看法是，正

在斗争中的力量只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为了控制拉丁美洲的大斗争中的一场小小的游戏。

自从他同当时在玻利维亚避难的巴西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阿斯特罗若多·佩雷拉——的一次会晤后，普莱斯特斯一直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下。通过阅读书籍以及与阿根廷和乌拉圭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接触，这种影响不断增长。但是，他没有马上加入巴西共产党。他和一个小组一起成立了革命行动团。几年来，巴西共产党谴责"普莱斯特斯个人崇拜"，直到来自莫斯科的一条命令，为普莱斯特斯作保，他才于1934年加入了巴西共产党。

1930年中期，革命的意图进展得不顺利。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鼓舞了他。6月26日，若昂·佩索阿在累西腓的一家糖果店被他的政敌之一——若昂·丹塔斯暗杀。这一罪恶集中了公、私两方面的原因。当时只强调了前一方面的原因，因为后一方面的原因会有伤于他作为革命烈士的形象。若昂·佩索阿的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在政治上受到了他人的利用。他被葬在共和国首都，当遗体运往首都时，聚集了大量群众。反对派收到了一件巨大的武器礼物。从此后，发展革命联系变得比较容易了。

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军队里取得成果。正是因为这样，武装运动的总指挥权交给了一个被认为是武装力量中最负责的代表人物。这就是出生在阿拉戈阿斯，其职业生涯和南里约格朗德联系在一起的戈伊斯·蒙特罗中校。1906年，当他在军事学校上学时，戈伊斯结识了热图里奥和其他许多南里约格朗德的政治家，并在州内的纷争中同他们进行了合作。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不是一个革命者。相反，在东北部各州，他还曾经和普莱斯特斯纵队作战。

1930年10月3日，革命在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爆发。在圣保罗，民主党实际上站在革命联络的边缘上，形势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米纳斯有一些抵抗。在东北部，10月4日凌晨，这一运动在儒阿雷斯·塔沃拉的指挥下，以帕拉伊巴为战斗中心全面展开。为了保证革命在伯南布哥取得成功，儒阿雷斯争取到了

累西腓人民的支持。人们占领了联邦大楼和一座武器库，与此同时，大西方铁路公司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东北部的形势很快便处于革命者的控制之下，注意力集中在控制了国家南方后正在准备开进圣保罗州的军队上面。然而，10月24日，在决定性的对抗之前，军队高层——以陆军和海军的名义，废黜了在里约热内卢的共和国总统，组成了一个政府临时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企图长期执政下去，但是，在人民群众的示威和来自南方的革命者的压力下，放弃了这种企图。热图里奥·瓦加斯乘火车转到圣保罗，并从那里到达里约热内卢，在那里已经先行抵达了3000多名南里约格朗德士兵。这个处在统帅全国的地位上、坚持民族团结的人提出要当时各个地区明确自己的立场。他身穿军装，挥动着大檐帽，在共和国首都下了车。当南里约格朗德人把马拴在立于里约布朗戈大街的方尖碑旁时，地区胜利的象征便完成了。1930年11月3日，热图里奥·瓦加斯就任总统，标志着第一共和国的结束和当时还没有确切定义的新时代的开始。

巴西的1930年革命是在一种不稳定的形势下出现的，这种形势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并且带有拉丁美洲的特点。1930～1932年之间，在那里发生了11次由军人主导的革命插曲。在反对党中，作为可仿效的榜样而受到欢呼的阿根廷的乌里武鲁将军的军事政变（1930年9月），对巴西具有示范性的作用。

* * * * * *

1930年革命不是由所谓新的社会阶级——不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发动的。中产阶级给自由联盟提供了基础，但是，它们的性质大不相同，要在政治方面以它的名义提出一个纲领，需要依赖农村力量。

至于工业家，我们应该想到，第一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组成在

初期即强调了不同阶级的地区标志。以圣保罗为例，多年来，在工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就产生了差异，这是事实，在1928年成立的圣保罗州工业中心的组成上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当时这种差异还没有达到打破在圣保罗利益名义下的统治阶级和谐一致的地步。大工业家拥有代表他们的圣保罗共和党的保护。他们没有理由对经常把他们作为批评对象之一的反对派怀有好感。因此，各工业家协会公开支持儒里奥·普莱斯特斯为总统候选人是不足为奇的。

在里约热内卢，工业家们都聚集在巴西工业中心里。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有一些里约热内卢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担任了政府的一些职务。比如，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大纺织工业家马努埃尔·吉列尔梅·达席尔维拉被选为巴西银行行长。当1930年革命爆发时，巴西工业家中心表示了对华盛顿·路易斯的支持，并认为造反是“最有害于国家经济局势的行为”。但是，革命胜利后不久，里约热内卢的工业家们便设法接近政府，这完全是事实。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觉察到热图里奥·瓦加斯是企业界的代表，而是表明他们在1930年前后，觉察到和国家接近是加强工业资产阶级的决定性的因素。

1930年的胜利者们组成了一支无论是从社会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看都是性质不同的干部队伍。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具有不同前景的同一个敌人：地区统治阶级的典型代表——旧政治寡头，他们仅希望对他们的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拥有更大的个人权力，进行最小的变革；年轻的文职干部们倾向于改革政治制度，并暂时和尉官们联合，组成了一个被称为“文人尉官”的集团；被军队的高级将领看做威胁的尉官运动主张中央集权和进行某些社会改革；民主党则企图控制圣保罗州政府和切实采取表面上保证其主导地位的自由州原则。

自1930年开始，进行了没有产生大决裂的掌权精英撤换。传统的政治寡头下台；上台的是军人、职业外交官、青年政治家和

后来的工业家。

新政府从一开始就设法把无论是财政—经济决定权，还是政治性决定权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这样，就独揽了各种现实利益。建立在各州力量基础上的寡头式政权失去了优势。寡头们并没有消失，顾主主义关系的标准仍然存在。但是，他们的辐射从中心走向了边缘，而不是从边缘走向中心。1930 年后，诞生了一个新型的国家，不但在中央集权和更大程度的自治上，而且在其他因素上与寡头国家不同：第一，逐渐进行以促进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行动；第二，努力给城市劳动者以某种类型的保护，并使他们加入国家政权倡导的阶级联盟的社会行动；第三，使武装力量——尤其是陆军——起到作为创立基础工业的支柱和国内秩序保障因素的中心作用。

热图里奥主义的国家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有两个支柱：在国家机器中，是武装力量；在社会方面，是工业资产阶级和部分城市劳动阶级的联盟。是这种方式，而不是因为它在 1930 年革命中的行为使工业资产阶级的地位提高了，变得在政府内有作为和有力量。工业化计划与其说是企业家的思想，毋宁说是政府技术官员的思想。

上述变化并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也不等于是革命政府的一个总体计划。它是在多年过程中，通过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有所侧重的努力逐步实现的。这样，只有随着时间托出的前景，一个总体的视野才变得清楚起来。

第四章
热图里奥主义国家（1930～1945）

一　政府行动

1930年10月上台执政的热图里奥·瓦加斯，作为临时政府的首脑、间接选举的总统和独裁者，统治巴西达15年之久。1950年，通过人民投票，再次当选为总统，但任期未满就于1954年自杀。

这位在20世纪巴西政治史上最突出的人物出身于南里约格朗德坎帕尼亚地区的圣博尔加的一个养牛庄园主家庭。父亲——里约格朗德共和党地方领袖——曾卷入反对联邦主义者的斗争。直到1930年，热图里奥在博尔若斯·德迈德罗斯庇护下的里约格朗德共和党圈子里从事着传统的职业。历任公诉人、州议员、联邦众议院南里约格朗德党团领袖、华盛顿·路易斯的财政部长和南里约格朗德州州长。1930年一跃而成为共和国总统，他代表着一条与寡头政治十分不同的行动路线。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临时政府设法在前景十分不明朗的情况下稳住脚跟。作为后果，世界经济危机造成农业生产没有市场、庄园主的破产、大城市中的失业。财政困难增加：出口收入下降和可兑换货币蒸发。

在政治领域里，1930年胜利的各州的政治寡头努力按照旧模式重建国家。尉官们反对这种前景，支持热图里奥加强中央政权的意图。然而，同时他们也代表了一种难以控制的、把军队内部的等级制度置于危险境地的潮流。

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支持基础是天主教会。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合作不是新鲜事，它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自阿尔图尔·贝纳尔德斯总统执政以来一直是这样。现在，这一合作变得更加密切了。合作象征性的标志是1931年10月12日——美洲发现日——举行的科尔科瓦多山上的救世主耶稣塑像落成仪式。热图里奥和他的全部内阁成员集中在翼然于里约热内卢上空的耶稣塑像矗立的狭窄平台上。在那里，红衣主教赖枚把巴西民族祭献给“耶稣的圣心，确认他永远是自己的王和主”。教会一下把广大天主教信徒带向对新政府的支持。作为回报，政府采取了支持教会的重要措施，突出的是1931年4月的一项法令，允许在公立学校开设宗教教育课。

临时政府的中央集权措施从很早就开始了。1930年11月，当解散国会时，瓦加斯就不但掌握了政权，而且掌握了立法权以及各州和市的政权和立法权。所有原来的州长，除了新选举的米纳斯吉拉斯的州长外，一律撤掉，在他们的位置上，任命了新的联邦督察员。1931年8月颁布的所谓督察员条例，规定了他们从属于中央政权的地位。同时限制了各州的活动领域，没有联邦政府的授权，禁止向国外贷款，要将原来经费的10%用于军警事务，收编州警察、炮兵和航空兵，并按照高于陆军的比例加以装备。

中央集权也扩张到了经济领域。瓦加斯政府没有抛弃，也不能抛弃咖啡。但是，设法把咖啡政策集中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在1933年成立国家咖啡局时就开始了。

但是，还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对在国际市场上无法处置的当前和未来的部分咖啡储备怎么办？1931年7月有了答案。政府用来自出口税和外汇留存的收入，即出口收入的一部分税收购买咖

啡，并把部分咖啡销毁。用这样的方法减少供应，以支撑咖啡价格。这种选择和阿根廷销毁葡萄或澳大利亚屠杀羊群的做法相似。巴西的这一计划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尽管在那些年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改变。销毁咖啡的做法直到 1944 年 7 月才告结束。在 13 年的时间里，共销毁咖啡 7820 万袋，相当于三年的世界消费量。

到 1931 年中期，国家财政情况已经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同年 9 月，中止偿还国外公债，再次对巴西银行实行汇兑垄断。后一项措施在华盛顿·路易斯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曾经宣布实行过，后被革命政府撤销。

瓦加斯政府最连贯的方面是劳动政策。在 1930～1945 年之间，这种政策经历了几个阶段，但是，都表现为后一个时期的政策对前一个时期的改革。它以镇压不在国家控制之内的城市劳动阶级的组织活动并把他们吸引到对政府的明确支持方面来为主要目的。

关于第一个目的，镇压落在了左派政党和组织——尤其是巴西共产党的头上，1930 年过后不久，这种镇压变得比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做法更系统化了。至于第二个目的，政府的一项特别政策取代了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 10 年中实行的对城市劳动阶级问题的零散关注。这在 1930 年 11 月，劳动工商部成立时就已经宣布了。接着颁布了劳动保护法、国控工会法，并成立了对老板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进行仲裁的机关——调停和裁决委员会。

国家对工会的控制是通过 1931 年 3 月颁布的一项法令确立的。它规定可组织工人阶级和老板阶级的联合工会，但是，前者是利益的焦点。工会被定义为咨询机关和政府的合作机关。它采取团结工会的原则，即在职业范围里，国家承认的惟一工会的原则。组织工会联合会不是非做不可的。政府赋有控制工会生活的职能，规定政府官员要参加工会代表大会。一个工会的合法性取决于劳动工商部的承认，当证实某工会不履行一系列的规定时，承认可被撤销。这一法令一直实行到 1934 年 7 月，直到被另一项法令取

代时为止。新法令的主要变革在于采取了工会多元化的原则，尽管多元化到1939年才从立法上消失，但是实际上，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工商协会最终接受了劳动法，尽管起初他们反对政府的这些措施，特别是那些赋予劳动者权利的措施。

左派控制下的工人组织企图反对国家对他们的控制。然而，这种企图失败了。除了政府，这些组织的基层也为了自己的合法性施加压力。许多权益，诸如假期、要求调停和裁决委员会保护自己的权益，都取决于是否是政府承认的工会成员这个条件。1933年末，自治的旧工会运动消失了，所有的工会一律都被纳入了立法的框架之内。

1930年的胜利者们一开始就很关注教育问题。其主要目的是培养更多的智力上受到良好培育的精英。教育改革的尝试始自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里以州一级的创意为特点，这是当时联邦共和国的时髦模式。自1930年开始，旨在创立一种教育体系和促进教育发展的措施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主要是从中心走向边缘。教育步入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大视野的标准。这一思想的最初标志是1930年11月创立教育卫生部。

瓦加斯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创举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有一种独具权威的雄心。国家自上而下地发展教育，不牵涉到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是，也没有持久地促进建立一种包括教授全方面知识的学校综合教育。

即便在新国家专制的过程中，教育也混合着等级价值观与源自天主教影响的保守主义思想，而没有采取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形式。教育政策尤其掌握在了米纳斯州青年政治家手里，他们的仕途生涯始自该州的旧寡头政治，1930年后才改变了方向。这就是1930年11月至1932年9月的教育部长弗朗西斯科·坎波斯和取代他的自1934～1945年长期主持该部的古斯塔沃·卡帕内玛。在1930～1932年之间，弗朗西斯科·坎波斯在教育部实现了一项主要关注高等和中等教育改革的强化行动。

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努力为同时致力于教学和科研的真正的大学创造条件。在中等教育范围里，设法开始建立真正的中等教育，因为直到那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学教育只不过是一种为进入高等学校设立的预备班。坎波斯的改革彻底建立了一种两个教学阶段的系列学历，即必须上中学和进入高等学校必须持有中等教育水平的文凭。

创立大学的主要措施出现在联邦区和圣保罗，对后者的办学活动，联邦很少参与。这样在 1934 年，成立了圣保罗大学，1935 年成立了联邦区大学。

二 政治进程

有相互关联的两点对决定 1930～1934 年之间的政治进程是重要的：这就是尉官运动和中央政权与地方集团之间的斗争。

由于 1930 年革命的胜利，尉官们变成政府的组成部分，并提出了一个更明确的纲领。他们建议在满足全国各地区的需要方面要采取更大的一致化措施，提出了一些经济计划，建立基础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和一个包括矿业、交通运输和沿岸航运在内的国有化纲领。为了实现这些改革，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和自由派的观点明确不同，尉官们主张延长专制制度的时间和制订一部建立阶级代表制与个人代表制并立的宪法。最后设想给予每个州的代表名额相同。

热图里奥设法利用尉官干部作为反对两个迥然不同的地区：政治寡头占主导地位的东北部和圣保罗州的斗争工具。东北部地区是尉官的“用武之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自这个以极端贫穷为特点的地区，在那里，小小统治圈施行暴力是明目张胆的。

许多被任命到东北各州去的联邦督察员都是军人。1930 年 11 月，联邦政府设立了北部地区代表处，并将之交给了儒阿雷斯·达

沃拉。尉官运动企图进行一些改良和满足人民的一些要求，在不同的景况下，重新捡起了"拯救主义"的传统。巴伊亚的联邦督察员，儒拉希·马加良斯建立了一些农业发展委员会，并努力推广卫生服务，发布命令，强制减租。达沃拉还企图征用一心追随旧共和国的政治寡头的财产。

然而，没有条件，也不想进行大变革的尉官们终于同地区统治阶级方面达成了谅解。减租和征用财产的措施被联邦政府封锁，没有继续下去。东北部的尉官主义行动——尽管是有限制的，激起了全国最发达地区的统治集团的攻击。儒阿雷斯被讥讽为北方的副国王，猛烈地攻击他企图建立一个小州集团。

在圣保罗，政府的不称职促成了一场内战的爆发。热图里奥否定了民主党的企图，将圣保罗精英边缘化，任命了若昂·阿尔贝托中尉为督察员。这位督察员没能顶得住圣保罗和政府内部的压力，于 1931 年 7 月宣布辞职。直到 1932 年中期，相继更换了另外三位督察员，显示了所谓圣保罗问题的严重性。

在圣保罗州领导中，或者说通过他们的影响，尉官们设法建立一个支持自己活动的基础。目标是那些没有咖啡种植背景的协会和工人工会。在后一方面，表现突出的是公安局长兼州民兵司令，米格尔·考斯塔。人们说他的心中怀着共产主义，他的狱中监禁着共产党员。这位原纵队领袖促进了诸如桑托斯码头工人中心等许多工会的出现，这个中心的领导委员会都是在他的影响之下。

尉官们面临着思想上围绕当地精英转的圣保罗大部分人的反对。这些精英主张根据自由民主原则实现国家立宪制度。作为过渡性措施，要求任命一位是圣保罗人的文职督察员。立宪制度和自治的旗帜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并且有利于圣保罗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接近。这些由于圣保罗统一战线在 1932 年 2 月组成而得到了实现。同月，临时政府准备向不但来自圣保罗，而且来自南里约格朗德和米纳斯州的反对延长专制制度的压力让步，并颁布了选举法。该法引进了一些重要的革新。规定了男女公民

参加投票的义务和秘密投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妇女的选举权利。1927 年的北里约格朗德的选举法是首例，但是，仅限于在本州内实行。

立法选举是按比例进行的，这样可保证少数族群的代表性。尽管职业代表性是受行会和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产生的，但其目标是最直接的。拥有 40 个阶级代表的议会党团——比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党团还要大——可以预见到是受政府控制的。它是用来同大州，具体地讲，是当时组成反对派主要核心的圣保罗州和南里约格朗德州搞平衡的。

最后，由于建立了负有组织、监察选举和审理上诉的责任的选举法庭，选举法为稳定选举进程，起码为减少舞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2 年 3 月，瓦加斯为安抚圣保罗，表面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任命了一位圣保罗人——佩德罗·德托莱多作文职督察员。但是，托莱多在圣保罗并不是个有很大威望的人。对于能否召集选举和控制尉官的疑问仍然存在。为维持因在选举法刚颁布后查封了里约热内卢《里约日报》报社的尉官小组的处分不变，政府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由一些地方政党组成的南里约格朗德统一战线同瓦加斯决裂。这一事实使大部分和民主党有关系、在圣保罗进行密谋的各集团加速了一场革命的准备活动，这场革命终于在 1932 年 7 月 9 日爆发。革命者的计划是对共和国首都进行突然袭击，迫使联邦政府进行谈判或投降。然而，这个计划失败了。尽管“圣保罗战争”在里约的中产阶级中唤起了广泛的同情，但是，圣保罗全境被军事包围。海军封锁了桑托斯港。

事实是，尽管同中央政权有分歧，南里约格朗德和米纳斯吉拉斯的地区精英们还不准备通过武力，冒险与他们在两年前帮助推上政权宝座的政府对抗。实际上，圣保罗是在独自以州民兵和人民紧急动员来对抗联邦军队的。

1932年运动联合了从咖啡庄园主、工业家到中产阶级的不同社会阶层。只有1932年上半年参加了一些重要罢工的有组织的工人站在了事件的边缘上。为国家立宪的斗争和圣保罗自治及在其他州面前所占的优势等内容，使相当一部分圣保罗人紧急动员起来。在当时，一个产生了巨大效力的形象是把圣保罗和一辆拖着20节空车厢——联邦其他20个州——的火车头联在一起。收音机第一次在大范围里使用，也对鼓舞参加集会的人和开赴战斗前线的志愿者队伍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人还响应圣保罗“黄金送给最可爱的人”公司的号召，捐献了自己的首饰和家里的其他财物。

革命者利用圣保罗工业园的各种资源来弥补武器弹药的明显不足。他们还派出了密使到美国，以期购买武器和飞机。但是，政府的军事优势十分明显。尽管力量不平衡，斗争还是延续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1932年10月以圣保罗的投降而告终。

“圣保罗之战”有面向过去的一面和面向未来的另一面。立宪化旗帜既庇护了那些希望向权力寡头让步的人，也庇护了那些希望在巴西建立自由民主的人。运动带来了重要的后果。尽管胜利了，但是政府清楚地觉察到不能无视圣保罗精英，而失败者也认识到必须同中央政权建立某种类型的妥协。

1933年8月，热图里奥终于任命了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圣保罗人做文职督察员：和民主党有联系的阿尔曼多·德萨勒斯·奥里维拉。同年8月，下达所谓经济调整政令，减少了受危机打击的农业耕种者的债务。从此以后，圣保罗政治精英方面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

1933年，尉官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开始解体。没有能把国家变成他们的政党，他们失败了，或者说，他们取得社会基础的企图被割断了，在等级制度受到威胁的军队中，失去了力量。1932～1933年之间，东北部的许多尉官主义督察官宣布辞职。10月3日俱乐部——尉官组织的主要中心——正如戈伊斯·蒙特罗将军喜不自禁地指出的那样，慢慢变成一个“摆脱了蛊惑的理论机关”。在

一部分尉官隶属于瓦加斯政府的同时，另一些尉官则壮大了一些右派和左派政党。

临时政府决定对国家进行立宪，于 1933 年 5 月进行全国立宪代表大会选举。选举运动对人民参与选举和组织政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在各州出现了各种不同倾向的政党：一些有着充实的基础，另一些则仅有一个门面。但是，除了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和一体化主义行动党之外，都没有形成全国性政党。

投票的结果显示了地区精英的力量。在南里约格朗德，当选者大部分是弗洛雷斯·达库尼亚派；在米纳斯吉拉斯，取胜的是老州长奥莱加里奥·马歇尔的追随者；在圣保罗，统一战线以压倒多数胜出。而在另一方，尉官们取得的结果却很微弱。

经过几个月的辩论之后，议会于 1934 年 7 月 14 日颁布了宪法。这部宪法和建立联邦共和国时制订的 1891 年宪法相似，但是，为了反映国家发生的变化，新宪法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参照的模式是德国的魏玛宪法。

在以往宪法中没有的三章是社会经济秩序，家庭—教育和文化与国家安全。其中第一个问题具有民族主义意向，规定了对认为对保卫国家经济和军事具有基本或根本意义的矿山、矿藏、瀑布逐步实现国有化。一些社会性条款保障了工会多元化和自治，也规定了有关劳动法的问题。劳动法最起码应该规定：禁止因年龄、性别、民族和婚姻状况的原因，对同样工作的人给予不同的工资待遇；最低工资；妇女、儿童劳动条例；周日公休；带工资假日；无正当理由解雇工人应给予补偿等。

关于家庭—教育和文化一章，宪法规定了免费进行初小教育和义务上学的原则。宗教教育是公立学校的选修课程，接受所有人的忏悔，而不仅限于天主教徒。

在巴西宪法上，第一次出现国家安全的内容。有关国家安全的所有问题都要经过由共和国总统主持和各部部长及陆军、海军总参谋长组成的国家安全高级委员会审定。服兵役被认为是公民

的义务，这种规定在第一共和国就已经存在，但实际上很少实行。

1934 年 7 月 15 日，通过全国立宪代表大会的间接选举，热图里奥·瓦加斯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任期到 1938 年 5 月 3 日。此后，将进行直接总统选举。

国家似乎终于生活在一种民主制度之下。但是，宪法刚颁布了三年多的时间，新国家政变便使这一希望落空了。政府中——尤其是军队里的各集团，自由派的犹豫和左派的不负责任一起促成了这次政变的发生。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极权主义、专制思想和运动在欧洲活跃了起来。1922 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取得了政权；斯大林在苏联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力；1933 年，纳粹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世界危机使在经济领域里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自由民主威信扫地。曾经许诺过机会平等和富有的资本主义一下跌入了一个似乎无法脱身的黑洞。不但没有带来美好的生活，反而带来了贫困、失业和绝望。

导致了国家机体分裂的自由民主和它的政党以及表面看来无用的政治斗争被集权主义思想家看做一种无力解决危机的制度。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时代似乎已经成为过去。

20 世纪 20 年代，在巴西出现了一些小的法西斯主义组织。1932 年 10 月，当普里尼奥·萨尔加多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在圣保罗成立巴西一体化主义行动（AIB）时，便诞生了一个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富于表现力的运动。一体化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内容重于经济内容的民族主义理论。毫无疑问，它也反对财政金融资本主义，并企图建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是，它最强调的却是要有建立在统一原则基础上的民族精神价值的良知："上帝、祖国和家庭"是这个运动的口号。

关于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一体化主义否定多党制和公民个人代表制。一体化主义国家是由国家元首组成，其内部包括职业代表机关和文化单位。

巴西一体化主义行动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犹太人手中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一体化主义很讲究礼仪和象征的利用：崇拜国家元首人格、加入组织礼仪、在一只胳膊上披戴绣有西格玛（Σ）臂章的“绿色衬衫”战士列队仪式。

一体化主义行动党的全国和地区领导人主要在中产阶级的城市职业人员中选拔，级别低的可在军人中选拔。一体化主义行动吸引了数目巨大的拥护者加入了自己的队伍。保守的统计表明这个数字在高峰时期（1937 年末）在 10 万～20 万人之间。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被认为相当于最低程度的国家政治总动员的人数。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体化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是死对头。但是，两个运动也有共同之处：都批评自由国家、赞颂惟一政党、崇拜领袖人格。因此，一些党员从一个党转到另一个党不是偶然的。

然而，两党之战却不是由于误解造成的。实际上，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一体化主义者把他们的运动建立在诸如家庭、国家传统、天主教等保守主义的内容之上；而共产党人讲的压根就是革命的思想和纲领：阶级斗争、批判宗教和偏见、通过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土地改革取得民族解放。这种割断社会关系的不同方式足以造成两个运动之间的敌对。此外，这些反映了两个运动的倡导者：以法西斯主义为一方，以苏联共产主义为另一方在欧洲业已存在的党派对立。

专制主义派没有同一的色彩，但是，都以很大的效力活跃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巴西。组织阶级、组织具有代表性的协会和政党的困难使专制主义解决办法不但在保守派中间，而且在自由派和左派中间成为一种持久的吸引力。这种情况逐渐使自由主义和寡头统治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所谓形式民主就没有很大的价值了。自由主义者为这种观点辩护。他们害怕社会改革，每当它似乎受到颠覆势力威胁时，总是接受、甚至鼓励中断民主游戏。

专制派不顾一切后果地展现出被称为保守主义现代化的前景，

即在像巴西这样一个缺乏组织联系的国家，政府要承担起组织全民族有秩序地促进经济发展和一般福利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专制主义的国家应能够制止社会冲突、党派斗争和过度自由的表现，这种自由只能起到削弱国家的作用。

在专制派和集权主义的一体化主义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它们并不相同。一体化主义企图通过动员不满的群众、突然取得政权的政党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专制派不是把赌注下在一个政党的身上，而是放在国家身上；它不相信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而相信一些人的远见卓识。法西斯政党把国家带向危机边缘；而专制的国家主义却努力使国家强大。专制主义者身居国家之内。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武装力量的最高层发挥自己的作用。

武装力量，尤其是陆军的加强成为 1930～1945 年这段历史的特点。这从兵员人数增加、更新装备和取得具有显赫威望的地位上表现出来。相比之下；州民兵大为逊色。然而在 1930 年革命后的前几个月里，陆军没有成为一支具有凝聚力的力量。当时，不仅尉官运动是个问题，而且，同情旧共和国的许多现役高级将领还存在。革命的军事首长本人还只是中校军衔。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为他连升三级，才能达到将军。1932 年革命为清理陆军做出了贡献。在那一年里，48 位军官被放逐，其中 7 位是将军。1933 年末，在役的 40 位将军中的 36 位被新政府晋升了职衔。

这样，忠于热图里奥·瓦加斯的集团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其中有两个人物最为突出：戈伊斯·蒙特罗和欧雷克·加斯帕尔·杜特拉。戈伊斯是军队政策的制订者，杜特拉是主要的执行者。两个人垄断了 1937 年以后的主要军事职务。戈伊斯是 1937～1943 年的总参谋长；杜特拉是 1937～1945 年的战争部长，当他离任参加共和国总统竞选时，戈伊斯·蒙特罗取代了他的职务。戈伊斯在 1934～1935 年之间或许已经领导过战争部。军队领导中忠于瓦加斯政府的新班子，尽管受到一些插曲的损伤，但直到 1945 年仍没有破裂。

1934 年以工人开展的要求权利的活动和在中产阶级领域里发生的骚动为标志。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贝伦和北里约格朗德爆发了一系列罢工，突出的是在交通、通讯、银行等服务领域的大罢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取得了迅猛发展，1934 年 10 月，圣保罗发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一体化主义分子之间的暴力冲突达到高潮。

政府以 1935 年初提出制订国家安全法（LSN）作为回答，这部法律由于自由派投票而获得国会通过。该法规定了扰乱政治和社会秩序罪，其中包括公务员罢工、在武装阶级中煽动敌对性挑衅、煽动社会阶级之间的仇恨、进行颠覆性宣传、以法律不允许的手段组织以颠覆政治或社会秩序为目的的协会或政党。

在讨论国家安全法的同时，共产党人和与之接近的左派尉官们准备发起民族解放联盟（ANL）。这个联盟在 1935 年 3 月 30 日在里约热内卢成立。当场有一个法律系的青年大学生——卡洛斯·拉塞尔达——宣读了这个运动的宣言，选定路易斯·卡洛斯·普莱斯特斯为其名誉主席，决议获得一致欢呼通过。民族解放联盟的公开主席是 1924 年领导了圣保罗护卫舰起义的海军上尉埃尔克里诺·卡斯卡尔多。

民族解放联盟的基本纲领具有民族主义的内容。它的五项条款中没有一项是专讲工人问题的。这些条款是：彻底终止偿还外债、将外国企业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保障人民自由、组成一个“凡有才能并积极进行合作的人”都可参加的人民政府。

民族解放联盟的组成与共产国际给巴西共产党的新的指导方针相符合，主张在全世界建立反法西斯威胁的人民阵线。民族解放联盟应是一个适合所谓半殖民地世界特点的人民阵线的范例，团结了决心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各个社会阶层。

同时，自 1934 年 8 月普莱斯特斯加入巴西共产党以来该党内发生的变化为民族解放联盟的成立提供了方便。这个组织不再是一个主要面向工人阶级的小团体，而要成为从人数观点看是拥有

各种社会组成的更强有力的机构。追随普莱斯特斯的军人和中产阶级的成员加入了巴西共产党。民族主题变成凌驾于阶级主题之上的占主导地位的主题，这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是相吻合的。

在几个月内，民族解放联盟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保守的估算认为，1935 年 7 月这个联盟已经拥有 7 万～10 万名成员。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一直在巩固阶级联盟的努力和发动夺取政权的起义的前景之间摇摆。起码在口头上，后者表现得很强烈。在 1935 年 7 月 5 日的纪念大会上，卡洛斯·拉塞尔达宣读了当时在巴西处于地下活动的普莱斯特斯的一项宣言，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可恶的瓦加斯政府”，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人民、民族和革命的政府。

早已开始镇压民族解放联盟活动的政府取得了关闭它的绝好的理由。这是通过 1935 年 7 月 11 日的一项政令完成的。从此以后，在政府进行大量逮捕和监禁的同时，巴西共产党开始了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发动 1935 年 11 月军事政变的尝试。

1935 年的起义——这使人联想起 20 世纪 20 年代的尉官起义——是一次失败。11 月 23 日在北里约格朗德开始，抢在从里约热内卢开始的一项协调一致的活动之前举行。一个政府委员会在纳塔尔夺得政权达 4 天之久，最后被镇压了下去。相继发生了累西腓和里约热内卢的叛乱，后者规模最大。在那里，发生了造反者和政法力量之间的对抗，造成了数人死亡，直到最后投降。

表面上的人民阵线战略建立后，在共产国际的坚决支持下，发动的 1935 年 11 月的冒险给巴西共产党带来了什么呢？一切表明，在巴西进行政变的努力代表了以往政治路线的终结。它是被察觉到当时全国存在的革命前气候的巴西共产党人的虚假情报鼓动起来的。尉官运动的影响对各地方做出起义的决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 年插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为广泛的镇压措施和专制主义升级开辟了道路。国际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巴西取得了大

规模的发展，主要还由于共产国际向巴西派遣了一些外国领导干部来协调起义的准备工作。

1936 年，国会通过了政府要求的镇压共产党人和一般左派的所有非常措施。1936 年 3 月，警察闯进议会，逮捕了曾经支持民族解放联盟或仅仅是对其表示同情的 5 位议员。国会接受了监禁他们的理由，并授权审讯这些罪犯，同时成立了专司镇压的机关。1936 年 1 月，司法部长宣布成立镇压共产主义国家委员会，负责调查公务员和其他人员参加反对政治和社会机构的行为和罪恶。一种特别法庭——国家安全法庭——于 1936 年 10 月底开始办公。起初，国家安全法庭仅为了审讯决定参加 1935 年起义的人，然而，后来变成了一个存在于整个新国家期间的常设机关。

在 1936 年末和 1937 年最初的几个月里，确定了定于 1938 年 1 月进行的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有民主党和另一些小党组成的立宪党推出阿尔曼多·德萨勒斯·奥里维拉为候选人。选定曾是瓦加斯政府航空和公共工程部长的东北部政治家若泽·阿梅雷格·德阿尔梅达作为政府提出的候选人。最后，又出现了一体化主义者推出的候选人普里尼奥·萨尔加多。政府提出的候选人拥有东北部各州、米纳斯吉拉斯州大部分人和圣保罗、南里约格朗德亲瓦加斯派的支持。

政治争夺的开展有利于镇压措施的松弛。通过司法部长的命令，近 300 人于 1937 年 6 月被释放。延长当时实行战争状态的请求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然而，热图里奥和他的亲信们不准备放弃政权，更因为三个候选人中没有一个是他的亲信。若泽·阿梅雷格越来越倾向民众主义运动，自称为“人民候选人”，并揭露帝国主义剥削。一位接近政府的观察家甚至说，由于巴西有变成被内战撕裂的西班牙的危险，社会问题居总统竞选运动的中心。

1937 年，为了化解可能发生的地区困难，政府对一些州和联邦区进行了干预，但是缺乏重新煽起政变气候的借口。这个政变还是由于其真正历史面目仍然模糊不清的科恩计划发生了。1937

年9月，当一位一体化主义者军官——奥林比约·莫乌冷·费略上尉——在战争部打一份共产党起义计划时，被吓住了，或说大吃一惊。文件的作者是科恩——明显地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也可能是匈牙利共产党领袖贝拉·昆的缩写。

表面看来，这个“计划”是个要在巴西一体化主义行动简报上刊登的虚构材料，显示共产党起义是什么样的和一体化主义者面对它应做出怎样的反应。起义引起了屠杀、抢劫、破坏、拆散家庭、焚烧教堂等。事实是，这一虚构的作品，当从一体化主义者手里转到军队最高层时，竟然变成了真实的事情。9月30日，通过电台官方节目广播并在一些报纸刊登而传播开来。

“科恩计划”的传播立即产生了效果。国会急忙以多数票通过了实行战争状态，并中止宪法保障90天。第三军区司令发布命令，将里约格朗德军旅改变为联邦部队。弗洛雷斯·达库尼亚无力抵制，弃职流亡乌拉圭。

10月末，众议员内格冷·德利马跑遍北部和东北部各州，说服各州州长支持政变，得到几乎一致赞同。直到1937年11月初，反对派才动员起来。阿尔曼多·德萨勒斯发表致各军事首长宣言，号召阻止政变施行。这一举动却只起到了加速政变的作用。在命令已下达到各军营的借口下，瓦加斯和军队高层决定将原定于11月15日发动的政变提前。

三　新　国　家

1937年11月10日，军警部队包围了国会，不准许国会议员进入。战争部长——杜特拉将军——反对行动由陆军负责执行。夜里，瓦加斯宣布一个新的政治阶段的开始和弗朗西斯科·坎波斯制定的宪章生效。这就是新国家专政的开始。

这个按专制主义风格建立起来的制度没有大型的运动。人民

运动和共产党人受到镇压，且无法做出反击行动；统治阶级接受了这一政变，因为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甚至是有益的事件。被解散的国会屈服了，甚至有80多位议员在11月13日，当他们的一些同僚被逮捕后，即表示了对瓦加斯的支持。

剩下了一体化主义者，他们原本就支持政变，并希望看到他们的普里尼奥·萨尔加多当上教育部长——这个跃入政权的重要阶梯。瓦加斯切断了他们的希望。1938年5月，一群一体化主义者突袭总统官邸，企图废黜他。这些劫持者被包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与卫兵的冲突中死亡，看来是在官邸花园中被击毙的。

新国家不代表同过去的一刀两断。过去的许多制度和惯例是在1930～1937年期间逐渐形成的。但是，自1937年11月开始，这些制度和惯例互相结合在一起，并在新制度的范围里取得了统一。1930年革命后最初的几个月里就已经暴露出来的中央集权的倾向现已完全变成现实。各州变为按不同标准挑选、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督察员执政。瓦加斯的亲属和许多军人都接受了不同的任命。但是，一般情况下，在各大州，一些地区政治寡头也得到了赏识。

国家的中央集权不意味着它脱离了社会。各种社会利益的代表改变了形式，却不是不存在了。直到1937年11月，这些利益通过议会和政府机关表现了出来。从新国家开始，通过议会渠道表现的代表性消失了，国家机器内部的技术机关里制造出来的代表性加强了。

在社会经济方面，新国家代表了文武官员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当前的共同目的是在没有大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促进国家现代化。文职官员支持工业化计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实现国家真正独立的道路；军人们支持工业计划是因为他们相信建立基础工业将会繁荣经济——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工业家也支持工业计划，因为他们终于相信了鼓励工业化发展要依赖国家的积极干预。工业资产阶级和瓦加斯政府的接近主要是从1933年圣保

罗革命失败后开始的。

上述各方面的联盟不意味着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和政府官员相反，工业家在支持国家干预主义和强调反对外国资本方面是不彻底的。他们主要要求在汇兑和形成对国内工业保护的进口关税方面采取措施。

瓦加斯政府在1937年开始的国家工业化方面不断增长的兴趣反映在教育方面。尽管卡帕内玛部长一直在促进中学教育改革，但是，他最大的关注却集中在组织旨在培养高水平的工业劳动力的工业教育上。

在国家领导方面，热图里奥的个人力量代表着对基本意图的执意坚持。总统与各位部长之间的信任关系一直被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自1938年3月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人主外交部到1941年6月之间，内阁中没有一位部长变动。武装力量的影响通过在新国家里不断增殖的各种官僚机关、各个总参谋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现出来。赋予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所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问题的职权，因此，该委员会在经济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武装部队负责建立国家钢铁工业，尽管它的代表的建议不都是受欢迎的。在石油方面，1938年7月成立的国家石油委员会作为共和国总统府的特别机关，落在了奥尔塔·巴尔博扎将军的手里。政府通过了购买武器的军事计划，包括德国克虏伯公司提供的大炮、英国和意大利的战舰、捷克斯洛伐克的步兵武器和美国的飞机。

尽管武装力量掌握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是广泛的，但它不是绝对的。军人不希望也没有条件简单地代替文职精英。这在政变时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了。支持军人候选人的观点没有大的影响，就连让军队公开卷入政变也被战争部长避开了。

武装力量的凝聚力是围绕着一个总目标——通过专制主义途径实现国家现代化表现出的一致产生的。但是，军人对与各个强国关系的观点，对某个具有或大或小自治权的经济发展计划的观

点却是根据每个集团和个人倾向的不同而不同。

这样，总统就能够掌握军队的意图，并使之与政府的全面利益协调一致，必要时还要与军方最高层进行抗争。1937 年政变不久，当瓦加斯决定中止偿还外债、动员军人予以支持时，要大家在下列两种选择中做出决定：我们要么偿还外债，要么更新部队装备和运输系统。以后的年代里，在 1942 年初，当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总统决定声援美国，对此杜特拉和戈伊斯·蒙特罗二位将军持保留意见。两位提出了辞呈，被总统拒绝。根据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说法，热图里奥甚至对两位将军说，他拥有人民，不需要武装力量来制止颠覆活动。

新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和 1930～1937 年期间相比是一个方向性变化。在前一个时期里，对鼓励工业的发展还没有一条明确路线。政府在包括农业问题在内的不同利益之间进行着平衡，对于外来压力也非常敏感。自 1937 年 11 月份开始，国家以极大的决心，采取了以国内生产代替进口和发展基础工业的政策。这一前景的捍卫者，不但从 1930 年以来的国际收支的关键问题中，而且从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增长的形势中取得了力量；战争和以往曾发生过的那样，强加给进口许多巨大的限制。

直到 1942 年，进口代替政策才在没有总计划的情况下实行，把每个方面都作为一个个案处理。同年 8 月，由于巴西参战和战争的继续，政府只好自己来监管经济。出于这一目的，成立了由原中尉若昂·阿尔贝托领导的经济动员协调局。

鼓励发展工业化，许多时候是和民族主义联在一起的。但是，热图里奥避开动员处在民族主义十字路口的民族。1937 年宪法为巴西人保留了开发矿山和瀑布的权利。决定了将由法律规范它们的逐步国有化，以及那些被认为对保护国家经济或军事十分重要的工业的逐步国有化。还规定，在国内，只有股东是巴西人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才有权开张营业。允许外国企业在法定的期限内转变为民族企业。

这些标准包括在反映不同集团压力和缺乏政府严格指导的一些政令一法。比如，电力公司就没有被提及，在1941年10月，瓦加斯拒绝接受一项规定在1946年8月前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要掌握在本国人手里的法令草案。国家对钢铁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争执的产物，而是通过和美国政府签订的一项协定形成的。

钢铁和石油两项对于理解国家对基础工业的投资政策是最具说明力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受到政府不同的对待。大型钢铁工业的创业史限定在新国家期间内；至于石油的历史则延长到了瓦加斯的第二届总统任期。

里约热内卢州的沃尔塔雷东达炼钢厂的建立及其建立形式直到1940年7月才确定下来，是用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和巴西政府的资金建成的。其控制权掌握在一个1941年1月成立的经济混合企业——国家钢铁公司的手里。这个解决办法不是由政府明确规定的，自新国家开始以来，在政府机关里对这件事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各个集团也仅在承认需要扩大和进行多种钢铁生产方面是一致的。运输服务的发展和重工业的建立要依靠上述问题的解决；此外，钢的进口对于继续处于不利地位的国际收支是一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私营集团和瓦加斯本人都倾向于和德国或美国等外国资本协作。在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工业方面，最大压力来自军队。然而，军人们还不能马上提出一个可行的最终解决方案。相反，在1939年，巴西政府和美国钢铁公司达成的谅解在这个舞台上占了统治地位，甚至签订了一项由美国公司、私人集团和巴西政府联手建立一家工厂的计划。然而，尽管瓦加斯和美国国务院从中努力调解，美国公司还是抵制了这项计划实现。从此，国家的选择取得了胜利。

和钢铁相反，石油工业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进口石油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发展起来，在一段很长时间里，没有给国际收支引起大的问题。直到1939年中

期，当在巴伊亚州发现石油时，石油工业似乎还仅限于建立炼油厂。即使在发现石油后，巴西石油的生产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储藏量的怀疑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石油政策的分歧远大于在钢铁问题上的分歧，连军队内部对这个问题的分歧也很大。无论怎样，在这一领域中的主要创建活动还是开始了。

自1935年起，一些工业家对建立炼油厂开始感兴趣。这使司坦达（在1936年）、特沙克、大西洋炼油公司和安戈洛－墨西哥高原公司（所有以上公司均在1938年）提出在国内建立大型炼油厂的建议。于是，围绕可能的选择展开了讨论，政府的干预政策随着1938年4月的一项宣布将进口石油或国产石油炼油工业国有化的政令—法而开始建立起来。国有化意味着企业的资本、领导和管理都应该在巴西人的控制之下，因而不等于国家垄断。同一项政令还宣布成立由总统指定的，由代表各部和各利益集团的人组成的国家石油委员会。赞同扩大国家对石油控制的指导方针的陆军统治了1938～1943年中期的国家石油委员会。这就是军事工程师奥尔塔·巴尔博扎将军管理时期。奥尔塔建立国家大型炼油厂的愿望落空了。国家石油委员会被有关集团、部长和瓦加斯本人封闭。

美国在石油方面的政策与它在钢铁方面的政策不同，因为它要保护历来控制着这个领域的大企业的利益。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奥尔塔·巴尔博扎于1943年中期，当一个私人企业的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开始时，就辞了职。

实际上，新国家在石油方面的功绩被缩小了，但是，并不因此而在以下两个方面就是不重要的了：一方面，国家石油委员会的政策封锁了外国大企业的活动，尽管还没有得到对它所提出的建议的答复；另一方面，奥尔塔·巴尔博扎将军的行动，对于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为使政府采取与他现在相似的路线施加了压力并取得了在1953年成立一个国家企业——巴西石油公司的胜利的集

团来说，是一个支持点和一种说明。

在财政金融方面，新国家设法将自己固定在由财政部长索扎·考斯塔体现的、实际上热图里奥在整个在职期间都保持的保守主义思想上。但是，实际需要使之采取了一些尽管一直被认为是例外的强泻措施。为了对付国际收支危机，热图里奥在政变之后，马上中止了外债偿还，发布命令垄断外汇买卖，对所有兑换活动强行收税。继续进行对外贸易控制；关于外债问题，达成了与债主的谅解，偿还外债定于 1940 年重新开始，尽管受到担心偿还外债会减少国家投资的军方的反对。

新国家的劳动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物质活动方面和热图里奥·瓦加斯作为劳动者保护人的形象建设方面。关于第一个方面，政府积极发展并使自 1930 年以来的实践系统化了，以法西斯意大利时行的劳动宪章为蓝本进行了立法。1937 年宪法重新采取了实际上一直没有抛弃的工会团结原则。禁止罢工和老板为对抗工人要求而采取的停工和关闭工厂。1939 年 8 月的一项政令—法规定了工会组织路线，使工会变得更加依附国家，并通过成立地区联合会和全国联合会加强了业已存在的纵向工会组织机构。

1940 年 7 月，设立了工会税——工会资助和工会附属于国家的基本工具。工会税，作为一种每年对国家的义务贡献而出现，相当于工人一个劳动日的工资，所有的工人，不论是否加入工会，都要缴纳。由巴西银行负责收取这种税，其中 60%给工会，15%给地区联合会，5%给全国联合会，20%给工会社会基金。工会社会基金的钱经常用做赞助各个部，后来成为赞助选举运动的一种“秘密款项”。

工会税支持了“缓冲垫”一类的人物。这个词是由它的下列的意思派生出来的：“缓冲垫”的原意是指放在马鞍下为减轻马在运动时产生的对骑马人身体撞击的棉布或兽皮褥垫。缓冲在这里的意思表达很确切。这里，“缓冲垫”一词是指那些在工会领导中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利益重于维护工人的利益，为缓和工人与国家

之间的摩擦而活动的工会领导人。在不需要把大量劳动群众都吸引到工会里来的情况下，他们的存在得到了支持。工会税保证了工会的存在，而加入工会的人数多少，在这个层面上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为解决维护劳动者的问题，政府于 1939 年 5 月组建了其前身是调解和审判委员会的劳动法庭。随着 1943 年 6 月加强劳动法（CLT）的颁布，劳动立法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并系统化了。

在工资政策方面，新国家引进了一项重要的革新。1940 年 5 月，规定了一种应该能满足劳动者基本需要的最低工资。当开始规定时，最低工资是符合它规定的明确目标的。随着年代的变化，情况在逐渐恶化，与其规定的明确目标相距很远了。

热图里奥作为劳动者保护人的形象建设是通过各种仪式和利用传媒来实现的。在举行的仪式中，以 1939 年以来在足球体育馆举行的历次 5 月 1 日庆祝大会最为突出。在这些集中了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大会上，热图里奥总以“巴西劳动者们”这一充满激励的呼唤开始他的演说，并宣布一些人们期待已久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措施。还经常利用收音机作为政府和劳动者接近的工具。劳动部长每星期举行广播录音讲座。在这些讲座里，讲述社会法律的历史，介绍一些具体事件，有时还举行一些同退休工人、妇女、工人子女的父母和外地来的移民等人的会见活动。

用这些和另一些方法树立起热图里奥·瓦加斯作为领导人和巴西人——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的领路人、作为朋友和父亲等类似社会范围里的家长的象征形象。这位领路人和父亲赐予人们一些恩惠，也从他们那里取得了等待他们效忠和支持的权利。恩惠不是幻象。然而，他的巨大的政治效益不但对物质收益，而且对有效树立一个在新国家进程中取得了形式和内容的总统形象起到了作用。

1937 年政权不仅仅是面向劳动者的。相反，它通过对批评意见和独立情报的检查和炮制国家经历的历史阶段的诠释，竭力形

成一种对自己有利的舆论。瓦加斯政府在这个领域的关注自他上台初期的1931年，当出现政府公告局时就开始了。1934年，在司法部下设立了一个文化传播宣传司，这个司一直存在到1939年12月。同月，新国家成立了一个直接隶属共和国总统的真正的宣传部——新闻宣传局（DIP）。新闻宣传局赋有十分广泛的职能，包括电影、广播、戏剧、新闻、“社会和政治”文学、组织政府官方电台节目、禁止“对巴西利益有害的出版物”进口、与外国新闻界合作，以防止“对国家信誉和文化有害的消息”传播。它还负责每天播出“巴西时刻”节目，这个节目多年来一直是宣传和传播政府作品的工具。

新国家的跟踪、逮捕、拷问迫使特别是左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和一些自由派人士流亡国外，但是没有采取迫害的态度。新国家的领导人深知吸引文人阶层为其服务的重要性。天主教徒、专制主义的一体化主义分子、假左派都取得了一些官职，接受了当局提供的优厚待遇。

在面向广大公众的集会上和诸如《政治文化》等发行面比较窄的一些刊物上，新国家竭力传播他们对国家历史的诠释。在最近的历史范围里，新国家作为1930年革命的理所当然的结果出现。他们在大地主和寡头统治下的一盘散沙的旧巴西和从革命中诞生的巴西之间来了一个一刀两断的分割。新国家定会实现它的革命目标，通过寻根、民族一体化和尚未被党派斗争撕裂的秩序，努力促使国家进入现代时期。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政府公务和顾主主义政治结合在一起。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不存在公开竞争，专业干部限于少数精英担任。新国家设法改良政府，使之变成一个现代化的代理人。设法培养一批脱离党派政治，而又按制度原则办事的官僚精英。这些仅致力于民族利益的精英应该采取并按效益、经济和理性的准则办事。

负责政府改革的主要机构是1938年成立的隶属于总统府的公

务员管理局。从人员录用观点讲，求职者要有一定的职业修炼、才干是录用的基本素质。这个准则为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创造了机会，但是，在使用时还有许多限制。立法和现实担负着严格执行按成绩录取和晋升的正式规定，限制官僚阶层大批形成的可能性。在官僚机关的高层，大部分所谓亲信职务的任命继续是根据共和国总统及其部长们的偏爱进行的，在这些岗位上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被撤换。这种选择取决于最起码的本领，但是，选择不一定是在职业公务员中进行。

全面审视 1930～1945 年这段时期，外交政策可能是最容易被理解的。路线调整和再调整是巴西与各大国之间地位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新国家仅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因素之一。

世界经济危机加重了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罗斯福总统反危机的措施开始产生效果的时候。同时，从 1933 年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另一个竞争者——纳粹德国。在这种情况面前，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指导方针；积极开展同向它提供更优越条件的国家的谈判，并设法从大国之间的对立中捞取好处。

1934～1940 年期间，以德国在巴西外贸中的份额日益增长为特点。德国是巴西棉花最主要的买主和咖啡的第二大市场。尤其在进口方面，德国的影响在日益增长。1929 年，巴西进口的近 13%来自德国，30%来自美国；1938 年，在巴西的进口方面，德国人以 25%略胜美国人的 24%一筹。在 1938 年当年，巴西向美国的出口占 30%，而向德国的出口占 19%。同德国的贸易不但对出口集团具有吸引力，而且对主张需要使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人也有吸引力。德国人一直在以提供铁路材料和资本货物等向打破大国外贸传统路线的可能性招手。

另一方面，某些反面因素压在同德国的贸易上：德国一直坚持所谓“补偿马克”的非兑换货币贸易，设法把同巴西的贸易变成推开其他竞争者的双边协议。德国代表设法以强加定额、强加

产品价格和他们的补偿马克币值来控制整个贸易。

在德国的进逼面前，美国采取了压力和谨慎相结合的政策。美国经济集团——投资者、银行家和进口商——希望对巴西采取报复行动。罗斯福却偏向避开采取可能导致巴西同德国联盟或走上激进民族主义道路的极端措施。

在政府圈子和经济领域里，甚至存在着要求做出与美国或与德国达成最大谅解的明确选择。自 1934 年以来一直任驻华盛顿大使的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驻巴西代表，瓦莱丁·博萨斯站在美国一边；军方高层成员，诸如杜特拉和戈伊斯·蒙特罗则表示同情德国。

在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热烈欢迎的 1937 年政变后，巴西的实用主义路线没有变。军方施压，要求同德国达成谅解，他们已经取得了一项克虏伯公司应于 1938 年 3 月提供大炮的大合同。但是，不久前，瓦加斯表示不准备在外交政策上进行实质性变动，并任命了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为外交部长。

反常的是，尽管存在着某种可能有利于同德国人进一步接近的思想亲和性，但是巴西和德国的关系却在 1938 年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这一年，瓦加斯政权已经稳定，并在政治舞台上清除了惟一一支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力量——一体化主义。在与国内的法西斯主义拉开距离的同时，新国家向盘踞在巴西南部的纳粹团体发起进攻。德国的一个代理人，南里约格朗德的纳粹党领袖被捕。德国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迫使其离开巴西。后来，摩擦消除了，但是伤痕却留了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比新国家确定巴西对外政策的方向更重要。英国的封锁使得德国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后退，然而英国却没有办法利用这个真空。这时，美国的存在以更大的力量浮现了出来。在战争迫近前，罗斯福就相信它将在世界范围里展开，并把美国卷进去。这个前景使美国的战略家们扩大了他们认为属于国家安全圈的范围，包括南美洲，特别是对大西洋影响很大的巴

西东北部地区。除了其他举动外，美国人也发起了一个政治—思想的攻势，倡议召开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的泛美大会：不论每个国家的现行政治制度如何，都要在美国领导下保卫美洲。在经济方面，制订了一项相当保守的政策。他们最大的兴趣对准了诸如橡胶、铁矿砂和锰一类的战略物资，并竭力取得这些物资买卖的控制权。

巴西对所有这些举动的回答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北方巨人”，努力从新形势中渔利。美国在 1941 年 12 月参战，迫使巴西明确立场。瓦加斯开始明确地讲起泛美主义语言，同时，坚持把重新装备巴西的经济和更新军事装备作为支持美国的条件。

1941 年底，不等巴西政府的同意，美国军队就开进了东北部地区。1942 年上半年仍然是以暧昧的气氛为特征，尽管做出了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1 月，戈伊斯·蒙特罗和杜特拉退隐，巴西同轴心国断绝了外交关系；5 月，巴西和美国签订了一项秘密性的政治—军事协定。

但是，美国人迟迟没有交付军事装备的订货，因为他们认为巴西大部分军官是轴心国的同情者。在 1942 年 8 月 5～17 日之间，5 艘巴西货轮被德国的潜艇击沉时，巴西的模糊立场终于被结束了。在人民盛大游行示威的压力下，巴西终于在当月参战。

巴西站到反法西斯战线的一边，随着一支征伐军——巴西征讨军——于 1944 年 6 月 30 日派往欧洲终于变成了现实。巴西参战不是联盟军强加的行动，相反，它代表了巴西政府必须冲破美国人的限制和英国人公开反对的一种决心。这两个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巴西军队能否成功地为战争尽力是个问题。2 万多名巴西军人在意大利一直战斗到 1945 年 5 月 2 日，战争在二战结束的前几天结束。在战斗中有 454 人阵亡。自 1945 年 5 月，巴西军队中的步兵开始回国，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为加速国家民主化向政府施加压力做出了贡献。

四　新国家的灭亡

新国家是作为一个延续了许多年的专制主义和现代化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但是，它的寿命终究是很短的，仅仅存在了不到8年的时间。这个制度的问题与其说是由国内政治条件的处境造成的，不如说是由巴西在国际关系的处境造成的。这种境况推动了反对派的发展，并为政府内部的分歧开辟了道路。

参战后，反对派人物开始利用早就存在于支持巴西民主化和瓦加斯独裁之间的矛盾。在政府范围内，起码有一个人坦率地表示了赞成民主开放，这就是外交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

更严重的事实是，新国家的设计者和军事支柱之一渐渐离开了它。戈伊斯·蒙特罗将军相信这种制度在新时代很难存在下去，于是放弃了他担任的巴西驻蒙得维的亚的美洲政治保卫和紧急委员会大使的职务，回到巴西。1945年8月，戈伊斯又人主战争部，与其说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不如说是他从瓦加斯身边走开。

1943年左右，大学生开始动员起来反对独裁统治，组织起了全国大学生联盟（UNE）及其各个州分会。在圣保罗，法学院的学生表现得最突出。1943年12月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臂挽着臂，每个人都用手帕堵着嘴，象征着取消言论自由，最后被警察粗暴地驱散，示威者中有2人死亡，20多人受伤，引发了一场愤怒的浪潮。

政府设法应对各种压力，并以战争为由为独裁统治辩护，同时答应恢复和平后即举行大选。在野党自由派的一招棋迫使政府于1944年末发生了态度上的变化：空军准将埃杜阿尔多·戈麦斯被推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准将不算个什么大人物。这位现役军人的名字是和尉官运动及科帕卡巴纳堡垒起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新闻界嘲弄愈演愈烈的新闻检查，刊登了许多主张举行大

选的报道和采访。

鉴于这种情况，1945 年 2 月，瓦加斯颁布 1937 年宪法补充法，规定 90 天后确定进行大选的期限。90 天后正好是规范选举和选举登记事宜的新选举法颁布的日子。确定 1945 年 12 月 2 日为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日子，1946 年 5 月 6 日为各州普选的日子。

在这种形势下，热图里奥宣布将不作为参选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在政府内选出当时还担任战争部部长的杜特拉将军做总统候选人，来对抗埃杜阿尔多·戈麦斯。

在决定性的 1945 年，还出现了三个存在于 1945～1964 年之间的主要政党。新国家的敌手——原自由派反对党，继承了各州民主党的传统，在 1945 年 4 月，组成了全国民主联盟（UDN）。起初，这个联盟还团结了一小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和少数共产党人。

从国家机器开始，由官僚、热图里奥本人和各州督察员倡议，在 1945 年 6 月组成了社会民主党（PSD）。最后，在同年 9 月，也是在热图里奥、劳动部部长和工会官僚倡议下，成立了巴西工党（PTB）。他们的目的是在热图里奥主义旗帜下，把广大城市劳动者团结起来。全国民主联盟在候选人埃杜阿尔多·戈麦斯周围组织了起来，社会民主党在候选人杜特拉周围形成。巴西工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既没有大人物，表面上也没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由一个专制主义政府首脑指引的分步骤向民主过渡的思想使反对派不悦。热图里奥采取了一个在保守的自由派反对党和高级军官看来十分惊异的举动。当发现政府失去了军队高层的支持时，他竭力通过劳动部、工会“缓冲垫”和共产党人的活动，在城市人民群众中寻求广泛支持。

巴西共产党对瓦加斯政府的支持主要用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解释。莫斯科制订的指导方针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支持反法西斯阵线成员国的政府，不管这些政府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巴西不但参加了反对轴心国的战争，而且还于 1945 年 4 月，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巴西同苏联建立外交关

系后不久，由于发布大赦令出狱的普莱斯特斯确认了共产党已经决定置于政府的影响之下。需要以“历史需要”的名义，把手伸向昨天的敌人。

被新国家镇压的工人罢工在1945年重新出现。由于民主自由的逐渐恢复和在二战最后几年里通货膨胀恶化的压力下，劳动者又被动员了起来。在这一年里，共产党努力阻止这种运动。他们认为，当时不是罢工的时候，而是“勒紧腰带”不给政府制造麻烦的时候。

1945年中期，在共产党的支持下，一项与热图里奥有联系的劳动界发动的行动改变了总统换届的方向。这就是“需要主义”运动。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它的目标可总结为一句口号“我们需要热图里奥”。“需要主义”分子走上街头，主张成立一个由瓦加斯执政的国家制宪会议。只有在这之后，才可举行热图里奥也应该参加竞选的总统直接选举。

这个运动在自由派反对党和军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情况好像很清楚，瓦加斯企图在竞选过程中，清除上述两个已经推出的候选人，自己作为独裁者或当选总统继续执政。当美国大使小阿道夫·伯利在1945年9月29日表示他相信12月2日将举行大选时，竞选争夺的激动气氛提高了。“需要主义者”揭露美国干涉巴西内政，把按预定形式举行的选举描写成“反动派操纵”。

另一方面，邻国阿根廷发生的事件在巴西产生了反响。自1943年6月革命后，胡安·多明戈·庇隆上校的影响在那个国家不断扩大。庇隆主义和热图里奥主义在许多问题上都很相近。二者都希望在经济领域里促进由国家行为支持的国家资本主义；二者都希望在政治领域里减少阶级之间的对立，号召人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国家倡导的合作。这样，国家就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愿望，而不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特殊利益。

这样，就形成了根据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根基和不同色彩的拉丁美洲民众主义。在一个阶级结构比巴西更严密的国家，庇

隆主义促进了工会组织更加深入的发展；同时，设法切断农村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巴西，象征性的号召和向人民群众进行经济让步是热图里奥主义的主旋律，起码是第一届瓦加斯政府的主旋律。给予工业资产阶级的照顾在与农村统治阶级的冲突中也没有引起什么后果。

1945年，在瓦加斯企图利用一种民众主义政策努力在国家领导层中搞平衡的时候，庇隆已经在尝试步入总统府。在当年10月，一个军事阴谋将他从共和国副总统的位置上打入监牢。在军队的支持下，一个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使他在8天之内被释放。这样，便为庇隆派在1946年2月大选中胜出开辟了道路。

这种情况使热图里奥的反对派在美国的赞许下加速了使其倒台的进程。无论是当时的热图里奥还是庇隆，都不足以使美国信任，尽管美国人仍然保持着和庇隆的联系。

但是，热图里奥倒台不是外部阴谋所致，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游戏的结果，也不缺乏激起事端的因素。1945年10月25日，这位政府首脑采取了一个错误的行动，撤销了若昂·阿尔贝托的联邦区警察局局长这一战略职务，再加上取代者是总统的弟弟——残暴的本加明·瓦加斯。从那时起，主持战争部的戈伊斯将军就开始调动联邦区部队。杜特拉妄图从中搞妥协，请求瓦加斯撤销对他弟弟的任命。请求被拒绝。

最后，热图里奥·瓦加斯对事件进行了冷处理。他被迫辞职，退出政权，他公开发表声明，同意退出政府，但是没有被驱逐出境，可以退隐于故乡城市圣博尔雅。

这样，两个政权之间的过渡靠了军事行动。还有一个把热图里奥推上政权的1930年革命的重要人物——戈伊斯·蒙特罗将军——15年后又在废黜他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样和那样的情况使向民主制度的过渡代表的不是一种与从前的决裂，而是一种在许多连续性中产生的方向变化。

五 社会经济状况

1920～1940年之间，巴西人口从3060万发展到4110万。在上述两个十年里，男女人口几乎各半。这是一个年轻的民族，20岁以下的人不但在1920年，而且在1940年均占总人口的54%左右。

1940年，各个地区的情况是，北方仅占全国人口的3.5%，东北部集中了32.1%，东部（米纳斯和圣埃斯皮里图）占18.1%，中南部集中了26.2%，南部（圣卡塔雷纳和南里约格朗德）占10.9%。

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国际移民的意义减小了，而国内移民的数量却不断增长。1929年之后的年代里发生的一些事件对于出现这种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经济危机和规定了移民进入限额的1934年宪法对除上面提到的日本人之外的外来移民潮的减少产生了影响。

国内人口的流动，对于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意义。作为橡胶危机的结果，北部地区提供了国内移民率很高的负增长率（近14%）；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东北部移民返回家园的运动。相反，南部和中南部作为一个整体，移民增长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11.7%）。我们来回忆一下，直到1940年，流向南部的国内移民主要是来自米纳斯吉拉斯而不是东北部的这一情况是很有意义的。当时，吸引力最大的中心是联邦区。国内移民流向圣保罗只有从1933年开始才变得突出起来，这是因为工业的再次跃进和强行限制外国移民进入对此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济历史学家一般把1930年作为国内工业产品取代进口产品这一转变过程开始的标志。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因为这个过程在前几十年就已经开始了。毫无疑问，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而

产生的进口困难和基础工业及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的剩余能力的存在促进了这个取代过程的发展。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产值，可以发现工业的明显进步。1920 年，农业占总产值的 79%，工业占 21%。1940 年，由于工业年增长率明显高于农业的结果，二者的比例分别为 57% 和 43%。

1929～1930 年开始的一段时期，无论从农业生产的观点还是从工业生产的观点看，都是非常突出的。在那些年代里，出现了咖啡危机，它在出口农业中的作用开始下降。而既用于出口，也用于国内纺织工业的棉花生产却在增加。1929～1940 年之间，巴西的棉花种植面积，在全世界从占 2% 增加到 8.7%。在 1925～1929 年之间，咖啡占巴西出口总值的 71.7%，棉花仅占 2.1%。在 1935～1939 年间，咖啡出口值下降到 41.7%，而棉花增加到 18.6%。

除工业生产外，我们应该强调一下供应国内市场的农业生产的增长。在 1939～1943 年之间，大米、豆类、肉类、食糖、木薯、玉米和小麦占农业生产总值的 48.3%。但在 1925～1929 年之间却从未超过该总产值的 36%。

工业的年增长率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 1930 年后良好的工业化进程，它表明了 1933～1939 年之间的巨大进步和 1939～1945 年之间的迅猛发展。这意味着工业从 1929 年开始的萧条岁月中很快地恢复了。工业设备的陈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国际贸易方面引起的混乱竞相造成 1939～1943 年之间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但是，从质量观点看，对于支撑工业化进程及其在战后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也许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为消除或削弱严重的窒息起到了作用。

各类工业的重要性在 1919～1939 年之间逐渐发生着变化。基础工业——冶金、机械、电力器材和交通运输器材——在工业总附加值所占的分量，实际上增加了一倍。传统工业——主要是纺

织、服装、制鞋、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具——尽管仍然构成工业附加值的60%，但是所占的比重在相对减少，因为1919年它曾占这种附加值的72%。化学和制药工业有了特大的增长，在1919～1939年之间，它的参与量增加了3倍。

在教育方面，1920～1940年之间，文盲指数有所下降。但是，它仍然是很高的。人们注意到15岁或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指数从1920年的69.9%下降到1940年的56.2%。这个数字说明，发展学校制度的努力在1920年入学率很低的基础上产生了效用。据统计，当时上小学和中学的5～19岁的少年儿童在校率不到9%。1940年，这个指数达到了21%以上。至于高等教育，比1929～1939年之间的学生总数增加了60%，从13200人增加到21200人。

第五章
民主经历（1945～1964）

一　选举和新宪法

热图里奥·瓦加斯倒台后，军人和自由派反对党同意提出两位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人选，并决定作为过渡，把政府交给联邦最高法院院长。保持定于1945年12月2日举行大选的时间表不变。

从出席竞选集会的人数看，候选人埃杜阿尔多·戈麦斯准将的支持率有明显的上升，而杜特拉则原地踏步。准将的竞选活动，在民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吸引了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杜特拉则没有激起任何热情，甚至曾想换另一位有较大竞选号召力的候选人。几乎到选举前夕，热图里奥终于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候选人杜特拉。尽管如此，声明还强调补充说，如果候选人不遵守其竞选诺言的话，他将站在人民一边反对总统。

1945年的大选在人民中间唤起了极大的兴趣。在多年的独裁之后，选举法庭还没有调整接收和计算选票的程序。巴西人耐心地排起投票的长队。在1930年最后一次的共和国总统直选中，有190万选民投票，占总人口的5.7%；在1945年12月的选举中，620万人参加了投票，占了总人口的13.4%。

在一个不存在选举调查的时代，反对派对杜特拉的明显胜利

深感惊讶。除掉无效票和白票，把投给候选人的票作为计算基础，将军对准将以55%对35%的选票胜出。选举结果表现出了社会民主党组建的从各州的联邦督察员开始的选举机器和热图里奥在劳动人民中的威望的强大力量，也表现了广大群众对和富人的利益连在一起的反热图里奥主义的厌弃。

杜特拉的胜利可以从这样一些因素的结合来解释。它不是落后对现代，或者农村对城市的胜利。杜特拉在三个大州——米纳斯吉拉斯、南里约格朗德和圣保罗——取得巨大的胜利。准将在东北部取得了他最好的成绩，在那里仅以微弱差距失利。

当时处于合法地位的巴西共产党的选票数很能说明问题。共产党推出了一个不太知名的候选人——耶多·福伊扎工程师，取得了相当于总选票10%的选票，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的选民中。共产党在国内得益于路易斯·卡洛斯·普莱斯特斯的威信，外部得益于苏联的威望。

热图里奥是1945年选举最大的赢家之一，这不仅仅表现在他对杜特拉胜利所起的作用上。他还得益于选举法，被几个州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他选择了作南里约格朗德的参议员。

立法选举选出了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合成了制宪会议，直到宪法通过。然后，又各自分立，起原来国会的作用。这次选举清楚地表明了，作为新国家为支持独裁的目的而组建的政治机器，在民主制度下争夺选票也可以是很有效的。对于大部分的选民来说，顾主主义的个人关系比在新国家的拥护者和自由派之间做选择更重要。选择在选民的日常生活中没有意义，选择对于教育水平很低的人们来说实在太抽象了。社会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保住了绝大多数的席位，其次是全国民主联盟。

1946年1月底，杜特拉宣誓就职，制宪会议的各项工作开始。9月，颁布了脱离1937年宪法并选择了自由民主模式的巴西新宪法。但是，这在一些方面为社团模式的继续开辟了道路。

巴西被定为采用总统制政府体制的联邦共和国。政权由不记

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 5 年的共和国总统执行。

另一方面，废除了 1934 年宪法中规定的众议院中带有法西斯主义影响的合作主义标志的职业代表。

在关于公民权的一章里，投票的权利和义务授予 18 岁以上、非文盲的男女巴西公民。这样，在政治权利方面实现了男女平等。1934 年宪法仅规定了有工资的公职妇女的选举义务。

关于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一章，在经济部分规定了利用矿产资源和电力资源的标准。在社会部分，罗列了立法应该保证的最起码的权益，和 1934 年宪法规定的很相似。

关于家庭的一章在主张和反对离婚者之间引起了漫长而热烈的辩论。最后，天主教会的压力和极端保守派的意见占了上风，把家庭定义为是通过结婚缔造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在关于劳动组织部分中，立宪者暴露了他们对新国家的行业合作主义制度的依恋。没有废弃“缓冲垫”人物们的主要支柱——工会税。罢工的权利原则上被承认，但是，一般的立法将之变成不起作用的条款。立法规定了什么是“主要活动”，根据这种规定，几乎所有的工业分支都不允许举行罢工。根据劳动法教授塞扎雷诺·儒尼奥尔的观察，如果服从这一法令，那只有香水厂的罢工才是合法的。

* * * * * *

在杜特拉政府时期开始对共产党进行镇压。这种镇压是由保守思想的压力、共产党本身的发展和列强之间国际关系的变化造成的。共产党在 1946 年成长为全国第四大政党，据计算，1946 年该党拥有党员 18 万～20 万人。

另一方面，纳粹主义战胜者们的联欢持续了没有多久，中国和希腊变成国内战争的战场。美国的霸权和欧洲平衡开始受到直接或间接地占领了东欧国家的苏联的威胁。这样，对于斯大林的

意图，悲观主义的怀疑得到了确认。总之，世界和平的希望落在了冷战之上。

1947 年 5 月，凭着两个面目不清的议员的揭发，联邦最高法院决定撤销共产党的注册。这个充满争议的决定仅以一票之差被通过。在巴西共产党被关闭的同一天，劳动部下令对 14 个工会进行查究，并封闭了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总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陆续进行了新的镇压行动，在杜特拉政府的最后一年，甚至有 200 多个工会被置于监控之下。尽管共产党人对许多工会具有影响是事实，但是，很明显，在反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政府竭力摧毁那些同自己的指导方针相反的工人组织的脊梁。

1948 年 1 月完成了使共产党转入地下的措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决定撤销按照共产党的推荐报告选出的众议员、参议员和市议员的资格。

* * * * * *

从经济政策观点看，杜特拉政府开始实行自由主义模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受到谴责，新国家建立的控制系统被逐步废除。相信国家的发展和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引起的通货膨胀的消除要依靠大市场自由——主要是商品自由进口解决。巴西在财政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因为，战争年代的出口使国家在国外已经有了外汇积累。尽管如此，自由政策最后还是失败了。由于巴西货币升值掀起的各种商品进口的浪潮不但没有带来积极的效果，实际上造成了外汇的枯竭。

1947 年 6 月，作为对这种情况的回答，政府改变了方针，建立了进口准许制度。实际上，准进制度的准则有利于诸如设备、机械、燃料等主要项目的进口，并限制了消费品的进口。应该注意到，巴西货币与美元的比率一直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不鼓励出口，而鼓励为国内市场生产。

新经济政策的出现，首先是作为对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问题的回答，但是，最终是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杜特拉政府在它的最后几年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1947年开始，经济的增长通过每年进行的国民生产总值调查更有效地计算出来。以1947年为基础，在1948～1950年之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

作为抵偿，对工会运动的镇压有利于强行缩减实际工资。据估算，在1949～1951年之间，生活费用在圣保罗提高15%，在里约热内卢提高了23%，与此同时，平均工资在圣保罗仅增长了10.5%，在里约热内卢仅增长了12%。

* * * * * *

继任总统的图谋在杜特拉的任期还没有过半的时候就开始了。热图里奥又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一极。实际上一直在参议院缺席的他，在各州进行了一些战略性旅行，并在圣博尔雅接受了政治家的吻手礼。他的战略是清楚的：保住社会民主党在农村构筑的政治机器的首领们对他的忠诚，同时建立一个支持他的牢固基础。

在圣保罗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在1947年的州选举中，共产党人支持的阿德马尔·德巴罗斯当选为州长。阿德马尔在圣保罗共和党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新国家时期，曾任驻圣保罗州督察员，善于适应新的时代，其政治成就在于他的吸引广大选民选票的能力。

阿德马尔组建了一个政党机器——进步社会党（PSP），这个党之所以能够存在，都因为他的人格魅力。他没有能修正、制订出一个思想深刻的纲领，却作为一个所谓管理能力强而政治道德差的形象很快传播开来。这位被坚持公共事务道德内容的全国民主联盟党人所仇视的政治家吸引了人民阶层和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圣保罗内地的中、小资产阶级各方面的成员。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阿德马尔已经没有争夺共和国总统的

力量，但是，却能对某个总统候选人提供高价值的支持。当他宣布支持正在运作中的总统候选人热图里奥·瓦加斯时，便向他提供了圣保罗这个重要的选举基础，从而大大壮大了开始向联邦区发展的热图里奥派的力量。

杜特拉拒绝支持不继续他的政府路线的瓦加斯做候选人。操纵社会民主党推出了一位几乎不知名的米纳斯政治家——克雷斯蒂亚诺·马沙多律师作候选人。事实上，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主要的领导人都不支持这位候选人。

全国民主联盟再次提出已经没有1945年的那种号召力的埃杜阿尔多·戈麦斯准将作候选人。他还获得了原一体化主义者的支持，麻木不仁地主张撤销最低工资法。

热图里奥把他的竞选运动建立在捍卫工业化和进一步推广劳动立法的基础上。他根据所到州的情况，发表不同形式的演说。在共产党影响大的里约热内卢州，他甚至说，如果他当选，人民将同他一起登上卡黛黛宫的台阶，共同坐江山。除了拥有巴西工党和进步社会党的支持，还取得了部分社会民主党、甚至全国民主联盟部分成员的公开支持。

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和巴西工党之间的分裂状态无法使瓦加斯达到杜特拉在1945年的选举中所达到的选票指数。即使这样，在1950年10月3日举行的选举中，瓦加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得到选票总数的48.7%，与此同时，准将的选票没有超过29.7%，克雷斯蒂亚诺·马沙多为21.5%。

二 热图里奥重新上台

1951年1月31日，热图里奥·瓦加斯宣誓就职。全国民主联盟未能成功地阻止他的当选，说什么只有获得绝大多数选票的候选人才配被认为是胜利者。这种要求在当时的立法中是不存在的。

这样，自由派把他们的矛盾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主张民主法制原则的人，在最重要的竞选中，没有能够吸引广大群众的选票。因此，他们以可疑的根据，不承认选举结果，并越来越求助于武装力量的干预。

热图里奥开始上台执政，企图在民主制度的条件下，扮演一个他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面前充当裁判的角色。他企图吸引全国民主联盟，并挑选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占优势的相当保守的内阁。但是，任命埃斯蒂拉克·赖阿尔将军——和军队中的民族主义派有联系的原中尉、军事俱乐部主席担任战争部部长这个战略职务。

在武装力量范围内，思想分裂在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称为"投降派"的对手之间具体化了。这种分裂既包括国内经济政策的内容，也包括巴西在国际关系范围里的立场。民族主义者主张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发展，强调需要创立一个独立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这意味着国家作为经济调整者和战略领域：石油、钢铁、交通运输、通讯的投资者的重要作用。民族主义者并不拒绝外国资本，但是，以十分保留的眼光看待它，不论是由于经济原因，还是因为相信外国资本在战略领域里的投资会使国家主权处于危险境地。

民族主义者的敌对者则主张国家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也不要给予工业化那么多特权，他们主张，国家的进步要依靠向外国资本有控制的开放。还主张采取控制货币发行和政府开资的手段，坚决反对通货膨胀。

在国际关系方面，民族主义者主张对美国采取拉开距离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它的对手们则主张，在一个由于朝鲜战争开始引起的紧张局势恶化的时代，巴西需要在世界反共产主义战斗中，无条件地和美国人站在一起。一个明确的信号是，赞成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倾向在军队的军官中占了多数，在 1952 年 5 月举行的军事俱乐部领导委员会的选举中，民族主义的敌对派获得了胜利。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政府采取了许多旨在鼓励在强调工业化上面的经济发展措施，包括对运输和能源系统进行国家投资的措施，取得了5亿美元的国外贷款。并设法扩大对东北部的电力供应，审议了国家煤矿的问题，还进行了货轮和港口系统的部分设备更新。1952年，建立了为加速工业多样化进程意图直接指导下的国家经济发展银行。这个银行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瓦加斯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奥拉西奥·拉费尔。

在设法活跃经济的同时，政府被迫面对一个产生了强烈社会反响的问题——通货膨胀蔓延。在1947年，这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的强度有所减缓，但是很快又开始了迅猛的发展。从1947年的2.7%上升到1948～1953年之间的年平均13.8%，就在1953年，这个平均率晃动在20.8%左右。

* * * * *

热图里奥被迫在纷繁的相互对立的派别之间周旋。一方面，他不能不关注受高昂的生活费用打击的劳动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又需要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来控制通货膨胀。在1953年6～7月间，他改组了内阁。任命青年政治家、南里约格朗德牧场庄园主、别名壤戈的若昂·古拉特为劳动部长。壤戈开始的政治升迁得益于他在圣博尔雅市的家庭与热图里奥家庭之间的联系。他和巴西工党工会界有关系，他作为一个能够控制工会中共产主义影响日益增长的人物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尽管壤戈能起这样的作用，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在中产阶级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民主联盟和反热图里奥派军人所仇恨的人物。在这些人当中，他被视为“工会主义共和国”的捍卫者和庇隆主义在巴西的化身。

在这期间，瓦加斯任命他的老合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初担任的职务中已经表现杰出的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为财政部长。新部长的被称为阿拉尼亚计划的纲领以控制信贷扩张和外贸汇兑为

目的。后者是 1953 年 1 月以来采取措施的继续。这些措施规定，根据要进出口的商品采取了浮动汇率制。最大的汇率浮动是为恢复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和有利于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商品的进口。

1953 年 10 月，采取了被称为外汇留成的制度。这个措施把咖啡出口商接受的美元兑换为克鲁塞罗，规定一个最低兑换值。由于外汇留成制度，政府可以把咖啡出口的收入转到其他经济方面，特别是工业方面去。这种做法引起了咖啡界的反对，他们企图举行带有政治内容的抗议大进军，被军方制止。这在儒塞里诺·古比契克政府时期，被称为生产大进军。但是说瓦加斯政府纯粹是抛弃咖啡种植业，那是夸张。尽管没能成功，但是他设法实行了一种对外高价支撑政策，在美国引起了愤怒。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甚至调查过巴西实行的“过高价格”的情况。

自 1953 年开始，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开始改变了方向。杜鲁门总统（1945～1952）迫使这些国家，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确定它们对共产主义的关系。但是，保持了援助已纳入美国轨道的国家的政策。1953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将军就任总统，分别任命乔治·汉弗莱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财政部长和国务卿。除了把反共产主义变成一场真正的圣战，美国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问题采取强硬态度。主导路线变为放弃国家援助，偏重私人投资。巴西为基本建设工程和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取得政府贷款的可能性明显地缩小了。

这一指导方针的变化给被称之为拉费尔计划的国家经济设备更新计划的实施增加了困难。这个计划的大部分后来成为儒塞里诺政府的目标计划组成部分。

* * * * * *

自他的政府开始后，在试图把所有的保守力量都团结在自己

的周围时，瓦加斯没有忘记他的主要支持基础之一——城市劳动者。在1951年5月1日的集会上，他朝同工人阶级建立更牢固的联系的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次已不限于一般性的话了，而是号召把劳动者组织在工会里，帮助他反对“投机分子和惟利是图分子”。废除了时行的为参加工会生活必须持有所谓思想证明书的要求。这样，有利于共产党人和杜特拉政府时期被开除的人回工会。

但是，政府没有能够完全控制劳动界。工会运动的自由化和生活费用昂贵带来的许多问题引起了1953年一系列的罢工。其中，最突出的有3月的圣保罗大罢工和6月的里约热内卢、桑托斯和贝伦海员大罢工。两次大罢工的意义很不相同。

从纺织工业开始，由于木工、家具木工、制鞋工人、印刷工人和玻璃工人的加入，圣保罗大罢工的人数甚至高达30万人。罢工以增加60%的工资为主要要求，但是，也具有反对限制罢工权利的立法内容。罢工延续了24天，中间还发生了与警察的冲突。最后，以达成由各方面分别解决的协议而告结束。

这次运动代表了热图里奥主义在圣保罗的失败。总统本人保住了他的部分威信，但是，工党和工会“缓冲垫”们失去了运动的领导权。坚决反对热图里奥的共产党人，指责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罢工中，他们扮演了组织罢工的主要角色。

参加海员大罢工的工人有近10万人。参加罢工的工会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被控同劳动部联在一起的海员联合会领导辞职。最后一项要求，在撤换该部部长的问题上，迎合了热图里奥的目的。

事实上，若昂·古拉特是由于正在进行的罢工才担任了部长的，起着一个卓有成效的调停者的作用。由于罢工是作为被置于国家经济调整之下的公共利益的一个方面进行的，因而罢工者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迫使海员联合会领导辞职，为另一届更接近劳动者的联合会领导和他自己上台开辟了道路。

* * * * * *

就在发生了30万工人大罢工的那个1953年3月，在圣保罗发生了一件当时认为十分重要，但其真正价值只有在几年的过程中才可显现出来的政治事件。基督教民主党和小小的巴西社会党推荐的一位市议员和原中学教师，打败了被认为力量可能更大的其他政党的候选人，当选为圣保罗市市长。让尼奥·夸德罗斯把他的成功建立在与反腐败斗争旗帜连在一起的民众主义运动——分文对百万运动——之上。他察觉到，如果不和全国民主联盟派精英联在一起，并通过有效的形象表现出来，这后一个主题将具有巨大的政治赢利性。扫帚是这种形象最好的象征。打败党派机器进行革新的愿望和对一个上天安排的反腐败人物的神奇力量的信仰把各社会阶层——从劳动大众到中产阶级——团结在了让尼奥这个名字的周围。

与此同时，在联邦舞台上，壤戈成为反热图里奥主义的军民集中攻击的目标。一方面，他的名字和建立一个工会主义共和国的莫须有的计划连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和在最低工资水平基础上工资可能增加100%连在一起。在政府的非军人敌人中，有一些小党和全国民主联盟的大部分成员以及大部分新闻媒体。由于他的激进主义思想和口才，原共产党人卡洛斯·拉塞尔达成为突出的人物。随着岁月的推移，拉塞尔达不但同他原来的伙伴决裂，而且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死对头。民众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他最喜欢攻击的对象。从他的报纸《新闻论坛》开始，发起了一个猛烈的反热图里奥主义的运动，鼓吹要总统辞职。这个运动伴随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进行，在总统辞职期间，所有民主制度都要进行改革，以防止拉塞尔达认为的民众主义政治家败坏了这些制度的情况。

在与政府作对的军人中，有反共军官、民众主义的敌人、一

些和全国民主联盟观点一致的人和另一些一般政治家的敌对者。他们中比较知名的人有戈德伊罗·德法雷亚斯将军、儒阿雷斯·塔沃拉将军和埃杜阿尔多·戈麦斯准将。青年军官们的力量很快便显露了出来。军界动荡的程度，从1954年2月由42位上校、39位中校签名的抗议军队的物质和道德水平变坏的所谓校官申诉书的抛出可以衡量出来。这份宣言也批评把最低工资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与国家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合。

三 热图里奥倒台

1954年2月，热图里奥改组内阁。若昂·古拉特被一个没有任何影响的人所取代，但在此之前，他提出了最低工资提高100％的建议，留下了一个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部长形象。希望军队平静的热图里奥任命他的亲信，也是有名的共产主义的死对头，泽诺比奥·达考斯塔将军为战争部长。

尽管如此谨慎行事，总统却越来越喜欢选择发表一个演说和采取一些同保守社会阶层的利益相冲突的措施。他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条民族主义的路线，使外国资本为国际收支负责。在加拿大和美国电力生产公司对是否进行新的投资犹豫不决面前，他以创造一个这个领域里的国家公司——巴西电力公司的法案（1954年4月）做出了回答。

1954年4月，原外交部长，若昂·内维斯·达奉图拉举行记者招待会，抛出了反对派最坚决的批评。若昂·内维斯指责总统和若昂·古拉特同阿根廷和智利签订了一项旨在阻止美国在本大陆南锥体存在的秘密协定。这个尤其是同庇隆的阿根廷的莫须有的联盟，作为建立“工会主义共和国”的又一个步骤引起了反响。在劳动关系方面，瓦加斯在5月1日宣布最低工资增加100％引起了抗议的风暴。

尽管有压力和当时已经失去了支持其政府的牢固基础，热图里奥仍然在政权范围里做着平衡。反对派还没有利用武装力量做出超越合法界限和废黜总统的重创性事件。然而，这个事件却由总统亲信圈子里的人促成了。在这些人中间形成了这样一种确信：为了保证热图里奥继续执掌政权，必须从政治舞台上铲除拉塞尔达。后来澄清的事实是，热图里奥身边的一些人建议卡黛黛宫总统卫队长——格雷戈雷奥·福图纳托"给拉塞尔达点颜色看看"。30多年来一直是瓦加斯忠实的勤务员的格雷戈雷奥策划了对这个反对派最显赫的人物的暗杀。

如果说这个罪恶的想法是个灾难的话，更灾难的是执行了这个想法。1954年8月5日凌晨，当拉塞尔达接近他在里约热内卢居住的楼房门口时，一个枪手向他开枪以期将其置之于死地。在杀死了拉塞尔达的护送人员——空军少校鲁宾斯·瓦兹——的同时，拉塞尔达仅受了些轻伤。这样，却给瓦加斯引来一桩引起普遍愤怒的罪责，一群重头人物组成的敌人向他扑来，同时，空军进入了造反状态。警察对这桩罪行的调查和空军自己进行的调查，开始暴露了瓦加斯政府的许多阴暗面，尽管总统本人没有牵扯到他自己所谓的"烂泥海"中去。

要求总统辞职的运动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瓦加斯在奋力抵制，坚持说他代表宪法法制原则的事实。8月23日，政府失去武装力量支持的事实已经变得很明显。在这一天，发出了由27位陆军将领签名的告民族宣言书，要求总统辞职。在签名者当中不但有热图里奥的著名敌手，而且有远离反对党的将军，比如一年多后成为法制发言人的亨里格·洛特。

当包围圈正在进一步缩小的时候，瓦加斯以一个最后的和悲剧性的行动做出了回答。8月24日上午，在卡黛黛宫寝宫，他向自己的心脏开枪自尽。瓦加斯自杀说明了他个人的绝望，但是，也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这个行为本身包含着能够使广大群众激动的悲剧性炸药包。此外，总统的遗书留下了令人感动的告巴西

人民书，在信中，他说自己是个牺牲品，同时是不得人心的力量的揭露者，指出与反对他的国内敌人相勾结的国际集团应对他们制造的困境负责。

他的这个动作立即产生了后果。各大城市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攻击他们所仇恨的重要目标，诸如反对派的报纸、美国在里约热内卢的外交代表机构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在把准备辞职边缘的整个瓦加斯政府都交给反对派之后，来了一个一夜之间的大转弯。从此以后，他们抛弃了经常造成让大敌受益的激进路线，变得越来越支持民众主义的民族主义纲领。

选择以合法的方式解决军队高层的危机和人民游行示威引起的冲击制止了一次反对国家制度的政变。副总统卡斐·费里奥上台执政。组成了一个全国民主联盟分子占多数的内阁，向国家保证实现定于1955年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

* * * * * *

第一个提出候选人的党是社会民主党。1955年2月，推出儒塞里诺·库比契克为候选人。儒塞里诺是在米纳斯吉拉斯社会民主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曾当选为该州州长。他很好地体现了热图里奥主义流派的思想，有条件取得巴西工党的支持，并真的如愿当选。这样，就又恢复了曾在1945年使杜特拉取得特大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巴西工党的联盟。5月，阿德马尔决定参选，尽管他在1954年10月的圣保罗州选举中败给了让尼奥。

一个月后，全国民主联盟再次推出一位军人候选人，他们不可能再坚持推举已经两次受失败磨损的埃杜阿尔多·戈麦斯准将。这次，另一位尉官主义运动的老成员——儒阿雷兹·塔沃拉将军——被推为这个党的候选人。

在竞选运动中，儒塞里诺坚持沿着利用国家和私人资本发展经济的方向前进，儒阿雷兹则强调政治习俗道德化，同时表示反

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认为这会给国家带来一个失衡的威胁。

在竞选运动中，经常爆出一些肮脏的东西。壤戈和儒塞里诺的对手在 1955 年 9 月的报纸上公布了所谓布兰迪信件，即阿根廷众议员安东尼奥·若祖斯·布兰迪在 1953 年寄给时任劳动部长的若昂·古拉特的一封信。这封信谈到壤戈和庇隆联手在巴西发动一次建立工会主义共和国的武装运动。大选后不久，由军队进行的调查证明，这是一封由阿根廷人炮制，然后卖给壤戈的反对派的假造信。

1955 年 10 月 3 日的大选票箱把胜利献给了儒塞里诺·库比契克，但是赢幅很小。他赢得选票的 36%，与此同时，儒阿雷兹达到了 30%，阿德马尔 26%，原一体化主义派的候选人普里尼奥·萨尔加多赢得 8%。这可能是在不同总统和副总统竞选班子成员的名义下投的票。若昂·古拉特以稍高于儒塞里诺的票数当选为副总统。壤戈的胜利表明了巴西工党的持续发展。

* * * * * *

儒塞里诺和若昂·古拉特胜利后，爆发了一个反就职的运动。1955 年 11 月初，卡斐·费里奥心脏病发作，被迫临时离开政府。他的位置由被指责公开支持军事政变派的众议院院长卡洛斯·鲁兹代替，从而发生了所谓“预防政变”，即保证当选总统就职，而不是预防总统就职的军事干预。

1955 年 11 月 11 日发生的这场行动的主要人物是洛特将军，他为此调动了驻扎在里约热内卢的陆军队伍。这支队伍占领了政府大楼及各家电台和报社。陆军各级领导都站在洛特将军一边，与此同时，海军和空军部长则指责这是“非法的颠覆”行动。陆军包围了海军和空军基地，以阻止武装力量之间的对抗。被赶出总统府的卡洛斯·鲁兹，带领他的各部部长和包括卡洛斯·拉塞尔达在内的其他政治人物逃到塔曼达莱巡洋舰上，妄图组织反抗。

仍然在11月11日，国会很快开会对形势进行了评估。与全国民主联盟的愿望相反，议员们同意禁止卡洛斯·鲁兹就任总统，而由参议院院长，内勒乌·拉莫斯按宪法规定继任共和国总统。10天后，表面康复的卡斐·费里奥企图再次就任共和国总统。被国会阻止，因为国会已经确认内勒乌·拉莫斯为政府首脑。应几位军人部长的要求，国会很快便通过了实行为期30天的戒严，并顺延30天。这一系列的非常措施保证了儒塞里诺和壤戈于1956年1月31日就职。

四　从民族主义到发展主义

与瓦加斯政府时期及总统自杀后的几个月相比，儒塞里诺·库比契克时期可以被认为是个政治稳定的年代。比这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经济增长指数高、并且实现了建造巴西利亚梦想的时代。“5年等于50年”的官方宣传口号在广大人民阶层产生了反响。

在关于保障国内秩序和反对共产主义方面，武装力量的——尤其是陆军——高级将领，大多数都希望保障在一定界限内的民主制度。当热图里奥主义走在进攻性的民族主义领域里，或借助于组织劳动大众时，受到的就是这个大多数的限制。

还有一部分武装力量不跟这个大多数走。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军官——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接近共产党的，这些人选择了与所谓的美帝国主义相对抗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民主纯净者”，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政变才能革新制度，才能阻止工会主义共和国和共产主义的发展。

不是所有的“政变主义者”都是“投降派”。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政变思想和保卫民族利益结合在一起。比如，1956年1月发起暴动的空军军官，他们除了揭发对在指挥岗位上的军人进行的共

产主义渗透外，还揭露政府和国际金融集团达成了莫须有的交出石油和出卖战略矿藏的谅解。

当儒塞里诺·库比契克政府上台执政时，军队高层已经平静下来了。政变党人在迫使瓦加斯辞职和企图阻止儒塞里诺就职方面孤注一掷，但是失败了。儒塞里诺上台执政，强调需要促进“发展和秩序”，这种总目标是和武装力量的目标一致的。总统设法满足军队在薪水和装备方面的特殊要求，也设法尽可能保持有控制的工会运动发展。此外，任命军人担任政府战略职位的倾向在加强。比如，在巴西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委员会，主要的职务都落在了军队成员手里。

* * * * * *

军队支持库比契克政府的主要代表之一，是总统5年任期中一直担任战争部长的洛特将军。在军队中从未担任过大的领导职务的洛特将军集中了两种重要品质：在军队服务中他写下了完美的一页，同时又是个无党派人士。后一个因素非常有利于他弥合武装力量分裂的工作。

在党派政策方面，社会民主党和巴西工党之间的一致保证了国会对政府主要计划的支持。各个政党在10年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形象。这不能不是和个人争夺及对寻取特权的敌对集团安置联在一起的一种形式，但同时，每个政党又代表着人们普遍的愿望和利益。

尽管社会民主党和巴西工党有分歧，但一种共同的特点使它们相互接近：这个共同点就是热图里奥主义。然而，有社会民主党的热图里奥主义和巴西工党的热图里奥主义之分。社会民主党的热图里奥主义团结了部分农村统治阶层、与新国家一起诞生的政府官僚阶层以及由于通货膨胀的刺激发展起来并从中受益的工商资产阶级。巴西工党的热图里奥主义包括了工会官僚和控制着

工会运动的垂直机构和诸如社会保障等重要领域的劳动部的官僚、一部分倾向民族主义的工业资产阶级和组织起来的大部分城市劳动者。

为使两党的联盟起作用，需要两党彼此都不要使自己的特点太极端化。一方面，需要社会民主党不要保守到与工会官僚和工人的要求相冲突的地步；另一方面，也需要巴西工党在争取实现上述要求和在向争夺激烈的政府职位进军方面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民族主义变成社会动荡的旗帜。

在其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儒塞里诺做到了使两党的行动界限综合起来。“发展和秩序”的原则是和他出身的社会民主党的形象相符的。在社会方面，他不反对工会官僚的利益，并努力限制罢工发生。这样，没有打乱工党和壤戈的步伐，尽管不能说他也在暗中做着这个党的事情。

* * * * * *

儒塞里诺的经济政策表现在他的目标计划中。该计划包括 31 个目标，分散在 6 个大的方面：能源、运输、食品、基础工业、教育和被称为综合目标的巴西利亚建设。

政府积极克服官僚主义的陈规，成立了一些和现存的行政管理机构平行的机关或一些新的单位。比如，与无用和腐败的国家抗旱工程局（DNOCS）平行，针对大部分没有实现的希望，成立了旨在促进东北部工业发展计划的东北发展总监局（SUDENE）。为了建造巴西利亚，成立了新首都局。

儒塞里诺·库比契克政府无论在基本建设方面，还是在直接鼓励实现工业化方面都开展了广泛的国家活动。但是，也公开宣布需要吸引外资，包括为之大力提供方便。这样，民族主义思想就失去了发展的地盘。政府允许广泛运用卡斐·费里奥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授权各公司进口外国设备而无需汇兑保证金，即不必要

在银行里储蓄用以偿付这些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币。享受优惠待遇的条件是在国外拥有可转到巴西的设备，或能偿付这些设备的资金。符合这些要求的外国公司可取得将设备从母公司转到巴西，并可把这些设备并入其在巴西的资本的优惠待遇。法律为政府认为优先的领域：汽车工业、空运、铁路、电力和钢铁工业的外国投资提供方便。

目标计划的效果，尤其在工业方面是激动人心的。在1955～1961年之间，工业生产值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了80%，钢铁工业（100%）、机械工业（125%）、电力和交通（380%）和运输材料（600%）都以很高的比例增长。从1957～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以7%的年增长率增长，人均产值增长近4%。如果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的10年，巴西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增长值接近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3倍。

儒塞里诺政府和汽车工业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尽管在此之前，巴西已经存在规模有限的汽车零件厂和装配厂。儒塞里诺政府鼓励利用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发展汽车和卡车生产。由于所提供的便利和巴西市场的巨大潜力，这些外国资本被吸引到巴西来。

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诸如威利斯·奥夫兰多、福特、大众和通用汽车公司等都集中到了圣保罗的ABC工业区——包括圣安德列、圣贝纳尔多和圣卡埃塔诺市在内的大圣保罗地区，完全改变了那个地区的面貌。汽车工业使巴西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工人队伍。1960年是儒塞里诺政府最后的一年，仅前面提到的4家企业的生产数量就占全国总产量133000辆汽车的78%左右，充分满足了巴西的需要。外国企业在继续扩展。1968年，大众、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出了巴西近90%的汽车。

就数量和企业组织来看，巴西汽车工业的建立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这种汽车工业是限制在建立“汽车文明”的宗旨框架内的，损害了面向大众的集体运输工具的发展。自1960年

以来，小轿车生产倾向继续发展，以致在1968年达到车辆生产的将近58%。由于铁路实际上被摈弃，巴西在运输方面越来越依赖公路的延长和维护以及对石油产品的利用。

在人们的记忆中，儒塞里诺政府的5年是一个乐观主义加巨大作为的时代，其最大的标志是建造巴西利亚。在那个时期，建立一个新首都引起了巨大的意见分歧，也被被迫转到中部高原工作的共和国原首都的公务员们认为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上述迁都的思想不是新有的，1891年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就赋予国会“迁移联邦首都”的职权。然而，将计划变为实际的使命最后落到了儒塞里诺的肩上，他以巨大的热情，动员了大量资金和主要来自东北部移民——巴西利亚建造者——组成的劳动力。领导设计巴西利亚的是两个具有国际声望的人物：建筑师奥斯卡尔·聂麦耶和城市规划设计师鲁西奥·考斯塔。

政府呈送国会的关于建设巴西利亚的法案，尽管遭到全国民主联盟的强烈反对，但仍于1956年9月通过。全国民主联盟分子说这个举动是蛊惑人心的，定会引起更大的通货膨胀和政府所在地的孤立。在建设过程中，卡洛斯·拉塞尔达牵头组成议会咨询委员会来澄清在签订工程合同中的违规行为，但未能得逞。儒塞里诺终于在1960年4月21日——这个象征性的日子，为新首都庄严开幕。

* * * * * *

在儒塞里诺·库比契克执政时期，工会运动发生了变化，最明显地暴露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几年，若昂·古拉特政府期间。各种倾向的工会领导开始认识到，在狭窄的官方机构下组织工人运动要取得大的发展是困难的。于是，出现了和官方组织平行开展活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例子有1955年在圣保罗成立的工会间团结公约（PUI）和在里约热内卢组成的团结行动公约（PUA）。和

工会间团结公约相反，行动团结公约活动存在于国家机构中，或在由国家企业控制、获得政府方面批准的公益机构里，这个机构为组成在古拉特时期举行的罢工中起到突出作用的工人总指挥部（CGT）铺设了道路。

团结行动公约的成立加强了前些年在工会活动领域业已存在的倾向。这种倾向越来越集中在国家或公益机构里。此外，在市场方面，这个工会组织的影响相对来说在衰落之中的传统工业，特别是在纺织品方面更大些。

在那个时代，工会运动很难深入到某个尖端领域——汽车工业方面去。这个事实好像可从两个基本因素来解释。一方面是工会运动，尤其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运动在与国家有联系的企业里的传统根基薄弱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在跨国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的新技术面前不知所措的缘故。

在平行组织成立的同时，工会领导人在努力使工会政治化。这意味着他们应该支持民族主义潮流和社会改革——即所谓基础改革，其中包括土地改革的建议。

* * * * * *

在儒塞里诺时期，并非一切都是鲜花。最大的问题集中在对外贸易以及与和政府财政具有内在联系的领域里。政府支持工业化计划和建设巴西利亚的巨大开支以及进出口的严重下降造成了联邦预算赤字的持续增加。这个赤字从 1954～1955 年的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 1%、1956 年的 2%，上升到 1957 年的 4%。这种情况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除了 1957 年之外通货膨胀到 1959 年达到了儒塞里诺政府时期最高的水平——39.5%左右。

通货膨胀增长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有建设巴西利亚的巨大政府开支和国会通过的为公务员增加工资、出进口情况下降、通过发行纸币购买咖啡来支撑下降的价格、向私人发放贷

款容易等。

1958 年 6 月，财政部长——若泽·玛丽娅·阿尔克民——因无法解决上述问题造成的困难而辞职。儒塞里诺任命国家经济发展银行第一行长鲁卡斯·洛佩斯工程师来取代他，罗贝托·坎波斯担任该行行长。二人共同制订了一个试图将反通货膨胀和降低公共赤字与目标计划的目的结合起来的经济稳定计划。

没有预见到这个计划要有大的牺牲，尽管如此，仍然引起了强烈的负面的反应。首先，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愿意为换取稳定而有半点损失，尽管他们希望有某个其他集团来承受这种损失。其次，通货膨胀对于许多社会方面来说，代表一种很好的生意：在工资不能随物价提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在价格调整和工业家与商人利用库存商品进行投机方面提供了赚大钱的好机会。此外，由于外债还不受币值调整约束，通货膨胀使资金对贷款，尤其在银行和国家资助机关以优惠条件取得的贷款方面变得极具吸引力。

在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方面，抵制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经济稳定计划和“与帝国主义整合”的嫌疑联系在一起，在巴西工党和左派中引起逆反情绪。同时，任何这种性质的计划在开始时，都要进行附加性限制。工会领导人和在他们影响下的工人害怕工人会被拖进这种新的限制。与此同时，其他社会阶层也都不接受这些限制。如果这样，在相同的或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及实际工资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工人们将在社会各阶层中处于最坏的境地。

限制工业家贷款的企图在圣保罗引起了抗议，并得到了巴西银行行长的支持。咖啡种植商在 1958 年 10 月组织了反对外汇留成和反对限制购买储存咖啡的政府新措施的生产大进军。

在与巴西对外收支有关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经济稳定计划，需要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项协议。巴西咨询了这个国际机构，因为它要取得一笔 3 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和该计划的敌对者们说的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附和它。这个国际机构对该计划的渐进主义进行了限制，比如，对用于补贴小麦和石油进口所

耗费的政府开支提出了批评。

巴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关系的犹豫不决持续了将近一年，1959年6月走到了尽头。这个时候，儒塞里诺已经到了他任期的尾声，他需要为继任总统着想。民族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一直在攻击总统准备“把国家主权出卖给国际银行家和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只会受到全国民主联盟的赞许和支持，然而，即使儒塞里诺选择了这条道路，也不可能得到反对派的政治支持。

由于这种情况造成了政府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裂，这就等于最后抛弃了经济稳定计划。1959年8月，鲁卡斯·洛佩斯和罗伯托·坎波斯离任。这一决裂引发了支持儒塞里诺的浪潮。巴西工党欢迎这一决定，因为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共产党人也出席了在卡黛黛宫花园举行的支持总统的集会。在集会者中，有自1958年就转入地下的路易斯·卡洛斯·普莱斯特斯。尽管形式上仍处于非法状态，巴西共产党却渐渐地找到了表达主张的途径。然而，支持不但来自巴西工党和左派，这一决裂也得到了圣保罗工业联合会和军队高层的支持。

但是，这种热情没有传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正像1960年10月3日的总统选举中显示了出来的那样。早在1959年就出现了候选人。让尼奥·夸德罗斯在当选圣保罗州长后，1959年4月在拉塞尔达支持下，被一个小党推举为候选人。阿德马尔在1955年选举的良好成绩的鼓舞下，也代表进步社会党出选。社会民主党和巴西工党在总统候选人洛特将军的周围再次联合起来，并推出若昂·古拉特为副总统候选人。

全国民主联盟在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和支持让尼奥之间犹豫不决。让尼奥走了一条捷径，他批评政府腐败和财政混乱。但他没有一个确定的纲领，并且蔑视所有的政党，全以他许诺的将严惩肮脏交易的受益者和一切腐败的带有威胁性的大众形象吸引人民。他虽然远不是全国民主联盟中意的那种表现杰出的人物，但是，

他也以自己的方式汇集了全国民主联盟党人演说中的一些东西。尤其，他代表了这个党可以取得政权的一个大好机会，尽管这是通过一条命运未卜的捷径。在1959年11月，全国民主联盟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对让尼奥的支持终于占了大多数。

从竞选运动一开始，偏向让尼奥的趋势就很明显。他集中了反热图里奥主义的精英和渴望所谓政治习俗道德化和饱受生活费用昂贵之苦的中产阶级以及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希望。

洛特是一位糟糕透顶的候选人。这位将军在有限的政权圈子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他们中间，他是保障民主制度得以继续的化身。但在大庭广众面前，他的弱点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他不会在公众面前讲话，而努力模仿发表热图里奥式的演说。由于他主张文盲也有参加投票的权利而使得社会民主党不悦；由于他批评古巴和共产主义，而使巴西工党特别是左派不悦。

从1945年以来的4届总统选举中，由于城市化的结果和政治参与的巨大兴趣，选民队伍大大增加了。从1945年的590万发展到1950年的790万、1955年的860万，直到1960年的1170万。这最后一次的全国直选共和国总统直到1989年才重新恢复。

让尼奥·夸德罗斯在1960年的选举中，以获得1170万张选票中的48%胜出，与此同时，洛特获得28%，阿德马尔获得23%。让尼奥成功的百分比仅低于1945年的杜特拉。若昂·古拉特当选为共和国副总统，尽管洛特遭遇了明显的失败。

* * * * * *

第一次，一个体现未来希望的总统在巴西利亚就职。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希望由于把国家抛向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的总统辞职而破灭了。

让尼奥开始了茫然无措的执政。他在诸如禁止喷香器、比基尼和斗鸡等与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不相称的一些事务中奔忙。在

采取最严肃的措施方面，他把赞同左派的措施和赞同保守派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使两方都不高兴。外交政策引起了保守派，特别是全国民主联盟大部分人的反对。在让尼奥·夸德罗斯短暂的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抛出了进步联盟——一项包括在10年内向拉丁美洲拨款200亿美元的许诺在内的改革计划。这个联盟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召开的一次美洲国家会议上通过。切·格瓦拉率领的古巴代表团没有在埃斯特角城宪章上签字。在回古巴途中，切·格瓦拉在巴西利亚做短暂停留，在那里，从让尼奥手里接受了很有意义的勋章——南十字星座勋章。这个动作没有任何表示支持共产主义的意向。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它只是象征着让尼奥开始付诸实践的独立的外交政策，为巴西在两个对立的大集团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

在财政方面，让尼奥宣布了一个应对从儒塞里诺政府继承下来的问题的计划，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国家的困难。他选择了一个涉及汇率大幅度贬值、控制公共开支和货币扩张的正统的一揽子稳定计划。减少对小麦和石油进口的补贴，从而导致面包和燃料价格提高了100%。

这些措施受到了巴西债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欢迎。欧洲债主以及美国人组成的海牙俱乐部，在1961年对巴西偿还债务重新做了规划。在肯尼迪总统的支持下，巴西又在美国取得了新的贷款。让尼奥被看做一条用来阻止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沿着不稳定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向下滑的途径。

1961年8月，让尼奥开始放松了财政收缩的措施，但是，还没能实践出一种可能的方向性变革。就在这个8月，一次巨变结束了他的政府。

这位总统是在没有政治支持基础的情况下管理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巴西工党控制着国会；拉塞尔达又转向了反对派，以原来支持让尼奥的激烈程度重锤批评让尼奥。全国民主联盟有各种不满的理由。总统的行动实际上没有征询全国民主联盟在国

会的党团的意见。此外，独立的外交政策以及总统对土地改革的同情亦令人担心。

1961 年 8 月 24 日夜，拉塞尔达——已经当选为瓜纳巴拉州州长——发表演说，后被电台广播，揭露司法部长奥斯卡尔·佩德罗佐·奥尔塔组织的让尼奥主义政变企图，奇怪的是他被邀请共谋。佩德罗佐·奥尔塔否认这一指控。于是，第二天，让尼奥即宣布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遂将决定通告国会。

辞职甚至没有说明原因。让尼奥自己拒绝说明事情的缘由，但是总暗示是“可怕的力量”将他带到这种地步。人们推测的最可能的理由是一个不稳定人物的所作所为同一个错误的政治算盘相结合的产物。根据这个假设，让尼奥希望凭借戏剧性的一搏，取得更多执政的权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国会和各政党的束缚。他认为自己在总统选举运动中对于政党是不可缺少的，还认为自己作为总统对巴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难道保守派和军人愿意把国家交给若昂·古拉特吗？

让尼奥匆忙地离开巴西利亚，在圣保罗的一个军事基地走下飞机。在那里，他接到一些州长要求他重新考虑此举的呼吁。但是，除了这些，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总统复位的重大行动。各个集团都有对他不满的理由，它们开始立足于新的形势之下。因为辞职不是由投票决定的，而仅仅是被通告的，国会只是知道了让尼奥的行动而已，从此便又开始了对政权的争夺。

* * * * * *

宪法对于让尼奥·夸德罗斯的继任总统问题没有留下任何疑义：总统应该由副总统若昂·古拉特担任。然而，在军方的干预面前，就任总统的问题却成了悬案，因为军方一直将他看做工会主义共和国的化身和共产党可能由之进入政权的缺口。当时，壤戈正在访问共产党中国不在国内这也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巧合。

在众议院院长临时担任共和国总统的同时，让尼奥的几个军人部长借口国家安全的原因，禁止壤戈返回巴西。但是，主张阻止壤戈回国的集团未能在军队高层中取得一致意见。在南里约格朗德，第三军司令声明支持古拉特就职，从而打开了被称为合法战役的局面。主要人物是带有壤戈烙印的南里约格朗德州州长赖奥内尔·布雷佐拉。布雷佐拉为组织军事抵抗计划做出了贡献，并在阿雷格里港发动了盛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当海军部长宣布海军陆战队到南方时，布雷佐拉威胁要炸沉几艘轮船来封锁阿雷格里港进口。

最后，国会采取了一个妥协方案。政府制度从总统制变为议会制，若昂·古拉特接受了缩小的权力，于 1961 年 9 月 7 日就职。议会制纯粹成为解决危机的权宜之计，不能持续很长时间，正如事实所发生的那样，真的没有保持下去。

五 政权危机和1964年政变

在壤戈政府执政期间，很明显，社会运动发展了，并出现了许多新的活动家。被遗忘的农村方面——民众主义政策的真正孤儿——开始行动起来。这种大规模运动的背景是 1950～1964 年之间在巴西发生的以城市发展和迅速工业化为特点的巨大的结构变化。

这些变化扩大了农业和畜牧业产品的市场，使得土地占有及其利用形式发生了变化。土地变得比从前收获大了，庄园主设法驱逐原来的合股人，或者说恶化了他们的劳动条件。这引起了农村人民的强烈不满。此外，移民使农村和城市接近了，从而使农村人比较容易地意识到自己所受的残酷奴役。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农村运动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人物——伯南布哥律师和政治家弗朗西斯科·儒里昂为公开领袖的农会运动。儒

里昂竭力把农会提高为类似工会式的组织，并设法把农民组织起来，他相信，农民比农村雇工更容易被吸引到重要的社会运动中来。

农会开始出现在1955年末，农会决心保护农民不被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反对提高地租和“牛轭”实践，根据这种实践形式，殖民——东北部对当地居民的称呼——每星期要为地主无偿地工作一天。

儒里昂设法使农会有一个权力集中的组织，在每个州的首府或一个地区的重要城市里建立他们的总部。采取这种战略的理由是出于相信在大城市里有可以和农民结盟的各阶级和团体——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那里有反动性不那么强的司法。在全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在东北部，比如伯南布哥和帕拉伊巴等州都出现了农会。

1961年11月，在贝洛奥里藏特召开了第一次农业劳动者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组织农村大众的各种路线。大会是由儒里昂和其他农会成员以及其最大基础在圣保罗和巴拉那的农业雇工之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全面策划的。在会上，分成两大派，农会领导人主张农村人的首要要求是无预付补偿金地征用土地；共产党人则主张先集中力量促进实现农村工会化和将劳动法延伸到农村。

立法范围里的一个重要进展出现在1963年3月，当壤戈批准了一项农村劳动者章程法的时候。这个法律建立了农村劳动者职业证书，规定了劳动年限，接受最低工资的情况，还规定了拥有诸如周日公休和假日工资照发等的权利。

在壤戈政府期间，社会其他方面的运动也发展了。学生们通过全国学生联盟，提出了他们关于社会变革的建议，开始直接干预政治游戏。

天主教在行为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的许多成员开始偏向关注组成它的社会基础的人民阶层。顽固的反共产主义让位于调和的态度：仍然反对共产主义，但是，

承认资本主义的邪恶引起了人们造反和共产主义的扩张。

教会分裂为不同的立场，从某些大主教的极端保守主义，到向左派开放，典型的是天主教青年大学生（JUC)。在学生运动激进气候的触动下，天主教青年大学生逐渐采取了社会主义立场，并和宗教等级制度发生了冲突。1962 年，从这个组织中产生了一个脱离了宗教等级制并具有革命目的的组织——人民行动党(AP)。人民行动党积极参加了那个时期的政治斗争，并在 1964 年军人政府上台后，受到了严厉的镇压。

天主教在东北部大搞农村工会化，同时，正面反对农会。1961 年 5 月，若昂 23 世教皇通谕“母亲与师长”——第一个清楚地谈第三世界问题的文件——的公布对于改良主义天主教是一个重要的鼓励。

* * * * * *

若昂·古拉特在面对比瓦加斯政府时期更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压力的情况就任总统意味着民众主义计划的卷土重来。政府的思想家和工会领导人竭力强化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应该说是建立在国家——包括了武装力量中的民族主义军官和制订这一政策的知识分子——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之上的。国家是这个联盟的连接轴心，其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和称为基础改革的社会政治改革。

这些改革包括一系列的措施。在社会方面，是旨在消除因土地占有而产生的冲突和保证千百万农村劳动者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改革。为此，建议修改宪法条文，规定出于需要和公用或社会利益，征用不动产所有权，但是，这只有通过预付补偿金的办法来解决。伴随土地改革一起出现的，还有城市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为房客能够变成其租赁房屋的所有者创造条件。

在政治权利方面，主张把选举权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方面：文

盲和武装力量的下层人员，在军队，是自中士以下的士兵。这样，就扩大了民众主义政府的支持基础，争取到了广大劳苦大众和军队基层被排挤的阶层。

与此同时，改革还包括许多民族主义措施，规定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更广泛的干预。在这些措施中，有对公共服务、冷藏、制药工业等特许企业的国有化，严格规定了利润汇出和扩大巴西石油公司的垄断等。

这些基础改革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试图通过国家行为，使资本主义现代化，缩小国家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但是，这需要进行一场巨大的变革，而统治阶级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为基础改革做了大量工作的政府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预想在反对帝国主义和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中，会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在这种景况下，外国投资者是民族资本主义最不忠诚的竞争者；而且，土地改革鼓励了农村人民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对工业产品产生了一种新的要求。实际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更喜欢走另一条路，在社会运动发展和投资前景不明朗的气候下，他们越来越离开了政府。

工会领导是忠于民众主义计划的。他们主要是由靠近政府的工党和共产党人组成，但是，没有从前的“缓冲垫”一类人物的那种俯首听命。创立平行组织的战术仍在继续，1962 年，组成了工人总指挥部。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逐渐做起疏导政治性要求的工作。特别是工人的要求，它们没有被忘记，但是，已经被认为是次要的了。

对于罢工运动，有三个因素应该指出：第一，罢工的次数大量增加；第二，罢工倾向集中在政治方面；第三，这些罢工从圣保罗转到了全国其他地区。

1958 年发生了 31 次罢工活动，1963 年则达到了 172 次。1958 年不低于 80％的罢工集中在私营方面；而 1963 年国营企业的罢工最多（58％）。

罢工的增长表明社会运动的发展。罢工从私营方面转到国营方面是和各种罢工的政治性质连在一起的，政府鼓励这些罢工，以强迫接受他们感兴趣的措施。

至于罢工的地区转移，我们首先想到，圣保罗是私人企业集中的地方，跨国公司尤其显著。要在这些地方取得好处十分困难，那里的企业领导人必须考虑利润，不想使工人阶级与他们的政治意图搅在一起。工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圣保罗很少引起反响，因为，要把这变成具体利益是件很有难度的事。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在联邦政府正与工会领导人接近的时候，圣保罗州长阿德马尔·德巴罗斯却严厉地镇压了罢工。

所有这一切使罢工对于工会领导人变成一个结果痛苦而又不切实际的希望。和政府接近、罢工升级、出席集会等产生某种惬意，同时，也掩盖了工人运动的薄弱点。这些弱点，正像以后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表现在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事实中：一方面，在这个集中了经济最活跃方面的州里，工人运动成比例地下降；另一方面，运动过度地依赖同政府的关系。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政权拉着民众主义工会运动一起倒台。

* * * * * *

在政治领域里，和社会运动平行的是，从儒塞里诺时期以来，一些超越政党界限的帮派思想的形成日趋明显。巴西工党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共产党的非法状态，取得了许多原来是投给共产党的选票。因为它主要是城市政党，又受益于工业化的发展，它还得益于对民族主义和社会变革有利的气候。

如果说在各政党内早就没有了一致性，党的分裂在古拉特时期变得更严重了。这种分裂更多的是指思想的分歧，其次是个人争夺。在不同程度上，在每个党派范围内的思想倾向的形成都是由民族主义和左派立场的发展引起的。在巴西工党内，形成了

“浓缩集团”，他们主张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路线和社会改革的具体措施。在全国民主联盟里，出现了赞同政府基础改革和财政计划的“新英才”派。

然而，全国民主联盟的大部分人接近与壤戈敌对的军人派。他们中的一些成员组成了极端保守的议会民主行动团体。这些团体鼓励和促成了结束1945年建立的政权的国家政变。

由于1955年在儒塞里诺竞选期间“青年翼”的形成，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水岭出现得最早。在这个“翼”里，杰出的人物有雷纳托·阿舍尔和乌利塞斯·吉马良斯等。青年翼谨慎地对抗着社会民主党里的老狐狸们，并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它由于洛特将军失败而解体，然而，它的成员们却为议会民族主义阵线的出现做出了贡献。

特别是由于苏联发生的事件，在左派中也发生了分裂，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报告传播开来后，斯大林主义发生了危机。一部分巴西的共产党人反对在党内推行的自由化措施和同壤戈政府毫无保留的合作路线。由于这些分歧，诞生了巴西共产党（PC do B），这个党在中国和后来在阿尔巴尼亚找到了所谓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榜样。巴西共产党的称号是重新起用巴西的共产党的原来名称，巴西共产党是在1961年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更名为巴西的共产党的。

* * * * * *

在人民进行重新站队的同时，一种从革命战争前景观察国际关系的观点在武装力量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观念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中提出来的，而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后取得了一个更清晰的面目。古巴革命的胜利在一些军人眼前显示了一种同时面对两个庞大的政权集团之间对抗的革命战争在不发达国家发生。

这个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战争囊括了社会的各个

阶层，并把理论和心理战，直到武装斗争都用做它的工具。正因为如此，需要采取同样规模的行动来对抗它。在这种境况下，以打败敌人、保证民族的安全和发展为目的武装力量具有积极和长久的作用，由此产生了国家安全论。

在外部影响下，这种理论于 1949 年 8 月，在美国和法国顾问的帮助下成立的战争高等学校里产生了。美国军事使团在巴西从 1948 年停留到 1960 年。在巴西人中，作为教练和组织者的主要人物是戈贝勒·多寇托·席尔瓦将军。战校的课程不但向军人，而且也向平民开放。平民的参加对建立与战争学校的主导观点相一致的军民联防是很重要的。

战争学校和诸如社会调查研究学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巴西民主行动学会等机关中逐渐出现了一种被认为能够制止颠覆社会秩序和保障某种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路线。随着古拉特政府逐渐激进化和不稳定，在战争学校—社会调研学会—巴西民主行动学会的协作圈子里，终于确立了一种信念，只有一场武装运动才能结束民众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制止共产主义的发展。

* * * * * *

古拉特以代议制给予的有限权力开始上台执政。第一届内阁以曾任过 1954 年热图里奥政府司法部长的米纳斯政治家坦克雷多·内维斯为首。在执政初期，总统的路线是温和的，设法表明他坚持民主原则和反对共产主义。他在访美期间，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取得了帮助东北部发展的资金。

不久，便提出了总统权力的问题。议会制立下的法规规定，在 1965 年将举行全民公决投票，届时，由人民彻底决定政府的体制。在和古拉特有联系的人们中，开始发起提前全民公决的运动。

总统制几乎有取得胜利的把握。在建立代议制的条件下，明显地是一种限制壤戈行动的措施。此外，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

一个权力大的总统能够稳定国家和促进基础改革。军队高层大部分也倾向加强政府的权力。

坦克雷多·内维斯于1962年6月辞去总理职务。几位部长和他本人决心离开内阁，以便能够成为当年10月举行的联邦众议院和各州政府选举中的候选人。此外，坦克雷多本人不信任代议制。总统任命圣地亚哥·丹塔斯继任他的职务。坦克雷多为首的内阁的外交部长圣地亚哥·丹塔斯主张巴西在古巴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引起了右派的愤怒。众议院否决了这项任命，选择由参议院院长阿乌罗·德莫乌拉·安德拉德作为代替人选。

为反对保守派人物阿乌罗，爆发了这个时期的第一次政治大罢工。1962年7月5日，宣布举行24小时大罢工，要求成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内阁，罢工没有达到大罢工的程度，却给国家企业或政府控制下的企业带来损害。港口工作人员的罢工实际上使全国所有港口瘫痪。在许多地方，罢工者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比如，在里约热内卢，陆军第一军保护工人免受州长拉塞尔达进行镇压的威胁。

最后，国会任命南里约格朗德社会民主党的一位不太知名的人物，布罗沙多·达罗沙为内阁总理。由他建议并获得国会批准，将全民公决提前到1963年1月。

* * * * * *

在举行全民公决投票之前，1962年10月举行的各州政府和议会的选举表明中间派和右派力量在全国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选举受益于巴西民主行动学会和类似的机关提供的资助是肯定无疑的。但是，政府也利用了它的机器。在圣保罗，阿德马尔险胜让尼奥。在南里约格朗德，全国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支持的伊尔多·迈内格逖打败了布雷佐拉。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则庆贺米格尔·阿拉艾斯在伯南布哥的胜利和布雷佐拉在里约热内卢的特大胜利。

布雷佐拉参选联邦众议员，获得了直到那个时候——一个在立法选举中的候选人所获得的最多的选票——26.9 万张选票。

然而，人们也注意到，卡洛斯·拉塞尔达和马加良斯·平托也分别当选为瓜纳巴拉州（里约热内卢）州长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因此，壤戈必须面对几个最大州州长的对立。

* * * * * *

1963 年 1 月总共 1230 万名公决投票人中的 950 万人对代议制说“不”。这样，便又回到了以若昂·古拉特为政府首脑的总统制。

由他挑选的内阁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战略。他竭力通过被称为“务实左派”的人物，比如，财政部长圣地亚哥、计划部长塞尔索·福尔塔多来严肃地应对财政—经济问题。同时，设法加强当时被称为“工会机制”和“军事机制”的两种力量作为其政府的支持基础。他选定在巴西工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中颇受欢迎的人物，阿尔米诺·阿奉索作劳动部长。战争部长仍然是来自代议制内阁的温和派，阿马乌雷·克卢埃尔将军。但是，民族主义军官，总部在里约热内卢的陆军第一军军长奥斯维诺·阿尔维斯和总部在南里约格朗德的第三军军长，贾伊尔·丹塔斯·雷贝罗明显地加强了军事机制。

* * * * * *

财政形势是严峻的。通货膨胀在升级，年通膨指数从 1960 年的 26.3%，上升到 1961 年的 33.3%，在 1962 年，竟达到 54.8%。为了应对财政和其他一些问题，塞尔索·福尔塔多抛出了力图把经济增长、社会改革和反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的 3 年计划。

这个计划要依赖在社会上有发言权的一些方面的合作。这一合作又一次落空了。通货膨胀的获益者没有兴趣使这些措施取得

成功；壤戈的敌对者更希望政府倒台和发生政变；工人运动拒绝接受压缩工人工资；左派则看到到处有帝国主义插手。外债债主在1963年圣地亚哥·丹塔斯对华盛顿进行的访问中持保留态度，访问收获甚微。

在1963年中期，计划失败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在当年前5个月里通货膨胀已经上升到25%的形势下，为公务员增加工资70%成为他的最后一搏。此外，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发出了衰落的信号。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从1962年的5.3%下降到1963年的1.5%。

在这种境况下，壤戈进行了内阁改组。计划执行者圣地亚哥·丹塔斯，因患肺癌离开政府。阿尔米诺·阿奉索走出了劳动部；丹塔斯·雷贝罗将军担任了战争部长。作为不想在财政政策方面再坚持激进道路的表示，古拉特任命了一位保守派人物——原圣保罗州长，卡尔瓦略·平托做财政部长。

自1963年中期开始，各种立场的激进倾向在增长。在农村，把土地改革看做灾难的农村产业主开始武装起来。另一方面，农会运动、农村工会化和侵占土地的风潮取得迅猛发展。当1963年10月，议会否决了不预付补偿金而征用土地的宪法修正案后，选择在法律边缘活动的倾向在加强。

以布雷佐拉为首的巴西工党左派抱怨壤戈在社会改革和对帝国主义关系方面摇摆不定。还是在1963年，布雷佐拉就开始把那些在全国各地联合抵制政变企图和帮助实现诸如召开制宪代表大会和外债展缓期等措施的团体组织起来。

在军队中，由主张对政府过头做法进行"保护性干预"的派别加强了的反对壤戈的图谋在增长。在这些人当中，就有陆军总参谋长乌穆贝多·德阿伦卡尔·卡斯特洛·布朗库将军。1963年9月发生在巴西利亚的一次空军和海军中士和班长暴动把这个集团推到了上述图谋一边。这次暴动是对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不能进行中士选举决定的抗议。造反者甚至占领了国家大楼，控制了通讯，逮捕了一些军官，直到他们被打败。

古拉特政府最后几个月发生的悲剧可以被理解为通过民主途径解决冲突被政治家们认为不可能或当做毫无利用价值的东西抛弃的事实造成的。右派终于使温和保守派接受了他们的这样一个论点：只有一场革命才能使民主净化和消除阶级斗争、工会政权和共产主义危险。

壤戈终于走上了采取非常措施的道路。1963 年 10 月，在军事机制启发下，以制止农村骚动和重建社会秩序的需要为借口，建议国会发布为期 30 天的戒严令。建议因既不受右派，也不受左派欢迎而失败，并增加了议会对政府意图的怀疑。

在左派中，"形式民主"被看做为特权者服务的简单工具。如果所有的人都能通过建立在"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之上的基础改革而获得利益，那怎么还会接受他的前进加倒退的困难游戏呢？

1963 年 10 月，在壤戈倒台之前，圣保罗发生了最后一次和狭义的政治原因无关的工人大罢工。这次主要包括钢铁、造纸和纸板化工工人在内的号称"70 万工人的大罢工"持续了多日。

1964 年初，在他的亲信圈里的人的劝说下，壤戈选择了一种灾难性的方向。这个方向大致是下面一些内容：依靠军事机制和工会机制的支持，总统应该向国会提出方案，并开始通过政令实现基础改革。为了显示政府的力量，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一系列集会，会上宣布进行改革。第一次大集会发生在 3 月 13 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在第一军队伍的保护下，近 15 万人参加了集会，听取也许彼此已经产生了争执的壤戈和布雷佐拉的讲话。

要求共产党合法化的红旗、要求土地改革的横幅标语等出现在电视上，这使保守派不寒而战。壤戈当场签署了两项政令。其中之一，主要是象征性的，即征用当时还不在巴西石油公司控制之下的石油炼油厂。第二项——被称为苏普拉（土地改革总监局）令——宣布未充分利用的土地产业被置于征用之下，还特别说明了被置于这一措施之下的土地的地域和面积。

总统还透露，正在准备进行城市改革——这对害怕把自己的不动产失手让给房客的中产阶级无疑是一个噩耗，行将提交国会的议案规定对税收进行改革并赋予文盲及武装力量下层士兵以选举权。

壤戈的第一项改革法案实际上标志着他的政府的倒台的开始。一场暴风雨的征兆随着圣保罗与保守教会有联系的天主教妇女协会发起的和自由神在一起的家庭大进军到来了。1969 年 3 月 19 日，近 50 万人上街游行，表示政变党人拥有巨大的社会支持基础。

一个严重的军事事件帮助创造了一种对阴谋家更为有利的气候。海员协会在保障海员权利和提高工资的斗争中逐渐突现出来。它的最重要的领袖是小队长安塞尔莫，据一些人反映，他后来或就是在当时，已经是海军情报中心（Cenimar）的情报员了。

3 月 24 日，席尔维约·莫塔部长下令监禁这个协会的一些被控颠覆等级制的领导人。第二天，近 2000 名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冶金工作者工会集会，纪念协会成立两周年，并提出新的要求，一些反对炮制监禁命令的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席尔维约·莫塔部长派海军陆战队的一支队伍包围了大会会场，并要求第一军支援。最后，通过谈判解决了问题。

在当时的压力下，海军部长感到自己的威信扫地，提出辞职。壤戈任命一位过时的人物，工人总指挥部支持的退役海军上将，保罗·罗德里格斯取代他的位置。新部长为了息事宁人，宣布不给予造反者以惩罚。实际上，这是火上浇油：军事俱乐部和一部分海军高级将领指责他的做法是鼓励破坏军衔等级制度。

当壤戈做出最后一个危险的动作，在里约中士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政变已经在进行中。他被 1937 年卷入阴暗的科恩计划的奥林匹约·莫乌冷·费里奥将军陷入不利的境地。在州长马加良斯·平托的支持下，3 月 31 日，莫乌冷调动他指挥下的部队，从驻地米纳斯吉拉斯向里约热内卢方向移动。

形势迅速出现不测。在里约热内卢，拉塞尔达在政府大楼内

武装起来，等待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4月1日，古拉特飞往巴西利亚，避开可能引起流血事件的任何行动。在阿马乌雷·克鲁埃尔将军指挥下的第二军部队从圣保罗向里约热内卢方向移动，去同第一军官兵进行联谊活动。

4月1日夜，当古拉特从巴西利亚去阿雷格里港时，参议院院长宣布共和国总统位置空缺。众议院院长拉尼埃雷·马泽里按照宪法规定就任总统，但是这时政权已经不在文职人员手中，而是转到军队指挥官的手里了。

布雷佐拉还试图组织军队和南里约格朗德人民，重建其1961年所建立的功勋，然而没有成功。4月末，壤戈终于流亡乌拉圭，事实上那时他已经在乌拉圭了。

这就是1945～1964年期间民主经历的结局，也是第一次在国家历史上，军人长期掌握政权，建立了一个专制制度。

这个表面建立在强大力量之上的古拉特政府灭亡了。军事机制、工会机制发生了什么问题？实际上，若昂·古拉特和支持他的高层对政治状况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幻觉。他们把政权领域里发生的事情当做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的表现。他们还相信，军队大部分是赞同政府提出的改革的，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成员出身讲，它都应该是表达人民愿望的。是的，是存在“政变主义者”，但是，他们是在军事机制和下层干部行动控制之下的少数。

多年来，多数军官不愿打破宪法秩序，这是真的。但是，对于军队，还存在另外更重要的原则：保持社会秩序、尊重军衔等级制度和控制共产主义。破坏了这些原则，秩序就会乱，秩序混乱就提供了干预的理由。

壤戈失掉合法性，再加上屡次破坏纪律以及武装力量下级官兵和有组织的工人之间的相互接近终于使武装力量中的中间派，像在人民中间发生的转向一样，转而壮大了阴谋家的队伍。至于所谓的工会机制，他们有发动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国家领域中的工人阶级的能力，但是，也只不过如此。

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广大工人群众实际上不听工人总指挥部下达的进行大罢工的命令。无论以什么方式，工人运动实际上除了分裂武装力量，很少能够取得什么实际利益，实际上武装力量也没有分裂。

这样，尽管社会运动在全国有很大发展，但在政治上，壤戈已经被架空。在他周围，实际上，只有一个已经指挥不了任何人的战争部长和身为镇压对象，手下只有为数很少的被领导者的工会领袖以及那些只热衷于空想的朋友。

第六章
军人政权和向民主的过渡（1964～1984）

一　保守主义的现代化

1964年3月31日的运动，表面上是以使国家摆脱腐败和共产主义以及恢复民主为目的发起的。

通过被认做“执行所有革命所固有的制宪权”的必然结果的所谓制度法，新政权开始变更国家的组织机构。一号制度法是由陆、海、空军司令于1964年4月9日发布的，形式上保存了经过几处修订的1946年宪法以及议会功能的运行。

后一个方面是这个军人政权的特点之一。尽管实权已经转移到了其他的范围，民主的基本原则已被破坏，但是，这个政权几乎从来没有赤裸裸地以一副专制嘴脸出现。除了一段很短的时期外，议会继续运行，而那些损害了公民权利的标准被说成是临时的。一号制度法限定自己的有效期到1966年1月31日。

一号制度法的一些措施以强化政权和缩小议会的活动范围为目的。共和国总统授权提交国会的法案，限众议院必须在30天内通过，参议院也要在同样长的期限内通过；否则被认为自行通过。由于议会投票很容易受阻，他们的工作一般也比较拖拉，政府提交的法案“在限期内”通过要成为常规。制订或增加公共开支的

法案的主动权也归于共和国总统的权限范围内。

议员的豁免权被中止，革命最高指挥部授予自己撤销议员资格和中止其政治权利 10 年的权力。国家赋予其他公务人员的终身和稳定的职业保证中止 6 个月，以便对他们进行清洗。

这个制度法还建立军警审讯处基地（IPMS），“凡犯有反国家，或国家遗产罪、破坏政治和社会秩序，或从事革命战争活动”的人都要被押到这里审讯。

他们利用这些特殊的权利，展开了对其制度的敌对者的迫害，包括监禁和拷问。但是，这个制度还没有完全封闭，还存在在法庭上利用“人身保护权”手段的可能性，新闻也还保持了相对的自由。

特别是由于里约热内卢《晨邮报》的揭发，卡斯特洛·布朗库总统决定由当时的军事办公室主任，埃尔内斯托·盖泽尔将军负责调查拷问犯人的事实。调查以“证据不足”结案，但是无论如何，在一定时期里，拷问犯人不再是一个系统性的实践。

在古拉特时期扮演了突出角色的大学生尤其成为被镇压的对象。1964 年 4 月 1 日后不久，在里约热内卢的全国大学生联盟总部被搜查和烧毁。全国大学生联盟被解散后，转入地下活动。大学成为另一种被首先查究的对象。以革新的意图创立，却被军人视为具颠覆性的巴西利亚大学，在政变一天后即受到了搜查。

最严厉的镇压集中在农村，特别是在东北部地区，矛头尤其针对同农会有关联的人。在城市，许多工会和工人联合会受到了查询，工会领导人被投入监狱。这种干涉一般对准比较有影响的工会，5000 人以上的工会组织的 70% 受到了查询。

在 1964 年，49 名法官被清洗。在议会，50 多名议员的资格被撤销。在第一批被撤销资格的 50 名众议员中巴西工党的有 18 名，居首位。全国民主联盟的议员没有一人被撤销。

据保守的估计数字，文职官员有 1400 人被撤职，军人在 1200 人左右。特别是那些在民族主义和左派立场上表现突出的人更是

打击的对象。

一些州长丢官罢职。在被撤职或被中止政治权利的著名人物中，除了明显是壤戈和布雷佐拉的人，还有让尼奥和儒塞里诺，后者当时是戈亚斯州参议员。这样对待儒塞里诺，明显的用意是要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砍掉一位有威望的文职候选人。

所有这些还没提到当时逐渐在全国形成的恐怖气氛和告密制度。1964 年 6 月，军人政权以成立国家情报局（SNI）为标志，在控制公民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的主要策划者和第一任局长是戈贝勒·多寇托·席尔瓦将军。国家情报局的明确和主要的目的就是“收集、分析有关国家安全、反情报和关于国际颠覆问题的情报”。在实践中，它变成一个几乎和政府一样重要的权力中心，它“在反对国内敌人的斗争中”独立行动，自行负责。戈贝勒将军在后来甚至曾为自己辩护说，他没想到创造了一个魔鬼。

一号制度法规定，一个新的共和国总统要通过全国代表大会间接投票选举产生。1964 年 4 月 15 日，洪贝托·德阿伦卡尔·卡斯特洛·布朗库将军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任期至 1966 年 1 月 31 日。

在政治方面，卡斯特洛集团的目标是在进行过一号制度法中规定的手术后，建立一种“有限的民主”制度；在经济方面，对准改革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作为自身的一种目的，也作为一种遏制共产主义威胁的形式将之现代化。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需要迎战古拉特政府最后几个月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混乱局面，控制农村和城市劳动群众，并促进国家机器的改革。

* * * * * *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中的第一项，抛出了由计划部长罗贝特·坎波斯和财政部长奥塔维约·戈维亚·德·布灵埃斯负责的政府经济行动计划（PAEG）。

政府经济行动计划设法缩小公共财政赤字，进行私人贷款，

缩减工资。设法控制各州的开支，为此，建议通过一项禁止各州在没有联邦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借债的法律。通过改善国营企业状况，缩减对诸如小麦和石油等基础产品的补贴和增加税收，取得联邦财政重新平衡。前两项措施一开始就在生活费用方面引起了冲击，因为需要增加电力、电话等服务费与提高汽油和面包的价格。

为改善缺点明显的国家机器设备，增加了税收。对迟缴的税收采取币值调整的制度，这样起码部分地对缓解国家债务压力的情况起了作用。

压缩工资通过固定低于通货膨胀的调整方式开始做起。这种压缩伴着旨在制止罢工和方便符合企业利益的劳动力流动同时实行。1964 年 6 月国会通过的罢工法塞进了事实上使合法罢工无法实现的官僚主义要求。但是应该记得，在将近 20 年的民主制度过程中，议会从来没有通过任何履行保证罢工权利的宪法规定的法律，尽管在那个时代的最后几年，这一规定事实上是自由执行的。

政府还撤消了对城市工人最有价值的权利之一——加强劳动法保证的凡拥有 10 年以上工龄的人享有职业稳定的权利。1966 年 9 月，出台了一种新的形式——创立工龄保证基金，作为代替职业稳定的补偿机制。

对于农村，卡斯特洛政府对所谓骚动者的镇压政策与他们煞费苦心地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相与出现。1964 年 11 月，国会通过了为贯彻土地改革和促进农业政策的土地章程。但是，这一法律像随之而来的其他法规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纸上，从未实行过。

坎波斯和布灵埃斯两位部长的重要的中心变革之一表现在外贸领域。他们冲破了当时流行的“扼住出口的喉咙”，即通过国际竞争对其进行严格的结构限制的思想。两位部长认为巴西的潜力被低估了，于是掀起了一个出口运动，不但要开发国家巨大的自然矿藏，出售农产品，而且要促进工业财富的增长。

他们期望引进外资，特别是在出口方面。为了鼓励外国资本的流入，1964 年 8 月，在规定的限期内，通过了一部规范外国投资和利润汇出的新法律，撤消了曾经引起美国和所有外国投资者抗议的 1962 年限制法。

政府经济行动计划达到了目的。削减公共开资和增加税收相结合使年公共赤字从 1963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4.2%下降到 1964 年的 3.2%和 1965 年的 1.6%。1964 年的严重通货膨胀逐步消退，自 1966 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重新开始增长。

为什么和以往诸多计划相反的政府经济行动计划能够取得成功呢？是坎波斯和布灵埃斯对形势做了恰当的评估，但是，这还不能解释一切。国家专制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政府行动的贯彻。任何稳定计划的贯彻实行，都依赖社会做出部分牺牲。在巴西现实社会和政治家洞察力有限的条件下，要在民主的范围内达到这些是十分困难的。

专制制度允许坎波斯和布灵埃斯采取特别会给本已失去条件进行抵制的劳动阶级造成牺牲的措施。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绿灯和美国政府通过进步联盟提供的大量援助，危急的外债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在国际方面，卡斯特洛·布朗库政府明确地站在美国政治一边。这种站队的一个例子在 1965 年前几个月爆发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内战期间表现了出来。当时，美国派出 42000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进行干涉。巴西站在洪都拉斯和巴拉圭一边，并同意在所谓泛美和平部队的旗号下派出军队进行干预。

* * * * * *

1965 年 10 月，在 11 个州进行了直接选举。当时的情况是，大部分革命热情已经衰落。很难再用消灭腐败的宣传去蒙蔽人了，中产阶级的钱袋已经空虚。

尽管一些所谓武装力量的强硬派对某些候选人投了反对票，反对派还是在像瓜纳巴拉和米纳斯吉拉斯等一些重要的州取得了胜利。投票的结果使军界惊恐不安。卡斯特洛派的敌人，强硬路线集团在这一结果中得到了政府对敌手还是很宽容的证明。他们宣传建立一个对决策系统进行严密军事控制的专制政权，把反共产主义和反腐败的斗争更加引向深入。

在这些方面的压力下，卡斯特洛于1965年10月颁布了二号制度法，规定24天后进行各州的选举。二号制度法做了最后规定，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在公开大会上，由国会绝对多数议员通过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总统可以发布有关国家安全的政令—法，从而，他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政府可以通过政令—法对于一些重要的事务进行立法，甚至扩大到国家安全观念所希望的一切地方。

二号制度法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消灭政党。军人们认为，多党制是造成政治危机的因素之一。新国家末期成立的好歹还能表达不同公众舆论派别的所有政党就这样被取消了。

政党法强迫组织了仅仅两个政党：纠集了政府派人士组成的全国革新联盟和联合了反对派形成的巴西民主运动。加入全国革新联盟的大部分政治家是全国革新联盟的成员，人数上几乎和社会民主党相同；巴西民主运动由巴西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人组成。

* * * * * *

卡斯特洛政府驱使国会在1967年1月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从而完成了在国家组织机构方面的变革。再次被置于撤销委任资格威胁之下的国会，在1966年10月被关闭一个月，后被召回，是为了开通过新宪法条文的特别大会。

1967年宪法加进了赋予政府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方面以更大权力的法律条款。但是，没有保留那些允许再次撤销他们委任资格和使他们丧失政治权利等的特殊人物。

* * * * * *

卡斯特洛集团没有能够推出卡斯特洛的继承人。阿尔图尔·达考斯塔·席尔瓦和文职人员，全国民主联盟党员佩德罗·阿勒绍分别当选为总统和副总统，两人于1967年3月就职。

考斯塔·席尔瓦虽然是卡斯特洛·布朗库的战争部长，但他却是卡斯特洛集团之外的人物。这位被1964年的阴谋家们称为“叔”的人稳健地致力于军事生涯，包括从在美国接受训练的岁月，到在1961～1962年紧张年代里担任第四军军长。然而，他的风格不同于知识分子化了的卡斯特洛。他对军事战略的复杂读物不感兴趣，而更喜欢一些轻松的东西和赛马。比这些不同个性更说明问题的是在考斯塔·席尔瓦身上集中了武装力量中的强硬路线和民族主义专制分子的希望，而不喜欢亲美和向外国资本提供方便的卡斯特洛主义政策。

但是，他在权力上不是强硬路线的简单工具。他注意到社会上存在的压力，建立了与反对派沟通的桥梁，并设法听取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见。与此同时，在劳工领域里采取主动攻势，鼓励组织工会，任命可以信任的工会领导。这些运动却伤害了他的有限自由化政策。

二　政治封闭和武装斗争

自1966年镇压的第一个冲击波过去后，反对派又开始慢慢组织了起来。许多教会的高层成员和政府进行对抗，在东北部地区，奥林达和累西腓的大主教堂·埃德尔·卡马拉的行动表现最为突出。学生们也在全国大学生联盟周围开始动员起来。

在政治舞台上，站在边缘的拉塞尔达与他的传统敌人——壤

戈和儒塞里诺——开始接近起来，以组成广泛阵线。聚集在蒙得维的亚的阵线的领袖们决心为使国家重新民主化和重新确立劳动者的权利而斗争。

1968年对全世界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那年的总体环境中，社会运动取得迅猛发展。上街示威游行的催化剂是一位学生，在3月的里约热内卢的一次小型抗议活动中被军警打死。几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对暴力重新燃起的愤怒日益增长。这些事件为更广泛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不但团结了广大学生，而且团结了教会和中产阶级具有代表性的方面。这些致力于民主化斗争的力量汇集的最高点是1968年6月的所谓10万多人的大游行。

在同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两次气势凌厉的工人罢工——贝洛奥里藏特附近的孔塔仁罢工和大圣保罗奥萨斯库罢工。孔塔仁的罢工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而奥萨斯库罢工却是由工人和学生联合做工作而发起的，罢工一开始就占领了一家大公司。经过较量，产生了不良的结果。劳动部对冶金工作者工会进行了干预，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用暴力将工人从该公司驱逐了出去。

奥萨斯库的罢工受到了左派组织的影响，这些组织指出只有武装斗争才能结束军人专制政权的前景，他们深受古巴革命的榜样与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出现的游击队的影响。

在巴西，传统的左派组织——巴西的共产党——反对开展武装斗争。1967年，由资深共产党员卡洛斯·马雷格拉领导的组织和党决裂，组成民族解放联盟（ALN）。人民行动党已经选择了武装斗争，还有一些新的组织出现，在它们中，有大量左派军人参加的人民革命先锋党（VPR）。

武装斗争组织在1968年开始了他们的前期行动。一枚炸弹放在了美国驻圣保罗总领馆；也出现了“财产征用”，或称筹集资金抢劫。这些事件足以迫使强硬路线更加相信，革命正在变为输家，

需要创造新的工具来消灭颠覆分子。取消有限自由化的借口是一个表面上不动声色的行动——众议员马尔西奥·莫雷拉·阿尔维斯在国会上发表的一个被认为是侮辱武装力量的演说这样说。

这个广大公众不知道的演说的全文在军队单位里散发。在创造了一种愤怒的气候后，军人部长们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审判莫雷拉·阿尔维斯侮辱武装力量尊严的罪行。但这一诉讼案要依靠国会的允准。国会做出了出乎意外的决定，否决了中止这位众议员的议员豁免权的要求。在不到 24 个小时的时间里，1968 年 12 月 13 日，考斯塔·席尔瓦下达 5 号制度法，关闭了议会。

5 号制度法是一场革命中的革命，或反革命中的反革命工具。与前面的几个制度法相反，这个制度法没有有效期限。这个制度法使共和国总统又有了临时关闭议会的权力，这是 1967 年宪法所没有授权的。重新建立了总统撤销议员资格和中止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及免除公务员职务和令其退休的权力。

从 5 号制度法开始，政权的军事核心集中在所谓情报团体，即那些在监视和镇压机关领导岗位上的人物身上。开始了一个取消议员资格、中止政治权利、清洗公务员，包括辞退大量大学教师的新周期。实际上，建立了对新闻传媒的检查；拷问变成政府工作方法的组成部分。

5 号制度法的许多悲剧面之一在于它加强了自 1969 年以来频频发生的武装斗争集团的理论的事实。专制政权似乎也不能向社会压力让步和进行什么改革，日益走上一条残暴的专制独裁的道路。

* * * * * *

1969 年 8 月，考斯塔·席尔瓦患脑溢血，全身瘫痪。军人部长们决定取而代之，破坏了应由副总统佩德罗·阿勒绍继任总统的宪法规定。

激进左派开始劫持一些外国使团成员，用他们来换取释放政治犯。反响最大的一次行动是在里约热内卢劫持了美国大使。这一劫持取得了以 15 位被送到墨西哥的政治犯的释放来换取埃尔布里克大使。

军事委员会设立了用于所有“变为对国家安全不合宜、有害或危险”的巴西人被驱逐出境的惩罚。第一批被驱逐出国的就是用来交换美国大使的囚犯。还建立了对“颠覆战争”罪犯执行死刑的规定。这一死刑从来没正式起用过，他们更喜欢立即处决或“颠覆分子”在拷问过程中和公安人员发生冲突致死，或说成是秘密失踪。

直到 1969 年，海军情报中心是拷问犯人最肆无忌惮的机关。从那一年起，在圣保罗出现了与第二军有关，其行动范围集中在圣保罗—里约轴心地区的远征队行动局（Oban）。远征队行动局后来被 DOI－CODI 取代，这个代号是情报行动别动队和国内防卫行动中心的字头的缩写。情报行动别动队和国内防卫行动中心深入到许多州，是军人政权的主要拷问中心。

在国家正经历着一个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的同时，政府在经济方面却取得了成功。坎波斯和布灵埃斯部长在一段相对短期的倒退后重新取得财政平衡，财政部长德尔奋·内图通过对信贷扩张提供方便的方式，积极鼓励经济增长。同时建立了对物价的控制机制，以刹住自 1968 年从上升到 25.4%的平台上开始下降的通货膨胀。

1968 年，在汽车工业、化工产品和电器器材工业的带动下，工业得到了强劲的恢复。主要由国家住房银行提供资金，土木建筑有了很大发展。在 1968 和 1969 两年中，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 11.2%和 10%，按人均计算，增长速度分别相当于 8.1%和 6.8%。这样，开始了一个被称为“经济奇迹”的时期。

* * * * * *

在1969年10月中旬，考斯塔·席尔瓦虽然还活着，但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健康了。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委员会宣布总统和副总统职位空缺，定于10月25日，由国会举行总统和副总统选举。武装力量最高指挥部推举埃米里奥·贾拉斯塔祖·迈迪西将军为总统，海军部长欧古斯托·拉德马凯尔为副总统。

迈迪西和考斯塔·席尔瓦一样，是南里约格朗德军人。父亲是意大利人后裔，母亲是巴斯克人后裔。20世纪50年代，作过当时第三军区司令考斯塔·西尔瓦的总参谋长，并成为他的亲密朋友。他支持1964年运动，古拉特倒台后，他被任命为巴西驻华盛顿武官。在考斯塔·席尔瓦担任共和国总统后，他成为国家情报局局长。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迈迪西是个不太知名的人物。此外，他对于行使政权没有兴趣，经常让他的部长们代行政府职权。因此，总统领导权力分散的反常现象，造成一个如果不是巴西历史上最压抑的时期，也是最为压抑的时期之一。

起初，以其引人注目的行动造成使专制政权不稳定印象的城市武装组织逐渐衰落，实际上慢慢消失了。这种结果，首先是由于对包括职业青年在内的武装斗争积极分子及其同情者的镇压产生的效果造成的。另一个因素是孤立人民群众团体，使它们行动的吸引力即使不能说是完全消失，也要变得最小。激进左派想在巴西再创造一个新的越南，那完全是错误的假想。

还剩下一个巴西共产党开始在位于巴拉州东部靠近马拉巴的阿拉瓜亚河流域的某个地区建立的一个农村游击中心。在1970～1971年，一支大致有70多人的游击队和当地的农民建立了联系，教他们农业种植方法和注意卫生。1972年，军队发现了这个活动中心，但是，没有像以往对待城市游击队那样进行镇压。直到

1975年，那个地区变成国家安全区之后，军队才最后将其消灭，即逮捕了巴西共产党的这部分人。这一切广大人民群众甚至都不知道，因为当时禁止传播这些消息。最多是在各地流传着一些关于阿拉瓜亚游击队的各种不同的传说。

另一方面，在迈迪西政府时期，作为有利的经济条件、镇压和在小范围内开展的投废票运动的结果，合法反对派进入了低谷时期。在1970年的立法选举中，当参议院2/3的席位被更新时，全国革新联盟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迈迪西政府不局限于镇压。它对在社会上占少数、但是颇为重要的人，专制制度的敌对者和在经济繁荣年代里日常生活还过得去的人民群众加以明确的区分。在对第一部分人进行镇压的同时，对第二种人进行宣传，起码使他们保持中立。

1964年之后，电讯在全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个人贷款比较容易，使得有电视的住户数量大增。1960年，有电视的城市住户只占9.5%；1970年，这个比例达到了40%。在这段时期，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并成为它的发言人的环球电视台甚至发展成为全国性电视网，实际上，已经达到控制了这个领域的地步。政府的宣传有了一个在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表达渠道。“大强国巴西”节目的播出在人民的思想上产生了作用。在这个时代，许多巴西中产阶级上了年纪的人都感叹自己的生理条件不能活到巴西将赶上日本的下一个世纪。

* * * * * *

被称为“奇迹”的时期从1969年一直延续到1973年，这是一个超常的经济增长和相对低的通货膨胀率相结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2%，高峰的1973年达到13%，而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不超过18%。

奇迹的产生有一个具体的解释。以德尔奋为首，策划了这个

经济奇迹的专家们首先得益于以广泛占有资金为特点的世界经济形势。先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了这种取得外来贷款的新机会。这些非石油生产国的外债总额从1967年的不足400亿美元，增加到1972年的970亿美元和1980年的3750亿美元。

与贷款并肩同行的是，在巴西，外国资本投资增加了。1973年，全年引进的外资为43亿美元，几乎是1971年的一倍，超过1970年的3倍。

外国投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带动工业以3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发展的汽车工业。贷款向消费领域的扩展和生产指标的修订以及授权生产中型汽车，吸引了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大量投资。

对外贸易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扩大某些商品进口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需要。通过发放优惠条件贷款鼓励工业产品出口，减免税收和对出口进行补贴等措施，使出口向多样化发展。旨在减少巴西对单一产品的依赖所做的多种经营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在1947～1964年之间，咖啡占巴西出口总值的57%。在1965～1971年之间占37%，而1972～1975年之间仅占15%。再者，政府收取税收的能力增加了，为缩小公共赤字和通货膨胀做出了贡献。

然而，“奇迹”也有它的弱点和消极面。主要弱点在于过度地依赖财政金融制度和国际贸易，是这些造成取得外来贷款容易、促进外国资本转换和出口扩大等。经济增长也造成对某些进口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石油的需要越来越大。

“奇迹”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社会性的。德尔奋·内图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上述提供的方便和预先制订一个低估通货膨胀的水平上的工资增加指数，把资本积累放在首位。从个人消费观点看，工业发展，具体地讲，在汽车工业方面，有利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而低层次的劳动者的工资却被压缩了。

这些造成了前些年遗留下来的财富过度集中。如果把100作为1959年1月的最低工资指数，到1973年1月，这个指数便降为

39。如果我们注意到，在 1972 年，52.5%的经济活动人口达不到最低工资水平，22.8% 的人的收入在 1～2 个最低工资指数之间，那这个材料是很说明问题的。但是，财富集中的社会冲击力减弱了。工作机会的扩大允许每个城市家庭的工作人数有很大的增加。

"奇迹"的另一个在其后继续存在的消极面是经济发展和被国家耽搁甚至放弃的社会计划之间的比例失调。在世界大环境中，巴西一直以工业潜力的杰出地位和以衡量一个民族生活质量的健康、教育、住房指数低而著称。

"野蛮资本主义"是那些年代及以后的特点，规模宏伟的项目开发从来不顾及大自然和当地人民的利益。"生态"一词根本就没有进入当时的词典，工业污染和汽车污染好像是给予人们的一种祝福。在迈迪西政府时期实施的横贯亚马孙公路工程项目就是反映这种精神状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条公路是为保障巴西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这在军人看来，永远是个离奇的幻想——和保住在东北地区农镇[①]的劳动者而修建的。这条公路造成了许多破坏，却肥了承包公司，是一个失败的工程。

* * * * * *

像卡斯特洛·布朗库一样，迈迪西没能取得连任。1973 年中期，武装力量选定继承他的人选是埃尔内斯托·盖泽尔将军。

盖泽尔将军生于南里约格朗德，他是 1890 年移民到巴西的一个德国路德教徒的儿子。在致力于军事生涯的同时，盖泽尔将军还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最重要的职务是巴西石油公司总裁。他的眼睛也在注视着政治。他曾经和杜特拉政府合作并帮助提出了保证 1961 年古拉特就职的信约。作为战争高等学校常设团成员和

① 农镇是为亚马孙长途公路的建设者及其家庭居住和供应而设计建造的具有综合服务设施的居民中心。——译者注

卡斯特洛·布朗库的军事办公室主任，他同卡斯特洛集团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与“强硬路线”保持距离，对他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军队范围里，盖泽尔被选作总统人选，不是由于他支持专制政权自由化，而是由于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管理才能。他是陆军部长奥兰多·盖泽尔的哥哥的事实对他的被选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与盖泽尔对抗，巴西民主运动推出其主席乌利塞斯·吉马良斯作为象征性候选人，以揭露间接选举、取消自由和经济模式造成的财富集中。

一部1967年宪法修正案改变了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方法，规定设立由国会成员和各州立法代表大会代表组成的选民团。盖泽尔是由这种选民团选出的第一位总统。他于1974年1月当选，并于当年3月15日就职。

三　政治开放进程

盖泽尔政府是和这位将军总统规定的慢慢的、逐渐的和有把握的政治开放联在一起的。实际上，起初被称为松绑的专制制度自由化举步维艰，充满着许多小的前进和倒退。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盖泽尔受到保持着强大力量的强硬路线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希望能把开放控制在不确定的保守民主的道路上，以免让反对派过早地攀上政权。这样一来，开放是缓慢的、逐渐的和摇摆不定的，因为，强硬路线的存在直到菲格雷多政府结束，一直是一种倒退的威胁。

松绑战略是由总统和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戈贝勒将军提出的。为什么盖泽尔和戈贝勒决定促进专制制度的自由化呢？是反对派压力的结果吗？毫无疑问，1973年反对派开始发出清楚的单起炉灶的信号；天主教和国家之间的对抗对政府也是颇具消耗性的。盖泽尔的过渡班子设法同教会从谅解的共同点——反拷问斗

争——建立沟通的桥梁。

但是，反对派和教会不是显示松绑需要的灵敏的晴雨表。这个晴雨表处在武装力量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政府被镇压机关所左右，在武装力量的高层中产生了负面反应。这样，军队的功能和基本原则就被扭曲了，给它的完整一致带来了危险。为了恢复等级制，需要削弱强硬路线，软化镇压，并有序地促进“军人回军营”。

政府开始在幕后进行一场反对强硬路线的斗争。同时，同意通过政党上电台、电视，让1974年11月的立法选举在一个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进行。希望全国革新联盟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但是，当选举结果表明巴西民主运动，尤其是在各大城市和各个最发达的州获得巨大进展时，政府大吃一惊。1975年，盖泽尔把自由化措施和镇压的措施结合起来，中止新闻检查，同时授权对被控站在巴西民主运动胜利幕后的巴西共产党进行严厉的镇压。

政府和强硬路线之间的重要对抗终于清楚地发生在圣保罗。尽管游击队早已被消灭，但是，强硬路线的军人们还继续怀疑各地都有颠覆分子，还继续执行拷问实践，致使许多被镇压杀害的人“失踪”。

1975年10月，在一个镇压浪潮过程中，圣保罗文化电视台新闻部主任，记者弗拉迪米尔·埃尔佐戈被怀疑与巴西共产党有联系，便通知他去情报行动别动队—国内防卫中心。埃尔佐戈到情报行动别动队—国内防卫行动中心去报到，就再也没能从那里活着出来。他的死被说成是上吊自杀，这是一种掩盖事实真相——拷打致死的粗劣方式。

事件在圣保罗的职业中产阶级和天主教会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教会和巴西律师协会联合行动起来，揭发了当局一系列的拷问和掩盖杀人的事实。

几个月后，1976年1月，又在相同的情况下，用与杀害埃尔佐戈相同的方式杀害了冶金工人马诺埃尔·菲埃尔·费略，并且再

次按官方炮制的老调，宣称他是上吊自杀。这一次，盖泽尔决定采取措施了。他在圣保罗设立了一个经过第二军军长同意，起码不需经过他的平行权力机构。盖泽尔派了一位他完全信得过的将军取代了第二军军长，并开始用另一种语言建立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尽管在圣保罗暴力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在情报行动局—国内防卫行动中心的下属单位拷问犯人的情况结束了。

* * * * * *

1974 年 11 月的选举结束后，选举对抗成为政府关注的大问题。面临着 1976 年 11 月的县市选举，全国革新联盟失败的可能性是现实的。

在此前几个月，1976 年 7 月，一项变更立法选举的法令堵塞了候选人进入广播和电视的大门。尽管司法部长炮制的这个法尔庚法原则上既打击了全国革新联盟，也打击了巴西民主运动，但是受害最大的却是在野党，因为它失去了宣传自己思想的惟一机会。尽管如此，巴西民主运动还是在市长选举中获胜，在全国 100 个较大的城市中的 59 个市政厅取得多数。

盖泽尔缩紧了包围圈，1977 年 4 月，在让国会休会后，采取了以“4 月包裹”著称的一系列措施。在包裹措施中，有创造了旨在阻止巴西民主运动在参议院成为多数的人造参议员。人造参议员是通过一个选民团的间接选举选出，更确切地说，是“制造”出来的。

同时，在 1978 年，政府开始同反对党和教会的领袖们进行一些会见，讨论妥善解决恢复公众自由的问题。自 1979 年开始，5 号制度法停止执行，重新恢复个人权力和议会独立。

巴西民主运动在 1978 年的立法选举中取得很好的成绩。这个党成为表达人民一切不满的政治渠道，从自由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都加入到它的队伍中去。1978 年的选举运动得到了文明社会不

同党派成员：学生、工会主义者、律师、天主教基层组织成员的支持。这些团体在巴西民主运动和广大群众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减小了不能自由上广播、电视的严重困难的程度。

巴西民主运动获得了参议院选举有效票的57%，但是还没有成为这个院的大多数，这是因为参议院的代表不是按比例的，而是代表各个州的。此外，还有人造参议员的存在。全国革新联盟在联邦众议院中仍然是多数党，取得了231个席位，巴西民主运动取得了189个席位。巴西民主运动的选票仍然集中在最发达的州和各大城市。这个党在参议院的选举中获得圣保罗近83%的选票，里约热内卢州63%的选票，南里约格朗德62%的选票。不论怎么说，政府继续在国会中占多数。

* * * * * *

1973年10月，还是在迈迪西时代，由于阿拉伯国家发动的反对以色列的所谓赎罪日战争的结果，发生了第一次国际石油危机。这次危机严重地打击了汽油总消费量的80%依靠进口的巴西。

但是，当盖泽尔将军在1974年3月宣誓就职时，"奇迹"年代产生的一些喜悦气氛仍然存在。经济政策的领导权掌握在取代德尔奋·内图作财政部长的经济师马雷奥·亨里格·西蒙森和计划部长若昂·保罗·赖伊斯·维洛佐的手里。赖伊斯·维洛佐是迈迪西内阁的留任部长。

新政府抛出了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是1967年由罗贝特·坎波斯为恢复财政平衡和反通货膨胀提出来的。第二个发展计划设法完成了几十年前就开始努力地在巴西建立的以内容不断变化的国内产品取代进口产品的过程。现在，已经不仅是设法取代消费品的进口，而是要设法在基础工业产品（石油、钢铁、铝、化肥等）和资本货物生产领域走出一条自主的道路来。

第二个发展计划对能源问题的关注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个

计划决心发展石油勘察、核计划、用酒精代替部分汽油和水电站建设，该建设最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根据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在巴西—巴拉圭交界处的巴拉那河上建成的伊泰普水电站。伊泰普水电站在1984年开始投产，以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著称。

第二个发展计划积极鼓励大的私人企业进行在资本货物生产方面的投资。国家经济发展银行的整个鼓励和贷款制度都是在这种努力下抛出的。然而，新政策还是把大的国营企业放在巴西工业化舞台的中心。巴西电力公司、巴西石油公司、巴西电讯公司系统和另一些国营企业负责进行的巨大的投资，严格地讲，是这一计划的支柱。

1974年，选择刺激增长而不是经济刹车，代表了既建立在经济评估也建立在政治评估基础之上的一种决心。坚持刺激增长表现了领导集团强烈地相信巴西是一个注定要发展的国家。这种信仰不仅仅来自"奇迹"年代，而且来自更远的20世纪50年代。

另一方面，松绑战略不是要政府选择一种使最大的重压落在工人群众头上的萧条政策。如果说在经济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反对派还在增长壮大，那么经济进入萧条状态，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许多企业家，尤其是圣保罗企业家对于经济政策走向的疑问引起了反对国家过多干预主义的热潮。这样，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方面才可设法对直到那时一直被军人和技术官僚把持的政策舞台进行干预。

关于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将产生的后果，在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争议。在一端，人们从这一计划看到加速经济增长的一种不合时宜的企图，认为这种增长必将延误经济调整，使外债问题更为加剧。站在另一端的人，认为第二个经济计划是对巴西工业化方向的真正改变，通过这种改变，才能在替换进口产品的过程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们来做一个回顾性的分析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计划

受到国际经济萧条和利率提高的厄运的冲击，这里有个背景问题。它适宜出现在第一世界国家里，其后果正处于克服过程中的工业水平控制下。比如，钢铁、铝、氯化硷等都是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在这些说明之后，重要的是应该指出，从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开始，在国内产品取代国外进口产品，特别是石油产品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自“奇迹”阶段就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把发挥企业的闲余能力作为加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这一事实。为了经济的继续增长，需要扩大投资，取得更多新的外来资金，因为只靠内部节约是不够的。外资并不缺乏，它们主要是以贷款的形式进入国内的，但由此造成了国家与私人的外债增加。在 1978 年末，外债已经达到 435 亿美元，比 3 年前增加了 1 倍多。

此外，因为大多数的贷款都是以浮动利率取得的，所以外债利息偿还便更加沉重地压在国际收支上。由于这个时期以国际利率不断提高为特点，巴西开始负担起越来越重的外债利息偿还的信约。国际利率的提高是由竭力吸引外国投资来掩盖其国际收支赤字的美国政策造成的。

不能说通过贷款取得的资金都从窗子里扔出去了，或都用来中饱了中间机构的私囊。这些事情确实也发生过，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由把资金用在了开支巨大、管理不善、回报期长、或能否回报都令人怀疑的项目上造成的。

按毛估数字，盖泽尔政府时期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满意的。在 1974～1978 年之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6.7%，按人均计算增长 4.2%。通货膨胀同期平均上升 37.9%。但是，危险还是很多的。对通货膨胀的相对控制一直是靠人为因素维持的。在这些做法中就有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国营企业生产的商品，这使这些企业的赤字越来越大。外债不断增长，除了取得新的贷款别无其他出路。出现在眼前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币值调整机制和偿还高息，内债的重压也开始大起来，危及到了联邦预算。

工资值的年指数调整，即只能一年一年地调整，更加深了工薪阶层的不满。

* * * * * *

军人政权镇压了与民众主义计划有联系的工会领导人，但是，并没有摧毁所有的工会。在这个领域里，农业劳动者全国联合会（Contag）早在 1968 年就已经开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动，鼓励在全国组织农村工会联合会。全国农村工会的数目从 1968 年的 625 个，发展到 1972 年的 1154 个、1976 年的 1745 个和 1980 年的 2144 个。1973 年后，加入工会的农村劳动者大量增加——从 1973 年的 290 多万人增加到 1979 年的 510 万人——是受到了通过工会管理社会保障计划刺激的结果。

有战斗力的工会领导在教会的影响下，通过大地牧师委员会（CPT）出现了。这样在农村创造了一种令人好奇的情况，即政府的救助政策促进了活跃的社会运动的涌现。

曾经分裂了 1964 年之前的农村运动领导的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或劳工权利深入到农村的斗争方式取得了更确定的内容。根据开展活动地区的具体条件，各个工会强调一种或另一种斗争手段。争取拥有土地的斗争保持了下来，甚至扩大了；同时，一些罢工，如 1979 年开始的伯南布哥甘蔗收割者罢工，唤起了对农村世界新现实的注意。

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白领”工作者工会，不但包括银行职员和教师的传统领域，而且包括医生、卫生工作者和其他阶层的人。这些领域的工会组织在职业方面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自由职业者日益被有文凭的雇员所取代。

在盖泽尔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以新的面貌、新的势头涌现出来。工会运动采取独立于国家的形式重新出现，许多时候是从企业内部的生活中产生的，在那里，工人组织扩大了工厂委员会。

最富于战斗力的轴心从国营企业转到了汽车工业。在少数几个单位里集中了大量工人和圣保罗 ABC 地区地理位置的集中成为组织新的工人运动的重要的实用因素。比如，1978 年在圣贝纳尔多的机械—冶金工业中大致有 12.5 万名工人，遥遥领先于汽车工业；这个总数的 67.2%集中在千人以上的企业里。1976 年，在首府圣保罗，在同一个工业系统里就有 42.1 万工人，但是只有 20.8%的人集中在千人以上的企业里。

但是，这些必要的条件还不足以解释新工会运动的出现。新工会运动是从组织工作中产生的，在这种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许多时候是和教会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领袖们。许多工会律师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工人运动公开出现还和政治开放创造的气氛有关，尽管这种开放拖了很长时间才允许工人集众进行游行示威活动。

1977 年 8 月，政府承认，1973～1974 年的通货膨胀官方指数是受政府操纵的。由于这种指数规定了工资调整的指数，实际上使工薪阶层失去了那些年实际工资收入的 31.4%。圣贝纳尔多冶金工作者工会开始了一个要求调整工资的运动，为 1978～1979 年聚集了几百万工人的数次大罢工开辟了道路。工会主席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的领导形象在平日的斗争和在圣贝纳尔多举行的历届代表大会上树立了起来。

冶金工人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1979 年，近 320 万工人参加了全国大罢工。冶金工人举行了 27 次罢工，参加的人数达 95.8 万人；同时，爆发了 20 次教师罢工，团结了 76.6 万名工薪阶层人员。罢工的要求目标很广泛：增加工资、保证就业、承认工厂委员会和民主自由等。

诸多罢工的发展证明了保守派关于圣贝纳尔多是一个孤立的世界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事实。在圣贝纳尔多发生的事，在全国其他地方都产生了反响。但是，毫无疑问，圣保罗 ABC 地区的工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都带有自己特殊的标志。最重要的是它

取得了对国家的最大独立性、很高的组织指数——1978 年左右，有 43% 的工人是工会会员——和在传统左派，即巴西共产党的影响之外确立了自己的领袖人物。

* * * * * *

盖泽尔将军选定了自己的继承人，他就是在 1978 年 10 月 14 日的选民团大会上，打败巴西民主运动的候选人而当选的若昂·巴蒂斯塔·菲格雷多将军。指定菲格雷多将军为候选人经过了一番严峻的力量较量，因为，陆军部长席尔维约·弗罗塔推出自己作候选人和强硬路线的代言人在军界和议会进行试探。弗罗塔对政府发动攻击，指责政府迁就颠覆分子。总统免了他的部长职务，切断了他的升迁之路。

菲格雷多将军曾任迈迪西时期的军事办公室主任和盖泽尔政府的国家情报局局长。如此看来，他为贯彻缓慢的开放过程，同时设法削弱强硬路线做了杰出的工作。无论如何，被指定来继续促进开放的人竟然是一个镇压机关的头子的事实与开放是南辕北辙、相差甚远的。

菲格雷多时期把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共处的两个方面：扩大政治开放和经济危机的加深结合在一起。这位新将军总统在 1979 年 3 月就职，仍然把西蒙森作为计划部部长留在领导经济的岗位上。在当过一段时期的驻法国大使之后，德尔奋又回到了内阁，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在内阁里，他的职位经历了多次变迁。

西蒙森强行推行限制政策的意图受到许多方面的反对。在反对的人中，突出的有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受益的民族企业家和对取得挥霍条件及显示成就感兴趣的政府成员。1979 年 8 月，西蒙森辞去计划部长的职务。以“奇迹”创造人而深孚众望的德尔奋·内图接任此职。然而，此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方面，情况都与往昔不同了。第二次石油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石油提价，

加剧了国际收支问题。国际利率持续攀升，使情况更加复杂化。取得新的贷款越来越困难，而其偿还期限却在缩短。

热切希望通过控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实验仅仅是昙花一现。在外债债主的压力下，在1980年末，德尔奋被迫选择了休克政策。货币扩充受到严格的限制；国营企业的投资被切断，国内利率上升，私人投资也在衰退。

1981～1983年的衰退产生了沉重的后果。自1947年开始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以来，在1981年的结果是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下降了3.1%。在3年的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1.6%。受打击最厉害的方面是耐久性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工业，这些工业都集中在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造成了失业。

尽管带来了如此大的牺牲，但是，通货膨胀并没有明显地下降。1980年，年通货膨胀指数达到110.2%，1981年下降到了95.2%，而1982年又在回升（99.7%）。在那几年里，曾设计过把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结合起来的"停膨"方案。

巴西已无偿付能力，但是，当墨西哥政府在1982年8月宣布处于展缓期，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抢救时，巴西政府却还在拍胸脯。政府发言人仍以一副高傲的姿态说，巴西不是墨西哥。实际上，墨西哥展缓期是对已经无法取得外国贷款的孤注一掷。最后，在美元储备枯竭的情况下，巴西在1983年2月，不得不求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出于换取为数可怜的财政援助和恢复国际可信度的目的，巴西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方案。这个方案首先是努力改善对外收支情况，保持债务偿还。在国内，规定削减公共开支，进一步缩减工资。

接踵而来的是在巴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争执。在巴西国内，存在着反对限制措施和反对偿付外债利息的压力；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深表不满，因为协议没有得到执行。在这种气候下，国际债主既不对确定巴西偿还债务的新限期让步，

也不给予像对墨西哥那样优惠的利率。

尽管很艰难，但是，改善对外收支的努力还是取得了成果。自 1984 年开始，主要由于占突出地位的工业产品出口增加的拉动，巴西经济开始复苏。石油价格下降使它不再对总体进口有那么大的重压。除此之外，由于从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开始以来进行的投资，对石油和其他产品的进口减少了，但是，通货膨胀仍然在上升。

1985 年初，当菲格雷多离开政府时，财政情况有了暂时的缓和，国家又开始发展。但是，那些年的财政决算亏空很大。通货膨胀加快，从 1978 年的 40.8%，上升到 1984 年的 223.8%。同期，外债从 435 亿美元上升到 910 亿美元。

* * * * * *

菲格雷多继续走在盖泽尔政府开始的开放道路上。这一活动的领导权握在了戈贝勒将军和司法部长佩特罗尼奥·波尔特拉的手里。1979 年 8 月，菲格雷多从反对派手里夺过他们的主要旗帜之一：为大赦而斗争。但是，议会通过的大赦法包含了一些限制，并向强硬路线做了一个重要让步，也包括了赦放那些进行过拷问的罪犯。不论形式如何，这部法允许了流亡政治犯回国，这是在扩大公众自由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开放的进程继续受到强硬路线行动的干扰。一系列的罪恶行动以企图于 1981 年 4 月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会议中心搞爆炸达到了顶点，当时，在这个会议中心正举行一个有几千青年参加的音乐会。要引爆的炸弹之一还没有来得及放置，就在两个军人乘坐的车内爆炸了；其中一个当场死亡，另一个严重受伤。政府主导了这次调查，对事件的荒谬进行解释，为肇事者开脱。1981 年 8 月，民事办公室主任戈贝勒的辞职请求肯定和操纵这一调查有关。

* * * * * *

1965 年通过的选举法早已变成政权摄取者设置的圈套。选举越来越变成投票赞成或反对政府的全民公决。为了破坏反对派的力量，1979 年 12 月，政府经议会通过一项新的政党组织法，取消了巴西民主运动和全国革新联盟，并强迫新创建的组织的名称必须含有个“党”字。扛着不得人心的名称的全国革新联盟借机改头换面，变成民主社会党（PDS）。巴西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则只在它的名称里巧加了一个“党”字，于是，巴西民主运动变成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

只有一个统一的反对党的时代过去了。在面对着一个十分强大的共同敌人的同时，各种不同倾向也都聚集了起来。随着专制制度的开放，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人士开始涌现出来。从城市和农村的工会主义、教会和职业中产阶级中，产生了劳工党（PT）。建立在基本权利纲领和旨在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社会变革基础上的劳工党自荐代表全国广大工薪阶层的利益。劳工党采取与巴西共产党和苏联的信仰相反的态度，避开对社会主义性质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种情况和在它内部存在着相反的派别有很大关系。在一端，是社会—民主的同情者；另一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者。在工会范围里，党和圣保罗 ABC 地区的工会主义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随着卢拉形象的日益增长而取得的杰出地位，这个运动是组成劳工党最重要的中心之一。

布雷佐拉没有加入巴西民主运动党，企图以左派劳工主义的威望为资本，自行组织政党。一个司法决定撤消了巴西工党的名称，建立了民主工党（PDT）。

立场的不同也经常发生在工会范围里。团结了巴西各种倾向的工会主义代表的第一次全国劳动阶级大会于 1981 年 8 月举行。会上，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其中之一非常接近劳工党，坚持强

硬要求路线，在这种路线下，工人运动被认为比曲折的开放过程更重要。运动的发动中心是圣保罗 ABC 地区的联合工会。

另一派主张把工会行动限制在不危及开放过程的斗争之内。政治思想性不要太明确，认为为工人取得当前的具体利益很重要。这一派别包括了像圣保罗冶金工作者工会等一些由政治派性不强的工会主义者和两个共产党的成员控制的重要工会。

1983 年，和劳工党思想相同的工联主义成立了没有所谓温和派参加的全国统一中央工会（CUT)。温和派也于 1986 年 3 月成立了全国总中央工会（CGT)。这样，全国建立了设想不同、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两个工会中心。

非格雷多保持定于 1982 年 11 月举行选举的日程不变。尽管存在限制，其中包括还在生效的法尔庚法规定的限制，但是，选举运动允许进行广泛的辩论。1982 年 11 月，4800 多万巴西人投票选举从市议员到各州州长。这是自 1965 年以来第一次直接投票选举。

议会选举结果，无论是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民主社会党都取得了胜利。在州长选举中，尽管民主社会党在大多数州胜出，但反对派也取得了重要的胜利。反对派在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州获胜，在里约热内卢州，尽管出现了舞弊的企图，布雷佐拉仍然当选，继续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威信。

* * * * * *

1983 年，作为它的优势之一，劳工党发动了要求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的运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该党领导第一次准备同其他政党站在一条战线上。经过多次示威游行之后，1984 年 1 月，在圣保罗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参加者超过 20 万人。

从此以后，要求直接选举的运动，已经越过政党范围，变成一个几乎全国一致的行动。几百万人充塞了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街道，其热情在全国罕见。“立即直选”运动同时说明了人民示

威游行的生命力和各政党表达诉求的困难。人民把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直选上：一种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前景，而且也是许多问题（工资不按数发放、安全、通货膨胀）的解决办法，事实上，这些问题仅仅靠直选一位总统是不能解决的。

但是，在上街游行和民主社会党占大多数的议会之间是有距离的。直选取决于一部应由议会2/3议员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在人民的热切期望下付诸表决。在巴西利亚，菲格雷多由于害怕群众示威，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然而，尽管宪法修正案被通过，但是没有取得改变宪法条款所需要的票数。

否决直选总统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失望。总统继任战役在选民团中展开。民主社会党中出现了3个可能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人物：副总统欧雷里亚诺·查维斯、身为陆军上校的内政部长马里奥·安德列阿扎和保罗·马鲁夫。马鲁夫曾通过间接选举先后当选为圣保罗市长和州长，并以高票当选为联邦众议员。

政府候选人的选择在1984年已经不再通过军人组织，尽管在做决定时军人仍有一定的分量。马鲁夫同民主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一起进行了紧张的竞选活动，在1984年8月战胜了马里奥·安德列阿扎，取得被指定为候选人的资格。他的胜利导致了民主社会党中支持其他候选人的最后分裂。欧雷里亚诺·查维斯早在1984年7月即退出候选人名单，去做组织持不同政见派的工作，组成一个新的政党——自由阵线党。自由阵线党和推出坦克雷多·内维斯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的巴西民主运动党接近。两股势力达成了一致协议，组成民主联盟来对抗马鲁夫。坦克雷多·内维斯被指定为总统候选人，若泽·萨尔内为副总统候选人。

巴西民主运动党以十分保留的目光看待萨尔内，因为直到不久前他还是民主社会党主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代表这个党当选为参议员，也曾经是这个党的主席。他的名字和巴西民主运动党高举的民主化旗帜很少或毫无共同之处。但是，自由阵线党对于推举萨尔内问题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民主运动党只好让步。

没有人想像到在1984年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尽管是间接选举的候选人，坦克雷多出现在电视和集会上，增加了他的威望和人民支持他作候选人所产生的压力。马鲁夫竭力使出利用他个人魅力的老伎俩，企图一个一个地争取选民团成员的支持，然而，他的战略失败了。

1985年1月15日，坦克雷多和萨尔内在选举团取得了明显的胜利。通过复杂的道路和利用专制政权规定的选举制度，反对派取得了政权。

* * * * * *

1964年3月31日后在巴西建立的政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这是武装力量高层第一次直接掌握政权并担任政府的许多职务。军人很少这样分成尽管有相互接触点的各种派别，诸如卡斯特洛派、强硬路线派、民族主义派集体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为了迫使人们接受某个候选人，或迫使某些指导方针合法化，这些派别的每个政权都在变化，正像取得包括中层军官在内的武装力量最广泛的支持的意见在变化一样。

1964年建立的制度不是个人独裁。我们可以把它比做军事首长之一——某个四星将军——被选定在确定的时期里统治国家的共管制度。总统更替，事实上，是在军队内部进行的，先是根据具体情况，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听取军队各级意见，并由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做出最后决定。表面上，根据立法是议会选举全国革新联盟指定的共和国总统，但是，议会——除了反对派的选票——只是把上面来的命令合法化而已。

* * * * * *

军人们不是自己执政，许多时候，他们对于和他们分权的文

职官员控制得也不紧。1964年建立的政权给他们以很大的活动余地，把经济政策制订者，诸如德尔奋·内图、马里奥·亨雷格·西蒙森等人放在很显要的位置上。十分优待国家的官僚方面，特别是国营企业领导人，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作为重要的最后决策集团的军人和国家技术官僚的政权共管制度。

这个政权有专制的特点，但是，与法西斯主义不同。它不做发动群众支持政府的努力；不想建立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惟一政党，也不想构筑一种能够俘虏文人阶层的思想。相反，左派思想在各个大学和文化界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1945～1964年实行的代表制度和军人制度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这个制度发号施令的人不是职业政治家，就连议会也不是一个重要的决策机构。发号施令的是军队最高层、情报和镇压机关以及国家技术官僚。民众主义不再做被政权利用的工具。从前社会上声音比较大的团体——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学生和农民——失去了活力。但是，工会，尽管有许多领导人被镇压，实质上没有被摧毁。工会税仍然存在，这保证了工会的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机构还在扩大。

专制制度不等于统治阶级的一件简单的工具。这个阶级已经从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好处——不同的阶层得到的好处不同，但是，多年来一直没有参与领导掌握在强有力的财政部长和计划部长手里的经济政策了。

在经济政策领域里，1964年后不是一切都变了。国家在经济活动和经济调整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仍然存在。这个特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政府的不同而不同，盖泽尔政府的例子比卡斯特洛·布朗库政府的例子更典型。但是，如果说不是一切都变了，但还是有许多事情变了。在儒塞里诺政府时期设计的模式取得了广大的发展空间。国外贷款和鼓励引进外资变成提供资金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跨国公司与国内公司、国营公司和私人公司中的大公司优先受益。这样，军人政权明显地

同建立在民众主义计划之上，包括促进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的自主发展经济的意图在内的古拉特政府决裂。

* * * * * *

由于坦克雷多当选，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并没有结束，却陷于没有预料到的前景之下。新总统就职定在1985年3月15日，但是没能如愿实现。在一次国外访问之后，坦克雷多匆匆住进巴西利亚的一家医院，在一些政治家和亲朋的陪伴下，接受了第一次有争议的手术。在此期间，萨尔内登上了高原宫的台阶，代替当选总统宣誓就职，人们都认为这是暂时的情况。

接着，坦克雷多处于垂危状态，转院到圣保罗，并进行了一系列手术。全国都在满怀悬念地关注着医疗简报，其中一些简报带给人们的是虚假的乐观。坦克雷多于4月21日——拔牙者的象征忌日去世。成千上万的人群走上街头，送他的遗体出圣保罗，经巴西利亚和贝洛奥里藏特，到他出生的城市安葬。一个总统在如此痛苦的条件下死去而引发的激动驱使一部分人上街游行。然而，人们痛感在一个微妙的时刻，国家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人们的这种感触是有理由的。坦克雷多在政治界具有一些罕有的品质：正直、不偏不倚、立场连贯一致。这些品德，都超越了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的思想境界。

* * * * * *

更令人对坦克雷多深为怀念的是，代替他的是一个在民主联盟中缺乏权威，而且是他最后一刻的反对派。萨尔内就是在这样一种坦克雷多·内维斯的形象强烈存在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任命了由坦克雷多指定的内阁。从政治角度看，其注意力着重于两个方面：废止军人政权遗留下来的仍在限制民主自由的法律——即

所谓的“专制瓦砾”；选举出一个负责制订一部新宪法的制宪代表大会。萨尔内尊重公众自由，但是没有切断同过去有联系的一些环节。比如，保留了国家情报局，并继续接受巨额的活动经费。

1985 年 5 月，立法确定了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的制度，并通过了文盲具有投票权以及使所有政党合法化。巴西共产党和巴西的共产党也变成了合法政党。由于斯大林主义危机和劳工党在左派中间日益增长的威信，这些党变成了小党。

国民制宪代表大会选举定于 1986 年 11 月举行。在这一天，也将选举议会和各州政府。当选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将担负制订新宪法的任务。

* * * * * *

当萨尔内在 1985 年上台执政时，经济状况不像前些年那么严峻。在出口的巨大推动下，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进口减少和出口增加造成了一个 131 亿美元的贸易结算盈余。这个盈余可以用来进行债务利息偿还。此外，到 1984 年底，巴西积累了多达 9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就有了和债主讨价还价的余地，政府可以无须再忍受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引起的不适之感，而集中力量直接与私人债主银行达成协议了。但是，外债和内债问题还将达到惊人地步的通货膨胀——1984 年为 223.8% 和 1985 年为 235.5%——问题一样长期存在。

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多尔内勒斯——坦克雷多·内维斯的侄子——采取了一个传统的反通货膨胀的方案。然而，反对严厉控制公共开支政策的压力和争夺政府中战略职务的斗争迫使多尔内莱斯在 1985 年 8 月辞职。代替他的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行长迪尔松·傅纳罗。这位圣保罗企业家和原圣保罗政府财政局长，征求了和许多大学有关系的经济学家的意见，很少有人赞同通过衰退途径来消除通货膨胀的方案。当迪尔松和计划部长若昂·萨亚德

掌握经济领导大权时，正是萨尔内政府最困难的时候。政党之间的争夺增加；对他的宠信朋友和经济集团的指责越来越多；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个除了照顾私人利益毫无作为的总统形象。

和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有关系的一个经济学家小组一直在批评控制经济活动和缩减国家赤字必然会降低通货膨胀的论点。他们以1981～1983年的经济萧条为例，在那段期间里，国家以很高的社会代价倒退，而通货膨胀却没有明显的降低。这个例子和发达国家的例子截然相反，在那些国家里，尽管也引起许多麻烦，但是，仍不失为反通货膨胀的一个有效的武器。

为什么在巴西这些就不能奏效呢？中心论据说，在像巴西实行的这种指数经济中，已往的通货膨胀被作为“惯性通货膨胀”嵌入未来的通货膨胀。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只有打破这种指数经济机制，才能从这种循环中走出来。只有通过结束币值调整和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新货币来取代已经衰颓的克鲁塞罗的冲突疗法，才会有效打破这种机制。实现这一建议——一个抛出后引起强烈反响的冲突疗法——是为正在寻求建立威信的政府的政治利益服务的。

* * * * * *

1986年2月28日，萨尔内通过国内的一家广播电视网向全国宣布了克鲁扎多计划。克鲁塞罗将以1000：1的比例，被一种强有力的货币——克鲁扎多——所代替；废除指数经济机制；无限期冻结物价和汇率；房租冻结一年。要关心劳动人民的景况不要恶化，甚至要有所好转。最低工资按照最后6个月的平均值，再加8%的货币补贴进行调整。以后，每当通货膨胀达到20%，工资将自动进行调整。

萨尔内号召人民帮助他执行这一计划，开展一场生活之战，即消灭通货膨胀之战。一夜之间，总统威望骤升。冻结物价在人

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回响。人民不注重经济的曲折复杂性，而更愿相信某个领导人的一厢情愿的行动。在工资领域的措施为贫困阶层提供了一定的喘息机会。一种无限乐观的气氛笼罩全国，交通却变得不堪重负，作为回报，许多人在平生中第一次开怀痛饮。

欢喜若狂的第一个热潮过后，克鲁扎多计划开始漏水了。这个计划是在经济活动正在发展的时候抛出的，在许多情况下，它造成了实际工资的增长。由于物价被冻结，从肉和奶直到汽车和国外旅游，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消费热潮。结果，冻结开始被破坏。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由人为加强的巴西货币推动了进口增加，从而引起对外收支失衡。

当 1986 年 11 月进行选举的时候，克鲁扎多计划已经失败，但是，对于这些广大人民群众一时还觉察不出来。巴西民主运动党的候选人可以把这个计划的问题归罪于这个或那个方面。选举过后，国家税率和间接税收延迟的增加导致了通货膨胀爆炸。对外收支危机迫使巴西在 1987 年 2 月宣布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一律实施展缓期。跟随克鲁扎多计划带来的欢喜之后的，是人民对经济方向的一片失望和不信任的气氛。

1986 年 11 月的选举表明，巴西民主运动党和政府在那个时候还保持着巨大的威信。民主运动党在除塞尔希培州之外的所有州的州长选举中获胜，并取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绝对多数的席位。在那个时候，甚至可以说，巴西有发生“墨西哥化”的危险。民主运动党可能成为一种类似垄断了墨西哥政权许多年的革命制度党。

* * * * * *

国民制宪大会于 1987 年 2 月 1 日开始举行。全国的希望和注意力集中在制订一部新的宪法上面。希望这部新制订的宪法不但要规定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基本机构，而且也能解决这些范围之

外的许多问题。

制宪是个长期的工作，直到 1988 年 10 月 5 日新宪法颁布时才算正式结束。宪法条文反映了不同社会集团的压力，从而加进了一些从技术观点看是不符合宪法性质的内容，所以，从实行一开始就受到了许多批评。在一个法律很少奏效的国家，各个集团竭力在宪法条文中最大限度地规定确保其执行的准则。

1988 年宪法反映了发生在巴西全体公民和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所谓的少数民族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的进步，也顾及到了其他一些革新措施，比如建立了资料取用保护权，以保障人们从政府单位的档案馆中获取他经常感兴趣的资料的权利，并预先规定要制订一部保护消费者权益法等。

同时，由于全球化世界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新现实，宪法确认了多年来一直设法克服的情境。赋予国家在石油、电讯、电力、港口和公路运输方面的垄断权很快便成为在提供货物和服务方面的障碍和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无法承受的负担。在近几年中通过的几个宪法修正案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清楚的证明。

鉴此种种，1988 年宪法只能被看做最后消除了专制制度正式痕迹的里程碑。盖泽尔将军 1974 年开始的开放，用了 13 年的时间，才达到一个民主制度。

* * * * * *

军人专制政权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是在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南美洲国家的更大的环境中进行的。和几个重要的邻国相比，巴西还是走在前面的。作为马拉维纳斯灾难性战争的后果，阿根廷独裁政权于 1983 年突然倒台。皮诺切克政权的结束发生在 1987～1988 年。鉴于在这些国家有发生尖锐的社会冲突的可能，它们好像成为几个力争避免事端发生的例子。无论是政府内的开放倡导者，还是许许多多的反对派人物都在寻求一个顺利过渡的模式，但不

是在拉丁美洲国家，而是在西班牙。

然而，巴西的情况和西班牙的情况相比，不同点比相同点要多。西班牙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组织联系程度比在巴西的要高，赋予担任这些群体领导的人的代表性也更强。这有利于蒙克洛阿公约所达成的广泛谅解，而在巴西做的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在政治人物层面上，巴西缺少一个像胡安·卡洛斯国王那样的人物，他不但是国王，而且还有在军队工作的经历。他有足够的威信使各派政治力量接近，进行顺利过渡。

为什么巴西的过渡期这样长，它的做法的后果如何？“慢慢的、逐渐的、有把握的”过渡战略出自政府自己。如果反对派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这些，或者，如果说是专制政权本身的消耗导致了它的垮台，那这种战略只能用自己的节奏和广度去变化。发生的事实既不是这，也不是那。

巴西过渡的优点是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但是，也有没把对保障人民政治权利走得很远的问题提出来的缺点。说这些问题是由于专制制度产生的，那是不恰当的。机会不平等、没有令人信任和面向公众的国家组织、腐败、顾主主义等在巴西都是根深蒂固的痼疾。毫无疑问，这些弊端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克服的，但是，在过渡时期的关键时刻是应该认真面对的。

几乎所有政治活动家达成的争取民主的表面总协议的事实有利于一个与真正民主相反的实践的继续。这样，专制主义的结束把国家带到比一个巩固的民主制度更加“民主的境地”。巩固民主是政府和社会在1988年以后的年代里的中心任务之一。

共和国总统直接选举从1960年第一次举行后，直到1989年才又再次举行。新宪法规定，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有效票数50%以上的候选人即被认为当选。假如所有候选人均未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再进行第二轮争夺。

后一种设想的发生成为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和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席尔瓦面对的现实。卢拉强调社会不平等的主题，

号召人民组织起来。科洛尔则坚持反腐败，使国家现代化和缩减公共开支，集中力量批评一些绰号为“官老爷”的政府官员工资过高。

双方进行了一场实际上没有政党支持，但由媒体尤其是强大的环球电视台的支持的争夺，科洛尔打败了卢拉，取得将近 3600 万张选票，对手取得 3100 万张选票。

这次大选证明了两个重要的事实。巴西正在变成一个具有 1 亿多选民的群众大民主的国家，这些选民以多达 85% 左右的比例参加投票，在以后的选举中情况也类似。这种投票的高出席率不但是由投票是 18～70 岁公民的义务这个事实造成的，而且也是由巴西公民赋予选票的强烈的象征价值造成的。1989 年选举的另一个有意义的事实是作为人民领袖确立起来的卢拉的意义重大的得票总数。

胜出的候选人，尽管有精英们将之作为战胜左派候选人的工具而给予的支持，但仍然是个被以保留目光看待的人物。这个小小阿拉戈阿斯州州长和该州的一个通讯企业的企业主，与国家中南部的财团和大工业很少有联系。

当科洛尔 1990 年 3 月宣誓就职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 80%，还有进一步升级的威胁。科洛尔宣布了一个激进的经济计划，封锁所有银行现有存款 18 个月，仅允许最多 5 万克鲁塞罗的提款。计划还规定了冻结物价，削减公共开支和提高某些税收。同时，科洛尔也开始采取了旨在促进国家现代化的措施，并开始对国营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实行对外贸易开放和裁减公务员。但是做起来却没有任何可循的章法。

时间不长，由总统的弟弟——佩德罗·科洛尔——开始的对政府令人惊恐的腐败的揭发，驱使联邦众议院于 1992 年 9 月，投票决定科洛尔离任，参议院甚至认为这是一项弹劾请求。全国电视网跟踪的调查进展和中产阶级青年走上街头要求弹劾总统的运动，预告了科洛尔再也不会回到总统位置上去了。意识到失败的科洛

尔终于于1992年12月宣布辞职。尽管如此，参议院还是判其犯有责任罪，被中止政治权利8年。

在一个无论在公事上还是私事上都不以诚信为主要特点的国家，一个共和国总统因受贿而倒台的原因可以有几种解释。一方面，科洛尔在对他的问题调查过程中表现拙劣，把发生的问题尽量缩小。这使他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本来就不占大多数的国会的支持。同时，他从来就没有与之处好关系的经济精英离开了他。另一方面，中产阶级青年——厌恶政界贪污程度的指示表——的迅猛异常的运动感动了国会，也是总统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军人政权的原温和反对派、米纳斯吉拉斯州原参议员、副总统伊塔马尔·弗朗哥担任了共和国总统。他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在科洛尔所采取的失败的经济措施面前，压缩通货膨胀。在新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月，1993年1月，通货膨胀已经到了29%的边缘，在同年的12月，超过了36%。

1994年的前几个月，财政部长费尔南多·恩里格·卡尔多佐开始采取另一个经济稳定计划的准备措施。在施行了第一批措施后，他离开了财政部去进行共和国总统竞选活动。这位受到人们高度尊重的知识分子成功地从学术生活过渡到政治生活，当他决定以由巴西民主社会党和自由阵线党组成的联盟为基础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对广大群众来说，还是一个不太知名的人物。雷亚尔计划是在1994年7月推出的，和以往的计划相比表现了鲜明的不同。因为类似的事情前几年已经发生过，人民并不感到惊异。这个计划创造了一种取名为雷亚尔的新货币，币值比美元高。清理外债和巴西积累了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事实对这一计划提供了支持。这一计划不规定雷亚尔和美元之间的固定关系，规定这种货币可在一定的界限内摆动。阿根廷货币比价引起清偿能力发生严重问题的例子为巴西不再重蹈覆辙起了作用。

稳定计划不冻结物价，只建议逐步取消指数经济机制。货币兑换活动——由克鲁塞罗兑换成雷亚尔——不仅仅是象征性的。

在一个不但从组织程度，而且从人民的接受程度上都有重要意义的兑换活动中，几个月的时间内，全国所有的货币都兑换成了雷亚尔。

在1994年10月的选举中，费尔南多·恩里格在第一轮选举中以取得近54%的有效票当选为总统。再次参选的卢拉居第二位。大选的这一结果是由各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是，雷亚尔计划起了决定性作用。反对派，尤其是劳工党犯了一个对形势估计不足的严重错误，硬说雷亚尔计划只不过是个“选举的诱饵”，短期内将引起严重的倒退。在一个战略时刻抛出，并在总统竞选中对费尔南多·恩里格胜出做出巨大贡献的雷亚尔计划没有像上面讲的那样。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倒退，由于通货膨胀明显的连年下降，广大群众的购买力有了提高。

四 1950年之后的结构状况

巴西总人口从1950年的5190万增加到1999年的1.64亿。这样，在40年的过程中，增加了两倍多。根据1980年的人口普查材料，巴西人口按性别而言是几乎是对等的：女性5980万；男性5910万。在这个总人口中，白种人占大多数（54.2%），接下来是混血人，首先是黑白混血人（占38.8%）、黑人（占6%）、黄种人（占0.6%）和没有肤色声明的人（0.4%）。白人人数可能偏高了些，这是因为一部分人的思想偏见所致，一部分混血人宁愿申报自己是“白种人”。

这是一个实际上很年轻的民族，有几乎一半（49.6%）在20岁以下。然而，正像从1960年以来发生的那样，老龄人的指数，即每100个青年人（15岁及小于15岁的人）平均的老年人（65岁及以上的人）人数在增加。这个指数从1960年的6.4%增加到1970年的7.5%和1980年的10.5%。

最重要的人口现象是出生率，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出生率在下降。在20世纪40年代，巴西妇女平均每人生6.3个孩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出生率急剧下降，根据图1提供的资料，2000年达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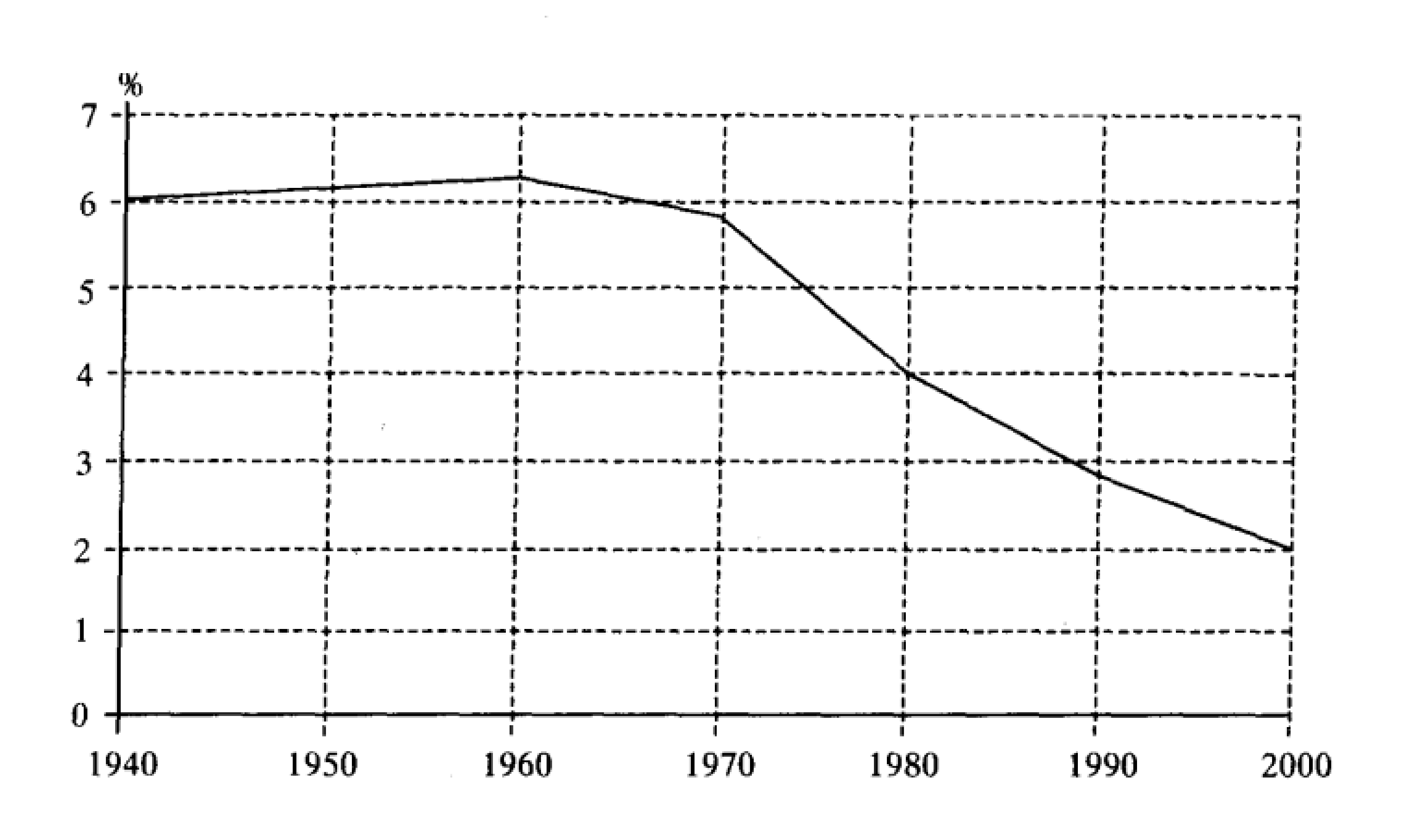


图1　总出生率(1940～2000)

资料来源:巴西地理统计学会,《数字巴西》卷7,1999,第78页。

表面上，出生率下降首先是由开展妇女避孕和绝育运动造成的。由于流产被认为是犯罪，除特殊情况外，人们说不清是否存在推广这种实践的情况。但无论怎么说，避孕方法的应用不但反映了被天主教严厉批评的政府政策，也反映了妇女和夫妇少要孩子的愿望。在这种愿望的诸多理由中，突出的一点是人们意识到无力抚养多个子女和给他们提供最起码的受教育的条件。

尽管出生率下降，但由于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人口增长率仍然很高。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口年增长率（2.3%）和不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2.4%）相当，但超过发达国家平均增长率（0.6%）的近3倍。但是，由于死亡率再大幅度下降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将来，只有降低出生率才能造成人口增长的进一步降低。

1996年的资料表明，巴西人口增长下降到了1.2%。

* * * * * *

从东北部和米纳斯吉拉斯向中南部地区的人口大转移和占领农业疆土的行动，对于人口的地区分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疆土起初在巴拉那，后来在国家的中西部地区（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和东北部地区（朗多尼亚）。东北部人口向中南部地区的大迁移，一方面是由工业化的飞跃发展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东北部地区，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剧烈旱灾造成的。

人口向国家的中西部和西北部地区转移，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成为第二大移民现象。起初是由联邦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机会推动的。建设巴西利亚可以被看做所谓“向西部进军”的一个里程碑，这也是瓦加斯政府在新国家时期就已经宣明的夙愿。移民向巴拉圭的方向的运动超过了巴西国家的边界，在那里，已经有大量主要是从事大豆和咖啡种植的被称为“巴西巴拉圭人”的独立劳动者长期定居了。

记取人口向空无人烟的地区迁移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是很重要的。在创造新的发展机会的过程中，边界对减少在早已开垦的地区的土地压力做出了贡献。没有这种情况存在，为占有土地而发生的冲突将会比现在的规模大得多。

* * * * * *

在上述这段时期里，城市人口大大增加了。以认为只有2万或2万人以上的居民聚集点才是城市的定义为准则，我们可以看到，在1940年仅有16%的人生活在城市里，与这种情况相对照，在1980年巴西大部分人口（51.5%）都变成了城市居民。这个比率在1996年已经达到了76%。

这个转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非常快。为了有一个对比的概念，在美国，人口中的城市居民从25%增加到64%，用了80年的时间——从1870到1950年。1980年左右，居住在城市中的美国人的比率是61%，比同年居住在城市中的巴西人的比率没有高出很多。对比到此为止。美国和巴西的城市人口的财富分配和生活质量分配情况表明两个国家具有被数字资料掩盖了的深刻的质的不同。

城市化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工业特别是各种服务行业方面扩大了就业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农业疆土的存在、合股人被驱逐、只能吸收少数劳力的机械化趋向的发展和农村活动的变革，把大量农村人口推向城市。

在1980年，就有9个州首府已经有100万以上的居民；这个数字在1990年上升到了1100万，圣保罗居首，接下来是里约热内卢、贝洛奥里藏特、阿里格雷港，其后是其他城市。

* * * * * *

尽管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工业化有所进展，但是，在1950年巴西仍然被认为主要是个农业国。在此后30年里，情况变化了许多，致使这个定位不再是事实。在1950年，59.9%的经济活动人口集中在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劳动上，这个比例在1980年下降到29.2%。这种初级产品方面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在1950年是24.2%，而在1980年仅为9.8%。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各个部分的分布表明，服务业创造了生产总值的59.7%，工业创造了生产总值的32.3%，农业创造了生产总值的8%。

说明这一变化的另一个资料集中表现在巴西出口产品结构上。在多年的过程中，原料产品——比如咖啡和铁矿砂，除大豆之外，和工业化产品相比都逐渐失去了重要性。从1978年开始，这些产

品在出口值上超过了原料产品。但是，在工业化产品中，也有许多像橙汁那样的工业加工程度很低的产品。

工业比农业实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的事实不意味着农业发展停滞了。相反，一系列的变革发生在农业生产结构上，深深地触及了劳动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几年，在实现了最后一次飞跃之后，咖啡失去了它在出口产品中的重要性。咖啡的出口高潮正是出现在1950年，当时它占巴西出口总值的63.9%。从那时开始，在国际竞争和价格下降趋势面前，咖啡日趋衰落，以致到1980年仅占出口总值的12.3%。1996～1998年的资料显示，在这些年里，大豆作为农产品出口主要项目，超过了咖啡。

咖啡的大量种植被取消，取代它出现了在帕拉那的大豆和在圣保罗内地的橙子种植。尤其自酒精促进公司创立开始，在圣保罗和东北部地区的甘蔗种植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无论在甘蔗生产，还是橙子生产方面尽管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独立生产者仍然存在，而且，在这两个领域中出现了建立农工业——同时是生产者和加工者——的倾向。鉴于建立农工业所需要的资本规模，出现了一种创立寡头销售市场的强劲倾向。

咖啡被其他作物取代和牧场扩张的后果之一是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者的数量下降。此外，农业生产活动的合理化，在追求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和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引发了中南部的雇农和东北部的居民旧制度的危机。雇农或居民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浮标”，即在特殊季节，比如在抢收甘蔗和橙子的时节雇来在庄园里干活的临时工。和雇农相反，这种临时工只参加一部分农村生活。他们住在靠近大庄园的城市里，在那里，他们直接被农工业主或在中南部被称为“猫”的中间人雇佣来做工。在圣保罗内地的城市里贫民窟的出现，尽管没有首府的贫民窟的规模那么大，但大部分都是由这些贫苦劳动者队伍的形成造成的。

说这些“冷浮标”是相当于把资本主义关系引进农村的城市

工人的农村变种，也许还为时尚早。大庄园现代化的典型形式，在于引进机器和以数量虽少，但经过一定训练的工人来彻底取代大量水平低的普通劳动者。时间将会告诉人们这个过程是否将缩小“冷浮标”这种人的重要性，或干脆使他们消失。

农村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作为它的后果之一，带来和这种性质的劳动相联系的要求的增长。对于临时工来说，占有土地最多只是一个梦想。他们需要设法通过罢工和谈判，取得具有雇佣劳动者特点的好处和权利。

在最近的一段时期里，临时工的社会问题为无地农民运动进入舞台开辟了场地。在以一种农业社会主义为视野的人们的领导下，在被称为天主教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无地农民运动在组织土地被剥夺者的斗争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尤其在他们开展斗争的初期，对费尔南多·恩里格·卡尔多佐政府加速施行他的土地改革计划是一个施加压力的强大工具。

然而，在以后的岁月里，无地农民运动加紧了他们的激进行动——占领土地，占领国家大楼，摧毁道路收费站，在企图进行社会革命的道路上，表现出一种暴力的倾向。这样，就变成一种长期不稳定因素，从而，为政府采取防卫措施，但不能是为州军警施行暴力提供了借口。

需要注意到，农村现代化和财产的集中是发生土地运动的重要因素。在 1980 年，拥有 10 公顷以下的农业单位被认为是小庄园，占庄园总数量的 50.4%，但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 2.5%。在另一端，大庄园——拥有 1 万公顷以上的农业单位——仅占庄园数的 0.1%，但是却拥有土地总面积的 16.4%。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改革的旗帜没有消失，然而改变了重点。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它把社会目的和经济目的结合在一起。它的捍卫者既坚持农村劳动者占有土地的权利，也坚持土地改革在鼓励食品生产和使被排挤到市场上去的劳动群众一体化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消费市场的扩大被认为是对工业化过程发展不

可缺少的因素。

军人政权建立后，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土地改革被放弃了。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军人政府放弃了通过贫苦人民消费能力的增大来扩大需求的前景，而更偏向以鼓励面向中、高收入阶层的耐久性消费品——最典型的是汽车——的生产来代替它。

这种选择和农村发生的变化，在当今使土地改革的经济层面变得相对次要了。也有人坚持认为农村新建企业的生产发展必须依靠一个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家的投资和帮助。这样，土地改革对于被剥夺土地所有权的群众变成了一个社会司法问题。

贫穷或极端贫困的生产者仍然是大量的。1975 年，近 364 万个或说占总数 73%的农业单位，种地还不用犁，不论是机械牵引，还是兽拉犁。1980 年，同样规模的农村家庭（73%）的人均现金收入仅相当于半个最低工资，甚至还要低。和这种景况相对照，国家南部和东南部主要从事小麦和大豆生产与东北部从事小规模水果生产的家庭的收入要好一些。

* * * * * *

在 1950～1980 年之间，巴西变成一个半工业化的国家，具有所谓第三世界所有国家最高的工业产品。工业自动化程度也有了很大提高。根据 1985 年的资料，国家所需要的资本工业产品（机械、设备）的 4/5 可以就地满足，无需通过进口来解决。自 1981 年开始，出现了一个强烈衰退阶段，尽管在 1984～1987 年之间有一段恢复时期，但还是延续了许多年。

在 1950～1980 年期间，传统工业的衰落倾向在加重。非耐用性消费品，比如饮食产品工业生产值下降。另一方面，其他产品，特别是耐用性消费品和资本货物增加了。耐用性消费品的尖端领域是占国民生产总值 10%左右的汽车工业。工业结构的变化发生

在包括东北部在内的全国所有地区。东北部工业的一对经典——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被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所代替，其中化学工业占首位。由糖和酒精生产等许多厂家组成的农工业联合体中，和汽车工业有关系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占了突出地位。外国企业数量不多，但在质量上表现的很重要。1991 年，被认为销售旺盛的 15 家私人企业中，巴西的企业只有两家。

多年来，实现了外国投资来源多元化。美国资本的传统优势地位得到了保持，但是，来自西班牙的小规模投资的大力扩张表现突出。

* * * * * *

在教育方面，根据图 2 表明的，15 岁或 15 岁以上年龄段的人，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文盲比率在持续下降。但是，尤其要注意到像东北部等一些地区的地区比重，正如同所选定的国家（图 3）的比较材料指出的那样，巴西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要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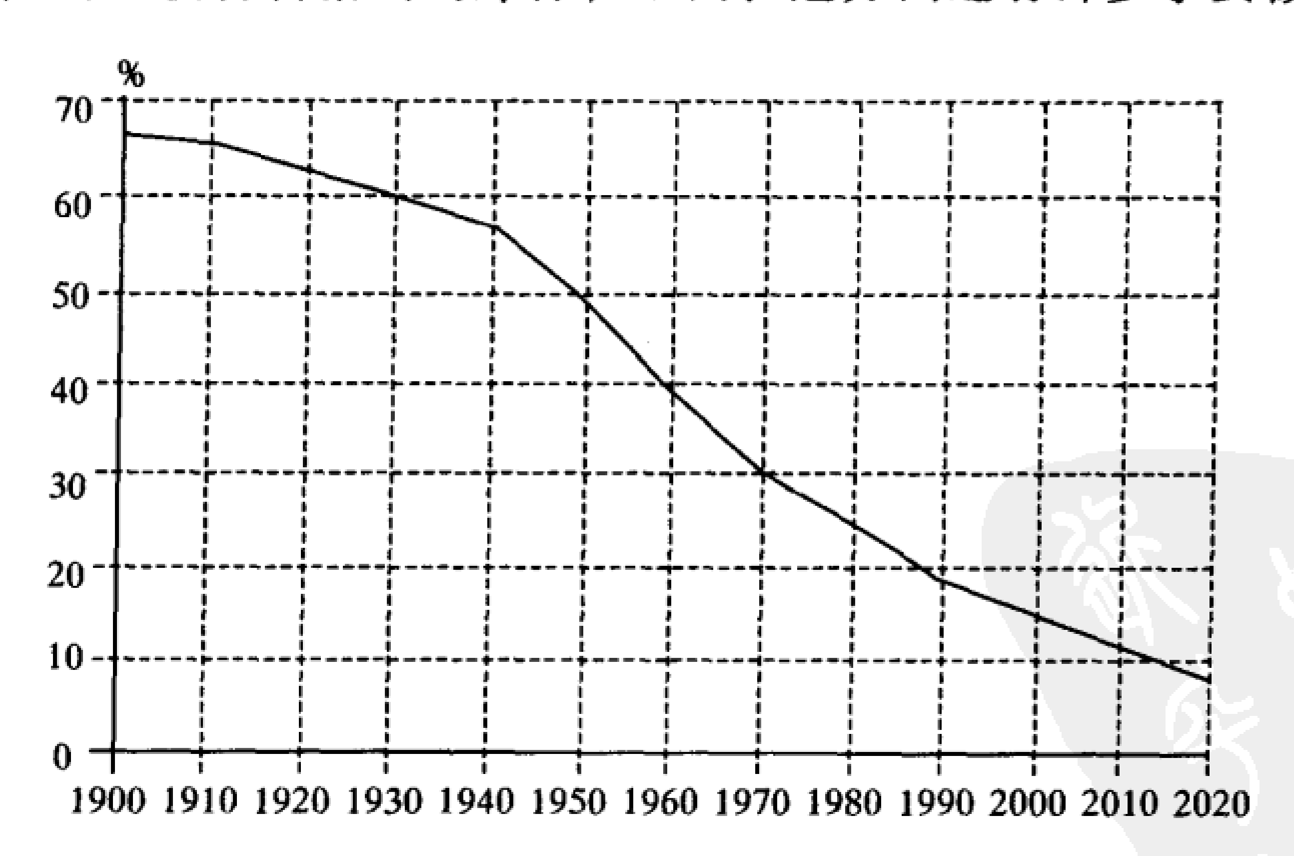


图 2　15 岁或 15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比率(1990～2020)

资料来源:巴西地理统计学会,《数字巴西》卷 7,1999,第 127 页。

1910 年和 1930 年的文盲率是两个极端。1992～2020 年之间的材料是计划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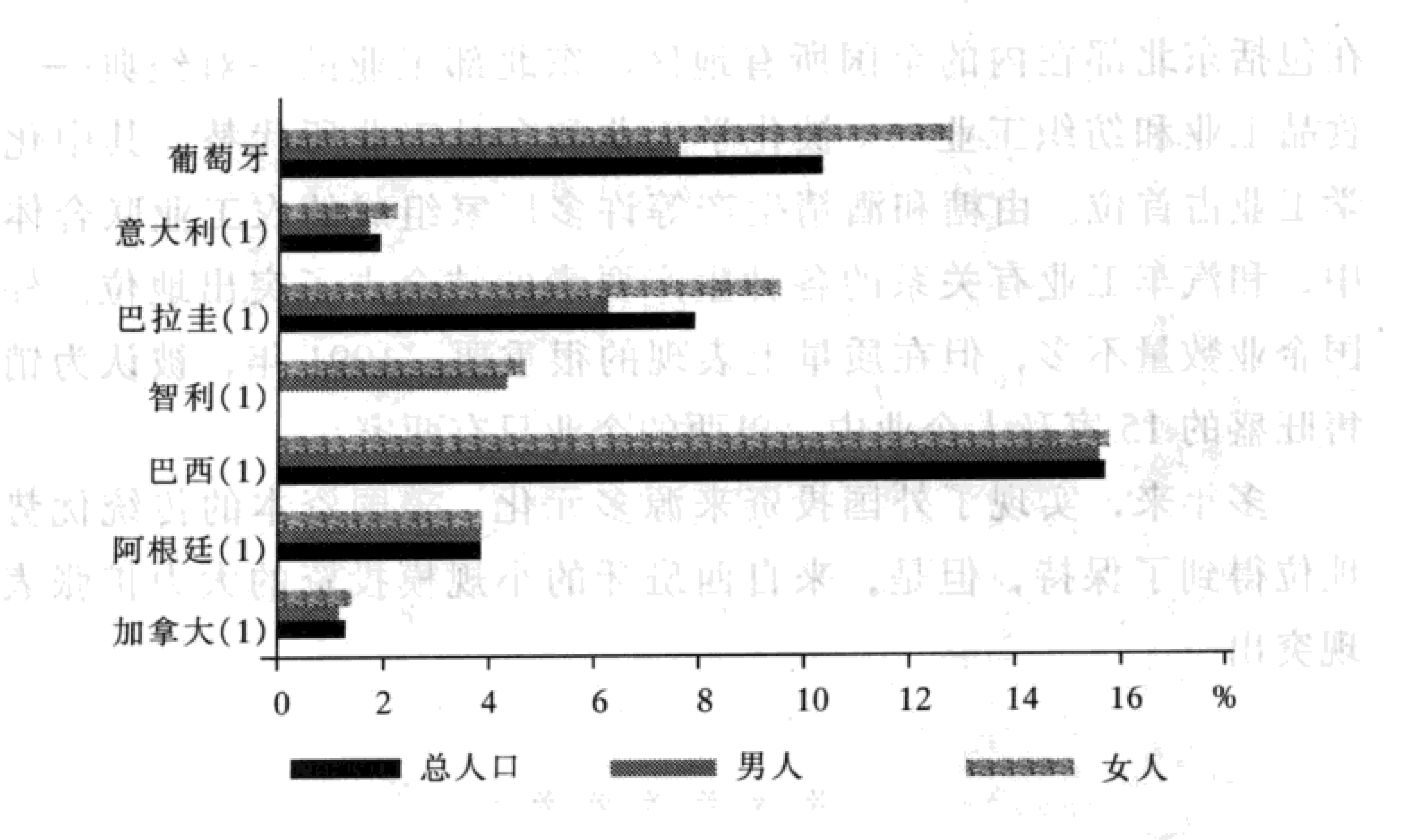


图 3　所选国家 15 岁和 15 岁以上人口文盲比率(1995)

资料来源:巴西地理统计学会,《数字巴西》卷 7,1999,第 133 页。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处 1994 年统计资料。

关于 7～14 岁注册在校儿童的百分比，由于最近几年的努力，新近资料是很积极的。这个进步很重要，因为，这影响着在校儿童指数的改善。表 1 的材料也表明了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还存在差距，但是比想像的要小。

表 1　7～14 岁儿童在校比率户籍记载情况（1997）

单位:%

大区和联邦单位	总数	城市	农村
巴西	93.0	94.5	88.0
北部	91.9	91.9	—
托坎廷斯	92.6	93.9	90.7
东北部	89.4	91.7	85.8
马拉尼昂	89.1	93.1	86.2
皮奥伊	90.6	94.6	85.3
塞阿拉	92.0	93.0	90.2

续表 1

大区和联邦单位	总数	城市	农村
北里约格朗德	89.6	91.1	87.6
帕拉伊巴	91.1	92.0	89.7
伯南布哥	87.4	90.0	80.0
阿拉戈阿斯	80.9	86.0	72.8
塞尔希培	91.7	92.2	90.4
巴伊亚	90.0	92.4	86.4
东南部	95.5	96.2	91.2
米纳斯吉拉斯	94.5	96.1	90.0
圣埃斯皮里图	93.6	95.2	88.7
里约热内卢	95.0	95.2	92.5
圣保罗	96.3	96.6	94.9
南部	94.5	95.5	92.7
巴拉那	93.7	94.7	90.4
圣卡塔雷纳	94.1	95.9	93.2
南里约格朗德	95.9	96.1	94.9
中西部	93.2	95.2	84.5
南马托格罗索	91.1	93.4	79.1
马托格罗索	91.1	93.5	84.3
戈亚斯	93.4	95.8	84.7
联邦区	97.8	97.8	98.1

资料来源：巴西地理统计学会，《数字巴西》卷 7，1999，第 131 页。

不包括朗多尼亚、阿克里、亚马孙、罗赖马、巴拉和阿马帕的农村人口。

应该注意到，近些年来，巴西的教育总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已经走在了一些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前面，正在努力克服几个世纪以来的落后面貌（见图 4）。

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在存在的问题中，以留级和教学质量最为突出。在基础教育中，和公立学校教育存在的缺陷相对照，一些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较高。而在公费的公立大学中，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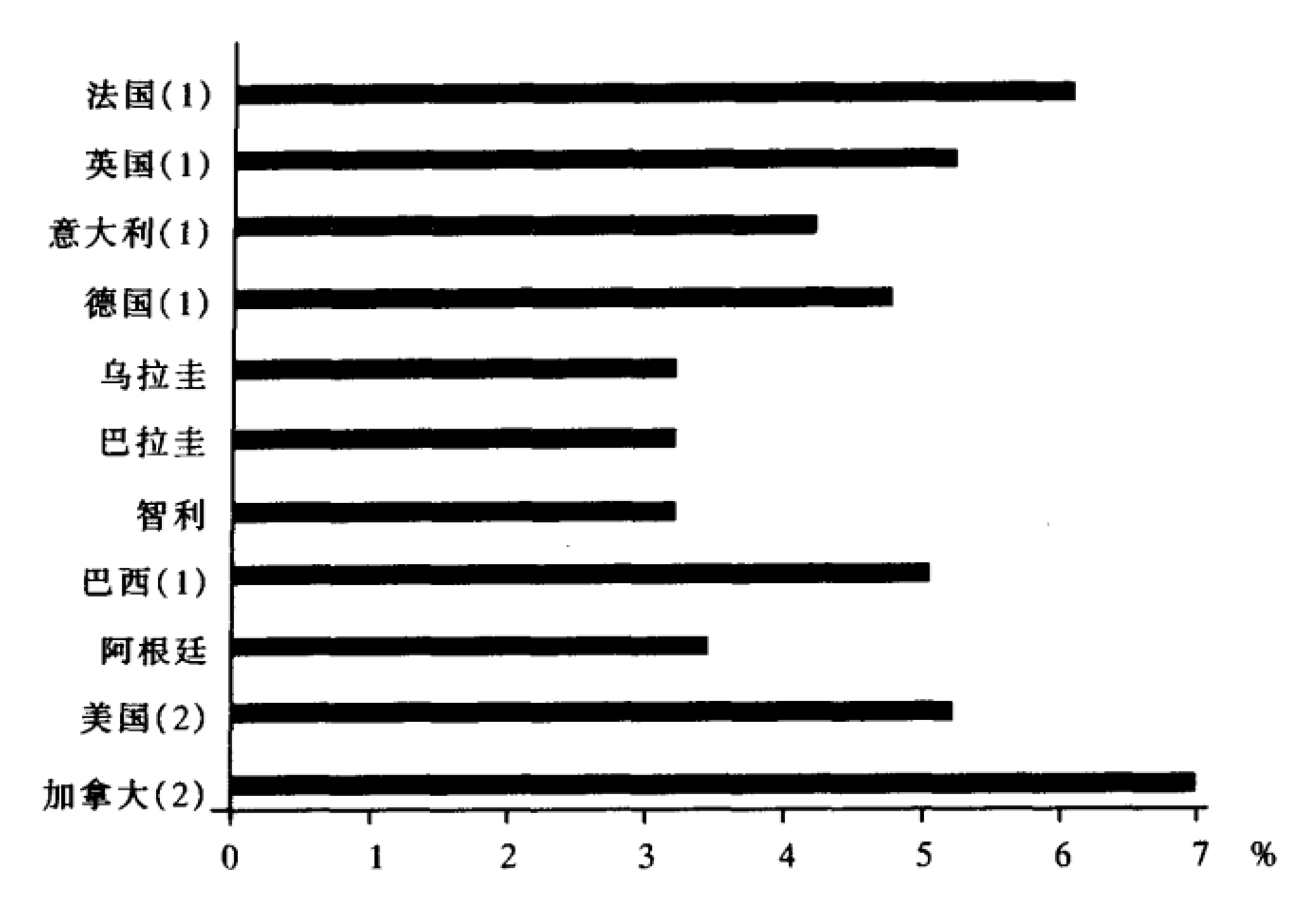


图 4　所选国家的教育总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数字巴西》卷 7,1999,第 131 页。

(1)1995 年资料,(2)1994 年资料。

学情况却恰恰相反。

进入这些公立大学的可能性，是和学生所受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毕业学校的学历以及在家庭或社会关系网中取得的知识——俗称为隐蔽学历有关系的。这样，贫穷阶层和中下阶层要进入公立大学有声望的科系是很困难的。这些社会阶层成为私立高等学校最喜欢招收的生源。私立大学的教学质量相对低些。

当我们注意到，1960 年有 44% 的高校学生是在私立学校注册的情况，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数字在 1970 年增加到 50%，到 1980 年达到了 65%。

另一些标示同时表明了进步和贫穷。健康和就医等综合条件下的平均预期寿命，在 1950～1980 年之间有了重要的增长，从 46 岁上升到 60 岁。这一增长的情况遍及全国所有地区。如果我们把南部地区作为正极，东北部地区作为负极，便出现了以下情况：

在南部，1950 年的平均预期寿命是 53 岁，1980 年将近 67 岁。在东北部地区，这个指数 1950 年相当于 38 岁，1980 年相当于 51 岁。这些指数近些年继续在进步。根据 1999 年的估算资料，总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 64 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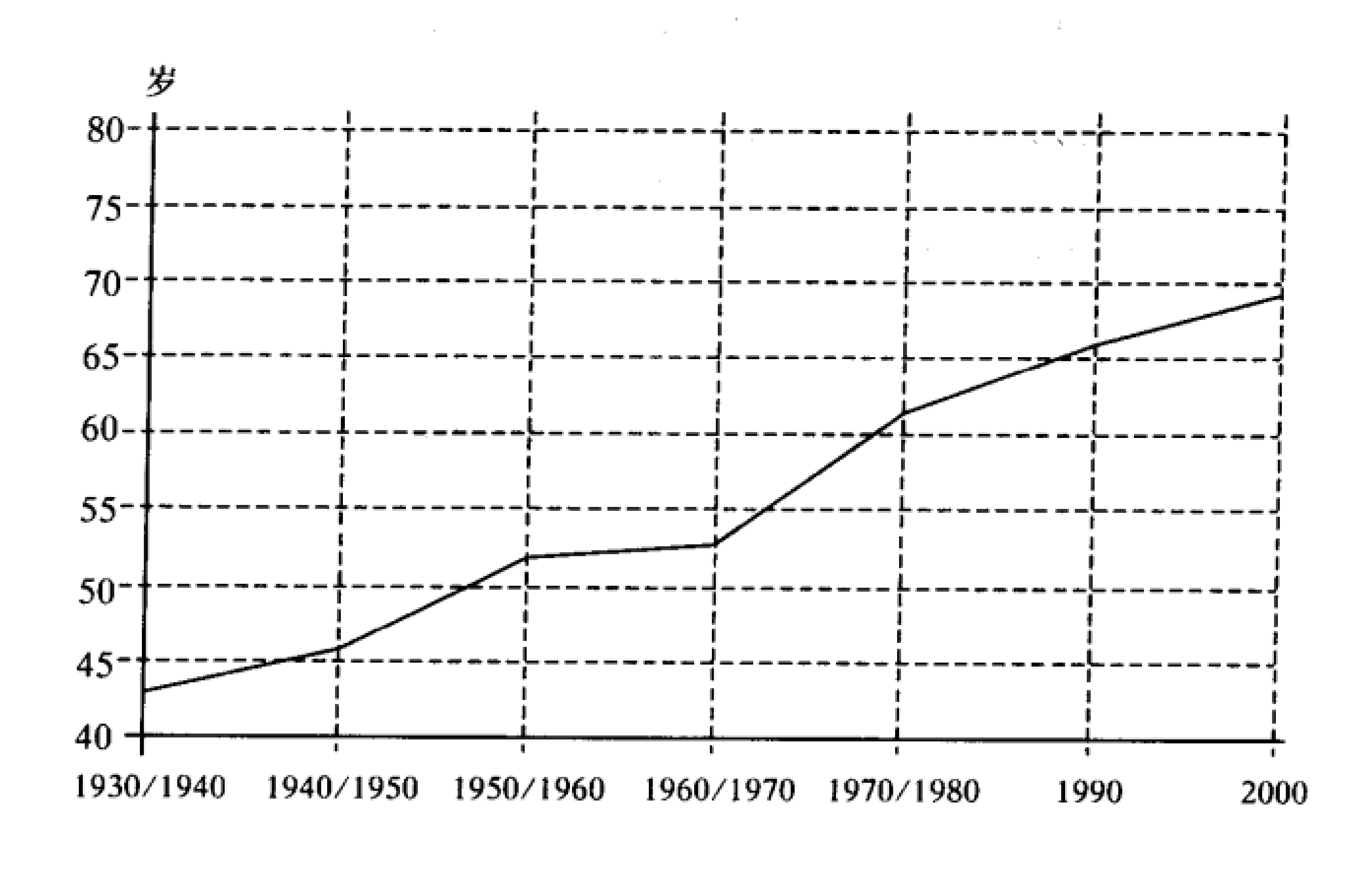


图 5　预期寿命(1930～2000)

资料来源:巴西地理统计学会,《数字巴西》卷 7,1999,第 77 页。
注:这是在 1980～2000 年期间,按人口组成方法,在巴西人口预先计划中的不明确标示。

婴儿死亡率也在下降，这个死亡率指数是由每 1000 个 1 岁之内死亡的婴儿的千分比来衡量的。巴西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比例从 1950 年的 130，下降到 1980 年的 86，到 1999 年下降到了 35.6。

衡量人的生活质量的主要标示表明了发展和贫穷。图 6 显示了这些情况的不同，其中的一些反映在减少婴儿死亡率和改善卫生条件方面。

巴西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问题和绝对贫困分布问题。在财富分配方面，巴西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国家之一。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总体衡量，巴西被认为是一个中上等收入的国家时，这种情况就表现得就更加明显。图 7 对问题的严重性给予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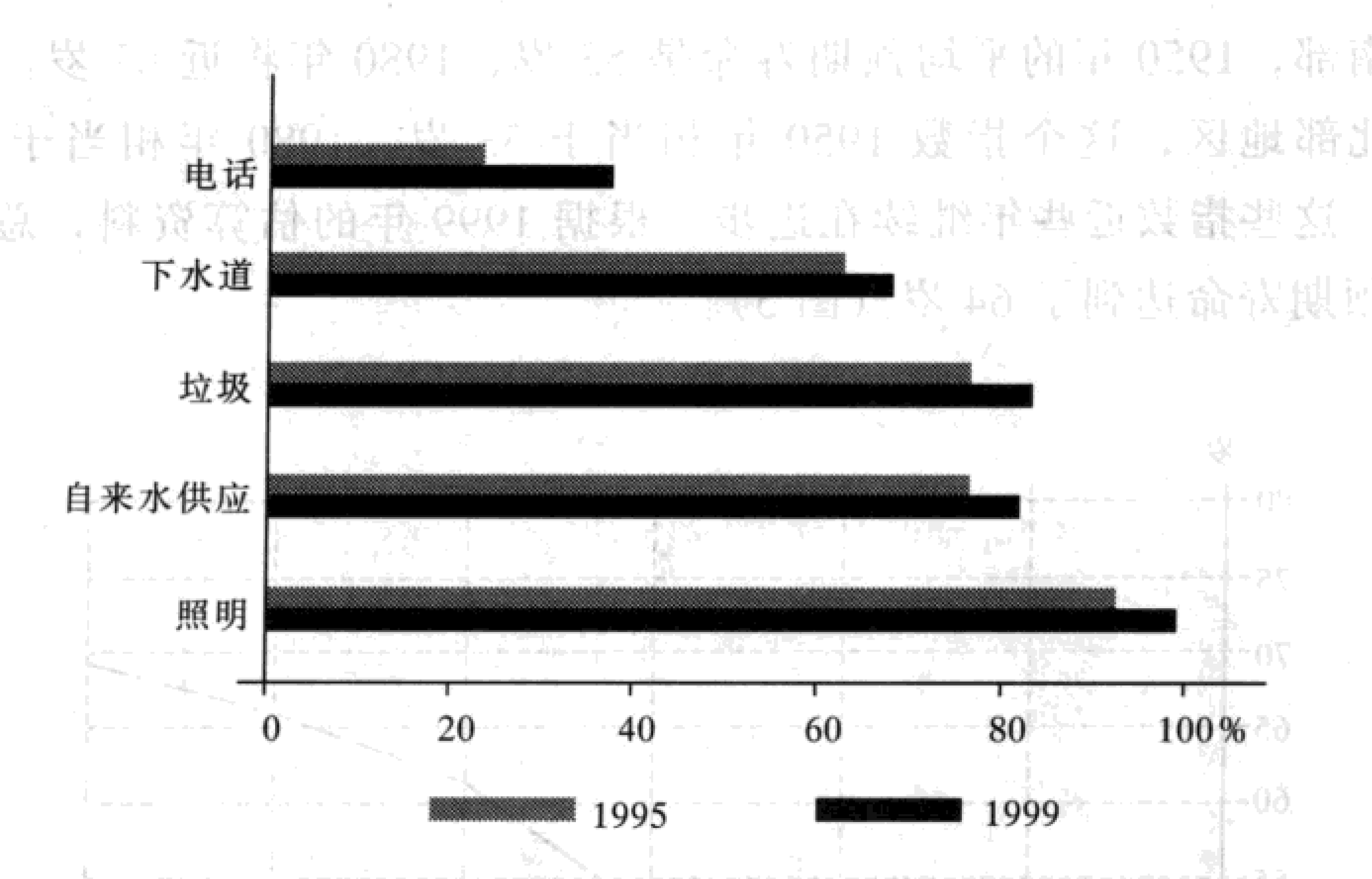


图 6 生活质量、基本建设、享有服务的巴西住户比例

资料来源:《圣保罗州报》2000 年 7 月 21 日,A1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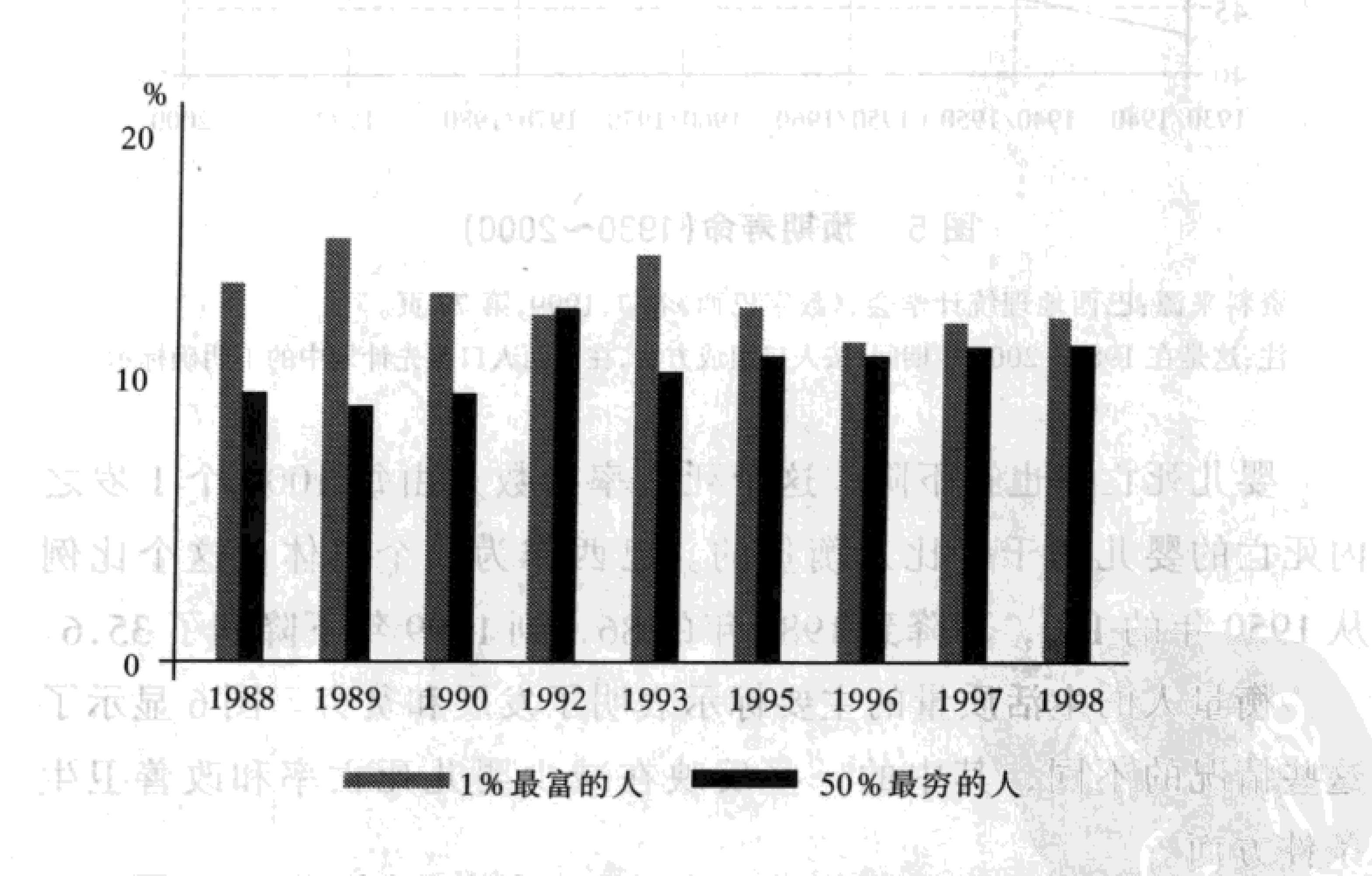


图 7 巴西财富集中情况,收入在全国总财富中所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圣保罗之页》2000 年 4 月 29 日,第 3 版,第 1 页。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0 年间,按国家标准,穷人或极端贫困的人数大大减少了。在 1993～1998 年期间,由于毁灭性的通货膨

胀的结束和物价的稳定，这部分人群的人数从5940万（41.7%），下降到5010万（32.7%）。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非常积极的，但是需要注意到，收入的不平等几乎是一如既往，起码像1980年以来的状况一样。

也存在因性别和肤色的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距。作为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1970年以来，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数日趋增多。在这些因素之中，由鼓励消费伴随的经济大幅度增长——从而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最为突出。许多妇女走出家门，寻找工作，以补充家庭生活费用。在社会关系方面，社会也逐渐认为妇女在绝大部分职业中工作是正常的事了。

但是，劳动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没有消失。参加工作的妇女大部分还是被限制在所谓女性职业中，这些职业在1980年吸收了70%的妇女劳动者。这些职业是家庭佣人、洗衣工、文化水平低的工人、秘书、柜台售货员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才能当的护士。

被认为的女性职业，作为“女人的工作”存在着贬值的倾向。但即使男女从事同样的工作，如果将他们做一个对比，我们也会看到妇女的工资要低于男人。令人好奇的是，这种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别也明显地表现在收入高的高级工作和领导工作中。

在最近几十年里，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发生在宗教系统里。巴西一直是一个天主教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根据1994年的资料，天主教徒仍然占大多数，包括了成年人的2/3左右。但是，其他宗教的发展也很明显。

这些上升中的宗教或宗教分支以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上，根据各自的企图，利用集体治病的神奇疗效和“驱赶魔怪”的招数来唤起人们的激动为特点。这些倾向最明显的例子是受盛大宗教仪式的美国模式的启示，由所谓电子神父引领的一些圣灵降临教会。和占人口3.3%的所谓“历史耶稣教徒”相反，圣灵降临教徒占成年人口的10%，即近1000万人，一般都是在社会的贫苦阶层中吸收教徒。

就是在天主教会范围里，也出现了受美国相似的模式引导的神力革新运动。1994 年，神力教徒占了成年人口的 3.8%。这些人代表着对强调天主教会在社会改革斗争中的作用的倾向的一种反应，他们借助内心世界、家庭关系、在盛大的宗教仪式上宣读宗教经文，一切都带有强烈的保守派烙印。

结　论

首先，对“结论”一语需要做一个解释。一个国家的通史，是从来不能做结论的。原因很明显，因为，不但任何人都不会知道仍在进行中的纷繁事实和过程的发展情况，更不会知道还将发生的另一些事实和过程的性质。也应该注意到，对过去的分析，即使做得再客观，也还是要被置于未来的一些修正和对过去解释的不同观点之下。尽管有这些说明，但有一个结束还是必要的，我想，这对于读者手里的这样一本性质的书还是有用的。

最近 30 年来，在世界上发生了一些还处于继续发展中的彻底性变化。

经济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存在工业化的主导国和生产原料及农产品的附属国之间的工作分工。为寻求廉价劳动力，起码在初期，作为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的回应，许多大型企业把它们工业园的一部分转移到这些国家。这样，便产生了生产过程的国际化。结果，在一些地区，为新的工业化浪潮创造了机会。这种浪潮最重要的表现是在亚洲产生了一些“亚洲虎”。

作为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世界经历了并且还在经历着一场把工业革命抛到后面的技术革命。信息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旧的生产程序被逐渐淘汰，进步集中在科学能力、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造上。

这些变化结束了边缘国家对主导中心国老式的依赖。从属环节在国际方面没有消失，但是其性质变了。随着技术革命，一些拥有原材料的国家步入明显的衰落，从“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变为被抛弃在新经济秩序边缘的孤儿。

在最近20年里，美国的霸主角色，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思想意识选择方面，为善还是为恶，都变成征服性的了。与此同时，第一世界的其他国家在寻求一种史无前例的一体化，由此，形成了由欧洲联盟组成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极。

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和90年代的前几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东欧体系崩溃，从而消除了冷战世界，也显示了专制制度控制下的国营化经济的破产。由世界分成思想意识对立的两个集团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观点失去了支持基础。自由思想体系在经济方面像在政治方面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一些情况下，甚至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加国家最低限度的干预可能克服经济乃至社会不协调的思想。

在这种景况下，包括巴西在内的所谓新兴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组成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集团成为迫在眉睫的需要。南美共同市场——由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组成的公约，迎着无数障碍和困难，在加强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方面，代表着一个重要步骤。当我们注意到巴西和阿根廷达到断绝外交关系地步的对立历史时，我们可以体会走到今天的这一道路的可贵。

关于巴西内政方面，一本历史书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它质问，历史的过去已经变得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克服的今天的许多弊端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一个综合的回答是，尽管过去的所有负面因素——奴隶制、顾主主义、社会对贫困阶层的排挤——现在还有反映，然而毫无疑问，这些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

一睹最近几年的情况，会使我们对正视未来感到谨慎的乐观。这种谨慎是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人都不能保证前进的方向会不断地继续下去，并继续证明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时代总给人们

以好的或坏的惊异。如果这个证明总是真实的，在现代，它更会是真实的，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一方面是风平浪静，另一方面是暴风骤雨，而且，许多时候，这种暴风雨是由从国外向国内吹的风带来的。

在经济方面，巴西努力按照新现实的节拍行动，通过私有化途径，但也不仅仅通过私有化途径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开放。经过一个调整的开始阶段，私有化改善了人民进入许多服务业的状况，像电话就是一个例子，它的应用给人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同时，国家开始正视一些问题，反省了过去的那种认为利用通货膨胀的“奇迹”，可能可以无限扩大公共开支的假想。这样，那种被称为税收责任的东西进入了日程，并导致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用于联邦、各州、市的措施。

如果像经常听到的那样，认为政府的政策将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形象，那是错误的，这些起码在理论上会减少国家的作用。实际上，国家已经改变了它在过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生产代理人的作用，变成作为社会发展的政策中心和私人企业活动的规范者，带着它的问题和成功积极活动在电力和通讯等敏感的领域里。

在持续多年的邪恶通膨“盛会”后取得的通货膨胀的急剧下降，只在财政领域没有产生有益的效果。物价稳定把广大人民中的最贫困阶层从每个月吞吃着他们的工资，使他们变得无力预计未来的真正的税收中解脱出来。尽管地区不平等和社会阶级不平等仍然存在，但是，更多的人享受基本服务业的服务、教育、卫生等权益的指数也都是真实的。所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这并不是为国家涂脂抹粉。社会不平等和比这更严重的、把数百万巴西人排斥在体面生活最起码的标准之外的现实是需要在一段时期内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

尤其在大城市里，众所周知的不安全问题近些年来令人惊恐不安。最严重的是，这种情况仅靠减少贫困和失业还不可能有明

显的改变，尽管这种因素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大破坏连在一起的毒品消耗和犯罪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即中产阶级青少年犯罪在增加。

也需要时刻牢记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失业问题。失业与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的应用和要求劳动者具有高学历、高水平的信息产业的发展有关，也和作为控制公共开支和大力降低通货膨胀的副产品，经济增长减小有关。

从像失业保险等保护措施还远远没有成为欧洲国家所提供的社会福利的保护伞的事实，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失业是巴西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尤其和欧洲相比。由于特权阶层的存在和因薪金收入显然不足而不得不去艰难地寻找新职业来糊口的广大退休劳动群众混在一起，社会保障措施的问题继续存在。

对于未来的首要目标是巩固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目标说来简单，但是，实现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这要依靠有利的总体形势和不仅是国家，而且包括整个文明社会的一致行动。

我们不应该把民主仅仅理解为时不时地参加选举，这并不是否定巴西变成大众民主国家的重要性。要设法为从应对社区的特别问题，到社会代表参与预算等各种民主参与打开空间。还要努力在日常行为中，树立减少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以利于共同努力实现的态度倡导尊重差异和不同意见的容忍精神。

文明社会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迈出了许多很有意义的步伐，不但鼓舞人们认识这些问题，而且要取得应对这些问题的组织形式，尽管取得的结果是有差异的。开展男女平等、争取印第安人权利、反对种族歧视、保护大自然等运动的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一切表明这些运动正在发展，而不是暂时的现象。

巩固和扩大民主的问题和被社会排挤者享有完全的公民权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民主制度只有在和公民更大的福利及一个美好的未来前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条件在巴西变成“普遍的价值”。

这个目标不是唾手可得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它的实现要依靠许多因素，要把结构局限性和人的能动性结合起来。认为未来是一个“天堂”的观点是幻想，但是，作为回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巴西是注定要失败的。

